

中亚史纲要

加文·汉布里 主编

商务印书馆



中 亚 史 纲 要

加文·汉布里 主编

吴玉贵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Gavin Hambly

CENTRAL ASIA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69

据纽约德尔出版公司1969年英文版译出

ZHONGYÀSHÌ GĀNGYĀO

中亚史纲要

加文·汉布里 主编

吴玉贵 译

责任编辑：赵琪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42-2/K·233

199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7千

印数 1200册

印张 11 1/4

定价：10.40元

译者的话

汉布里主编的《中亚史纲要》先后出版过德文(1966年)、英文(1969年)两种版本,译者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原书共二十章,我们只翻译了前十五章。所译部分的时间断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阿契美尼王朝至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即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现代中亚格局的形成,基本上包括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中亚历史。

中亚史头绪繁多,史料零碎、分散,具有相当的难度。本书以较小的篇幅,清晰地勾勒出了历时两千多年,错综复杂的中亚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亚史的发展进程;而且由于各章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所以对中亚史各个阶段有重大争论的问题,大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不同于一般通史性著作的泛泛而论;同时在“注解”与“参考书目”中,编者还特意具列了中亚史研究各个方面的基本书目,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看作研究中亚史的入门读物。

本书最明显的缺憾是“详于西而略于东”,即对于中国中亚地区的历史以及中国历代王朝在中亚的活动着墨不多,但是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这恰恰可以弥补我们对中国中亚地区历史知之较多,而对国外中亚历史知之较少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了解中亚地区的历史。

1982年,已故的马雍老师嘱我翻译此书,以作为学习中亚历史的门径,其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断断续续,拖了七年之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深切地感到自己在专业知识与语言水平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译文中肯定有很多错误,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有些中亚专用名词,在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史书中,以及在同一朝代的不同著作中,都有各种不同的译法,要严格按照古代各朝已有的译名来译写中亚专名,不仅以我的学力无法做到,而且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译文中除了少数专名外,我们尽量采用了目前我国中亚学界较为通行的译名。其他译名都是按照商务印书馆颁发的“译写通则”翻译的。

本书正文以及“注解”、“参考书目”中出现的德、法、俄以及波斯、阿拉伯、蒙、梵等文字的书名和专名,译者请教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刘迎胜、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宋力道、美国研究所任越以及历史研究所耿昇、宋岬、余太山、宋晓梅等先生和师长。此外马雍老师生前曾校阅了导言和第一章,余太山师长审读了第一、二、三、四诸章的译稿,陈高华老师、郝镇华先生以及王谭师兄也热情地给予了译者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赵琪先生不厌其烦地对译者进行了具体指导,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书附有一页“编者与撰稿人简介”,现译出供读者参考:

本书主编加文·汉布里是耶鲁大学印度史副教授。他曾经就学于莫尔文和剑桥皇家学院,并且在剑桥获得了印度史博士学位。从1961年至1968

年，经由斯玛茨英联邦纪念基金会倡议，他在伊朗、土耳其和印度为英国对外文化协会工作，其中，1963—1964年是在剑桥度过的。汉布里博士是《莫卧尔印度的城市》一书的作者，此外他还发表了有关印度和伊朗历史的数篇论文。汉布里博士现在正在撰写关于十五世纪赫拉特的专著。在本书中，除了《导言》之外，他还撰写了第5—9，第12—13各章。

第14章的作者亚历山大·德邦尼格桑在巴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工作。

第1章至第4章的作者大卫·比瓦尔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工作。

第11章的作者玛欣·哈吉扬普尔是加文·汉布里的妻子，她出生于伊朗德黑兰，曾经就学于德黑兰大学。

第10章由尚塔尔·勒梅尔西埃—凯尔克热撰写，他在巴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工作。

第15章的作者理查德·皮尔斯是安大略金斯顿之奎因斯大学的教授。

吴玉贵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9年11月

目 录

原序	1
导言	3
第一章 阿契美尼王朝与马其顿帝国: 稳定与动乱	24
第二章 游牧帝国与佛教的传播	49
第三章 中亚的萨珊人和突厥人	70
第四章 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90
第五章 西藏文明的建立	110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一生	120
第七章 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	138
第八章 金帐汗国	157
第九章 察合台汗国	174
第十章 哈萨克与乞尔吉思	192
第十一章 帖木儿帝国与乌兹别克对河中地区的征服	204
第十二章 昔班王朝	221
第十三章 乌兹别克汗国的衰落	236
第十四章 沙皇和苏联统治下的突厥人	252
第十五章 俄国的征服及其对突厥斯坦的管理	277

地 图.....	299
第 1 图 中亚(299)	
第 2 图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扩张(299)	
第 3 图 阿契美尼朝与帕提亚(安息)时期的伊朗与西南亚地区(300)	
第 4 图 印度—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301)	
第 5 图 十二世纪末的蒙古地区(302)	
第 6 图 察合台汗国(302)	
第 7 图 十三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蒙古帝国(303)	
第 8 图 哈萨克诸帐	
第 9 图 帖木儿朝与昔班朝时期的河中、呼罗珊以及伊朗西部地区(304)	
第 10 图 俄国对中亚的征服(305)	
注解与参考书目使用的缩写.....	306
参考文献要目.....	307
索引.....	326

原 序

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中亚”主要是指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但是，因为在许多世纪中，中亚诸民族与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区边缘邻人的交往几乎没有中断过，本书作者感到，有必要多次涉及到发生在中亚边界之外的历史事件和民族迁徙。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试图对中亚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的叙述。编者之所以准备刊印这本书，就在于急切地感到，就中亚历史来说，以前缺乏从类似的角度进行概括研究的范例。但是从一开始，笔者就认识到，以这本书的规模而言，对历时二千五百年，见诸记载的历史进行全面论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简要叙述，以集中反映笔者感到具有特殊意义的中亚历史的各个方面。这样就不得不删去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希望更详细地了解中亚史的读者，应该查阅注解中所引参考书目和本书具列的参考文献，主要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注解（汉译本改为页下注——译者）和参考书目放在一起。

读者应该注意到，在导言中，对于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一般讨论，主要是关于前殖民时代和前工业化时代的中亚环境，在

这里,作者很谨慎地使用了过去时。读者还应该注意,在处理大量互不相关的语言的原始材料,将中亚名词译为英语时,本书撰稿人没有刻意强求一致。

加文·汉布里
于耶鲁大学

导 言

1

中亚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这一特点导致了中亚降雨量的稀少，由于缺乏雨水，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变得异常干燥。这种地理上与海洋隔绝的状况，历史上相应的表现为中亚各民族都被排斥在海上探险、贸易或者政治扩张活动之外，而至少自十八世纪以来，海上探险、贸易以及政治扩张等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中亚常与相邻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实际上，在撒哈拉以北的东半球上，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中亚那样，不受外部压力的干扰——至少在十八世纪俄国、中国开始将他们的疆域扩拓到草原地带之前是如此。

中亚是一片浩渺无垠的沙漠和草原，这种浪漫主义的说法虽然不无夸张，需要补充，但决不能说是错误的。作为一般叙述，我们完全可以说，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区，也就是中亚边界终止的地区——例如在北方，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南缘相接。中亚的南界，则由一条将近四千英里，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山链标志出来。这些山脉从中国一直延伸到里海，挡住了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东方向的通路，由东往西，这些山脉是南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苏斯山、厄尔布尔士山和高加索山脉。虽然昆仑山脉实际上是无法通行的，而喀喇昆仑山的通道在十九世纪之前，也许就没怎么被人利用过，但仅只是这一山

链的个别地段,才是人们无法翻越的壁障。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苏斯山以及厄尔布尔士山,从来就没有阻挡过南北方向的民族迁徙运动。在这山链的南面,是两个在历史上与中亚本土有着不解之缘的高原。西藏高原从其南面被喜马拉雅山所环抱,伊朗高原的东南侧是吉尔特尔山脉和苏来曼山脉,它的西南侧是扎格罗斯山脉。

要确定中亚东部和西部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在东部,大体可以沿着中国长城划出一条界线,然后从热河,沿着满洲森林地带向北延伸。但在西部,乌克兰草原则一直延伸到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构成了中亚草原地区地理和历史的延伸。

尽管沙漠和草原在中亚占有显著优势,但中亚还是有其复杂的自然特色。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最低的凹地,例如位于里海东北部和新疆吐鲁番周围的凹地。而且中亚地区的气温差别也是极为悬殊的。大致位于北纬 35° 至 55° 之间的中亚地区,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沿锡尔河与天山山脉划一条假想的线,将它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中亚北部虽然有部分地区是干旱的,但其大部分地区都很湿润。湿润的气候,为中亚北部提供了广袤的牧场,对于游牧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俄国和中国农业移民出现之前,游牧生活一直是统治着中亚北部地区的突厥和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

几乎无雨的南部地区是非常干燥的,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在苏联政府兴修了大量灌溉工程之前,中亚南部的居民大多被限制在绿洲和大河流域。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
3 很古的时期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伊朗文明和伊斯兰教的

影响，久已成为中亚南部地区都市和绿洲的特色。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中亚南部地区对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此，虽然来自天山北部的游牧入侵者一次又一次地掠夺和侵略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地区，但他们从不大批地停留在此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不但牧场贫瘠，而且由于缺乏水，还得被迫从事吃力的水利工程。

从里海南岸到贝加尔湖沿岸，分布着一系列大山脉，与中亚的沙漠和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山脉中，最高的是帕米尔山脉。帕米尔山脉从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交汇处向北延伸，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世界屋脊”。慕士塔格峰高达24388英尺，公格尔峰的有些峰巅则超过了25000英尺。帕米尔山脉将塔里木盆地与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分隔开来，接近帕米尔西部和北部的，是一系列较小的山脉，这些山脉环抱着一些河谷，锡尔河和阿姆河就是通过这些河谷，向下游流入了平原地带——巴达赫尚和费尔干纳。在中世纪的旅行者中，巴达赫尚以其绿松石和红宝石著称。肥沃的费尔干纳则在中国唐代被誉为“天马之乡”。天山位于帕米尔的东北方，向东一直延伸到了戈壁。天山将位于其北部的肥沃的伊犁河流域和准噶尔与南部干旱的塔里木盆地(喀什噶里亚)分离开来。除了东面以外，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从三面环绕着塔里木盆地。与险峻的昆仑山脉不同的是，天山从来没有阻碍过南北两个地区的相互交流。在这一点上，天山与更高的帕米尔山脉倒是不无相似之处。在中国以“天上的山”知名的天山，是亚洲最大的山脉之一，汗腾格里峰高达23600英尺。

天山东北部，突起着高约10000英尺的阿尔泰山脉，这里是突

4 厥民族的传统居地。连接天山与阿尔泰山的，是一系列低矮的山脉，即准噶尔西部山地和塔尔巴哈台山。在这些山脉中，贯穿着一些较长的河谷，这些河谷是游牧民族经常从准噶尔盆地和戈壁地区进入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通道。由阿尔泰山再往北，往东，是座落在外蒙古境内的东、西萨彦岭。萨彦岭几乎一直延伸到了贝加尔湖。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了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附近。除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中国东干人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在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族文明的影响。

山地地形对中亚各民族的迁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沙漠的影响至少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里海与威海之间的乌斯季乌尔特；科彼特山脉（东厄尔布尔士北面的悬崖）和阿姆河之间的卡拉库姆；将阿姆河下游地区与锡尔河下游地区分开的克孜勒库姆；锡尔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半沙漠地带别特帕克达拉草原（以“饥饿草原”著称）；将内外蒙古分开的大戈壁；以及位于天山南部，斯坦因认为可能是世界上沙丘覆盖的沙漠中最可怕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所有这些沙漠都对中亚的民族迁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塔克拉玛干风蚀黄土带的东面是罗布泊（古代罗布泊的盐壳，最初由西南到东北，绵延大约 160 英里，最宽处大概有 90 英里），在这之外，还有白山。塔里木盆地、疏勒河盆地和额济纳河盆地，也是三个极为荒凉的沙漠。正是这一点，使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假定，中亚地区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干旱和周期性的气候变动。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斯坦

因的考古发现所否定。斯坦因断定：

就我们能够追溯的古代遗址和可靠的记录来看，古代在塔里木盆地巨大的低压槽内的气候环境，几乎与现在是同样干旱的。另一个结论⁵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内，由大河带来的水量大大减少了^①。

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困难得多。

就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成就诸方面来说，中亚最重要的地区，恐怕非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莫属了。在希腊人那里，阿姆河和锡尔河分别以 Oxus 和 Jaxartes 知名，而阿拉伯人则分别将它们称为 Jayhun 和 Sayhun^②。阿姆河以南，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伊朗的卡维

^① 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斯坦因《腹地亚洲》),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25, 489. 参见 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亨廷顿《亚洲的脉搏》), London, 1907.

^② 关于阿姆河河道的争论，见 V.V. Barthold, *Nachrichten über den Aral-See und den unteren Lauf des Amu-darja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XVII. Jahrhundert* (巴托尔德《关于咸海和阿姆河下游的报道——上古至十七世纪》), Leipzig, 1910. B. Spuler, *EI*, sv. 'Āmū-Daryā' (《伊斯兰百科全书》，斯普勒“阿姆河条”).

尔盐漠,是阿拉伯人叫做呼罗珊的地区(它比现代伊朗同名的呼罗珊省要大得多)。中世纪时,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有你沙不尔、徒思(后来被马什哈德取代)、木鹿、赫拉特、巴尔赫^①。这些城市都因其商业活动、精湛的手工艺,特别是金属工艺而闻名于世。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之间的地区,希腊人称为 Transoxania,阿拉伯人称为 Mawarannahr。在穆斯林时期,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是这里最重要的都市中心。花刺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正南。中古时期,玉龙杰赤^②是花刺子模的首府。玉龙杰赤的地位后来被希瓦取代,一直到十九世纪,这里附近的地区都称为希瓦。在锡尔河以外,河中地区的东北是赭时,即塔什干周围的地区。象费尔干纳附近的城市一样,赭时的城市虽然在规模上与重要性方面,都无法与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城市相提并论,但这些城市在中世纪以制造甲仗、兵器、马具而驰名于世。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使这些城市更易于受到相邻的游牧社会周期性变动的冲击。河中地区及其邻近地区除了不相称地产生了大量穆斯林学者、艺术家以及技艺精湛的工匠外,还在连结远东、中东和地中海世界的横贯大陆的商业网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正是因为河中地区在交通中的作用,河中地区居民的高超技艺,使河中地区在中亚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中亚商队贸易,有许多不同的路线,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连结中国与西方的道路。在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建

① 你沙不尔 (Nishapur), 今译内沙布尔, 徒思 (Tus) 今译图斯, 木鹿 (Marv) 今苏联马雷, 巴尔赫 (Balk) 即缚噶。——译者

② 玉龙杰赤 (Urganj), 今译乌尔根奇。——译者

立之前,穿越喀什噶里亚的道路,恐怕是最常走的路线了。从甘肃境内的敦煌绿洲出发,或者沿着塔克拉玛干南缘的道路,由阿尔金山脉北麓,到达和田和叶尔羌,然后再翻越帕米尔;或者沿着罗布泊到哈密、吐鲁番^①,再穿越库车、阿克苏,抵达喀什噶尔,到达帕米尔。对于到达了吐鲁番的商队来说,还有第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即由吐鲁番往西北,进入准噶尔,到达七河地区,离开天山南下至锡尔河。

从锡尔河起,商队或经威海、里海北部草原,进入黑海地区;或者渡过锡尔河(通常是在讹答刺渡河),进入河中地区。或由此前往花刺子模地区的玉龙杰赤,或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在这里可以与那些由帕米尔穿越费尔干纳谷地而来的商队汇合(通过帕米尔南部的商道,则进入巴达赫尚,再进而到达阿姆河之南的巴尔赫)。虽然从布哈拉去喀布尔和印度的商队,是在阿姆河上游巴尔赫方⁷向渡过阿姆河,然后穿越兴都库什山,但是从布哈拉往木鹿的道路,则经常是在查尔朱方向渡河的。从木鹿起,那些商队或者是在巴尔赫集中,或者取道前往你沙不尔,由此再至赖依(现在的德黑兰附近)。在这里,有几条道路可供选择:或南下伊斯法罕,或西南行至哈马丹和巴格达,或由正西到大不里士和拜占庭。

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政治环境自然总影响到商路的重要性、安全性以及商路的繁荣状况。例如,在十三世纪蒙古统治的和平时期,与通过喀什噶里亚的古代道路相比,人们宁愿选择经由七河流域和准噶尔的天山北麓的道路。在十七、八世纪,俄国人入侵到

^① 在汉代,这条道路经由罗布泊抵达库勒。见斯坦因上引书,第394—5页。

贝加尔湖地区以后，许多商队则宁愿走极北的森林边缘地带，因为在这一地区，他们至少可以在商路的某些地段，得到俄国人的保护。

中亚商道路程极为遥远，即使不说战争和盗匪的危险，在路途中最可能碰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就足以令人心惊胆寒。商路运输依靠马、骡、驴、西南地区的单峰驼和巴克特里亚高寒地区的骆驼、高原地区的牦牛和犏牛（一种野牦牛和黄牛的杂交种牛）以及由马、牛、驼拉的车等畜力运输。这种畜力运输方式不仅未必比船运安全，而且要比船运慢得多。这些遥远的路程，对于乘邮传的信使和备有换乘马匹的骑兵来说，走起来是很快的。但是对于一位旅行者——商人、朝圣者或者纯粹的探险者来说，骑着步履维艰的牲畜，要走这样远的路程就要困难得多。世界上干旱地区中最重要的驮畜是骆驼，一般说来骆驼空载时，每小时可以走4英里，重载时，每小时走2.5英里至3英里。平均负载300磅的货物，每天也许可以行走30英里^①。根据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记载，在喀尔喀地区，能够负载五百磅的庞大的蒙古驼，每天可以行走28英里，与此相比较，蒙古马每天可以行走40至47英里，而青海地区的骆驼，一天则不超过20英里^②。

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给我们留下了由北路从黑海到中国的记述，他生动地描述了这条中世纪旅行者艰辛地横

① 感谢伦敦动物学会图书馆，向我提供了这些数字。

② N. M. Przhevalsky, *Mongolia, The Tangu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ibet* (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唐古特地区以及北部西藏的荒漠》), 2 vols., London, 1876, I, 64.

穿中亚的通道^①。以中国为最终目的地的商人,从顿河口出发,最初乘牛车走 25 天,或者乘 10 天至 12 天马车,抵达阿斯特拉罕地区附近的伏尔加河。在这里,他们可以绕道溯河而上,到达金帐汗的驻蹕地萨莱,由萨莱顺伏尔加河而下,可以航行到里海,然后由乌拉尔河上溯,至那海鞑靼的主要居住地小萨莱,这段路程航行只需要 8 天,比走陆路少 4 天。从小萨莱往后,由于马料缺乏,再加上欧洲人不习惯骆驼的颠簸,所以他们经常乘坐骆驼车。从小萨莱到玉龙杰赤,乘坐骆驼车需要 20 天(根据与裴哥罗梯同时的伊本·拔图塔计算,需要 30 到 40 天)。从玉龙杰赤到讹答刺,还需要乘坐 35 天或 40 天骆驼车。大多数商人取道玉龙杰赤,是为了在这里做生意。如果从小萨莱直接到讹答刺,则只需要 50 天左右,比走玉龙杰赤要快。驮驴从讹答刺通过七河流域,进而抵达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据计算需要走 45 天。从阿力麻里穿过准噶尔,到达甘肃走廊的甘州城(张掖),驮驴还需要走 70 天。从甘州城起,旅行者至少还有骑马往前走 40 天至 45 天的路程,才能到达杭州(马可波罗称之为“行在”)。从甘州到北京,也还需要 30 多天。整个行程至少需要 9 个月时间。即便如此,裴哥罗梯可能还是失之于乐观了。因为他没有将路途上几乎无法避免的延误计算进去,而大多数商队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到这种延误。与此相比较,十分有趣的是,在满洲人的统治下,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商队,在路上估计要花费 10 到 12 个月的时间^②。

^① F. B. Pegolotti, *La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 ed. A. Evans (埃文斯编,裴哥罗梯《通商指南》), Cambridge, Mass., 1936.

^② D. Carruthers, *Unknown Mongolia* (卡拉瑟斯《未知的蒙古》), 2 vol., London, 2nd edn., 1914, II, 446.

9 与其说是通过不时的战争的冲击，倒不如说是通过经常的商业生活的联系，位于中亚边缘地区的定居社会，开始与中亚各民族熟悉起来了。中亚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民族势力消长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极为复杂的语言上和种族上的类型，但是至少到十八世纪末，中亚民族与语言的一般趋势都是突厥民族和语言取代了中亚古代祖先的民族和语言，或者说是突厥民族和语言在中亚占有优势地位。甚至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也丝毫没有使这种趋势发生改变，尽管突厥部落贵族，后来就象真正的蒙古人一样，自豪地声称他们的血统出自成吉思汗或成吉思汗的将领。

无可置疑，在绿洲和城市以外，中亚一直是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地区。中亚人口密度低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普遍干旱和缺乏雨水的气候环境所致。但这也是由于游牧经济的需要——与灌溉农业需要巨大的人力相反，游牧经济需要有广阔的牧地。中亚粗放的畜牧业，与那些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地区，例如中国北部，是迥然相异的。也许象有些人主张的那样，中亚人口稀少的原因，是由于极端寒冷的气候（象在西藏高原）和连续的骑乘生活，降低了人的生殖能力^①。

中亚人口统计学材料之间的相互抵牾，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中亚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中亚人口统计学，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激烈争论的问题存在下去。因此，下

^① 例如埃克瓦尔就持这种观点。见 R. B. Ekvall, *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埃克瓦尔《甘肃——西藏边缘地区的文化联系》), Chicago, 1939, 81.

列人口数字的目的,仅仅是试图根据现在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一个很粗略的轮廓^①。至于人数非常少的一些少数民族以及中亚的汉族、斯拉夫移民,在本表中都没有具列。

乌兹别克	600 余万	突厥穆斯林
维 吾 尔	400 万左右	突厥穆斯林
东 干 人	400 万左右 ^②	中国穆斯林
哈 萨 克	400 万弱	突厥穆斯林
蒙 古 族	300 万左右 ^③	佛 教 徒
藏 族	300 万弱	佛 教 徒
塔吉克族	150 万 ^④	突厥穆斯林
土库曼人	150 万	突厥穆斯林
吉尔吉斯	100 万	突厥穆斯林
喀喇喀尔帕克	20 万弱	突厥穆斯林

在创办工业和引进机械运输之前,中亚地区实际上没有什么 10
工业和机械运输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1917 年。由于许多世

① 有关1953年新疆人口数和1959年苏联中亚人口数,见W. A. Douglas-Jackson, *Russo-Chinese Borderlands* (道格拉斯—杰克逊《俄中边界》), Princeton, 1962, 12。关于苏联中亚人口统计学方面更详细的情况,见L. Krader,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克拉德《中亚诸民族》), 171—218。

② 大部分东干人(现在称为回族)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和陕西,居住在新疆的不到五十万,还有更少的一部分在苏联境内。赫德森采取了一百万的数字。见G. F. Hudson, 'The Nationalities of China' (赫德森《中国各民族》), *St Antony's Papers*, VII, London, 1960, 60。苏联估计的数字,则要高得多。见'The Dungans in China' (《中国的东干人》), *CAR*, 1961, 201。

③ 蒙古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部分,在外蒙古有一百多万,内蒙古和巴嘎不到二百万,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不到三十万。此外,还有1965年卡尔梅克自治州重新安置的十万卡尔梅克人,新疆卫拉特人的数字也与此差不多。

④ 这个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另外在阿富汗还居住着二、三百万塔吉克人。

纪演化的结果,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异,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但在有些方面又是相互对立的。第一种生活方式,是由存在于河流沿岸,例如扎拉夫尚河和塔里木河,或者绿洲地区的农业社会构成的。完备的水利设施,为这些地区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些定居地区(卡拉库姆沙漠中的木鹿绿洲是最典型的例子),形成了被沙漠和草原包围的很小的农业岛。虽然这些农业岛通常是相互孤立的,但一般说来,在多数日用必需品方面,它们还是可以自给的。在这样的绿洲和河流渡口,形成了一些乡镇。这些乡镇不仅发展成了当地一些贵重产品的制造和传播中心,而且还在横贯大陆的商队交通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些乡镇所处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其居民中产生了一种公认的“绿洲思想”,这种思想的特点,就是缺乏智力上的求知欲,这种情况仅仅由那些来往从事商队贸易的人,部分地得到了补偿。至于那些都市的名流学者们,他们的文化,通常不外乎是中国或伊朗文化的延伸。至少在中亚西南部,正是这些中心都市扮演了伊斯兰教文明渗入中亚的先锋的角色。几乎一直到了十二世纪,在河中地区和喀什噶里亚西部的诸城市中,还保留着伊朗文化的余脉。所以,从伊斯法罕或马什哈德前往布哈拉、叶尔羌等地的旅行者,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就会发现那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

中亚地区另一种更具特色的生活方式,是草原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草原环境对于游牧经济是非常有利的。游牧经济使牧人们避免了土地耕作的劳累,同时也使他们免于长期定居一地。牧民们拥有驯鹿、马、骆驼、羊、牛、牦牛等家畜,依靠这些家畜,他们

获取了食品、衣物、帐篷、燃料、运输工具以及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被用来与定居的邻人交换粮食、铁器等游牧生活无法提供的必需品^①。所以，游牧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几乎自给自足，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了他们以足够的灵活性，使他们在与农业社会对垒的战争中，具有了压倒的优势。如果他们是狩猎者或牧马者，这种优势就更其明显，因为狩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其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游牧民族对于他们的牲畜的依赖性，也是值得强调的。羊群和牛群的损失，对于游牧民来说，就意味着饥饿。这种依赖因素，有力地限制了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因为他们从来不愿意将牲畜驱赶到缺乏水和草场的地方去。游牧民族自己可以在很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为了免于袭击或逃避追击，甚至可以小部分地进入最荒凉的沙漠地区，但他们不可能要求他们的牲畜在不遭受重大生命损失的前提下，能够具有同样的耐性。所以，尽管游牧民族的流动性与沿河的定居者和绿洲的耕种者相比，是十分惊人的，但

^① 我们可以介绍下列文章作为入门读物：J. L. Myres, 'Nomadism' (迈尔思《游牧生活》),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41; R. Patai, 'Nomadism: Middle Eastern and Central Asia' (佩特《游牧生活：中东与中亚》), *SJA*, 1951; E. E. Bacon,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Southwest Asia' (培根《中亚和西南亚游牧生活的类型》), *SJA*, 1954; L. Krader,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Asiatic Steppe-Pastoralists' (克拉德《亚洲草原畜牧者之组织原则与结构》), *SJA*, 1955; idem, 'Ecology of Central Asia Pastoralism' (同作者《中亚畜牧生活生态学》), *SJA*, 1955; idem, 'Ecology of Nomadic Pastoralism' (同作者《游牧社会生态学》),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59.

是除了在特别危急的时刻之外，这种流动性还是受到了距离和地区的局限。如果游牧民族的牛、羊、马，在一定的地区和距离之内，能够安全地牧放，他们就不会无谓地消耗牲畜的体力。那种认为游牧部落总是驱赶着不计其数、不知疲倦的牛羊群，倏忽往来，横行亚洲的看法，是凭空夸大了游牧生活中的自然潜力。实际上从冬牧场往夏牧场迁移的距离，通常是比较短的，这种迁移仅仅是代表气候和高度的一种显著变化。例如天山中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在露天夏牧场下面仅仅几英里处隐蔽的山谷中渡过冬天，夏牧场距离它下面的过冬住所只有几千英尺之遥。游牧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总是显示出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

12 得到一个普遍的原则，或者根据对十八或十九世纪的蒙古社会，甚至根据对哈萨克社会所作的观察中，得出关于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结论，都是轻率的。由于缺乏定居社会因素的影响，中亚游牧生活有它自身发展进化的历史，这不仅可以从游牧生活内部的紧张关系中反映出来，而且也可以从与中亚接壤的诸文明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上反映出来。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一个游牧成员，不仅是自己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也是一个氏族或胞族、一个部落、有时甚至是一个部落联盟的一分子。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单位，游牧成员都得承担一种明确规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长期形成的相互间的忠诚和义务的传统基础上的。不管是家庭、氏族还是部落，首领都是关键的因素。因为没有首领，牛群和羊群就得不到保护，牧场和水井就无法保卫，入侵的邻人就不能被击退，掠夺性的远征也就无从进行。后来，在中亚游牧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开始促进家庭和团体

之间的等级关系的发展。这种等级关系被很确切地称为“游牧封建主义”。作为一名首领，除了真正勇敢的品质和突出的个性之外，当然是由各种因素的结合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大量的畜产，众多的奴仆，历来享有部落和氏族的忠诚以及高贵的门第等等。十三世纪以后，在中亚大部分地区，对于一位首领来说，能够自称出自成吉思汗的血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先决的条件。在中国边境地区，“皇台吉”这一王子的称号，终于变成了成吉思汗后裔的意思。

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洲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以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 13 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性的习惯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然而，虽然游牧者在杀戮生灵方面是不择手段的，但他们并没有沉迷于中国封建王朝和拜占庭帝国那种极端残酷的行为之中。游牧者总是瞧不起绿洲的定居居民，例如，蒙古人虽然经常追求中国的金银、丝绸和谷物，有时甚至为汉族妇女或贵族做辅助工作，但就象游牧的土库曼人或哈萨克人对河中地区的城市居民和农民——不管是塔吉克人还是定居的乌兹别克人——表示轻蔑一样，蒙古人也总是看不起汉族人。那些认为游牧民族较之农业民族，只是从事更低级的活动的史学家们，在他们的中亚历史的著述中，很可能会误入

歧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游牧民族通常在绿洲居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是基于高级的军事技艺)。但游牧民族转变为农业民族，较之农业民族转变为游牧民族更为常见(甚至在加进强制成分时也是这样。例如二十世纪内蒙古游牧民族的衰退就是如此)。当然也有个体农民以及农业村社，选择游牧的更贵族化的生活的记载^①。

对于绿洲居民来说，隔绝状态经常使他们产生盲目信仰。与绿洲居民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在宗教问题上是不拘泥教条和形式的。在佛教和伊斯兰教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借助萨满教的超自然力量，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男巫可以与死去的祖先互通信息，扮演一种与存在于全部自然现象中的精神世界联系的媒介。这种精神世界无处不在，它存在于地、水、风之中以及高山之巅、密林丛里，也存在于由于荒漠的草原而增加了恐惧感的急速的暴风雪中，以及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苍穹中。正是由于采取了萨满教的形式和传说，伊斯兰教的托钵僧和佛教的喇嘛，才得以持续在游牧者的头脑
14 中占据统治地位。到十九世纪，中亚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成了穆斯林教徒。但传统习俗在他们许多人身上仍有轻微的保留，特别是居住在远离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间就更其如此。这些游牧者无视《古兰经》的戒律，喝马乳酒(一种用发酵马奶制做的酒精饮料)，有时还喝血、吃腐肉以及自然死亡的牲畜。

在中亚游牧人中间，两性之间的关系与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穆斯林地区两性间的习俗相比，也具有明显的差别。对古代穆斯林教徒来说，男女之间是严格分离的，处女的贞操被视为神圣，婚前

^① 见埃克瓦尔上引书，第 80—2 页。

失身(就象婚后通奸一样)要被处死。而现在已经成为穆斯林的中亚游牧者中,两性之间则倾向于一种自由、亲昵的关系。在宴会上有男女混杂的舞蹈,而且在男女之间的交谈中,也经常毫无忌讳地提到男女私情。处女婚前失身以及婚后对丈夫的不忠实行为,都不会绳之以伊斯兰教严峻的法律。所有这些,至少部分地影响了妇女在中亚游牧社会中与她们在纯粹的定居社会中所起的极不相同的作用。在一个游牧家庭中,妇女是家里很重要的一员,她不仅要整理家务,而且还得帮助照料牲畜,特别是在生产和分羔季节,她既要挤奶,还要给幼畜断奶,当家里男人不在时,还要看护、管理牲畜以及帮助牛、羊群转场(因为妇女肯定和男子同样精于骑术)。在中亚游牧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时期、不同部落是有明显差异的。有关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学者强调,游牧民族妇女的一生,通常也就是作苦工的一生。在她们的一生中,几乎无权利可言,而且总是屈从于聘金的习俗。然而另外的学者则倾向于将游牧民族妇女所享有的自由,与中东妇女的蒙面习俗以及深居简出的生活加以比较,中东妇女在阿拉伯历史¹⁵上(甚至在统治王朝中)起比较消极的作用,这与公开地由成吉思汗的妻子、寡妇和姐妹,甚至河中地区的穆斯林帖木儿的宗室公主们所行使的权力以及她们的影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单调的游牧生活,没有多少艺术表现的余地,所以游牧部落人民的创造力,总是被局限在诸如编织地毯、毛毯、马褡子以及简易的帐篷用具等狭窄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制造这些器具的过程中,他们充其量不过只能表现出敏锐的色感和精巧的设计。因为大多数游牧民族都是文盲(从某种程度上说,喇嘛教时期蒙古、西藏的

游牧者除外),游牧文学通常是由诗歌和传奇组成的口头文学,这些口头文学的内容,大致都是一些祖先的英雄行为和部落的传说。首领们和富贵之家最引为骄傲的财产,是他们从绿洲居民和生活在草原边界以外的民族那里得来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的来源,有时依靠战争,但更多则是通过合法贸易得到的。尽管中亚商业史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一般情况大致还是清楚的。通过对商队征收税款,而不是依靠掠夺,游牧统治者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以用来购买必需品,如武器、铁器以及他们自己和贵妇人们热切渴望的奢侈品,正因为如此,游牧部落的首领们对商业持保护态度。作为商队纳税的酬报,他们则为商队提供一些其他的便利,例如警卫队和向导等,他们还向商队承担保证通过自己境内的货物安全的责任。

游牧民族自己,也供给他们的邻人大量有用的商品,如马、牛、皮革、毡、羊毛、毛织品、奴隶(例如组成中世纪巴格达、开罗、德里的马木路克军队的突厥奴隶)、猎鹰、隼等等。他们还传递极北地区的出产,如皮货、铁器、琥珀以及海象和猛犸牙等物品。作为交换,游牧民族也得到了—些必需品,象谷物、室用器皿、武器和马具,还有供高贵的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以及十七世纪以后,为蒙古佛教寺院提供的丝绸、贵金属、宝石、精工制作的武器、盔甲、马鞍和茶叶。

十八、九世纪俄国进入中亚之前,在文化和商业关系方面,中亚游牧民族最重要的邻人是中国和伊朗。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关系,一直在主动的外交政策和稳健的防御政策之间波动。主动的外交政策通过惩罚性的远征,一次次地得到了加

强，而防御政策则是建立在一种城墙和瞭望塔楼系统（例如斯坦因在甘肃走廊发现的，精心建造的长城）的基础之上。尽管在里海东部的戈尔甘地方，残留有防御工程的遗址，但伊朗地区的政权是很少建立封闭的边界系统的。这也许是因为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中部地区，混合居住着绿洲居民和游牧民族，这就在伊朗和草原地区之间起了某种缓冲作用。虽然这些游牧入侵者在他们最初进入河中地区时，经常只是得到一些伊朗和穆斯林文化的皮毛，但他们接受了伊朗和穆斯林文化这一事实，确实保证了他们的入侵对伊朗的冲击不象没有接受这些文化时那样，造成巨大的灾难。然而不管怎么说，河中地区的缓冲作用还是没有能够阻止游牧或半游牧人对伊朗的连续入侵。大体上说，在不同时期中国中原王朝为了边疆政策需要而形成的传统认识，不管它是侵略的抑或是防卫的，都使中原王朝得以保持了一种较之伊朗与其游牧邻人更为积极的关系。就长城以外的部落地区来说，中原王朝与游牧部落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游牧部落经常滞留在长城之外，一俟中原王朝内部出现一些衰弱的迹象，或者部落自身有了强烈的推动力（例如，一位有能力将他们联合成为暂时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的出现），游牧民族就向中原王朝发起战争。这样一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也确实需要限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因为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原王朝与边界部落的关系相对说是稳定的。这种关系对双方也是互有裨益的。我们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北部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游牧民族的经济制度是相互补充的。中国农业村社对于来自游牧人的家畜、皮革和羊毛的需求，几乎与游牧者对中国谷物和铁器的需求同样迫切。

虽然游牧者在数量上的劣势，很少允许他们深入持久地保持其优势地位，但直到大炮在中亚出现之前，每当与定居的邻人战斗时，他们总是胜利者。这是因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够打破农业生活的正常秩序，妨碍复杂的灌溉系统的定期维修。但是对于游牧经济来说，长期战争的危害就更少一些。虽然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主要是基于流动性与使用弓箭技术的结合，但游牧者与那些急欲解甲归田的农民军队相比，能够更好地承受一场消耗战争。游牧民族的流动性与使用弓箭技术的结合，使火药发明之前的弓箭手几乎无往不胜。如果能象成吉思汗和他的将领们所做的那样，在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之外再加上训练——如佯装撤退以及伏击，游牧者在战争中就几无败北的时候。

在草原战斗中，最有用的武器是弓箭和长矛。长矛有时装上钩子，用来将敌方的骑手从坐骑上拉下来。作为弓箭和长矛的补充，还有战斧、狼牙棒、剑或腰刀、套索和匕首。连枷这种武器，可能是草原上本来就有的武器。它最初的作用，是由骑乘者用来对付中国的步卒。连枷是由木头棍子做成的，在木棍上面绑一根铁链，铁链连着另外一根包着铁的棍子。这种武器，后来被中国人自己接受，一直使用到乾隆统治时期(1735—1796)^①。在中亚地区，盔甲的应用肯定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了。用各种方法处理过的皮革，可能是最早被广泛接受的保护材料。十三世纪的威廉路柏鲁克曾对此有过记载。虽然象中世纪在欧洲那样，骑士和坐骑披盔戴甲，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灵活性——例如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

^① B. Laufer, *Chinese Clay Figures* (劳费尔《中国泥雕》), Chicago, 1914, 249—50.

初，帖木儿在与更为轻装的乌兹别克人的战斗中，就发现了穿重装铠甲的代价——但拥有更牢靠、更精致和更昂贵的铠甲，是财富等级的一种表现。在整个穆斯林时代，伊朗和河中地区的诸城市，一直是武器和铠甲的重要制造中心。这些武器和铠甲是为中亚各民族，甚至为更遥远的藏族人制造的，而藏族人直到1904年荣赫鹏远征时，还仍然穿着铠甲打仗。¹⁶

大炮和火器从十六世纪起在中亚出现了。一旦大炮和火器成了日后为草原建立永久要塞和殖民地开路的，中国和俄国军队的标准军事装备之后，游牧者便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原来在邻人中的军事优势，甚至也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同时大炮和火器也导致了中亚在世界史上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角色的终结。

第一章 阿契美尼王朝与 马其顿帝国: 稳定与动乱

公元前七世纪,当里海东部草原地区的历史揭开序幕时,一场大规模的游牧民族迁徙运动已经在进行了。以马萨格泰知名的一支强大的部落联盟,将后来以斯基泰著称的民族向西赶过了伏尔加河。而这些抵达乌克兰地区的斯基泰人,又转而取代了乌克兰地区早先的居民辛梅里安人,并将辛梅里安人赶过了高加索,进入了安那托利亚地区。胜利的斯基泰人到达了乌尔米耶湖地区,在这里与伊朗的米底统治者基亚克萨里斯遭遇,并且战胜了基亚克萨里斯。这样在他们的国王马底耶斯(普罗托蒂耶斯之子)统治的二十八年中,斯基泰人得以享有中亚宗主国的地位。直到基亚克萨里斯策划在一次宴会上屠杀了斯基泰人的首领们之后(传说中是这样记述的),才将斯基泰残部从亚洲赶回了乌克兰。这次胜利保障了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侧翼的安全,使他得以腾出手来转向南方,准备对尼尼微的进攻。接踵而来的是公元前612年对尼尼微都城的掠夺以及亚述帝国和文明的消灭。

评注者们花费了很大精力解释希罗多德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叙述^①。有一种传说与希罗多德的记载不同,这种传说主张,从中亚

^① Herodotus (希罗多德), IV, 11; 参见 E. D. Phillips, 'New light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 (菲利普斯《欧亚草原古代史新探》),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LXI, 1957, 269--80.

击败了斯基泰人的不是马萨格泰人，而是伊塞顿人。这种传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传说中细枝末节的差异，丝毫不能减弱希罗多德这位古代历史学家有关草原民族的记载对于我们的强烈的吸引²⁰力。在大山（也许意思是指帕米尔山或乌拉尔山）东部，居住着阿吉派伊人^①。他们是一种秃头的民族，鼻子扁平，下颏很大，以野樱桃汁为食。阿吉派伊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保护他们免于受到攻击，也使他们能够在邻人的争端中秉公仲裁。再往东，居住着伊塞顿人。所谓伊塞顿人，可能正是在汉文史料中提到的乌孙^②。巴泽雷克古墓中的遗物，看来进一步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载，据希罗多德记载，伊塞顿人在仪式上有吃人肉的习俗。再往东，在伊塞顿人之外，居住着“独目的”阿里玛斯皮艾人。

要使上述汉文史料、古代波斯文记载中的诸草原民族对应等同起来，或者使文献中提及的材料与考古发现的材料对应起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关他们居住地的另一条线索，就是希罗多德在另一处提到的，马萨格泰人的聚居地在伊塞顿人的“对面”^③。而伊塞顿人则似乎经常出没于阿尔泰地区。根据以后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马萨格泰人占领了药杀水（锡尔河）北部的草原地区。在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559—

① E. D. Phillips, 'The Argippaei of Herodotus' (菲利普斯《希罗多德记载的阿吉派伊人》), *Artibus Asiae*, XXIII, 1960, 124—8; idem, 'The legend of Aristeeas; fact and fancy in early Greek notions of East Russia, Siberia and Inner Asia' (同著者《阿瑞斯特斯的传说：古希腊对东俄、西伯利亚和内陆亚洲认识中的事实与幻想》), *Artibus Asiae*, XVIII, 1955, 161—77。

② 有关伊塞顿人就是乌孙的证据，见 W. Samoli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萨莫林《突厥之前塔里木盆地之历史人种论》), *Palaeologia*, IV, Tokyo, 1956, 38。

③ Herodotus (希罗多德), I, 201。

公元前 530 年),他们再次出现于锡尔河北部地区。

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推翻了米底帝国,将波斯的统治从伊朗向东推进到了中亚。关于居鲁士征服中亚的材料,没有能够详细地保留下来,但是一个居住在赫尔曼德河沿岸的部落,因为给居鲁士的部队提供服务,而被认为是皇室的恩人^①,据说,居鲁士摧毁了喀布尔北部肥沃的达曼山河谷的中心城市卡皮萨市^②。根据另一种传说,居鲁士率领一支军队通过了格德罗西亚(俾路支)沙漠。座落于锡尔河的居鲁士城,就是他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证据^③。

大约在公元前 530 年,居鲁士试图将他的统治权扩大到阿拉克塞斯河(Araxes)^④北部,进而征服马萨格泰人。对波斯人和马萨格泰人双方来说,这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马萨格泰人的王后托米丽丝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将波斯人放过了河,在这之后,居鲁士靠施展谋略,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俘虏了托米丽丝的儿子斯帕尔伽皮塞斯。斯帕尔伽皮塞斯不久就自杀了。后来马萨格泰人的主力与波斯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波斯人大败,阿契美尼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也被杀死。

- 21 波斯人这次失败的严重性,在我们的史料中显然被夸大了。事情很明显,居鲁士的尸体被重新找到,埋葬在他的家乡帕萨加第^⑤。阿契美尼王朝也一直统治着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

① Arrian, *Anabasis*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III, 27; Strabo (斯特拉波), XV, 724.

② Pliny, *Natural History* (普林尼《博物志》), VI, 92.

③ E. Benveniste, 'La ville de Cyreschata' (邦韦尼斯泰《居鲁士城》), *JA*, 1943—5, 163—6.

④ 希罗多德所用的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指锡尔河。

⑤ 此据 Arrian, *Anabasis*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VI, 29.

区。实际上，波斯帝国的动乱并不是由来自草原的入侵者引起的（如果我们除去贝希斯敦碑铭中有关尖帽塞种人不可靠的材料的话^①），而是由于帝国内部的矛盾导致的。在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死后，马吉安的王位觊觎者高马塔在公元前 552 年篡权，此后，大流士大帝（公元前 552—前 486 年）在六位同谋者的帮助下获取了政权。紧接着在波斯帝国的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动乱。里海东部，帕提亚和希尔卡尼亚的总督是大流士的父亲希斯塔斯普（古波斯文作维什塔斯帕 Vištāspa），当地人叛离了希斯塔斯普，宣布支持一位米底反叛者弗拉瓦尔蒂什。希斯塔斯普在战斗中击败了反叛者。当大流士的增援部队到达拉伽（即赖依）时，希斯塔斯普又赢得了第二次决定性的胜利。在马儿吉亚那一位名叫弗拉达的造反者被忠于大流士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达达尔什击败。在阿拉霍西亚，波斯人造反者瓦黑阿兹达特的党徒，在卡皮萨坎尼^②战役之后，被总督维瓦纳镇压。至于帕提亚暴动中的英雄，大流士之父希斯塔斯普，有些权威倾向于将他与伊朗先知琐罗亚士德传说中的保护者比定为同一个人，而后者也叫维什塔斯帕（现代波斯文为 Gushtasp）。在阿维斯陀经典中，有关琐罗亚士德的方言，确实属于伊朗东北部地区，这里也正是希斯塔斯普的活动地区。这一比定甚至与琐罗亚士德的传说年代——“亚历山大之前 258 年”，也是相吻合的。如果将这种说法与公元前 311 年的塞琉古纪年^③联

① R. G. Kent, *Old Persian* (肯特《古代波斯人》), 1953, 134.

② 没有必要将此地牵强地比定为著名的卡皮萨城 (Capisa)。

③ 阿拉伯天文学家也将塞琉古纪年称为亚历山大纪年。见 al-Biruni,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trans. Sachau (萨乔译, 比鲁尼《古代民族纪年》), 121.

系考虑的话，也许可以将先知的的时间(或许是他的生年)定于公元前 569 年。鉴于学者们对有关先知的年代提出的各种矛盾的解释(亨宁在他的剑桥讲稿中，对此曾有过该谐的评论^①)，我们说，先知的生平目前尚无法用精确的历史术语进行讨论，这一说法也许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些动乱，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中亚诸省是为时很短的，总²²之，中亚地区后来卷入了琐罗亚士德教。古波斯铭文正式列出了中亚诸省的名称^②，希罗多德(第 3 卷，第 91 节)甚至列出了中亚诸省每年向波斯贡献的大致数目。

省	贡献数(塔兰特) ^③
帕提亚	300
阿列亚	
花刺子模	
索格底亚那	
巴克特里亚(包括毗邻部落)	360
德兰吉亚那(包括萨伽提、塔蛮尼、乌提和密喀) ^④	360
健达罗(包括达迪卡伊、阿帕里塔伊)	170
萨塔吉底亚	
塞种	250
里海	

① W. B. Henning, *Zoroaster, Politician or Witch-Doctor* (亨宁《琐罗亚士德，政治家或巫医》), Oxford, 1951.

② 肯特上引书，第 144 页。

③ 贡献是用银条支付的，按照巴比伦的标准，一塔兰特相当于 30.024 公斤。

④ 对于异邦人的称呼，希罗多德使用了古波斯语“Saranges”这个字。为了与米底亚的行政区划名称保持一致，在本书中，按照后期希腊作家的习惯，采用了德兰吉亚那(Dragiana)这一名称。

以上数字，为我们提供了每个城市相应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一些迹象。但是，即便将德兰吉亚那地区（锡斯坦盆地）现代极大的衰退考虑进去，德兰吉亚那的贡献数还是过高了。在这个表中，也还有一些窜乱，例如表中遗漏了阿拉霍西亚地区（也许是同德兰吉亚那合并在了一起）。而且在表中，将上印度河的帕克蒂喀错误地与阿尔美尼亚放在了一起，而在希罗多德第3卷第102节中，则清楚地记载了帕克蒂喀的正确位置。但总的来说，这个表的资料性还是很强的。

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阿契美尼王朝对中亚诸省的控制无疑是很有效的。苏萨的建筑铭文记载，建筑宫殿工程所需要的金子来自巴克特里亚，天青石和光玉髓来自索格底亚那，绿松石来自花刺子模，象牙当然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但也有些来自阿拉霍西亚^①。现代阿富汗的坎达哈地区周围是没有大象的，如果古代坎达哈省是一直向东延伸到印度河谷的话^②，可能会有一些大象，但如果是并非那样的话，那么这就只是印度大象由阿拉霍西亚再次输出了。

很清楚，波斯帝国通过它的东方边境进口黄金，然后再将这些黄金向西方出口。而银子则作为贡物来自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²³再流向东方。这种趋势的证据是查门赫兹里窖藏的希腊银币，这些银币是在公元前380年左右埋藏在喀布尔附近，于1933年发

① 肯特上引书，第144页。

② 如 Strabo（斯特拉波），XV，724所叙述的那样。参见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2nd, edn., Cambridge, 1951.

现的^①。这种条金的运动是阿契美尼王朝坚持严格的金银复本位制的必然结果^②。

不管怎么说,阿契美尼王朝在中亚统治的最深远的经济后果,就是它对中亚农业的影响。非常熟悉波斯人的色诺芬,就很着重强调波斯人积极的农业政策^③。毫无疑问,波斯人的这种农业政策部分地是由于提高土地收益的愿望推动的。希罗多德(第3卷,第117节)提供了一件有关中亚水利工程的相当混乱的轶事。很明显,无论水坝的位置选择得多么合适,也没有一个水坝能够象希罗多德设想的那样,同时控制花刺子模、希尔坎尼亚、德兰吉亚以及不知确切地点的塔蜜尼地区的供水,但希罗多德毕竟集中了大量有关水利工程的记载。向希罗多德提供材料的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意在表明,这些水利系统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水利供应,从农民那里榨取税款。诚然,在水供不应求的时候,灌溉工程能够帮助中央集权国家将其意志强加在农村头上,少数人偶尔也许会因为这些水利工程而受苦,但是仅仅将中亚水利工程的目的归于榨取税款,这种解释则很明显是恶意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将希罗多德提供的轶闻理解为一种扩大中亚食物供给的伟大计划的反映。

奇怪的是,每当苏联学者们在讨论花刺子模浩大的水利工程时,总是倾向于将阿契美尼王朝的贡献估计得很低,而把这些工程

① D. Schlumberger, 'L'argent grec dans l'empire achéménide' (斯伦贝格《阿契美尼帝国时代的希腊钱币》), in R. Curiel and D. Schlumberger,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3—62.

② J-P Guépin, 'Greek coinage and Persian bimetalism' (盖潘《希腊铸币和波斯金银复本位制》), Jaarboek voor Munt-en Penningkunde, XLIX, 1962, 1—19.

③ Xenophon, Oeconomicus (色诺芬《经济论》), IV, 2.

的开端拉回到不可知的公元前一千年早期^①。当然要用野外方法确定渠道的时间，在古建筑中确实是最困难的事。但至于波斯人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技艺，那些由大流士一世在苏伊士^②、薛西斯一世在阿索斯^③建设的水利工程，这些最著名的范例，无疑都可以作为波斯人水利建设技术的证据。这或许能充分证明，阿契美尼王朝正是将巴比伦文明的灌溉技术传入中亚的中介人。

现在以坎儿井(karez)或者暗渠(qanat)为人所知的著名的波斯地下水系统，在亚述时代后期就已经知名了^④。这种地下水工程是用来将水从石灰岩层中引出来，从地面上看则荡无一物。但只是在阿契美尼王朝的统治下，坎儿井地下水系统才有可能被传播到遥远的埃及哈里杰绿洲的昔兰尼伽和奎达坎达哈地区^⑤。在阿契美尼王朝统治下，中亚另一方面的进步，是由外国引 24 进的食用植物的传播。公元前406—400年，年轻的居鲁士在萨尔底斯担任总督时，曾亲手从事园艺业，但居鲁士究竟种了些什么树，由于材料阙如，尚无法得知^⑥。正如同玛尼希亚档案中的希腊铭文记载的那样，大流士大帝对传播食用植物也很感兴趣^⑦，但遗

① 例如托尔斯托夫即持此说，见 Tolstov, *Auf den Spuren der altchoresmischen Kultur* (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刺子模的遗迹》)，Berlin, 1953, 111。

② A. T. Olmstead, *History of Persian Empire*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146。

③ 奥姆斯特德上引书，第248页。

④ J. Lasse, 'The irrigation system of Ulu' (拉瑟《兀勒忽的灌溉系统》)，*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 1951, 21—32。

⑤ G. Caton-Thompson, 'Kharga Oasis' (卡顿——汤普森《哈里杰绿洲》)，*Antiquity*, V, 1931, 221—6，主要参考第224页。

⑥ Xenophone, *Oeconomicus* (色诺芬《经济论》)，IV, 23。

⑦ M. N. Tod,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托德《至公元五世纪末的希腊历史铭文》)，Oxford, 1946, 12。

憾的是，希腊铭文中同样没有提及具体作物的名称。这里首先使人想到的是桃(Persicum)和杏(Armeniacum)。虽然桃和杏直到公元一世纪克卢弥拉时，在西方才见于记载，而且泰奥弗拉斯托斯^①对桃和杏这两个名称的使用还很模糊，但是桃树和杏树很可能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就完成了从中国开始的漫长的传播旅途的第一阶段^②。如果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丝绸已经被波斯人所使用的话^③，这一事实就可以有力地证实，阿契美尼王朝这时已同中国建立了间接交往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总之在四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对纺织品作了明确的描述^④。

有关印度传入中亚的食用植物，首先应该提到稻谷。亚历山大的同僚们发现了生长在巴克特里亚、苏西亚纳、巴比伦尼亚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稻谷，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新奇^⑤。可以断定，稻谷是在阿契美尼王朝时期传入上述地区的。尽管甘蔗和柑橘（虽然事实上 Medicum 可能实际就是表示枸橼）的传入问题尚不清楚，然而这两种植物可能也是在阿契美尼王朝时期从印度传入伊朗的。

在薛西斯统治时期(公元前 486—前 465)，由于波斯军队(这些军队在公元前 480 年曾入侵希腊)驻扎在中亚，使中亚诸省对波斯帝国的依附明显地加强了。巴克特里亚人和阿米尔基安塞种(古波斯文作 Saka Haumavarga)在维什塔斯帕的控制之下(维什

① Historia plantarum (《植物志》), IV, 4, 2.

② B. Laufer, Sino-Iranica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 539.

③ G. M. A. Richter, 'Silk in Greece' (里克特《希腊的丝绸》),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XXXIII, 1929, 27—33.

④ Historia animalium (《动物志》) V, 19; 551 b 13.

⑤ Strabo (斯特拉波), XV, i, 18.

塔斯帕为大流士国王与爱托莎之子)；阿列亚人归希达尼斯之子希萨姆涅斯统治；帕提亚和花刺子模人由法尔纳西斯之子阿塔巴朱斯统治；索格底亚那人在阿塔尤斯之子阿萨尼斯统治下；健达罗人和里海人则分别由阿尔达班努斯的两个儿子阿蒂费厄斯和阿里奥马杜思统治。墨伽巴组斯之子费伦达特斯指挥德兰吉亚那人，伊塔弥特瑞斯之子阿泰特斯指挥帕克底斯人^①。这些将领都是波斯²⁵上层贵族成员，在和平时期，他们中有许多人肯定在那些由他们率领作战的臣民中担任高官显职。

至于生活在阿契美尼帝国北部边界以外的游牧部落，史料根据就更缺乏了。例如在希腊作家笔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马萨该塔伊人，在古波斯铭文中却从来没有被明确地提到过。这也许是因为马萨该塔伊部落联盟保持了它的独立性，但是在和阿契美尼王朝发生联系的塞种人中间，这种保持独立的部落是很少见的。古波斯铭文中将提格拉豪达塞种称为“尖帽塞种”，在波斯波里斯雕刻中，生动地描绘了尖帽塞种人的形象。豪玛瓦尔格塞种则相当于希罗多德所记载的阿米尔基安塞种。在大流士的苏伊士象形文字铭刻中，将提格拉豪达塞种描写为“沼泽地的塞种”(很可能是在威海沿岸的塞种)，而豪玛瓦尔格塞种则被描写为“平原上的塞种”^②。在阿契美尼王朝后期，萨伽诺卡伊(Sacaraucae, 即 Sakarawaka)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文献记载的缺乏，提高了苏联在

^① Herodotus (希罗多德) VII, 66. 关于帕克底斯人，见 H. W. Bailey, 'Kusania' (贝利《贵霜帝国》), BSOAS, XIV, 1952, 430.

^② G. Posener, *La Première domination perse en Egypte* (波塞内《波斯人在埃及的第一个政权》), Cairo, 1936, 183; R. G. Kent, 'Old Persian Texts' (肯特《古代波斯文文献》),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302—6, 主要参考第304页。

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发现的意义,通过这一发现,使我们得以管窥阿契美尼王朝疆域以外的游牧部落的情况。巴泽雷克的发现说明,游牧部落的首领们不仅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且他们同一些遥远的地区,如中国和伊朗都有商业联系^①。在巴泽雷克地区,有一座王者墓,时间在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墓穴中堆积的冰块,使古代纺织品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纺织品包括世界上最早的绒毛地毯,地毯中间点缀着一幅方块玫瑰花饰,地毯边缘环绕着一群麋鹿、骑手和鹰头狮身兽。这种地毯与另一种边缘有行军狮子装饰的毛织品一样,使人强烈地联想到阿契美尼王朝的艺术。这两件织品很可能都是由伊朗传入的。巴泽雷克古墓中,还保存了一些当地制作的毡剪画,这些作品表现了充满西伯利亚“动物风格”气势的斗兽。此外还有一幅带有异国情调,描绘飞翔的鹤的挂毯,这幅挂毯可能是中国纺织艺术最早的作品之一。

26 同样是由于冰块的缘故,一位游牧首领的遗体也得以保存下来。这位首领的臂膀、背部、腿上都刺有动物风格的图案。然而有这样惊人的发现,又缺乏确实的证据证明墓主的身份,这的确是一件憾事。最有可能的假设是,他们就是希罗多德记载的伊赛顿人。如果举行仪式时吃人肉的说法当真能够被接受的话,就会进一步证实这种观点^②。蒙古诺颜乌拉古墓的发现,在许多方面与巴泽雷克的发现相似,但时间要晚一些^③。蒙古的这些古墓,可

① S. I. Rudenko, *Kultura naselniya Gornogo Altaya v skifskoe vremya* (鲁金科《斯基泰时期的戈尔诺——阿尔泰居民文化》), Moscow, 1953.

② 如同杰特玛主张的那样。K. Jettmar,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杰特玛《突厥之前的阿尔泰地区》),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XXIII, 1951, 182.*

③ C.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特里沃《北部蒙古的出土文物》), Leningrad, 1932.

以归为匈奴(Huns)的一支,诺颜乌拉古墓发现的文物中,包括一张饰有斗兽的羊毛毯,传入的希腊风格纺织品以及经确定时间为公元前2年的中国漆碗。

只是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通过里海大门之后,中亚才担负起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亚历山大追击阿契美尼王朝国王大流士三世的时候,逃亡的大流士三世不幸被其军官杀害了。从这时起,亚历山大这位征服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地位。作为马其顿王,马其顿军队是他依靠的军事力量,也正是这支军队,使他赢得了胜利,所以对亚历山大来说,保持马其顿人的忠诚和爱戴是必要的;但是他现在同时又被承认是波斯国王,全部遗留的阿契美尼王朝行政区域的首领,人力的减少,漫长的交通线,迫使他对新臣民采取怀柔态度,竭力在管理这块领土的事务中得到他们的尊敬和合作。

基于以上原因,亚历山大大在征服中亚的同时,就很自然地开始在中亚采用了波斯人的服饰,在波鲁斯著名的圆雕饰上,生动地描绘着亚历山大身着波斯服装的形象^①。波斯宫廷礼仪也在日渐推行。对于波斯人来说,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了在国王面前的跪拜礼,但是将这种习俗推广到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自己中间时,却遭到了这些征服者的抵制,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享有这种荣誉。事实上,在亚历山大死后,人们就热情地将他奉为神灵。如果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就希望,或者得到这种承认的话,他也许在这时就能为他的臣民中的所有等级建立标准的宫廷礼仪。不管怎么

^① B.V. Head, 'The earliest Graeco-Bactrian and Graeco-Indian coins' (黑德《最早的希腊-巴克特里亚与希腊-印度钱币》), NC, 1906, PL. I, 8.

说,象从那些生动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 27 亚历山大的革新在追随他的希腊人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在这些故事中,阿里安将大智者卡利斯提尼斯作为表达他们情感的代言人^①。

随着大流士三世的死亡,紧接着的任务就是追击当时已经僭越称王的弑君凶手贝苏斯。不久,南部的骚乱使亚历山大转向了阿塔柯纳(现在的赫拉特?)和德兰吉亚那。在阿列亚,他赶走了地方总督萨提巴赞尼斯,从德兰吉亚那驱逐了巴塞提斯。在德兰吉亚那省,亚历山大怀疑菲罗塔斯图谋不轨,逮捕了这位著名的马其顿将军,并将其处死,将这一事件的发生地命名为普洛塔西亚(预知)。然后,亚历山大进行了一次很大的迂回包抄,又绕到了北方,横越阿拉霍西亚,在兴都库什山脚下建立了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②,亚历山大突如其来地从东南方出现于巴克特里亚,使不幸的贝苏斯惊慌失措。短短几周之内,马其顿人就越过了阿姆河,贝苏斯成了阶下囚,最终被送到阿克巴特那处决了。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挥师向锡尔河逼近,严厉地镇压了当地人的反抗。

但是在索格底亚那省阿姆河外地区,对亚历山大的反抗并没有结束。在河外地区,涌现出了一个新的领导人斯皮达玛。斯皮达玛利用骑兵的袭击来骚扰马拉坎达的马其顿驻地,他还得到了来自草原的大约六百塞人的援助。当马其顿人准备突围时,斯皮达玛给了他们以严厉的打击。亚历山大被迫三天行军 185 里,及时赶回支援,才算保住了他的驻地。在渡过阿姆河到札里亚斯普

^① Arrian, *Anabasis*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IV, 10.

^② 古代希腊人认为,兴都库什山是高加索山脉的一条支脉,在印度北方方言中,兴都库什山以帕鲁帕米苏斯山知名。

(巴克特里亚)之前,亚历山大再次将斯皮达玛赶回了草原,在札里亚斯普度过了冬天(公元前 329—前 328)。在这次休整期间,亚历山大怀疑又有一场反叛阴谋,这次被怀疑的对象是皇室侍从,他们中许多人被用石头砸死。大智者卡里斯塞尼斯也因涉嫌策划密谋,以同谋罪被处以死刑。此后,亚历山大接待了花刺子模国王法拉拉斯曼尼斯的国事访问之后(很明显,花刺子模在当时是自治的),到冬季结束时,又再次渡过阿姆河,进入索格底亚那。他将部队分为五支,以对付那些当地的不忠诚者。

与此同时,斯皮达玛进一步得到了“以马萨该塔伊知名的塞种²⁸的一个分枝”的援助,他渡过了阿姆河南岸,袭击马其顿人驻地的受伤人员,甚至铤而走险,进攻札里亚斯普。当马其顿人首领克兰特鲁斯佯作进攻马萨该塔伊人的故乡时,斯皮达玛被引开了。后来斯皮达玛与另一支由科努斯指挥的部队遭遇,科努斯重创斯皮达玛,并将他赶回了草原。在回到草原之后,斯皮达玛被他的塞种援军所杀,或者根据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说法,是被怨恨他的妻子所杀。斯皮达玛的头颅则送给了亚历山大,他的女儿爱帕玛后来成了马其顿将军塞琉克斯的妻子。

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反抗亚历山大的斗争实际已告结束,但是,巴克特里亚人奥克夏特仍然占据着农村。奥克夏特将眷属安置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山间要塞里,这座要塞被称为“索格底亚那岩塞^①”。要塞守军戏谑地说,只有亚历山大的士兵都长上翅膀,亚历山大才能攻克这座岩塞。但是,三百名希腊攀岩能手

^① 这个岩塞的位置尚无法确知。在伊斯兰时期,穆格山(Mount Mugh)有一座类似的粟特人的山间堡垒,这无疑也是粟特人的许多堡垒之一。

利用冰用钢锥登上了这座峭壁，迫使守军投降。

奥克夏特的女儿，国色天香的露娜娜也在俘虏之列。据说亚历山大对露娜娜一见倾心，他们的婚姻，很快就导致了亚历山大与奥克夏特的和解。现代学者中，塔恩将亚历山大与露娜娜的婚姻描述为一种政治联姻，即意在调和马其顿人与东伊朗诸民族、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以及塞种人之间的关系^①，保持日渐消耗的马其顿人的东部伊朗盟友，尤其是希望在即将对印度的入侵中，得到骑兵的补充。亚历山大的婚姻，最终具有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亚历山大远征的长期结果，确实导致了波斯在中亚的霸主地位的毁灭，加强了与马其顿统治者长期合作的当地东伊朗人的成分。而波斯人在中亚地区的统治，直到公元三世纪才得到恢复。但是古代权威们强调，促成亚历山大与露娜娜婚姻的，不是一种外交，而是出自本能的愿望，我们要否定古人的这些记载，恐怕是很困难的。

在这些战役中，最突出的是亚历山大城的建立，这些城市有许多后来在历史上都是非常著名的，命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是：阿列²⁹亚的亚历山大城，即现在的赫拉特；德兰吉亚那的普罗塔西亚之亚历山大城，该城位置尚未确定；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②；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该城可能座落在萨朗地区之杰贝勒苏拉吉的中世纪的帕尔万城地方；以及锡尔河地区的短命的艾斯查塔的亚历

① W. W.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塔恩《亚历山大大帝》), II, 326. 其次, 请参见 Plutarch, *Alexander* (普鲁塔奇《亚历山大》), XLVII.

② 塔恩将《安息驿程志》(Parthians stations, 19.) 所记载的查拉克斯的伊西多之亚历山大城置于加兹尼(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第49页)。但是坎达哈发现的希腊铭文, 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原来对这一地区的比定。

山大城。作为征服者，亚历山大需要做的实际工作，只不过是整修和守卫一些旧的防守性的战术据点，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使亚历山大选择了那些许多世纪中在中亚占有关键地位的地区。由于坚决地守卫住了这些地区，马其顿统治者才牢牢地掌握了横穿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

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将征服的目标转向了旁遮普。他挥师挺进，通过了巴焦尔和马拉根德，镇压了一切反抗活动^①。此后不久，留在后方的驻防部队就发生了叛乱，后方留守部队中有许多是原来大流士三世的雇佣军。仅仅在第二年，就有 3000 希腊移民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叛乱，他们放弃自己的岗位，开始进行返回欧洲的长途行军。关于这些希腊移民的命运，有关记载各不相同^②。公元前 323 年，当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之后，爆发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冲突，在上萨特皮斯^③，大约有 23000 人起而叛乱^④，出发前往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者珀耳狄卡斯派出了一支部队，由珀同统帅，前去镇压叛乱者。珀同是个肆无忌惮的统治者，对于反叛者，他同时施用武力和外交手段，软硬兼施，在暗中却希

① 最近卡罗在本地人了解的基础上，对亚历山大在这些地区的远征进行了讨论，见 O. Caroe, *The Pathans* (卡罗《帕坦人》)，49—55。

② 在狄俄多儒斯的记载中 (Diodorus, XVII, 99, 6.)，说这些反叛者都遭到了屠杀，但古耳提乌斯记载 (Curtius, IX, 7, 1—11)，他们最终到达了自己的故乡。

③ 这是希腊人对从米底亚往东，伊朗高原诸省的一般称呼。这个词组可能译自一个不再使用的波斯词，例如 Diodorus (狄俄多儒斯)，XIX, 14, 1；以及伊朗尼哈文和贝希敦的塞琉西王朝时期的铭文。罗伯特曾经介绍过这批铭文，见 L. Robert, 'Inscriptions Séleucides de Phrygie et d'Iran' (罗伯特《弗利吉亚与伊朗的塞琉西帝国铭文》)，*Hellenica*, VII, 1949, 22—4; *Gnomon*, XXXV, 76。

④ 塔恩反对 23000 人这个数字，他相信，反叛者的真实数目只有 3000 人。见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 72 页。

望能将叛乱者争取过来，成为自己的部属。在一次战斗中，叛乱者有些逃向了珀同一边，其余的人则被击败。但是，珀同的军队执行了珀耳狄卡斯严厉的命令——惩罚叛乱者，于是他们屠杀了驻扎在珀同军营中的幸存者，并抢夺了他们的财产。

珀同失望地撤回到了巴比伦，公元前 322 年，在一次与埃及的战斗中，他主谋了刺杀珀耳狄卡斯的行动。在安提帕特对马其顿帝国的瓜分中，珀同又重新回到了米底亚，并且立即使他自己的弟弟欧德摩斯取代了他的近邻，帕提亚总督佛刺塔斐耳尼斯。珀同这一侵略行为，迫使其他的中亚总督们与皮塞斯塔（亚历山大的保镖，当时的波斯总督）结成了反对珀同的联盟。在反珀同联盟当中，最著名的是露娜娜的父亲，当时的帕鲁帕米塞德总督奥克夏特。现在有些权威倾向于将奥克夏特看作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著名的“阿姆河宝藏”的所有者，但是，宝藏中一枚戒指上的名字是否就是奥克夏特，还远远不能肯定。不管怎么说，奥克夏特在公元前 322 年伤心地与女儿露娜娜分手，在同一年，露娜娜（她生了亚历山大的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艾格斯）与安提帕特一起返回了马其顿。安提帕特死后，露娜娜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母亲奥琳贝丝的庇护。但是，当奥琳贝丝在公元前 316 年死后，露娜娜和她的孩子一起在安菲波里斯被卡山德逮捕，四年之后又被处死。露娜娜怎样离开雅典，和对她在欧洲时期的回忆一样，颇带几分神秘的色彩^①。

联合起来反对珀同的还有阿列亚和德兰吉亚那总督斯塔萨诺

^① 根据公元前 311/310 年的一份存货清单，露娜娜曾向雅典娜供奉了很典型的伊朗礼品，金角制杯和项链，但没有证据说明她本人到过雅典。

耳以及阿拉霍西亚总督西彼耳提乌斯。亚历山大从前的大臣欧迈尼斯为了亚历山大的后嗣，起兵反对独目安提柯努斯，当欧迈尼斯由小亚细亚长途行军到达波斯时，联合起来的总督们加入了他的行列。安提柯努斯在伊斯法罕附近的一次战役中击败了联盟者。但此后安提柯努斯又返回了西方，将东方的辖地安然地留下来，仍由原来的总督们统治。

公元前 312 年，塞琉克斯再次占领了巴比伦之后，首先试图重新统一亚历山大的东方诸省。塞琉克斯消灭了取代安提柯努斯成为米底亚统治者的尼喀诺，重新征服了巴克特里亚，越过兴都库什山，进攻新成立的印度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的创立者是著名的旃陀罗笈多，作为一位年轻人，亚历山大的伟大抱负曾深深鼓舞了旃陀罗笈多，后来他以大大超过对手的 600000 人的军队征服了北印度^①。到公元前 304 年，塞琉克斯与孔雀王朝终于达成了和议。塞琉克斯的使节是西彼耳提乌斯原来的大臣墨伽斯忒涅斯，墨伽斯忒涅斯后来以他在印度游历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塞琉克斯同意将帕鲁帕米塞德、阿拉霍西亚和吉德罗西亚割让给孔雀王朝^②，在两国之间缔结了联姻关系，塞琉克斯接受了 500 头大象的礼物^③。当塞琉克斯回到小亚细亚之后，在公元前 301 年，这些大象使他在

① Plutarch, Alexander (普鲁塔奇《亚历山大》), 62.

② 根据 Strabo (斯特拉波), XV, 689, 部分或全部阿列亚都割让给了旃陀罗笈多, 这一说法被史密斯接受, 见 V. A. Smith, Asoka (史密司《阿育王》) 66, 但是贝文和塔恩反对这种说法, 见 E. R. Bevan, The House of Seleucus (贝文《塞琉西王室》), I, 296;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100. 按, 割让阿列亚说缺乏进一步的碑铭证据, 如果孔雀王朝得到了阿列亚, 塞琉西帝国与巴克特里亚的交通就会中断。

③ 参见 W. W. Tarn, 'Two notes on Seleucid history' (塔恩《塞琉西王朝历史札记二则》),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LX, 1940, 89.

伊普苏斯打了胜仗。

最近的几次发现证明，孔雀王朝在塞琉克斯割让的诸省中，实际行了有效的统治。在现代阿富汗，至少发现了三件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的铭文。一件残破的阿拉米文铭文，发现于现代贾拉拉巴德西北部的拉格曼^①。另外两件碑铭是在古代坎达哈市发现的：一件上面刻有阿拉米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记述了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以及他对臣民的德政^②。而另一件只刻有希腊文的碑铭，则显然是阿育王第十二和第十三块石头敕令的部分译文^③。以上情况表明，是阿育王将佛教传入了孔雀王朝新得到的诸省之中。佛教的传播，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 324 年，亚历山大返回苏撒之后，塞琉克斯象许多马其顿首领一样，娶了一位伊朗妻子，她就是著名的斯皮达玛的女儿爱帕玛。到公元前 293 年，他们的儿子安条克作为塞琉克斯的嗣君，统治东部伊朗地区，由于家世和教养，使安条克足以胜任他的职责。安条克的任务是击败塞种人从草原的入侵，加强塞琉西王朝对其在阿列亚和巴克特里亚保留的领土的控制。安条克增强了木鹿的设防，并且再易其名为安条奇亚^④。在巴克特里亚本土，有一个塞琉西王朝的铸币厂，发行塞琉克斯与安条克的名字并列的硬

① W. B. Henning, 'The Aramic inscription of Asoka found at Lampaka' (亨宁《岚婆发现的阿育王阿拉米文铭文》), BSOAS. XIII, 1949, 80—8.

② D. Schlumberger, L. Robert, et al., 'Une bilingue gréco-araméenne d'Asoka' (斯伦贝格、罗伯特等《阿育王的希腊—阿拉米文双体碑》), JA, CCXLVI, 1958, 1—48.

③ D. Schlumberger, '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grecque d'Asoka' (斯伦贝格《阿育王的一篇希腊文新碑铭》), CRAI, 22 mai 1964.

④ W. W. Tarn, 'Two notes on Seleucid history' (塔恩《塞琉西王朝历史札记二则》),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LX, 1940, 84—94.

币^①。但是在公元前280年,当安条克继承了独裁统治之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小亚细亚地区,塞琉西王朝对中亚的控制也就削弱了。

一件新发现的铭文进一步证实,在公元前261年安条克去世之前,某个名为安德拉戈拉斯的人,以总督的身份统治着帕提亚和希尔坎尼亚^②。在嗣君安条克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261—前246),安德拉戈拉斯宣布自治,并发行了没有皇室名号的金币和银币。但在短短数年之内,安德拉戈拉斯就被另一位新的首领——帕提亚帝国的缔造者阿尔萨西斯击败。阿尔萨西斯以他的拥护者,游牧的帕内人为先锋,蹂躏了帕提亚省。这些游牧人的语言中,最初肯定有东部伊朗语的成份^③,但他们的语言很快就被帕提亚定居者的北部伊朗方言所同化。公元前247年,安德拉戈拉斯复灭之后,阿尔萨西斯接踵而入,开始了阿尔萨西斯时代^④。新建的帕提亚王朝早期的一座重要都城在尼撒(位于现代苏联土库曼³²的阿什哈巴德附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一地区接受了帕提亚王朝米特拉达特克的名称。苏联在尼撒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其中包括四十多个希腊风格的象牙角制

① E. T. Newell, *Eastern Seleucid mints* (纽厄尔《东方的塞琉西王朝铸币》), 231—6。

② L. Robert, 'Inscription hellénistique d'Iran' (罗伯特《伊朗的希腊文碑铭》), *Hellenica*, XI—XII, 1960, 85—91。

③ Justin (朱士提), *XLI*, ii, 33; 参见 W. B. Henning, 'Mitteliranisch' (亨宁《中世纪伊朗》),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V. Iranistik, erster Abschnitt, 93。

④ 沃尔斯基采取了更早期的年代,见 J. Wolski, 'The decay of the Iranian empire of the Seleucids, and the chronology of Parthian beginnings' (沃尔斯基《塞琉西王朝之伊朗帝国的衰落以及帕提亚早期历史编年》), *Berytus*, XII, 1956—7, 35—52。新发现的安德拉戈拉斯的铭文,与他的结论稍有抵牾。

杯^①。许多带有墨写题记 (ostraca) 的陶器碎片,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些出土文物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贮酒室。贮酒室的发现,可以用来解释当时的农业和经济生活。关于他们的语言,现在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他们的语言不是用阿拉米文字书写的帕提亚语^②,而是一种带有许多伊朗外来语的仿效阿拉米文字风格的语言^③。

在以后的历史上,帕提亚王朝加紧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推进,这样他们的重心就离开了土库曼草原。与此同时,在帕提亚王朝的东部边界,又形成了另一个国家。当阿尔萨西斯兴起的时候,塞琉西王朝的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德也取得了独立。狄奥多德的独立,首先部分地由于狄奥多德的肖像出现在硬币上而稍见端倪(尽管这些硬币的背面仍然还保留着安条克二世的名字和肖像)。不久,狄奥多德的名字就作为国王,在钱币上出现了,同时他的双关发明,司雷神宙斯的形象也出现在钱币上。狄奥多德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力,在以后诸王统治时期内,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疆域不断扩张,进入了印度次大陆。巴克特里亚之所以能够与帕提亚一样,最终从塞琉西王朝脱离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这就是安条克二世死的时候(公元前 246 年),埃及国王

① 蒙盖特曾对这些发现有过概要介绍,见 A. Mongait, *Archaeology in the USSR*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马森和普戈谢科娃详尽地描述了象牙制品,见 M. E. Masson and G. A. Pugochenkova, *Parfijskije ritony Nisy* (马森和普戈谢科娃《尼撒的帕提亚角形杯》), Moscow 1956。本书有法文提要。

② 亨宁上引书,第27, 30页; R. N. Frye, *The Heritage of Persia* (弗赖依《波斯遗产》), 148。

③ M. Szyner, 'Nouveaux ostraca de Nisa' (斯兹内采尔《尼撒新发现的墨写题记》), *Semitica*, XII, 1962, 105—26。

托勒密三世对塞琉西王朝的入侵。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僧侣科马斯·英狄科普流斯特在红海的阿多里斯见到了一个著名的铭文，铭文中记载说：“（托勒密）越过幼发拉底河，亲自出马，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苏西亚那、波斯、米底亚和（帝国的）其他地区，一直到达遥远的巴克特里亚（的边界）^①。”塞琉西王朝的心脏地区都已在入侵者的控制之下，对于东部诸省，只有任其自生自灭。

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狄奥多德兴起之后几十年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尚无法确知。由于狄奥多德的儿子和继承人显然与狄奥多德姓名相同，这就使识别狄奥多德钱币的工作变得复杂化了^②。据说，第二个狄奥多德改变了他父亲与帕提亚为敌的政策。但是详尽的阐述只是由于波里比厄斯对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三世大帝东征³³的描述才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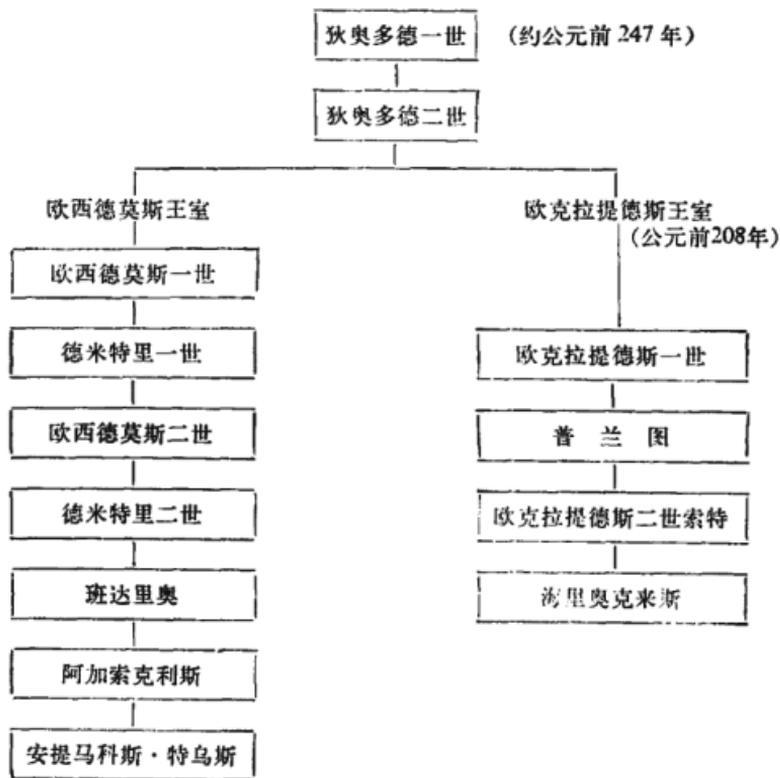
公元前 208 年，安条克从阿克巴特那进军，扫除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部帕提亚人的反抗，他穿过希尔坎尼亚，占领了坦博拉茨的宫殿，猛攻深沟壁垒的希里克斯城。后来，安条克在阿里厄斯河（哈里河）赶走了巴克特里亚人的骑兵，当时巴克特里亚人的统治者是来自马格尼西亚的希腊人欧西德莫斯。安条克包围了位于巴克特拉的巴克特里亚人的首都，但是徒劳无益，一无进展。经过两年的战斗之后，面对着巨大的土坯城墙^③以及四周的沼泽丛莽，在对手

^①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ed. E. O. Winstedt (温斯台特编《基督教地志》), Cambridge, 1909, 73—4.

^② 纳利因在《印度—希腊人》(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一书中声称，他识别出了两幅肖像。但纽厄尔则表示了相反的意见。见 E. T. Newell, Eastern Seleucid mints (纽厄尔《东部塞琉西王朝铸币厂》), 248.

^③ 关于这些残存的遗迹，见 B. Dagens, M. Le Bèrec and Schlumberger, Monuments Préislamiques d'Afghanistan (德盖斯，贝雷和斯伦贝格《阿富汗的前伊斯兰古迹》), Paris, 1964, 69—75.

的威吓下，安条克终于失去了勇气。他承认了可怕的草原塞种部落，并且同意了他们的条件。欧西德莫斯声称自己并不是造反者，而是杀了造反者的后裔（即狄奥多德的后裔）的人，安条克答应欧西德莫斯保有他的王国，而欧西德莫斯则将自己的大象交给了安条克，双方缔结了联盟条约。欧西德莫斯的儿子，德米特里风姿翩翩的王者风度，使安条克留下了深刻的映象，以至于安条克提出要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这位王子为妻，然而这项婚约似



平并没有实行。此后，安条克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了帕鲁帕米塞德，与该地的印度君主索法盖奴斯缔结了条约，然后沿着穿越卡曼尼亚的那条漫长的道路，返回了自己的首都。欧西德莫斯则作为中亚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统治者，独自在巴克特拉留了下来^①。

古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关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的记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是在零碎的文字材料和值得重视的残存钱币的基础上重建的。塔恩对于铭文的研究，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史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标志着一个时代^②，但塔恩的缺点是过分的理论探讨，这就使钱币学流于基础薄弱的历史演绎。纳利因补正纠偏，促进了有益的考订^③，然而他对塔恩的评价虽不失于慎重，但偶尔也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我们所知后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入侵印度西北部的知识，主要是依靠钱币学的证据，故而对这些钱币材料，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解释^④。

阿育王之后，孔雀王朝日渐衰落，在健陀罗地区留下了一个真空。这时，由于受到来自锡尔河地区塞种人的威胁，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备受骚扰，他们渴望在帕鲁帕米苏斯山以南得到一个可靠的后方。在希腊人占领帕鲁帕米苏斯山南部地区的过程中，德米特 34

① 本段依据 Polybius (波里比厄斯), X, 31.

② 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③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纳利因《印度—希腊人》)。

④ 这一时期权威的钱币目录仍然是 P. Gardner, *A Catalogue of Indian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加德纳《大英博物馆或印度钱币目录——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斯基泰诸王》), London, 1866年。以及 R. B. Whitehead, *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Punjab Museum* (怀特黑德《旁遮普博物馆藏钱币目录》), Lahore, Oxford, 1914, Vol. I, *Indo-Greeks coins* (《印度—希腊钱币》)。

里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接受了一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有关的象头皮的头饰和一个征服者的称号——“不可战胜的”(Anikètos)。纳利因^①也适当地强调了在对南部分界线的入侵中，安提马科斯·特乌斯的活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这次向南迁徙的时间，一定是在公元前190—前170年之间。然而南迁的结果，促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分裂。在德米特里的后面，兴起了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欧克拉提德斯。时隔不久，欧克拉提德斯就战胜了德米特里，进入布色羯逻伐底。我们可以将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的许多国王，看作两个分裂敌对的王朝系统。这两个王朝系统的渊源关系，用表格的形式最易表达出来(见第46页附表)。

1948年，在阿富汗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银币，这些银币后来以“昆杜兹宝藏”著称于世。这次重要的发现增加了我们对于有关早期巴克特里亚统治者的知识。以前，我们对于“昆杜兹宝藏”的了解仅限于一篇简单的介绍文章^②，最近在一篇题为《法国阿富汗考古团报告》的论著中，对这次发现作了详尽的阐述^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除了当时发行的一般的4德拉克马面额的钱币之外，还发现了5枚象勋章的，双10德拉克马大小的钱币。这些钱币是由后期的统治者阿敏塔斯发行的，每枚重84克多。我们在下一章中接着要谈的，就是这些后期印度——巴克特里亚统治者的复杂时期了。

① 纳利因上引书，第46页。

② A. D. H. Bivar, 'The Bactria treasure of Qunduz' (比瓦尔《昆杜兹的巴克特里亚宝藏》), JNSI, XVII, 1955, 37—52.

③ R. Curiel and G. Fussman. Le Trésor monétaire de Qunduz(柯里尔、福斯曼《昆杜兹的钱币宝藏》)(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 Paris, 1965.

第二章 游牧帝国与佛教的传播

欧克拉提德斯兴起之后，掌握了兴都库什山北部巴克特里亚³⁵ 王朝领土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在兴都库什山南部，也形成了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欧克拉提德斯王朝与欧西德莫斯王朝之间互相争斗不已，而在各自王朝内部，也充满了篡位者之间明争暗夺的斗争。

德米特里死后(约公元前 170 年)的四十年间，每十年就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出来统治。德米特里死后第一个十年(即大约公元前 170 年—至前 160 年)的统治者是阿波罗多都斯一世^①。阿波罗多都斯发行过大量钱币，特罗古斯也曾简单地提到过他^②。阿波罗多都斯之后的十年里，主要角色由弥兰陀一世索特充当。弥兰陀一世的统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佛教也采取了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佛教经典著作《弥兰陀问经》(Milinda-pañha)中，弥兰陀一世是作为一位主要人物出现的。《弥兰陀问经》是一部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对话录^③。佛教传说认为，弥兰陀王的都城在奢羯罗。人们一般将奢羯罗比定为旁遮普地区的锡

① 注意将他与很久以后的阿波罗多都斯二世区别开来。参见 D. W. MacDowall and N. G. Wilson, 'Apollodoti reges Indorum', NC, 1960, 221—8.

② Prologue (《序言》), XLI.

③ Milindapañha, tr. I. B. Horner(霍纳译《弥兰陀问经》), 1963; 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tr. T. W. Rhys Davids(菲斯·戴维译《弥兰陀问经》), Oxford, 1890.

牙尔科特。然而，尽管锡牙尔科特很可能在寒冷季节偶而作为弥兰陀一世的驻蹕地，但钱币学的证据有力地证明，弥兰陀一世王国的统治中心是在布色羯罗伐底，即现代白沙瓦附近的查萨达。几位现代权威认为，弥兰陀一世创立了一种纪元，并根据这一纪元来确定大量印度早期铭文的时间。实际上，所谓弥兰陀一世创立的纪元，很可能是一种希腊纪元。这一纪元创始于公元前155年，它的出现标志着弥兰陀一世的统治从这时起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对于弥兰陀一世统治的具体情形，我们还缺乏其它方面的材料，但³⁶是，在印度的希腊诸王中，弥兰陀一世显然是最著名的一位。

弥兰陀一世之后的十年内（可能是公元前145—前135年）出现的统治者，肯定是安提耳希达斯。象前文列举的那些国王一样，安提耳希达斯的姓名也是出现在大量由他发行的钱币上。著名的贝斯那格石柱的婆罗谜文铭文中，也提到了安提耳希达斯的姓名。这段铭文是国王的使臣赫里奥多鲁斯在毗邻的国土上献给印度神毗湿奴的献辞^①。赫里奥多鲁斯其人是在坦叉始罗的一位公民，但是，安提耳希达斯在占领布色羯罗伐底以及弥兰陀一世死时其余的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土之前，他的首府可能设在阿富汗的加德兹。

对于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最后一代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者，文献和铭文的证据都很缺乏。仅有的证据就是钱币材料。在这一时期，突出的统治者是斯特拉托一世（约公元前135—前125年）。斯特拉托一世似乎是在布色羯罗伐底开始他的统治的。但是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命运变迁和一段时间的背井离乡之后，斯特

^① 见纳利因上引书，第42页及图版6。

(表 a) 印度-巴克特里亚铸币概览

37

布色羯逻伐底

咀叉始罗

加德兹

高加索—亚历山大城



欧克拉提德斯

阿波罗多都斯一世

弥兰陀一世索特

弥兰陀一世索特

† 佐鲁斯一世狄喀奥斯



{ 狄奥斐卢斯
尼希阿斯

吕希阿斯(只有德拉克马)

吕西阿斯(德拉克马)



菲洛克塞努斯(a)

菲洛克塞努斯(a)

安提耳希达斯

安提耳希达斯

斯特拉托(一期)

† 赫尔麦乌斯(a)



海里奥克来斯二世

海里奥克来斯二世

海里奥克来斯二世

海里奥克来斯二世

斯特拉托(二期 a)

弥兰陀二世

(德拉克马)

斯特拉托&阿加素

狄喀奥斯

克利斯

菲洛克塞努斯(b)+Σ

赫尔麦乌斯&卡利俄珀

赫尔麦乌斯&卡利俄珀

赫尔麦乌斯(b)

赫尔麦乌斯(b)

斯特拉托(二期b)

斯特拉托(二期b)

续表

斯特拉托(三期)	阿敏塔斯		阿敏塔斯
	斯特拉托(四期)	斯特拉托(四期)	斯特拉托(四期)
	波吕克塞努斯	波吕克塞努斯	
	阿切比厄斯	阿切比厄斯	阿切比厄斯
斯特拉托(三期)			
	莫俄斯	阿切比厄斯	

拉托一世的活动又转移到了咀叉始罗和加德兹地区。对于斯特拉托一世统治的这一混乱时期，钱币学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参见表 a)，但具体理由，在此恕不能一一详述。

在表 a 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早于斯特拉托的统治者们的花押字顺序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是这一时期铸币活动的基本脉络还是清楚的。在斯特拉托第一次就任之后(见斯特拉托一期)，某位海里奥克莱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四个大造币厂。海里奥克莱斯其人与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海里奥克莱斯是否是同一个人，现在还不能肯定，但钱币学家将他称为海里奥克莱斯二世，这样就将他与巴克特里亚的海里奥克莱斯区别开了。后来，斯特拉托返回了布色羯逻伐底，在这里，他遭到了几位统治者的频频入侵。当最终离开布色羯逻伐底时，斯特拉托再次出现于咀叉始罗、加德兹和高加索——亚历山大城，最后，他是作为阿敏塔斯的继承者而出现的。阿敏塔斯以他的双 10 德拉克马钱币而著名。最终除了布色羯逻伐底以外，斯特拉托的名字在全部造币厂都被阿切比厄斯的名字取代了。布色羯逻伐底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还不清楚。第四代印度——巴克特里亚诸王的历史是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其间战事频繁，诸势力此消彼长，事多不明。再往东，在旁遮普地区，

有一些势力较弱的统治者据地自保，其中最著名的是佐鲁斯二世³⁸索特与阿波罗法内斯，他们发行了小德拉克马系数的劣质钱币。

就在巴克特里亚王国与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间卷入无休止的内部斗争时，巴克特里亚人在锡尔河的中亚边界沿线，已经战云密布了。其实即使是在欧西德莫斯统治时代（约公元前208年），巴克特里亚人也只能勉强地遏止草原地区塞种人的威胁。欧西德莫斯之后的若干年中，来自锡尔河草原的新的压力降临了巴克特里亚，这股新的压力大大超出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防御能力。这次新的压力来源于东方遥远的中国边境。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追溯这次压力的来源。

在中国的蒙古草原边界，有一支以匈奴知名的强大的游牧民族。将匈奴比定为若干世纪后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匈人，对这种观点一般还存在争论，但我们认为匈奴即匈人这一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确切地说，匈奴人在语言和种族上究竟与哪个民族相近，目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一般认为，匈奴与突厥在某些方面有关系。在东西方史料中，对于匈奴的记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强调匈奴在战争中的极端的暴行。应该承认，史书作者们总是倾向于将匈奴给他们的同胞带来的灾难戏剧化，其中有些记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对匈奴暴行的描写如此普遍，读来又那样自然入理，所以这类记载中肯定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成份。几百年之后，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虽然并不了解欧洲的匈人与中亚的匈尼特人之间的关系，但他却用相似的责骂词句描述了这两个民族^①。

^① 关于匈尼特人，见第14章，第3节，第1页；关于欧洲匈人，见第31章，第2节，第1页。

很明显,在匈奴/匈人八百年的历史中,匈奴一直是一个破坏性很强的对手。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很快就对中国北部的统治者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中国古代遗址中最著名的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而建造的。但是随着秦王朝(公元前 221—前 206年)的崩溃,削弱了中国的防卫力量。而³⁹与此同时,在匈奴的头曼单于(最高首领)统治下,匈奴的力量则得到了增强。到了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统治时期(约公元前 209—前 174年),匈奴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冒顿征服了鲜卑、契丹以及东胡等与匈奴相邻的部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宰。

在甘肃西部,也就是后来以敦煌(即千佛洞)闻名的地方,有另外一支被称作月氏的,成份相当混杂的游牧部落联盟。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了月氏,又反击溃北部的乌孙,并将乌孙赶到了西方。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再次向月氏发起进攻,击败月氏,并杀死了月氏王。最后一次失败,使可怕的月氏部落(他们是与匈奴相似的游牧民族)开始举族向西方迁徙。月氏人可能是越过伊犁河谷而下,沿着伊塞克湖南岸向西进发。在伊塞克湖地区,月氏击败了一支塞种部落,并将后者赶到了西南方。《前汉书》将这支塞种称为“塞王”。但是,月氏在进军途中,又与乌孙部落遭遇,乌孙这时转而在后方袭击了月氏。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落荒而逃,继塞种之后,被赶到了费尔干纳地区。这样,在公元前 160 年之后不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锡尔河边境地区,受到了来自塞种和月氏这两个强大的游牧部落的威胁。

从这时起,西方史料接着叙述了游牧民族对巴克特里亚的征

服。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但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汉文史料中的月氏,显然就是西方文献中叫做吐火罗的部落。在斯特拉波著名的《地理学》中,有一段记载了后来发生的事件^①:

从希腊人那里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阿希或阿色尼、吐火罗和塞伽罗克,都是最著名的游牧部落。他们来自遥远的锡尔河彼岸,与塞种及索格底亚那毗邻的地区,这里曾被塞种所占据。

在这里,阿希或阿色尼最初见于文献记载。虽然庞培·特罗古斯的著作全本已佚,残存的只有《序言》部分,但其中有两处记载了这些游牧部落在当时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序言》XLI 中⁴⁰这样记载:“Saraucae(读作 Sacaraucae, 塞伽罗克)和阿色尼的斯基泰部落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在《序言》XLII 中,对以后的事件作了如下的记载:“阿色尼人成了吐火罗的国王,而 Saraucae(读作 Sacaraucae)则被击溃了”。

以上记载虽然很简略,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离开了原居地的游牧部落,后来不久就侵入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据塔恩推论,游牧民族这次入侵巴克特里亚,发生在公元前 141 年之后^②,塔恩的观点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在“昆杜兹宝藏”(肯定是在游牧民族入侵时埋藏的)中,有一枚塞琉西王朝亚历山大·巴朱斯(公元前 150—前 145 年)的单四德拉克马钱币,如果将这枚钱币从叙利亚辗转传到巴克特里亚所用的时间算作五

^① 第11卷,第8,2页(= p. C511)。这里所引的译文,根据市兰特(Vaillant)修订过的译文。参见 G. Haloun, 'Zur Üe-tsi-Frage' (哈隆《大月氏考》), ZDMG, XCI, 244. Sacaraucae(塞伽罗克)读作 Sacaraulae。

^② 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272、294页; JNSI, XVII, 1955, 43。

年的话，则“昆杜兹宝藏”入藏的时间上限，与塔恩的推论几乎完全一致。又，公元前129年，在帕提亚也爆发了游牧民族入侵的浪潮^①，据此推论，游牧民族对巴克特里亚的入侵，下限至少不得晚于公元前129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对于这些游牧部落后来的去向，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但我们根据以后出现的与此相关的地名对他们的去向进行推论，还是有可能的。大概就在这一时期，赫尔曼德湖地区（现在叫做哈穆，Hamun）不再以德兰吉亚那之名为人所知了，它得到了塞伽斯坦（Sakastan，即 Segistan）的称号，并由塞伽斯坦这一名称进一步发展成了现代的名称塞斯坦（Seistan，即 Sistan）。秣菟罗狮柱的佉卢文铭文^②证明，公元前一世纪，在塞种政权的鼎盛时期，塞伽斯坦这一名称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了塞种在印度征服的全部土地，即罗马作家笔下的印度——斯基泰人^③的领地。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赫尔曼德地区的民族，甚至在中世纪还以 Sagzi 之名为人所知，Sagzi 这个字则源于更早的 Sagčik，下赫尔曼德地区民族的名称，突出地表明他们来源于塞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塞种部落向南通过了赫拉特山口，并且在原来的德兰吉亚那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一推论应该是可靠的。公元前一世纪，塞种人

① Justin, *Epitoma* (朱斯提《概要》), XLII, 1—2.

② S. Konow, *Kharoshthi Inscriptions* (科诺《佉卢文铭文》) (CII II, pt. i), Calcutta, 1929, 46—9. 达尼对此曾有过饶有趣味的评论，他认为铭文镌刻时间要更晚。见 A. H. Dani, 'Mathura Lion-Capital inscription (a palaeographical study)' (达尼《秣菟罗狮柱铭文——古文字研究》),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V, 1960, 128—47. 但是镌刻时间的早晚，与铭文本身内容反映的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情况这一结论无关。

③ Ptolemy, *Geography* (托勒密《地理学》), VII, 1, 55;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红海周航记》), 38.

一定是向东北推进,进入阿拉霍西亚,到达了印度河,此后,又分别向印度河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移动。这样,塞种人一方面进入了呾叉始罗和北印度平原,同时也到达了沙拉斯特拉和乌贾因地区。

由于塞种入侵的结果,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和阿拉霍西亚开始了塞种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塞种历史,几乎完全是在铭文和钱币⁴¹的基础上重建的。近年来约翰·马歇尔先生对重建公元前一世纪的塞种帝国史做出了最有益的努力^①。如上所述,虽然大量的塞种部落很可能是通过上文提到的道路入侵北印度的,但是,出土的钱币证明,第一个塞种国王显然是莫俄斯其人,而莫俄斯则出现在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心脏地区呾叉始罗。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使纳利因^②重新提到了一种旧观点,即认为莫俄斯率领一支塞种人由和田翻越帕米尔山脉,穿过印度河科锡斯坦地区,由北部直接到达了呾叉始罗。这条险峻的道路被中国史学家称为“悬度”。然而在当时要完成这样艰难的跋涉,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另外一种更易被人接受的解释是,假设在莫俄斯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初期,他是一名塞种雇佣军的将军,为后期的印度——希腊诸王,特别是为阿切比厄斯服务。在印度——希腊诸王四分五裂,而塞种入侵者又大兵压境的形势下,这样一位人物,是很有可能得到最高统治权的。

詹金斯通过对钱币的分析,认为在阿波罗多都斯二世的统治下,希腊人最终成功地从呾叉始罗驱逐了莫俄斯(公元前97—

① Taxila (《呾叉始罗》), I, 44—73。

② 纳利因上引书,第136页。

约公元前 77 年)^①。这时的喀布尔河谷和健陀罗似乎还保持在希腊人手中。在阿拉霍西亚,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塞种王朝,这一王朝可能是新来的人侵者建立的,阿拉霍西亚塞种王朝诸王的钱币可以识别出来。以下是在阿拉霍西亚发现的塞种国王的顺序,他们分别是乌奴你思、悉婆里瑞思、悉婆罗格达米斯、悉婆利瑞塞思、阿泽斯一世以及阿泽里塞斯。莫俄斯本人在秣菟罗的一次战斗中被杀死。秣菟罗的狮柱,就是为了纪念莫俄斯而建造的。但是时隔不久,阿泽斯一世也着手在坦叉始罗恢复塞种的事业。尽管战争时有胜负,但阿泽斯一世最终摧毁了希腊人的诸王朝,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统治。毫无疑问,新的“阿泽斯纪元”^②,就是为了纪念阿泽斯一世的胜利而创立的(“阿泽斯纪元”开始于公元前 57 年)。虽然帕提亚人不断地入侵德兰吉亚那和阿拉霍西亚的塞种领地,但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塞种帝国一直牢固地占有旁遮普地区。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证明阿泽斯二世继位的确切时间,但阿泽斯二世是继阿泽里塞斯之后登上王位的。

使塞种人的军队能够在如此广大的地区横行无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高度的机动性。虽然塞种人从来没有能够进入兴都库什山起伏不平的山地地带,但作为乘马的游牧人,他们在开阔地区具有极大的优势。塞种人在战争中占据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他们采用了新的战斗方法,即运用骑兵组织密集队形的冲锋。塞种骑兵都是双手持矛,周身则以薄片铠甲保护。在塞种人的钱

^① G. K. Jenkins, 'Indo-Scythic mints' (詹金斯《印度—斯基泰铸币》), JNSI, XVII, 1955, 16.

^② 参见 S. Konow, Epigraphia Indica (科诺《印度铭文》), XXI, 1932, 251; JRAS, 1932, 949; Kharoshthi Inscriptions (《佉卢文铭文》), 71.

币上，生动地描绘了这种铠甲。保存在中世纪文献中的特罗古斯所记述的珍贵片断，也形象地叙述了塞种人的装备^①：

凶猛的斯基泰部落在平地的战斗中迅疾如风，他们通身都有铠甲保护，腿部裹以铁甲，头上罩着金盔。

吐火罗与阿色尼人，也同塞种人一起参加了这次游牧民族迁徙运动。他们驻扎在阿姆河北岸，位于塞种进军路线以东。当塞种人通过赫拉特山口，进入阿拉霍西亚和旁遮普平原时，吐火罗和阿色尼的情况究竟怎样呢？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叙述这个问题了。关于阿色尼人的身份，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但他们的历史作用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阿色尼人是“成为吐火罗的国王”的部落。虽然，就阿色尼人的名称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定还未必有把握，但是阿色尼人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正好与后来著名的贵霜部落的活动相合。塔恩认为，阿色尼即相当于历史上的贵霜部落^②。塔恩的这一假说要比哈隆的观点更使人信服^③。哈隆认为阿色尼就是乌孙，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西诺尔的认可^④。不管怎么说，“贵霜”这一名称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半叶河中地区首领黑刺思的硬币上。在这些钱币中，掺入了海里奥克来斯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四德拉克马硬币。硬币上的希腊

① Pompei Trogi Fragmenta, ed. O. Seel (西尔编《庞培·特罗古斯著作辑佚》), Leipzig, 1956, 179.

②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 287, 533 页。

③ 见上引哈隆《大月氏考》。

④ D. Sinor,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西诺尔《内陆欧亚研究导论》), 233.

字题铭为：“黑刺思统治下的贵霜首领(?)”^①。这个题铭很有意思，它是第一次在巴克特里亚用希腊字母书写当地人的姓名，它证明当时已经用希腊文前缀 san，来表示在伊朗语中很普遍的 s 音了^②。

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将吐火罗称为“大部落”^③。吐火罗斯坦地区靠近阿姆河上游，以昆杜兹和巴格兰为中心。由于吐火罗这一名称与吐火罗斯坦地区密切相关，据此我们可以对吐火罗的⁴³进军路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公元前一世纪早期，吐火罗的兵锋肯定是向南，逼进了兴都库什山口。然而到基督纪元开始的头几十年时，吐火罗已经在贵霜部落的领导下，最终实现了统一，并且据有了喀布尔谷地。在贵霜国王丘就却统治时期，他们冲出山区，进入了旁遮普平原。在《后汉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记载，概括地叙述了这些事件^④：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巴克特里亚)，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盼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属部首领)。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帕提亚)，取高附(喀布尔)地，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立为王。

在基督纪元开始的时候，位于阿拉霍西亚和旁遮普地区的塞

① 参见 R. B. Whitehead, 'Notes on the Indo-Greeks' (怀特黑德《印度—希腊人考》), NC, 1940, 120—2.

②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 508—10 页。

③ Geography (《地理学》), VI, 11, 6.

④ 转引自 S. Konow, Kharoshthi Inscriptions (科诺《佉卢文铭文》), lvi, lxii,

种帝国已经开始衰落了。这时塞种帝国的统治者是阿泽斯二世，阿泽斯二世的银币质量急剧变得低劣，可以充分反映出塞种帝国的衰落状况。在塞种帝国衰落的同时，当地帕提亚统治者的一个王朝则沿着赫尔曼德河谷向东压过来。有关这些帕提亚统治者的年代顺序，目前学术界还争执不决。但是除了某一位来源尚不清楚的阿尔撒西斯·泰奥斯之外，他们的名字分别为帕科瑞斯、俄塔格涅斯、戈多法里斯、阿布达伽塞斯以及撒萨斯(Sasan)。另外有证据说明，某个萨纳巴瑞斯到达了这一地区的西部边缘。在这一王朝的统治者中，戈多法里斯声名卓著，远在其他诸王之上。根据塔克提巴希 103 年的铭文，我们可以确定戈多法里斯在咀叉始罗的年代。103 年，是戈多法里斯在位的第二十六年，这里的 103 年，肯定是根据开创于公元前 57 年的“阿泽斯纪元”来计算的，这样，103 年就相当于公元 46 年，这说明最晚从公元 20 年起，戈多法里斯已经扩展到了咀叉始罗地区。在古代印度钱币和铭文发现之前，这一估计与有关戈多法里斯的唯一的一次记载互相吻合。戈多法里斯其人，出现于传道者托马斯航海前往印度的故事中。如果传说可信的话，托马斯是在克鲁锡费克申（即在公元 29 年或 33 年）之后，就立即出发了^①。大约十年之后，另一位来自罗马世界的旅行者⁴⁴，提亚那的阿波罗尼奥斯也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国王哇尔达尼斯的第三年时（公元 43—44 年），阿波罗尼奥斯正在巴比伦，他可能是在公元 46 年到达咀叉始罗的^②。

① W. Wright, *Apocryphal Acts of the Apostles* (赖特《伪使徒行传》), II, 146ff.

② Philostratus,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菲洛斯特劳图斯《提亚那的阿波罗尼奥斯传》), II, xviii.

人们通常认为,塔克提巴希的铭文中,有一处提到了贵霜王丘就却。一般观点都主张丘就却对月氏部落的统治开始于基督纪元初期。丘就却所创立的贵霜帝国,很快就将其统治扩展到了兴都库什山南北两地,贵霜帝国也成为中亚最有影响的文明强国。贵霜帝国虽然进入和统治了北印度平原,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贵霜人对于自己来源于游牧民族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力图恢复与中国边疆地区的联系,因为这里是他们的迁徙运动开始的地方。毫无疑问,丰富的畜力运输资源,为贵霜帝国提供了足够的手段来刺激中国的贸易,使他们充当了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的桥梁。由于贵霜人复杂的迁移过程,使贵霜种族和语言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后几个世纪中,贵霜统治民族的圆脸盘和下垂的胡须,给古代作家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使他们很难将贵霜人归于印欧语系的民族。中世纪阿拉伯作家贝鲁尼将贵霜称作“吐蕃人”^①,而叙利亚人巴尔德萨纳斯所记述的贵霜人的母权制倾向,对于贝鲁尼的观点似乎是一个有力的证据^②。当然,对于主张贵霜来源于突厥种族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但是从秣菟罗精心描绘的伽腻色伽皇帝形象所著的全套服装来看,贵霜人的穿着是典型的草原伊朗人的装束。伽腻色伽穿着带扣的大氅、长衣,骑马人宽松下垂的裤子。在战斗中,贵霜人与塞种人一样,身穿用金属薄片迭成的铠甲,在他们的武器中,有一种是三英尺多长的直剑。

贵霜人是否一度曾有过一种他们自己的特有的语言,现在尚

① Indica, ed. Sachau (萨乔编《印度》),207。

② Bardesanes, Le Livre des lois des pays, tr. F. Nau (诺译,巴尔德萨纳斯《各地区法律汇编》),41。

不可得知。在贵霜帝国游牧统治集团的等级中，吐火罗的地位仅次于贵霜。对于吐火罗的语言问题，早期学者将其与在库车和焉耆发现的写本残卷中的两种印欧语方言联系起来。现在这两种方言一般被称为“库车语”和“焉耆语”，但是有些权威学者还继续将它们称作“吐火罗 A”与“吐火罗 B”，以此特别将这两种方言归于历史上的吐火罗。毫无疑问，这种意见是有其合理因素的。目前，⁴⁵吐火罗的语言问题还存在争论，例如，亨宁竟然认为：“至于所谓的‘吐火罗语’，最大的可能性是，这种方言是乌孙方言，而不是月氏土语类型的语言^①。”近来进一步的迹象表明，库车和焉耆发现的这些方言确与吐火罗有关，然而整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发展起来的贵霜帝国内部，就部落地位而言，位于吐火罗之下的可能是塞伽罗克人。贵霜人将塞伽罗克人扶植为北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予以遣散，其余的部分则吸收到了贵霜帝国自己的统治机构之中。毫无疑问，塞伽罗克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东部伊朗方言。他们的方言很可能是三个部落中至今尚存的唯一一种语言。要对塞伽罗克的语言进行确切的定性研究，现在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对于他们的语言，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在次大陆的佉卢文和婆罗谜文的铭文中，有一组来自伊朗语的外来语，相当于于阗文写本中出现的一些字，例如：horaka-，horamurta（捐款主管人）；bakanapati—（僧侣）^②以及人称名Ysa-

^① W. B. Henning, 'The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亨宁《焉耆与“吐火罗语”》), BSOAS, IX, 1937, 564. 最近, 克劳斯对有关“吐火罗语”的观点进行了综述, 见 W. Krause, 'Tocharisch' (克劳斯《吐火罗语》),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Abt. I, Bd. IV: 3. Abschnitt, Leiden, 1955.

^② H. W. Bailey, 'Kusanica' (贝利《贵霜语》), BSOAS, XIV, 1952, 420; idem, 'Languages of the Saka' (同著者《塞语》),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Abt. I, Bd. IV: 1. Abschnitt, Leiden, 1958, 136.

motika^①。人们有时认为,于阗语和塔里木盆地有关方言中,包括“Saka”(塞种)这个词,但是贝利认为“Saka”一词在这些文书语言中的应用,并没由文书本身直接证实^②。

对于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语是从塞种入侵者的语言中演变而来的这一说法,也存在着争论^③。婆罗谜文铭文中 Castana(总督)这一名称,即相当于普什图语的 tsaxtan(主人),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就应该对印度——斯基泰语、于阗语和普什图语都加以重视,但是,于阗语和普什图语的关系并不密切,即使两种语言都是塞种的语言,它们之间也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同时在阿富汗的苏科克塔耳发现的 25 行用希腊字母书写的东伊朗语铭文,又给这一问题提供了第四种因素。这种新的语言与从贵
46 霜王朝钱币中得知的语言是相同的,现在已经证明,这种语言是巴克特里亚当地的方言^④。在巴克特里亚方言中出现的有些字,与于阗语文书中的字是相同的,如巴克特里亚语的 xšono, 即相当于于阗语的 kšuna (即位元年)^⑤,但是我们还很难断定,于阗语的这个词就是来源于东部伊朗方言。

贵霜诸王的年代,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争论课题,然而贵霜

① S. Konow,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Kushanas' (科诺《贵霜民族考》), ZDMG, LXVIII, 1914, 99ff.

② Bailey, 'Languages of the Saka' (贝利《塞语》), 131.

③ G. Morgenstierne, EI, sv. 'Afghanistan' (《伊斯兰百科全书》, 摩根斯蒂尔尼撰“阿富汗”条)。

④ W. B. Henning, 'The Bactria Inscription' (亨宁《巴克特里亚铭文》), BSOAS, XXIII, 1960, 47.

⑤ A. Maricq, 'La grande inscription de Kaniska' (马利克《伽腻色伽大碑铭考》), JA, 1958, 364.

年代问题的难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一般来说，对于根据贵霜诸王的钱币推断出的贵霜统治者的顺序，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从公元初头十年开始，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是丘就却。此后，是一位以“伟大的救世主”(Soter Megas)的称号为人所知的“不知名的国王”和阎膏珍；另一个系列则是几个更为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伽腻色伽、护毗色迦和波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阎膏珍用一种质地优良的金币取代了印度——帕提亚时期质量低劣的钱币。阎膏珍所发行的金币，采用了正规的罗马金币中标准纯金与合金的比例。这些金币可能是利用罗马在贸易中支付的铸币杂金铸造的。贵霜统治者的绝对年代，依赖于在次大陆各地发现的许多有纪年的佉卢文和婆罗谜文的铭文。但是事实上，次大陆在历史上曾创立过几种不同的纪元，这就使贵霜诸王的年代问题复杂化了。最合理的假设是，假定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纪元，试排列如下：

a. 大约创始于公元前 155 年的印度——巴克特里亚纪元(通常称为“古代塞种”纪元)。

b. 创始于公元前 57 年的阿泽斯纪元。

c. 大约创始于公元前 128 年的伽腻色伽纪元。

在以上几种纪元中，有关伽腻色伽纪元的年代的争论最为激烈。我们在下列年表中，采取的是一种传统的观点^①。传统的观点不仅没有被大量的反对意见驳倒，而且由最近在阿富汗的苏科克塔尔发现的一件铭文进一步得到了证实^②。在伽腻色伽纪元的年

① W. E. van Wijk, 'On dates in the Kanishka Era' (范威金科《伽腻色伽纪元年代考》), Acta Orientalia (Leiden), V, 1926, 168—70.

② 参见 A. D. H. Bivar, 'The Kaniska daving from Surkh Kotal' (比瓦尔《苏科克塔尔铭文反映的伽腻色伽年代》), BSOAS, XXVI, 1963, 498—502.

代表中,相应地有下列一些主要的贵霜统治者:

年 代	统治者姓名
2 — 23	伽腻色伽一世
24 — 28	伐尸色伽
28 — 60	护毗色伽
74 — 98	波 调
99	姓名不详

47 在一件 41 年的铭文中,也发现了伽腻色伽的名字,一般认为这是第二个以伽腻色伽为名的统治者,故而将他称为伽腻色伽二世。很明显,在第一位伽腻色伽即位之后,这个王朝几乎持续了整整一百年。在这里,根据我们采取的计算法,伽腻色伽王朝的统治一直到大约公元 227 年才结束。

根据我们推算的结果,伽腻色伽和他的继承者们所处的时代,与古罗马帝国的哈德良以及后来的安东尼是同时的。在古代世界史上,这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贵霜帝国为世界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元一、二世纪,是中国与罗马之间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最活跃的时期。每当帕提亚帝国心怀敌意,对丝绸贸易横加干涉时,贵霜帝国就将商队向南转移,从巴尔赫通向印度河三角洲,商品由印度河三角洲通过海路,完成它的旅程。作为进口大宗丝绸的交换,罗马帝国出口的产品是种类繁多的手工制品,例如雕有珍珠和宝石的羊毛毯^①、小雕像和金属器皿。在罗马人出口的商品中,最重要的可能要属亚历山大里亚华

^① 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楼兰遗址,参见 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斯坦因《腹地亚洲》), I, 241; Pl. XXX。

丽的玻璃器皿了（这时中国还没有产生玻璃制造业^①）。与东西物资交流的同时，贵霜帝国的印度领土（到公元 57 年，贵霜帝国的征服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恒河河谷）则出口精巧的象牙制品。法国在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发掘出的出土文物，为这时的贸易情况提供了最能说明问题的原始材料^②，另外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小规模地发现。

在公元一、二世纪期间，贵霜帝国的繁荣并非没有中断过。虽然要对护毗色迦时期的内战迹象进行详细具体的描述是很困难的，但另一个事件却留下了较为具体的线索。天花女神诃利帝母的还愿形象，这时屡屡出现于健陀罗流派的雕像中，这在当时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健陀罗艺术都与来自佛经的内容有关，但是诃利帝母的特殊形象则很可能与当时的现实有关。公元 165 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③，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很可能就是天花。这次天花开始于贵霜帝国，⁴⁸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如果这一点得到

① M. Wheel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惠勒《帝国疆域之外的罗马》), London, 1954, 175.

② J. Hackin et al., *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egram* (哈金等《贝格拉姆考古新研究》)。

③ 关于诃利帝母，见 A.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e Gandhara* (福奇《健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 II, 130。有关泰西封，见 Dio Cassius (狄俄·卡希厄斯), LXXI, 2, 4;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 XXIII, 6, 24.

确认的话,这次同时发生的事件,将有助于证实传说的时间。

贵霜帝国的宗教问题,也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为在伽腻色伽和护毗色伽的钱币上,很明显地刻画了各种神象。虽然在萨珊人的眼里,贵霜人不是正统的琐罗亚士德教徒,但贵霜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信奉琐罗亚士德教的。在伽腻色伽与护毗色伽钱币上出现的神象中,有许多属于琐罗亚士德教^①。在其他一些钱币图案上出现的神象,例如大力神和罗马神,使人联想到古罗马的影响,但罗马的塞拉庇斯神不在此例。塞拉庇斯的形象虽然也出现在贵霜钱币上,但与上述罗马诸神不同的是,塞拉庇斯久已适应了中亚的环境^②。贵霜钱币中所见印度教诸神中,最重要的是湿婆,这时还出现了韦驮天和其他的神象。贵霜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对后世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在一枚珍贵的伽腻色伽钱币上,刻着佛陀的形象。从佛教典籍中可知,伽腻色伽对佛教的仁慈态度是很出名的。伽腻色伽还在白沙瓦兴建了一座宏伟的佛塔。1908年在白沙瓦发掘出了著名的伽腻色伽金棺,最近重新解释了金棺上的佉卢文铭文^③。根据铭文记载,金棺是伽腻色伽大王送给在伽腻色伽布逻城的他的寺庙的礼物。伽腻色伽布逻这一地名,显然是用了王朝名来命名白沙瓦市。在佛教史上,还有一件与伽腻色伽密切相关的事实,即伽腻色伽曾在克什米尔(或者根据另一种说

① M. A. Stein, 'Zoroastrian deities on Indo-Scythian coins' (斯坦因《印度—斯基泰钱币上的琐罗亚士德教诸神》), *Oriental and Babylonian Record*, August 1887, 88; 近来马利克也对此进行了研究,见 A. Malicq, 'La grande inscription de Kaniska' (马利克《伽腻色伽大碑铭考》), *JA*, 1958, 421—9.

② 见第1章第43页注②罗伯特文中所引关于戈尔甘的铭文。

③ B. N. Mukherjee, 'Shah-ji-ki-Dheri casket inscription' (缪凯杰《沙杰基德里棺铭》),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XXVIII, 39—46.

法,是在阉烂达罗)召开了佛教的第三次结集,对佛教经典进行解释^①。由这次会议的两位主要人物,波栗湿婆、伐苏蜜咄罗共同编纂的注本之一《大毗婆娑论》,现在仍有汉文本传世。虽然伽腻色伽本人是否皈依了佛教,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在贵霜帝国统治时期,佛教确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久,佛教就向外传播,越过兴都库什山,沿着贸易通道传到了中国。一般都将巴米扬,苏科克塔尔^②以及塔吉克斯坦的阿济那台佩^③等地的巨大的泥塑大佛的时间定于这一时期。与佛教传播的同时,印度的佉卢文以及象健陀罗的《法句经》^④这样一些佛教著作,也沿着这条道路传到了中国。佉卢文是在距离和阗不远的尼雅出土文书中发现的。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伽腻色伽统治时期,佛教就已传播到了中亚,并开始向中国传播。

① T. Watters, On Yuan Chwang (沃特斯《玄奘传》), 270—8; S. Frauwallner, 'Die buddhistischen Konzile' (佛朗沃勒纳《佛教的结集》), ZDMG, 1952, 250—6.

② D. Schlumberger, 'Le temple de Surkh Kotal en Bactriane (III)' (斯伦贝格《巴克特里亚苏科克塔尔的寺庙》), JA, 1955, 276.

③ B. A. Litvinsky, 'Arkheologiya Tadjikistana za gody sovetskoy vlasti' (李特文斯基《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塔吉克斯坦考古学》, 1967, III, 118.

④ J. Brough, The Ghandhara Dharmapada (布拉夫《健陀罗之〈法句经〉》), London, 1962.

第三章 中亚的萨珊人和突厥人

49 佛教的传播道路，是由已经发现的健陀罗艺术流派的雕像和画像地点标志出来的，这条道路穿越兴都库什山，从健陀罗到巴克特里亚，进而抵达塔里木盆地，再由此通往中原地区。健陀罗艺术最著名的作品，是雕刻在绿片岩上的雕塑品和浮雕，公元一世纪中叶之后不久，这些作品出现于咀叉始罗和白沙瓦河谷。但是健陀罗艺术风格发展的最重要的时代标志，是释迦牟尼形象的出现。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流派是从不贸然地去刻画释迦牟尼圣像的。但是在健陀罗地区，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以及可能同时存在于秣菟罗的那种偶像传统的影响下，产生了这一决定性的革新。虽然对于释迦牟尼形象最早出现于健陀罗地区的具体时间，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伽腻色伽钱币上的形象证明，到公元二世纪中期，释迦牟尼的形象就已经很普遍了。也许可以引证的最早的释迦牟尼像的例证，是出现于著名的比玛兰金棺上的释迦牟尼形象。比玛兰金棺的铸造时间，大约在公元57年，金棺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健陀罗艺术除了表现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之外，还重现了许多释迦牟尼的生活场面，这些生活场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为释迦牟尼在世时期的生活场面，另一种则为人们想象的释迦牟尼前生的生活场面。在独立式单个的释迦牟尼像之后，正是这些叙事的

雕塑场面，构成了最典型的健陀罗艺术的主题。伽腻色伽金棺和 50 比玛兰金棺，为我们显示了健陀罗艺术流派在金属器皿制做方面的成就。但是在健陀罗艺术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作品是塔里木盆地米兰遗址的壁画，这些壁画是斯坦因爵士在探险期间发现的。米兰壁画在艺术风格和主题题材方面与伽腻色伽金棺非常一致，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将米兰壁画的时间定为伽腻色伽时期。在距离贵霜政权控制的主要中心如此遥远的塔里木盆地，居然有那样早的健陀罗壁画存在，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证实一种颇为流行的传说，这一传说认为，伽腻色伽沿着商路，将其统治范围扩张到了远至中国地区^①。贵霜王朝沿着丝绸之路的这次入侵可能是很短暂的。此后不久，汉朝政权就在这一地区取代了贵霜帝国。虽然贵霜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但是健陀罗艺术的影响还继续存在，甚至在贵霜帝国复灭以后，由健陀罗艺术风格衍生的壁画还在塔里木盆地流行，例如库车地区的克孜尔千佛洞就是如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巴米扬的洞窟寺以及其中巨大的佛像的兴建，也可以归于贵霜帝国时期。但是在克孜尔，那些在35米大佛的拱型建筑内残存的壁画中，时间最早的壁画也大约都在公元227年贵霜帝国诸大王中的末代君主波调垮台之后。克孜尔壁画中的有些画像，根据其所描绘的贵霜——萨珊类型装饰华美的王冠判断，可能确实已经是晚至公元四世纪的作品了。

现在史学界一致公认，贵霜帝国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萨珊波斯征服了贵霜帝国的西北部领土。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缔造者阿尔达西尔一世击败并且杀害了帕提亚皇帝阿尔达汪五世，

^① T. Watters, *On Yuan Chwang* (沃特斯《玄奘传》), I, 124.

使自己成了伊朗的最高统治者。阿尔达西尔还肃清了许多在帕提亚的管理体制下十分活跃的当地小邦统治者，代之以萨珊皇室的总督。如果泰伯里著名的记载可信的话^①，阿尔达西尔甚至在东部伊朗发动了一次战役，占领了锡斯坦、阿巴沙赫尔(现代的你沙不尔)、木鹿、巴尔赫和花刺子模。他还会见了一个由贵霜王派来的⁵¹的投诚使团。我们将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定为公元 227 年，也就是贵霜王波调一世最后可证实的一年，可能是比较合适的。确实有迹象表明，贵霜皇族的一支继续在印度河东部统治了几十年之久。这支贵霜皇族被称为“Murundas”。他们中的一位有可能就是第三位伽腻色伽，他的存在，已由他发行的钱币得到了证实。但是另外的材料证明，贵霜帝国的中心地区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谷地，这时已经落到了萨珊人手中。

关于萨珊人之占领贵霜领土，我们可以从波斯波里斯附近纳克什鲁斯坦姆发现的萨珊皇帝沙布尔一世(公元240—272年)的铭文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这段铭文是用中世波斯文、帕提亚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刻写的，铭文中具列了大约公元 260 年左右的萨珊帝国诸省。尽管三种文字的全部译文还没有出版，但是霍尼格曼和马利克整理出版了铭文的希腊文本，并且加上了他们自己的注释^②。铭文中列出的萨珊帝国诸省包括“远在白沙瓦的贵霜帝国”。这段铭文说明，到沙布尔一世时，原来的贵霜帝国仅仅只有一

① Ed de Goeje (戈热编《泰伯里史》), 819; T. Noeldeke,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sur Zeit der Sasaniden*(诺尔代凯《萨珊时代的波斯、大食史》), Leiden, 1879, 15ff.

② E. Honigmann and A. Maricq, *Recherches sur les Res Gestae Divi Saporis* (霍尼格曼和马利克《弋秦人研究》), Bruxelles, 1953, 11: 98-110.

小部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存在的。贵霜帝国被萨珊波斯兼并的具体时间,还无法得到详尽的证明,而且在沙布尔统治时期,萨珊人究竟是怎样管理当时已经处于萨珊帝国统治下的贵霜领土的,对此,也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但不管怎样,因为赫兹斐尔德已经证明,由贵霜——萨珊系统钱币中得知的最早的萨珊诸总督中,有一位总督叫做沙布尔。据此,我们可以推论,萨珊朝贵霜省的第一任总督,就是以后的沙布尔一世皇帝,当时他还没有登上伊朗帝国的王位。

公元 206 年之后的一百年中,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健陀罗地区一直保持在萨珊皇室诸总督的统治之下。赫兹斐尔德曾对这些总督的钱币作过一些论述^①,现代学者又对此进一步地作了分析研究^②,根据它们的研究成果,将萨珊总督名单顺序排列如下:

沙布尔(即后来在公元 240—272 年在位的伊朗皇帝沙布尔一世。)

阿尔达西尔一世贵霜王

阿尔达西尔二世贵霜王

卑路斯一世贵霜王

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大约在公元 277 年—286 年叛乱,反对伊朗巴赫兰二世。)

卑路斯二世贵霜王

忽鲁密斯二世贵霜王(即后来在公元 302—309 年在位的伊朗皇帝忽鲁密斯二世。)

^① E. Herzfeld, *Kushano-Sasanian coins* (赫兹斐尔德《贵霜—萨珊钱币》)(*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XXXVIII), Calcutta, 1930.

^② A. D. H. Bivar,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比瓦尔《贵霜—萨珊钱币系统》), *JNSI*, XVIII, 1956, 13—42.

婆罗兰一世贵霜王

婆罗兰二世贵霜王(公元 360 年在位)

有关这些原贵霜领土上的萨珊帝国总督的情况，文字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但在拉丁文的《奥古斯塔史》一书中，曾经提到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起兵反对他的兄弟，萨珊王朝的巴赫兰二世皇帝(公元 276—293 年)一事^①，马夸特也注意到，在后来的拉丁文颂词中，提到了同一事件^②。公元 283 年，当罗马皇帝卡鲁斯占领泰西封时，萨珊的巴赫兰二世皇帝似乎正陷于同伊朗东部敌人的战斗中而不能脱身。东部的战事，使巴赫兰在罗马入侵者面前，无力在首都设防。钱币学材料证明，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这时占领了木鹿(他在这里铸造过金币)和赫拉特(在这里发行过银币)地区。虽然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与其继承者卑路斯二世贵霜王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搞清，但是事实很明显，忽鲁密斯最终是被击败了。

贵霜——萨珊诸总督的识别，全都依赖于他们各自钱币上的独具特色的头饰。至于婆罗兰二世贵霜王，他的头饰是一种公羊角样式的头饰。根据头饰的式样，我们有理由认为婆罗兰二世与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所见的是同一个人。据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记载(第 19 章，第 1 节，1—2 页)，此人在 360 年围攻阿美达时，戴着样式类似的王冠，而史学家们认为，围攻阿美达的这个人就是萨珊皇帝沙布尔二世。如果说婆罗兰二世贵霜王与萨珊皇帝沙布尔二世是同一个人，这种看法可以成立的话，

①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Carus 8* (《奥古斯塔史·卡鲁斯传》)。

② *XII Panegyrici Latini, ed Baehrens* (贝赫雷编《十二篇拉丁颂词》), 288。

我们就可以据此确定婆罗兰二世的时间,因为在公元 360 年,他一定还在位。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贵霜诸总督的金币中,有些金币上铸有制币厂的名字,例如 Baxlo (巴尔赫)。但是大多数金币上却没有制币厂的名字。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没有制币厂名的金币,是在贵霜总督的治所发行的。萨珊朝贵霜总督的治所应该位于喀布尔或者坎培萨。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婆罗兰二世贵霜王发行的钱币上,没有发现巴尔赫制币厂的名字。大概到婆罗兰二世贵霜王就任时,萨珊贵霜总督在来自草原的新的人侵者的浪潮面前,已经无力控制巴克特里亚草原,这时他们仅仅保有喀布尔河谷。这次新的冲击的细节,现在强烈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到公元四世纪,蒙古草原的匈奴游牧帝国已经久已分裂成了 53 两个各不相属的部分,它们就是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北匈奴这时都动乱不已。公元 311 年,南匈奴部攻陷和烧毁了 中国北部都城洛阳^①。洛阳城当时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终点,在罗马人中间,洛阳城以“Sera Metropolis”(丝都)而著称。此后不久,沿着再往西的陆路上接踵而来的骚乱,可以从粟特文古代书信中反映出来^②。后来,南匈奴在洛阳建立了一个王朝,一直到了公元 350 年,南匈奴王朝才因为自己种族中背叛者的大屠杀而灭亡。

与此同时,鲜卑部落日益强大,成为北匈奴的主要对手,并将北匈奴从贝加尔湖地区附近赶向西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

^① 参见 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 307ff.

^②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亨宁《粟特文古代书信的年代》), *BSOAS*, XII, 1948, 603.

北匈奴很明显地是向天山山脉北部迁徙,但是古代东、西方史学家对于北匈奴这时的迁徙情况,都没有加以记载。最终,北匈奴出现于索格底亚那北部的锡尔河草原。从公元350年以后,到达锡尔河的匈奴中有许多分枝入侵了萨珊帝国东方诸省,在这里,他们以“匈尼特”的名字为人所知;后来,其余的匈奴部落则出现于阿兰人和伏尔加河西部南俄草原的哥特人中,这些匈奴部落以欧洲“匈人”著称。

公元350年,当伊朗的沙布尔二世(309—379年)正在围攻罗马帝国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要塞时,突然传来了游牧入侵者袭击萨珊帝国东部疆域的消息。沙布尔二世立即撤围,出发前往受到威胁的地区。是否是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下,喀布尔的萨珊法官塞琉克斯(Siwky)来到了萨珊国王的宫廷,最近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①。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沙布尔二世将他的指挥部设在了你沙不尔市,“你沙不尔”,意即“沙布尔的卓越功绩”,说明该城是为了纪念沙布尔的这次行动而命名的。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沙布尔二世为了萨珊帝国东部边疆的稳定,被迫发动战争以反对匈尼特人。就暂时来说,沙布尔二世确实取得了⁵⁴成功。在公元360年,他又返回了西方,重新与罗马帝国开战,而匈尼特人的军队则作为沙布尔的同盟者,在匈尼特王伽楼巴提的统率下,跟随伊朗军队出征。然而从长远来讲,沙布尔二世的努力则是徒劳的。事实非常清楚,在公元360年之后的短短几十年之

^① 这一问题是亨宁在讨论波斯波里斯中世波斯语铭文时提出的,他将铭文的时间辨认为沙布尔的第18年,而不是旧版中的第48年。见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伊朗金石录》), Pt. III, vol. II, Portfolio III, Introduction.

内,原来的贵霜诸省已经脱离了萨珊朝总督的控制,而臣属于来自草原的新的入侵者的首领。这时在伊朗东部,兴起了一股新的势力,这就是匈尼特人及其继承者寄多罗人和啜哒(Hephthalites或Ephthalites)。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最初在呼罗珊地区出现的匈人,可能就是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提到的匈尼特人^①,他们的出现,比到达欧洲的匈人大约早25年左右。匈尼特这一名称可能是由中部伊朗的xiyōn(Hun),加上希腊文部族的词尾-ιται构成的。但是亨宁认为,Ephthalites(啜哒)这一名字的词尾是粟特文的复数形式^②。当匈尼特人最终与沙布尔二世结成联盟之后,他们参加了沙布尔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反对罗马帝国的战役。在那里,匈尼特王伽楼巴提的儿子在围攻阿美达(Diyarbakr)的战斗中阵亡。根据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记载,这位匈尼特王子的尸体被焚化了。阿弥厄奴斯记载的这件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与匈尼特人在一起的萨珊军队是琐罗亚士德教徒,对于琐罗亚士德教徒来说,焚尸是一种要遭到谴责的行为。但是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所描述的焚尸细节,与欧洲匈人的考古材料却是相互吻合的^③。在塔吉克斯坦的佩斯肯特河谷,也有类似的报告^④。同时根据《周书》记

① XVI, 9, 4; XII, 5, 1; XVIII, 6, 22.

② ZDMG (《德国东方协会杂志》), XC, 1936, 17.

③ N. Fettich, Le trouvaile de tombe princière hunnique à Szeged-Nagyszécsós (费缔什《塞格德—瑙吉塞克绍斯发现的匈人王者墓葬》), (Archaeologia Hungarica XXXII), Budapest, 1953, 105.

④ 参见 G.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IV, Tadzhikistan'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第四部分“塔吉克斯坦”), Central Asia Review, XIII, 1964, 176.

载,同一时期的焉耆民族,也有同样的习俗,而焉耆的民族很可能与匈奴是有关的^①。

我们知道,在匈尼特人出现后不久,就兴起了匈人首领寄多罗。在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寄多罗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诸部落中,是一位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物。寄多罗的钱币(因为将这些钱币归于他,是再合适不过的。)是与萨珊伊朗君主沙布尔二世(公元 309—379年)、阿尔达西尔二世(公元 379—383年)以及沙布尔三世(公元 383—388年)的钱币一起,在喀布尔附近的特佩马兰贾的钱币宝藏中发现的^②。毫无疑问,寄多罗的统治时间与上述三位萨珊统治者相互交错,或者是在他们之后。希腊关于匈人的
55 史学家普利斯库斯经常不时地提到“寄多罗人”。虽然事实上,寄多罗确实继续在他的钱币上使用贵霜当地的称号“贵霜王”(Kushanshah),但是根据普利斯库斯的记载,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寄多罗的部众的确是匈人,而不是有些学者坚持认为的贵霜人。实际上,在寄多罗之前占据贵霜领土的萨珊总督们,也是使用“贵霜王”这一称号的。诚然,普利斯库斯对有关公元五世纪“寄多罗匈人”的表述,也确实存在着年代上的错误。因为到公元五世纪时,已经有一个新的游牧部落在这里出现了。似乎在寄多罗的末年和他的儿子(钱币证明他与寄多罗同名,所以我们称他为寄多罗二世)统治时期,又兴起了一股新的匈人入侵者的浪潮,啾哒人在这时进入

① R. A. Miller, *Accounts of the Western 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 (米勒《北周史上之西方诸民族考释》), 11—12。

② 参见 R. Curiel, 'Le trésor de Tépé Marajan' (柯里尔《特佩马兰贾的钱币宝藏》), 本文收于 R. Curiel and D. Schlumberger,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柯里尔、斯伦贝格《阿富汗的钱币宝藏》), 103ff.

了巴克特里亚，并且将寄多罗人赶到了旁遮普。在旁遮普地区的许多金币上，都发现了寄多罗的名字，但是这些金币的铸造厂及其确切归属，目前还无法肯定。

根据科什曼的意见，匈尼特人（据他的理解，Chionites这个字包括了寄多罗人在内）与在公元五世纪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哒哒并无不同。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一些汉学家如麦高文^①、榎一雄^②等人的看法，在史学界得到了一致认可。这些权威学者坚持认为，哒哒人是新到达的游牧入侵者。根据他们的观点，哒哒人是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到达巴克特里亚，然后又将寄多罗人赶到了南方。这样看来，公元427年被巴赫兰四世从伊朗击败的东部入侵者，很可能就是寄多罗或者哒哒。但是，不管入侵伊朗东部的是否是哒哒，这次动乱都可能是由于哒哒人的出现所引起的骚乱造成的结果。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公元457年，萨珊王子卑路斯为了从他的兄弟，忽鲁密斯三世那里得到伊朗王位，曾经求助于哒哒。后来，卑路斯又转而反对他的哒哒同盟者，但他反被哒哒击败，成了哒哒王的阶下囚。泰伯里将这位哒哒王称为阿科苏瓦尔（Akhšnwar），而费尔道西则将他称为库什那瓦兹（Khušnavaz）。这一次哒哒人将卑路斯的儿子居和多留作人质，释放了卑路斯。后来，卑路斯赎回了居和多，接着再次向哒哒人发起进攻。但卑路斯的骑兵冲入了一道暗沟，以至全军覆没。与我们上文讨论的匈尼

^① 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 408.

^② 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榎一雄《哒哒的民族》),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XVIII, 1952, 22, 25.

特人焚尸的丧葬习俗相比,有意思的是,根据泰伯里的记载,哒哒王库什那瓦兹将波斯人的尸体埋入了坟墓之中。

- 56 .关于哒哒人的丧葬习惯以及卑路斯之败于哒哒这一历史事件,普罗科匹厄斯作了权威性的描述^①,普罗科匹厄斯认为,虽然从哒哒的名称与种族来看,哒哒人是匈人,但他们过的并不是游牧生活。哒哒人肤色白皙,五官端正;对死者实行土葬,而且哒哒人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要埋葬 20 名生前好友来陪葬。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哒哒人实行土葬这一点,与匈尼特人实行火葬的习俗有明显的区别。

公元 488 或 489 年,年轻时在哒哒人中间作过人质的萨珊王居和多,通过哒哒人的帮助,成功地恢复了波斯王位。但是,哒哒部落这时仍然威胁着伊朗的安全。另一位萨珊皇帝库萨和(公元 531—579 年)在戈尔甘平原构筑了防御工事,以抵御哒哒部落的入侵。最后,随着突厥人在阿姆河地区出现,库萨和与突厥可汗结成了联盟,共同夹击哒哒。在西方史料中,与库萨和结盟的突厥可汗叫 Sinjibu 或 Silzibul(室点密)^②。公元 557 年之后不久,哒哒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击败,他们的领土以阿姆河为界被萨珊帝国和突厥瓜分,萨珊帝国占据了阿姆河以南的哒哒领土,而阿姆河以北的全部土地则落入了突厥人手中。

公元五世纪与六世纪早期,即哒哒人在巴克特里亚占据统治地位的后期,根据印度史料记载,旁遮普地区频频遭到入侵,而且某个以“匈奴人”(Hunas)知名的民族也在这时侵入了西印度。很明

① Procopius, Wars (普罗科匹厄斯《战争史》), I, 3.

② 他的实际名字叫 Istemi(室点密)。

显,这些入侵者就是匈人,但他们究竟是匈人中的哪一支,目前尚不清楚。在这些入侵者中,最重要的一支是疾布里提。早在公元458年,笈多王子塞建陀笈多就被召来,抵抗入侵者的猛烈进攻。这些入侵者很可能就是匈奴人。在塞建陀笈多在世期间,他遏止了匈奴人的进攻,但是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年,笈多帝国就衰落了。到公元510年,匈奴人首领头罗曼已经在印度的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他的统治。头罗曼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声名狼藉的摩醯逻矩罗。摩醯逻矩罗统治了旁遮普的大部分地区。后来大约在公元525年,摩醯逻矩罗在印度平原被击败,但他还继续统治着克什米尔。根据传说,摩醯逻矩罗喜欢将大象从克什米尔的悬崖上滚下来,以大象摔在下面岩石上发出的惨叫声自娱。继头罗曼和摩醯逻矩罗之后是其他的一些匈奴王。逻迦拏与身矩罗就是其中两位,他们的统治在公元六世纪后半期崩溃,但对他们在位的确切时间,现在尚无法得知。以后的这些匈奴王的统治区域,一定是在喀布尔河谷或者加德兹地区。最近发现的一件铭文证实,身矩罗的统治至少延续了八年^①。

除了米诺尔斯基报告的“哈拉吉”突厥方言中残存的一些古代匈人语言的痕迹之外^②,我们对于亚洲匈人的语言,象对他们欧洲同胞的语言一样,完全一无所知。究竟哪个民族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匈人相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现在有两种主要的假设。第一种

^① D. C. Sarcar, 'Three early medieval inscriptions' (萨卡尔《三件中世纪早期铭文》), *Epigraphia Indica*, XXXV, 1963, 45--7.

^② V. Minorsky, 'The Turkish dialect of the Khalaj' (米诺尔斯基《哈拉吉突厥方言》), *BSOAS*, X, 1940-2, 417-37.

假说是由科什曼^①和榎一雄^②主张的“伊朗语”说，这一假说的主要根据是草体希腊字钱币题铭。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新的发现所排斥，人们发现这些题铭实际上是东部伊朗当地的巴克特里亚方言。苏科克塔尔巴克特里亚铭文的发现，使这一结论成为定论。毫无疑问，这种伊朗语言偶尔确曾被匈人为了管理的目的而使用过，但是匈人实际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呢？现在能够自圆其说的假设，是米诺尔斯基提出的“突厥语”说。然而，“突厥说”也并非尽如人意，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周书》说，哒人实行一妻多夫制^③，这一记载对于主张哒源于印欧语系的理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与其说他们接近突厥人，倒不如说他们接近藏族人。从大英博物馆一个银盘上所画的东部匈人（很明显是寄多罗人）的军事装备上，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他们的种族起源有关的问题^④。从银盘上所见，匈人的装备有一柄笔直的双手握宝剑和一张复弓，但是没有马蹬。匈人装备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特点，很明显地将他们与后来的阿哇尔人区别开了。阿哇尔人具有特色的装备是弯曲的剑和马蹬，而一般则认为阿哇尔人属于蒙古人种。米诺尔斯基主张，说突厥语的伊朗哈拉吉人与说普什图语的阿富汗吉尔扎伊人（他们可能与中世纪记载中称为“哈尔吉”的人是同一民族），都是哒人的后裔。这种观点初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这一观点有利的小证据。这些证据说明，在阿富汗早期有人居住的

① R. Ghirshman,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科什曼《匈尼特—哒》)。

② 见上文注解引榎一雄文。

③ 米勒上引书，第11—12页。

④ O. M. Dalton,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多尔顿《阿姆河的宝藏》，3rd, edn., London, 53, no. 201.)

地区，现在是由语言中有突厥语因素的吉尔扎伊人占据着。我们⁵⁸完全有理由认为，一股与伊朗的哈拉吉人有联系，而且具有同一名称的突厥人，曾经在阿富汗地区的哒哒人中占据统治地位，后来他们肯定是被同化于数量庞大的操普什图语的部落之中了。这些操普什图语的部落来源于东部伊朗。这股与哈拉吉人有关的突厥人虽然被同化了，但他们却给由此产生的部落混合体留下了“哈尔吉”这一名称。一个入侵部落完全丧失自己的语言，接受原来本地民族的语言，这在阿富汗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如阿富汗中部的哈札刺蒙古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族源是蒙古人种，但他们现在几乎全都说波斯语。我们应该承认，哒哒人究竟与哪个民族在种族上和语言上接近，有关这一问题的证据还很零碎，目前要作出结论也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米诺尔斯基的理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众多东部匈奴部落统治着巴克特里亚以及现代阿富汗的其他地区时，在蒙古地区的草原民族中，也发生了重大的王朝更替。实际上，正是蒙古草原的这些变动，最终导致了哒哒帝国的垮台。鲜卑将北匈奴从鄂尔浑河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赶到巴克特里亚以后，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统治了蒙古草原。但是到公元六世纪，有一支称作柔然的部落在蒙古草原崛起。这些柔然人，可能就是后来以阿瓦尔的名字在欧洲出现的部落。公元560年之后不久，阿瓦尔人就已经君临匈牙利草原。虽然无论是对阿瓦尔人在蒙古草原的情况来讲，还是就其到达匈牙利居地后的情况来讲，我们对阿瓦尔王朝的历史都所知甚少，但是阿瓦尔民族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具有某种强烈的兴趣，因为可能正是阿瓦尔人，向欧洲传递了骑兵战

争的两种重要器械,马蹬和马刀^①。公元五世纪时,大概在介于中国和草原之间的地区,发明了马蹬和弯曲的骑兵剑。当这两种发明被阿哇尔人传到欧洲之后,很快就被拜占庭采用了^②。像马蹬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象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蹬为何物,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诧不已,然而看来实情确是如此。

突厥兴起的结果,将柔然王朝驱逐出了蒙古草原,在此过程中,突厥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到公元 552 年,柔然已经完全败亡。突厥帝国的开国君主是汉文史料中称为土门(突厥文铭文中称作“布民”,Bumin)的首领。突厥可汗的驻地位于库车北部的白山(Aq Dagh),但突厥帝国的领土则往西一直达到了阿姆河和里海。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突厥汗国的西部实际上是在土门可汗的兄弟,室点密的独立统治之下。室点密其人与西方史料中的Sinjibu(Silzibul)是同一个人。就是室点密与伊朗的库萨和一世建立了联盟。突厥与伊朗的联盟不仅导致了柔然帝国的灭亡,而且为突厥帝国与伊朗建立了共同的边界。虽然室点密死于公元 576 年,但突厥人对索格底亚那还保持着强烈的影响,甚至在东、西突厥分别于公元 630 年和 659 年名义上臣服了中国唐朝之后,情况也仍然如此。

到公元 682 年,突厥在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东(蓝)突厥

^① 关于马蹬,见 A. D. H. Bivar, 'The stirrup and its origins' (比瓦尔《马蹬及其起源》), *Oriental Art*, n.s. I, 1953, 3—7。

^② 林恩·怀特在其著作中,采纳了一些经过修正的年代。这虽然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但从具体细节上说,他所主张的年代是不足凭信的。见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林恩·怀特《中世纪的技术及社会变革》), Oxford, 1962, 1—38。

汗国。东突厥政权为我们留下了鄂尔浑河的鲁尼文碑铭^①，西诺尔作了有关这些碑铭的提要^②。突厥碑铭中详细叙述了颉跌利施可汗(公元681—689年)怎样战胜了乌古斯，侵入唐朝，直抵太平洋沿岸的事迹。颉跌利施可汗的继承人是默啜可汗，默啜可汗在西方征服了黠戛斯和突骑施部落，到达了索格底亚那的铁门。但是到了第三任可汗毗伽可汗统治时期(公元716—734年)，乌古斯人起而反叛，并且逃向唐朝，毗伽可汗虽然殊死力战，但最终也没能挽救东突厥衰亡的命运。公元699—711年之间，原西突厥的全部领土，都被并入了复兴后的东突厥疆域之内。东突厥衰落之后，西突厥的突骑施部落开始兴起。突骑施首领苏禄为了反对阿拉伯将军屈底波的继任者，与阿拉伯人发生了多次战争。从这时起，开始了索格底亚那的阿拉伯征服时期。从此以后，索格底亚那就以其阿拉伯名字“Mawarannahr”(河外地区)为人所知。早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军队就已经蹂躏了伊朗，将逃亡的萨珊国王伊嗣俟三世(公元632—651年)赶到了木鹿。伊嗣俟在木鹿死于刺客之手。没过多少年，阿拉伯人就发现他们的征服并非一帆风顺，阿拉伯军队被迫滞留在阿姆河畔，与突厥人反复争夺阿姆河以北诸省的所有权。

在突厥人与阿拉伯人争夺中亚的同时，蒙古草原突厥领地的东端，这时形成了一个在文化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的突厥政权，这就

① 汤姆森对此碑铭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见 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échiffrées' (汤姆森《鄂尔浑河碑铭考释》),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Ugrienne, V, 1896, 1-224。现代人的研究，见 Giraud, L'Empire des Turcs célestes (古罗《蓝突厥汗国》)。

② D. Sinor,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西诺尔《内陆欧亚研究导论》), 86—90。

是回鹘汗国。回鹘人与葛逻禄、拔悉密等其他的突厥部族一起，共同推翻了东突厥帝国，并在公元 744 年建立了回鹘汗国，汗国的首都设在鄂尔浑河地区的斡耳朵八里。斡耳朵八里直到近世仍以哈喇八喇合逊知名，同时此地还因为出土了三种文字的三体合璧碑而著称于世。我们在下文中将就此碑铭进行讨论。汉米尔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回鹘可汗的王朝年表^①。但是有关回鹘可汗的名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回鹘统治者的姓名中，大多数是从汉文转写中得知的，我们从汉文转写中能够得到或者还原出的突厥语名称，仅仅是一种相当规范的称号而已。如汉米尔顿表中所列的第一位可汗，汉文译写为“骨力裴罗”，而突厥语则为 Qutlugbilgā kül qaǧhan(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意为威严、睿智、光荣的皇帝陛下)。

在回鹘汗国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是公元 762 年，回鹘第三任可汗统治时期，回鹘统治者对摩尼教的皈依。这一事件见于哈喇八喇合逊三体合璧碑记载^②。三体合璧碑是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的，但能令人满意地保留下来的只有汉文铭文。很明显，回鹘人占领了丝绸之路的终点洛阳，其结果使回鹘可汗与摩尼教的传教士发生了关系。从公元 694 年以来，在中国汉地就已经有摩尼教的传教士在活动了。摩尼教是一种混合的宗教，在其教义中包括了来源于琐罗亚士德教、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成分。萨珊帝国在伊朗兴起后不久，摩尼教的先知摩尼在

^① J. R. Hamilton, *Les Ouï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汉米尔顿《五代回鹘史料》), 139.

^② E. Chavannes and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Journal Asiatique*, 1913, 177.

美索不达米亚创建了摩尼教，创立摩尼教的具体时间为公元244年。在传道者马尔·阿摩的领导下，这种新的宗教从很早起就进入了呼罗珊和索格底亚那。当摩尼教团体在萨珊领土上日益遭到⁶¹迫害时（后来在哈里发统治时期，又发生过类似的迫害事件），摩尼教信徒（毫无疑问，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粟特民族和商人）纷纷沿着通往中国的道路涌向了东方。

就有关摩尼教徒后代的情况而言，摩尼教社团中主要的重大事件的记载，都保留在现存的摩尼教圣典中。这些摩尼教圣典都是用另外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写成的，如帕提亚语、粟特语和中世纪波斯语。摩尼教现存圣典，包括中世纪波斯语著作“Shaburagan”“沙布尔（之书）”中的残片。在该书残片中，摩尼向萨珊皇帝沙布尔一世阐述了自己的信仰。除了残存的中世纪波斯语片断之外，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由阿拉伯编年史学家比鲁尼保留了下来^①：

上帝的使者永远将睿智、懿行一次次地带给人类。在天地初始的时代，名为释迦牟尼的使者，将它带到了印度。到了下一个时代，又由琐罗亚士德带到了波斯。到再下个时代，耶和华将它带到了西方。现在，启示再次降临了，最后时代的预言将通过我——上帝旨意的使者——摩尼，带给巴比伦尼亚。

在回鹘文的重要残稿 Kavan 或《巨人书》中，也保留了摩尼教另外的著作^②。摩尼教在其思想中，着重强调书法，这一点对摩尼

^① Al. Biruni, *Al-athār al-bāqīya*, tr. Sachau,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萨乔译，比鲁尼《古代民族系年》），190。

^② W. B. Henning, 'The Book of Giants'（亨宁《巨人书》），*BSOAS*, XI, 1943-6, 52-74。

教著作的传播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摩尼教艺术中,他们对手稿的装饰和绘画也很感兴趣,这对摩尼教的传播也不无裨益。

第三任回鹘可汗皈依摩尼教之后,接受了波斯称号“Zahag-i Mani”“摩尼之(圣)子”。摩尼教一度曾经是少数派的宗教,随着回鹘可汗的皈依,摩尼教第一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的国教。这样,摩尼教得以相应地扩大了影响,逐步繁荣起来。对于回鹘部落来说,皈依摩尼教之前,他们信仰有几分残忍的萨满教,通过改信这种新的宗教,使回鹘部落得到了一种接近较为文明的河中地区和伊朗文化的途径。在铭文中,对此有如下描述^①:

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

62 第一回鹘汗国一直统治到了公元840年,这时,在叶尼塞河沿岸骤然兴起了黠戛斯部落。黠戛斯人摧毁了回鹘汗国的首府,在他们的打击下,十三个回鹘主要部落如鸟兽散。一些幸存的部落则向西南方迁徙,在塔里木盆地(新疆)建立了政权,逐渐取代了这里原来的印欧语系民族——特别是那些所谓说“吐火罗”方言的人。以后,这股回鹘人定居的主要中心在敦煌东面的甘州和吐鲁番绿洲的高昌。特别是在高昌,发现了大量重要的写本,其中包括回鹘文写本,摩尼教写本以及古叙利亚文手稿,反映了摩尼教、基督教以及佛教的情况。这些写本的内容,大部分发表在散见于定期刊物的文章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后期回鹘汗国复杂的文化生活的知识。这些回鹘汗国一直延续到了蒙古帝国兴起时期,

^① 沙畹、伯希和上引书,第194页。

最终被蒙古帝国合并。回鹘人还为蒙古帝国留下了他们独特的，由粟特文改写的稿本以及传说抄本。回鹘民族及其早期帝国的传说，以及后来以“亦都护”之名著称的回鹘最高统治者的传说，甚至包括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哈喇八喇合逊铭文，这些材料在志费尼写作吉思汗的历史时(Tarikh-i Jahan Gushā,《世界征服者史》)，都为他所利用^①。志费尼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偶而也可能稍有歪曲。

^① Ala-ad Din' Ata-Malik Juvaini, the Tarikh-i Jahān Gushā, tr. J. A.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博伊尔译,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Manchester, 1958, I, 54.

第四章 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63 我们说阿拉伯人入侵中亚进展顺利、战略复杂，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事实上这次入侵是沿着两条分开，但又会合的路线同时展开的。21/642年尼哈温一战，阿拉伯人摧毁了波斯帝国军队，波斯人主要的有组织抵抗宣告结束。萨珊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成了逃亡者。虽然地方统治者们提出了分散抵抗的主张，但收效甚微。29/649年，库法总督塞依德·本·阿斯的军队从哈马丹和赖依，沿着北部道路向朱里章、呼罗珊挺进。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巴士拉总督阿不都拉·本·阿弥尔开始通过法尔斯和克尔曼向泰白辛盆地、你沙不尔以及木鹿前进。历史学家白拉左里的伊斯兰征服史，对这些事件提供了最简明的叙述^①，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徒思的波斯长官(Marzban)曾给两位总督每人去了一封信，声称他们谁先抵达徒思，该省就向谁臣服。虽然阿不都拉·本·阿弥尔途经的道路更加难走，但他进展神速，使他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控制了徒思省。呼罗珊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如撒刺哈夕、徒思、赫拉特以及木鹿等，很快都向入侵者屈服了。在攻打撒刺哈夕的战役中，未来的总督阿不都拉·本·卡齐穆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另外

64 一支由拉比·本·齐亚德率领的分队从克尔曼出发，前去征服锡

^① F. C. Murgotten,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默戈廷《伊斯兰国家的起源》), New York, 1924, II 39; 139ff.

斯坦，拉比也顺利地完成了使命。但是由阿赫奈弗·本·盖斯统帅的先头部队，在前往赫拉特东北部时，却在木尔加布河附近遭到了猛烈的抵抗。经过激烈战斗之后，阿赫奈弗才占领了当地的城镇，向巴尔赫推进。

在哈里发阿里统治时期（35/656—40/661年），阿拉伯帝国发生了骚乱。这次骚乱的结果，使阿不都拉·本·阿弥撒撤出了呼罗珊，阿拉伯人对呼罗珊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削弱了。但是在穆阿维亚就任哈里发之后，阿不都拉又返回巴士拉任职，他的部下也再次控制了呼罗珊。然而阿不都拉本人却因为过分宽大的行为，在44/664年被免去了总督职务。继任的巴士拉总督为齐亚德·本·阿比·苏菲亚，是他最先将呼罗珊省分成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分别为你沙不尔、巴尔赫、木鹿鲁德（位于木尔加布河畔）和赫拉特。但只是在齐亚德之子欧贝杜拉·本·齐亚德在54/674年被任命为呼罗珊统治者之后，阿拉伯人才又重新开始入侵，阿拉伯军队这次渡过了乌浒水（Oxus，阿姆河），击败了布哈拉的统治者。

在有关阿拉伯入侵中亚的史料中，有些史料将反抗阿拉伯人，保卫布哈拉的主要角色归于一位号称为“可敦”（Khatun）的突厥王后，一般认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传说。不管怎么说，以后的呼罗珊诸总督，特别是齐亚德的另一个儿子萨利姆，继续向乌浒水北部地区入侵。萨利姆于61/681年就任呼罗珊总督，他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战役，打败了花刺子模人。此后，萨利姆推进到了撒马尔罕，他的妻子——第一位随军参加了乌浒水以北地区远征的阿拉伯妇女，在撒马尔罕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给儿子起名为“苏克底”（al-Sughdi，即索格底亚那）。

在伊斯兰东部领土上,阿拉伯总督们的地位,仍然严重地受到哈里发政权心脏地区发生的骚乱的影响。这些骚乱是64/683至73/692年之间,反对哈里发的阿不都拉·本·佐拜尔的势力兴起的⁶⁵结果。由于哈里发政权内部的争夺,进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也因宗派之争而告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萨利姆无法继续保持他的地位,被迫将统治权交给了阿不都拉·本·卡齐穆,而后者现在是作为佐拜尔的支持者出现的。直到72/691年在一次纠纷中被杀为止,卡齐穆实际上一直是作为一位独立的统治者统治呼罗珊地区的。此外,卡齐穆的儿子木萨·本·阿不都拉·本·卡齐穆也掌握了位于阿姆河北岸的特尔梅兹(Tirmiz)要塞,并在那里公开割据自立。直到在85/704年死于一次战争为止,木萨一直保持独立,他既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首领们,也反对突厥和粟特人的首领。

在呼罗珊总督割据独立的同时,大总督哈贾吉代表倭马亚朝哈里发阿布德·马里克在伊拉克就职。78/697年,哈贾吉派遣著名的穆哈拉布·本·阿比·苏弗拉将军担任呼罗珊总督。穆哈拉布试图重新发动阿拉伯人对乌浒水以北地区的战争,以此来转移那些长期不和的阿拉伯部落的力量。他入侵了史国(Shahrisabz)和那色波(Nakhshab),但在归途中,穆哈拉布得了胸膜炎,并在82/701年死去。穆哈拉布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叶基德·本·穆哈拉布。叶基德是个挥霍无度而又暴虐残忍、生性浮夸的人。根据最近发现的阿拉伯—萨珊钱币可知,叶基德曾在护时健地区征收过人头税,他的画像也清楚地保留了下来^①。后来,叶基德进一

^① J. Walker, 'Some new Arab-Sassanian coins' (沃克《若干新发现的阿拉伯—萨珊钱币》), NC, 1952, 108 and Pl. IX 3.

步介入南方，代表他的上司哈贾吉平定叛乱者。这次叛乱是阿布德·拉赫曼·本·穆哈默德·本·阿夏特发动的。阿夏特也是由哈贾吉从巴士拉派往锡斯坦的，他是装备精良的“孔雀军”的首领。但阿夏特后来与哈贾吉意见不和，并起兵反对哈贾吉。

然而在85/704年，哈贾吉免去了叶基德的总督职务，先是由他的兄弟穆法德勒·本·穆哈拉布接替叶基德担任呼罗珊总督，紧接着在几个月之后，又以著名的屈底波·本·穆斯林取代了穆法德勒。在此后一系列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乌浒水北部确为阿拉伯人吞并的土地，实际上全部是由屈底波负责的。屈底波征服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在锡尔河北部的赭石(塔什干)建立了一个基地，并且向北推进到了远至白水胡城的地区。与此同时，屈底波的弟弟阿布德·拉赫曼征服了花刺子模(Chorasmia)王国，使花刺子模俯首称臣。96/715年，当屈底波的死敌苏来曼就任哈里发⁶⁶的消息传来时，屈底波还正在费尔干纳作战。屈底波拒绝向新君主效忠尽力，这时他的军队发生了叛乱，叛乱者袭击了屈底波将军的帐篷，屈底波和他的许多亲属都遭到了残杀。在这次叛乱中，只有屈底波的侍卫们还对他保持忠诚，这些侍卫都是粟特人的人质。

在屈底波死后的一段时间内，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势力极大地衰退了。屈底波因为得到了他的上级哈贾吉的全力支持，所以他具有特别的优势。屈底波的继任者们则很少能够得到这种支持，毫无疑问，就这些继任者的能力而言，他们也没有资格得到这种支持。在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中，宗派斗争相当普遍。后来在呼罗珊本地各宗派间的斗争之外，又出现了从事于推翻倭马亚朝哈里发的“阿拔斯间谍”的秘密宣传，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削弱了阿

拉伯人对中亚的入侵。但是，促成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势力衰退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锡尔河北部突厥突骑施部落的兴起。突骑施人很快就响应了河中地区本地粟特人首领的呼吁，被请来与阿拉伯势力抗衡。106/724年，突骑施彻底击败了穆斯林进入费尔干纳的一次远征。阿拉伯人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才得以重新南渡锡尔河，落荒而逃。因为阿拉伯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备尝艰辛，所以这次战役以“干渴之日”而著称^①。在以后的十多年内，阿拉伯人被迫处于守势。有一个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问题是，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人以及索格底亚那、吐火罗斯坦本地的君主们，都向唐朝朝廷派出了许多使节，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劝说唐朝皇帝对突骑施人施加影响。

从屈底波死后的这一段动乱时期起，有一个重要的文件窖被保留了下来。窖中所藏文件大部分是粟特文书。这些文书组成了泽拉夫善河上游喷赤干的统治者，粟特王歹伐思帝的档案。歹伐思帝为了逃避阿拉伯人惩罚性的远征，躲入了他在穆格山(Mount Mugh)的一个山间堡垒。但是阿拉伯人最终攻克了这座堡垒，并将其洗劫一空。歹伐思帝的档案就是近年来在穆格山发现的^②。喷赤干本地也是一个成功的发掘地点，苏联考古学家在喷赤干地区发现了一组重要的壁画^③，据考证，这些壁画的时间与前穆斯林时期紧紧衔接。

在与突骑施的战斗中，阿拉伯人实际上失去了对乌浒水以北

① 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 66.

② 蒙盖特上引书, 第290页。

③ 同上, 第293页。

全部土地的控制权。突骑施可汗苏禄甚至入侵到了乌浒水以南地区。但是阿拉伯总督阿萨德·本·阿不都拉·盖斯里后来击败了苏禄可汗，苏禄在失败之后不久，就被自己的一个部下暗杀了。苏禄之死，标志着突骑施帝国的瓦解，也解除了突骑施对阿拉伯统治的威胁。120/737年阿萨德去世，纳斯尔·本·塞耶尔继阿萨德之后，成为下一任总督。由于突骑施崩溃的结果，纳斯尔得以实现和平，成功地重建了呼罗珊省。

纳斯尔是一位明智而审慎的总督，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呼罗珊地区阿拉伯人之间的宗派斗争仍然很激烈，但纳斯尔为恢复呼罗珊的文明做了大量工作。人们对于纳斯尔的回忆，因为他在雅赫雅·本·宰德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黯然失色。雅赫雅是一位要求阿里任哈里发者，也是当时活跃的宣传运动的中坚人物。当雅赫雅在巴尔赫出现时，纳斯尔将雅赫雅扣留了起来，命令他去首都大马士革。但雅赫雅在你沙不尔附近逃脱了。在与当地的统治者进行了多次小规模战斗之后，雅赫雅纠集了一小股部队，向安贝尔(现代阿富汗的萨里普尔，Sar-i Pul)进发。纳斯尔派遣一个骑兵分队与雅赫雅交战，雅赫雅在后来的战斗中被杀。他的尸体被曝露在城墙上，最后由阿卜·穆斯林的追随者安葬。雅赫雅的墓地就是装饰精美的塞里吉德圣陵，他的墓地至今还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

129/747—8年，阿拔斯朝的传教士阿卜·穆斯林(他的全名是阿布德·拉赫曼·本·穆斯林，*Abd al-Rahman b. Muslim)到达了呼罗珊，他的召募运动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阿卜·穆斯林赢得了德赫干们(伊朗土地占有者)的全力支持，反对倭马

亚王朝的全部力量都加入了他的军队。由于阿拉伯驻军仍然陷入宗派分裂之中，纳斯尔·本·塞耶尔的阵地很快就防守不住了，除了撤回西方之外，纳斯尔别无选择，最后，他死于撤退途中。

- 68 阿卜·穆斯林的胜利敲响了倭马亚王朝垮台的丧钟，也揭开了阿拔斯王朝建立的序幕。但是，正值西方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时候，在东方阿拉伯征服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危险。一支强大的唐朝远征军，在这时进入了锡尔河上游河谷，赭时地区的统治者因为拒不从命，甚至被唐朝军队处死。阿卜·穆斯林的将军齐亚德·本·萨里赫进行了抵抗，并且在一次战斗中重创了唐朝军队，这次战斗结束了唐朝统治河中地区的企图。但是，这次战争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后果，从战争中俘获的俘虏那里，撒马尔罕人民学会了造纸的方法，而这种纸产品作为书写材料，最终在西方取代了羊皮纸和纸草。

138/755年，阿卜·穆斯林被他的阿拔斯王朝君主——哈里发曼苏尔骗到了伊拉克，后来又被处以死刑。但是，阿卜·穆斯林在呼罗珊产生的巨大影响，给当地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与后来出现的异教狂热崇拜相联系，对阿卜·穆斯林的回忆不断地复活。这种狂热崇拜，有时采取公开的造反运动形式，反抗阿拔斯朝政府。在这些反抗运动中，最危险的一次是160/776年，由一个叫做哈希姆·本·哈基姆领导的起义。哈希姆以“木坎纳”(al-Muqanna, 蒙面者)知名。哈希姆自称是神的化身，他的前身是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阿卜·穆斯林等先哲^①。

^① 参见 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布朗《波斯文学史》), London, 1902, I, 247ff;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 199.

这些分裂教派的成员，后来被阿拔斯朝的军队包围在史国附近的一座要塞中，他们最后在要塞里自杀身亡。

早在哈里发阿里统治时期（35/656—40/661），持不同政见的喀里吉特派就已经从正统的伊斯兰教派中分裂出来了。在木坎纳起义的同时，喀里吉特派继续保持独立，以反叛政权与中央政权对抗。喀里吉特派对阿拔斯朝的反抗，并不亚于他们对倭马亚朝的反抗。虽然喀里吉特派屡次遭到镇压，但他们总是死灰复燃，一再起而反抗。在锡斯坦和克尔曼等省，喀里吉特派尤其数量众多。181/797年，反对哈里发的喀里吉特派成员哈姆宰·本·阿不都拉（他也被称为 Hamza b. Atrak 或 Hamza b. Adhrak）成了一位著名的人物。哈姆宰甚至敢于公然藐视阿拔斯朝哈里发诃伦·拉希德。阿拉伯史学家很少注意到哈姆宰的所作所为，但波斯文《锡斯坦史》极为详尽地阐述了哈姆宰的冒险传说，书中还引用了喀里吉特派与哈里发之间来往信件的全文，这些信件具有强烈的说服力^①。虽然就哈姆宰本人而言，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匪徒首领，但哈姆宰表达了人们在巴格达哈里发政权统治下普遍要求独立的愿望，关于哈姆宰事迹的英雄故事，在锡斯坦广为流传。人们确信，是哈姆宰创建了阿富汗的加德兹市，但是由于物力拮据，哈姆宰没有能够攻下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根据《锡斯坦史》记载，哈里发诃伦·拉希德在193/809年前去镇压哈姆宰的途中，死于徒思附近。哈里发这次远征的另一个目的，无疑是要结束拉菲·本·莱斯在撒马尔罕的反抗活动。拉菲是原来的呼罗珊总督纳斯尔·

^① Ed. Malik al-Shu'ara Bahar (麦立克·舍耳拉·白赫尔编《锡斯坦史》), Tehran, 1314/1935, 156; 162. 最近发现的这部作者不详的波斯文文献，对于研究穆斯林早期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部书还有待于译为西方语言。

本·塞耶尔的孙子。到158/810年,在麦蒙统治时期,拉菲被迫归顺,但是关于哈姆宰的最终命运,则不见于史籍记载。

诃伦·拉希德在死的时候,将他的帝国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艾敏与麦蒙。艾敏得到了伊拉克和阿拉伯帝国的西部,呼罗珊则归于麦蒙名下。诃伦·拉希德的这种安排铺平了哈里发国家的分裂道路。在东部诸省,接着就形成了当地的民族政权。后来麦蒙最终废黜了他的兄弟,将呼罗珊省的统治权赏赐给了他的波斯将军——“两面讨好者”塔希尔。当塔希尔将哈里发的名字从礼拜五的祈祷文中删去时,麦蒙又秘密毒死了塔希尔。但是呼罗珊的统治权却仍然保持在塔希尔家族手中。塔希尔死后,先是将呼罗珊统治权传给了塔希尔的长子塔勒哈,后来又传给了他的次子阿不都拉。这样的结果,在呼罗珊省以你沙不尔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世袭的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

塔希尔朝诸王满足于将他们的统治局限在原来的呼罗珊省境内,而塔希尔王朝政权则保持着一种从属于哈里发政权的形式。

70 据信属于这一时期的一项改革,是运用阿拉伯文来书写波斯语,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文学^①。因为在哈里发政权统治下,全部文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而波斯语在以前则似乎只用麻烦的中世波斯文书写。

由铜匠亚古布·本·莱斯·萨法尔在锡斯坦建立的国家,与

^① 关于在塔希尔朝统治时期,在《巴达黑斯的谈谐》(Hanzala of Badghis)一书中写的波斯文诗歌,见 C. E. Wilso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ersian'(威尔逊《现代波斯文的创立》), BSOAS, II, 1921—3, 218。但在萨法尔朝之前,是否有波斯文诗歌,还很难证明。《锡斯坦史》第209页,引用了一首由作家穆哈默德·本·沃西夫写作的波斯文诗歌,这首诗歌是为了纪念牙古布·本·莱斯而吟诵的。书中声称,在当时运用波斯文,是一个革新。

塔希尔朝所建王国大相径庭。萨法尔朝这个名称是由“铜匠”这一称号而来的。亚古布不是阿拔斯朝哈里发的军官，而是一个可怕的暴徒，他是被征募到不思忒总督萨利赫·本·纳斯尔手下的部队中服役的。当萨利赫进军疾陵城，驱除塔希尔朝总督依布拉辛·高锡时，亚古布随同萨利赫一起出征，并且利用了这场混乱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使亚古布取代了萨利赫和另一位可能的竞争对手，保证了他在247/861年当选为艾弥尔。作为一位令人敬畏的战士，亚古布继续攻打不思忒的要塞，与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些守军得到了东北部山国统治者，突厥首领熟毗利的支持，在战斗中，亚古布陷入了窘境。但是，亚古布发起了一次由五十名骑兵组成的勇猛冲锋，杀了熟毗利，使敌人落荒而逃。在这次战役中，亚古布缴获了足以装满二十只驳船的战利品。

在取得不思忒之战的胜利之后，亚古布的力量继续得以迅速壮大。在挺进赫拉特，从塔希尔朝的赫拉特总督手中夺取这座城市之前，亚古布杀害了喀里吉特派首领阿玛尔，并且解散了阿玛尔的军队。此后，他转向西方，征服了克尔曼和法尔斯，最后进军你沙不尔，并且攻克了你沙不尔城，囚禁了塔希尔朝的艾弥尔穆罕默德。紧接着，亚古布又占领了朱里章，入侵陀拔斯单，驱逐了陀拔斯单省的阿里统治者哈桑·本·宰德。亚古布的实力日益增长，引起了哈里发穆耳泰米德的疑虑，他指斥萨法尔朝为篡位者。后来，亚古布决意继续进军，将兵锋直指哈里发本人。263/876年，亚古布开始向巴格达挺进。但是在首都附近的代尔阿古勒地方，亚古布第一次遭到了失败。随后他撤退到了朱代沙布尔，并在265/879年死于此地。

亚古布的继承者是他的兄弟阿穆尔·本·莱斯。阿穆尔虽然缺乏亚古布那样钢铁般的意志，但他有效地统治了萨法尔帝国在锡斯坦、法尔斯和呼罗珊的领土达 21 年之久，而且阿穆尔还表现71 出了很大的军事野心。阿穆尔的将领之一叫法尔甘达，法尔甘达在任哥疾宁总督期间，曾攻克并劫掠了位于喀布尔附近卢格尔谷地塞伽瓦德的印度寺院。法尔达甘的行为引起了印度河流域奥欣德的印度教沙希亚朝国王迦秣罗的强烈反对，因为被亵渎的圣地，就在他的领土之内^①。287/900年，在哈里发的欺骗怂恿下，阿穆尔夸下海口，企图统治乌浒水外(trans-Oxus)诸省。但是，在阿穆尔向巴尔赫推进的同时，一个新的政权——萨曼王朝政权正在他所覬覦的领土上形成。萨法尔朝的军队在巴尔赫遭到了抵抗，被萨曼王朝艾弥尔伊斯玛仪·本·艾赫麦德的军队包围。当阿穆尔试图逃跑时，他被俘虏，并且作为一名囚犯被送到了巴格达。最后，阿穆尔在巴格达遭受监禁而死。穆斯林史学家总是喜欢将阿穆尔在这场灾难之前的盛况与他后来遭遇的惨状进行比较。

在锡斯坦地区，萨法尔朝的残余势力继续存在了几十年，而他们的后裔则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②。但是，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现在已经建立，萨曼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尊奉哈里发为宗主，实际上它却是伊斯兰中亚的至高无上的政权，同时也是锡斯坦的君主。从伊斯玛仪时代起，萨曼王朝就开始经营西部边界，

① 这件由奥菲《轶事大全》记载的轶事，已经由托马森在其《印度古代文物》一书中发表。现在又从《锡斯坦史》第 255 页的记载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见 E. Thomas, *Essays on Indian antiquities* (托马森《印度古代文物》), I, London, 1958, 317.

② 参见 J. Walker, *The coinage of the second Saffarid dynasty in Sistan* 沃克《锡斯坦第二萨法尔朝的铸币》，New York, 1936。在波斯文著作《锡斯坦史》一书中，对这些后期萨法尔朝统治有着叙述性的描写，可资利用。

力图确保对朱里章和陀拔斯单的统治，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锡尔河北岸，赭石(塔什干)是萨曼王朝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萨曼王朝的北部疆界一直延伸到了远至奇姆肯特的白水胡城。萨曼王朝驻在你沙不尔的总督行使对呼罗珊的管理权，而萨曼王朝艾弥尔的首都则设在布哈拉。

萨曼王朝政权强盛时期，在军事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保护了穆斯林世界，使其免于遭到异教的中亚突厥人的入侵。不仅如此，萨曼王朝在文化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有些学者断言，萨曼王朝艾弥尔纳斯尔·本·艾赫麦德(301/913—331/943)在伊斯玛依派传教士的说服下，秘密地改变了宗教信仰^①，但正是因为有了萨曼王朝，严格正统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才得以在河中地区稳固地建立起来。在萨曼王朝统治下，法律、秩序以及财产权都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伊斯兰法官和宗教首领也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萨曼王朝统治者还热情地鼓励文化活动。虽然阿拉伯语既是政府官方语言，同时又是很精确的书面语言，但正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波斯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诗人鲁达基这时生活在纳斯尔·本·艾赫麦德的宫廷，他在一首优雅动人的波斯文颂歌中，描绘了皇室宴会的场面^②。波斯文散文在当时也成了--种时尚，在这方面的例证是，萨曼朝宰相(Wazir)巴拉米翻译了泰伯里的阿拉伯编年史。

在反对草原上的异教徒突厥人的战争中，萨曼王朝在战利品

① 巴托尔德上引书，第242页。

② E. Denison Ross 'A Qasida by Rudaki' (丹尼森·罗斯《鲁达基的四行诗》)，JRAS, 1926, 213ff.

方面几无所获,但是,这些战争却为萨曼王朝提供了充足的奴隶来源。这些俘获来的奴隶,有些被用来与伊斯兰的主要都市地区进行贸易,在伊斯兰都市里,突厥奴隶是阿拔斯朝哈里发奴隶禁卫军的补充。萨曼王朝自己也广泛地使用了突厥奴隶战士,突厥奴隶甚至成了萨曼王朝军队的一个重要成份。由于突厥人众所周知的,优良的军事素质,使他们在萨曼王朝的军队中服役时,经常能够上升到很高的领导地位。著名的阿勒波的斤,就是一位这样提升起来的奴隶军官。在艾弥尔阿布德·玛里克·本·努赫(343/954—350/961)统治时期,阿勒波的斤曾经上升到了呼罗珊部队总司令这样的高位。后来,阿勒波的斤阴谋反对阿布德的继任者满速尔一世,但又害怕满速尔一世的势力,所以阿勒波的斤决定向萨曼王朝政权的东南边界撤退。在那里,他将有望作为印度边界上的半独立的统治者自立,而且还可以得到良机,发起一场“圣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的远征,是有先例可援的,萨曼王朝将军喀喇的斤生前(约在317/929年),曾在不思忒进行过类似的远征。喀喇的斤的继承者是他的奴隶军官。

当阿勒波的斤到达哥疾宁时,本地统治者阿卜·巴克尔·拉维克(或“阿努克”)拒绝他进入哥疾宁,但是阿勒波的斤在361/962年成功地攻陷了哥疾宁城。次年,阿勒波的斤去世^①,其子伊沙格(或阿卜·伊沙格)继承了他的职位。伊沙格在继位之后得到了萨曼王朝当局的承认,而且,当他被拉维克从哥疾宁驱逐出来

^① 《史略》一书称,阿勒波的斤在哥疾宁统治了16年,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见 Hamdullah Mustawfi Qazvini, *Tarikh-i Guzida*, tr. E. G. Browne and R. A. Nicholson (布朗与尼克森译,哈姆杜拉·穆斯塔法·加兹维尼《史略》), London, 1913, II, 78.

时，伊沙格又劝说萨曼王朝当局，使他重新回到了哥疾宁。伊沙格死于355/966年，他的继承人是另一位奴隶军官毗伽的斤。364/975年，毗伽的斤在包围加德兹的喀里吉特派艾弥尔时，不幸中箭身亡。两年之后，另一位军官鼻利也被废黜，哥疾宁帝国的真正的缔造者，萨布克的斤开始登上了王位。萨布克的斤也是出自突厥奴隶的血统。⁷³

367/977年，萨布克的斤袭击了奥欣德的印度教沙希亚王国，俘虏了沙希亚国王占波勒。占波勒后来靠交纳贡金而获释。然而，在割据独立的同时，萨布克的斤总是认为他自己是萨曼王朝艾弥尔的忠实封臣。正因为如此，在383/993年，当萨曼王朝艾弥尔努赫二世面临他的将领法伊格和阿卜·阿里·锡姆朱里起兵造反时，努赫二世就召集萨布克的斤在呼罗珊进行干预，而且萨布克的斤也对这次事作出了公正的处理。萨布克的斤在取得胜利之后，又于384/994年得到了巴尔赫、吐火罗斯坦、巴米扬、廓尔以及加希斯坦的统治权。与此同时，他的儿子马哈穆德（即后来的哥疾宁苏丹马哈穆德）也被授予呼罗珊总司令的职务，马哈穆德在呼罗珊的指挥部设在你沙不尔。后来，当萨布克的斤在387/997年去世之后，马哈穆德发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君临父亲原来的领土。马哈穆德巩固了对阿姆河南岸土地的所有权。与此同时，萨曼王朝却已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状态之中，一个新的政权——突厥人的喀喇汗王朝政权，已经开始由北向南逼近了萨曼王朝。不久，喀喇汗王朝就同哥疾宁朝的马哈穆德瓜分了萨曼王朝的领土。

在各种不同的突厥部族中，喀喇汗王朝的族源问题还存在着

较大的争论^①。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学术权威之间的不同意见分歧，不过是一些术语问题的争论。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是葛逻禄部落的一个分枝。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葛逻禄民族可能活动于萨曼王朝边界东北部的巴拉沙衮（在楚河流域）和怛逻斯（塔拉斯）中部一带。在哈里发穆克塔迪（死于487/1094年）统治时期，作家马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他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名为《突厥语大词典》（*Diwān lughāt al-Turk*）的著作中，详细叙述了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诸部落与方言的情况^②。喀什噶里将与自己同时的突厥部落从西到东列为两个区，第一区的部落名称依次为北褥（位于拜占庭边境）、钦察、乌古斯、咽面、巴失吉尔
74 惕、拔悉密、柴、药拔古、鞑靼和黠戛斯（吉尔吉斯）；第二区的部落是处月、突骑施、样磨、亦哥罗克、喀禄克、处密、回鹘以及党项。毋庸置疑，喀什噶里将有些与突厥不同种族，但臣属于突厥的部落，也算入了他想象的突厥诸部落之中。他承认，这些部落使用两种语言，除了突厥语之外，也说本地的非突厥语言。在突厥语诸方言中，喀什噶里将“可汗的突厥语”尊崇为“最典雅”的语言，很明显，这里所指的就是喀喇汗王朝宫廷的方言。同时他又说，样磨人与突骑施的语言“最为精确”。喀什噶里还区分开了乌古斯人的语

① O. Pritsak, 'Die Karachaniden' (普里查克《喀喇汗王朝》), *Der Islam*, XXX; idem, 'Von der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 (同著者《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 *ZDMG*, CI, 1951, 270-300. 甚至巴托尔德也改变了他对喀喇汗王朝起源的看法。在一度坚持喀喇汗王朝起源于样磨之后，他后来又接受了起源于葛逻禄的意见。参见 V. Minorsky, *Hudūd al-'Alam*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 280.

② C. Brocklemann, 'Mahmud al-kašghari über die Sprachen und die Stämme der Türken im II. Jahr.' (布罗克曼《马赫默德·喀什噶里关于十一世纪突厥的语言和种族》, *Körösi Csoma-Archivum*, I, 1921-5, 26-40.

言。但是，喀什噶里在描述这些方言时，究竟以哪一种方言作为他进行比较的标准，对于这一点，却始终没有搞清楚。

喀喇汗王朝的领土迅速向东方扩张，囊括了喀什噶尔地区。据说，某个名为阿布德·凯里姆·萨图克的可汗，是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君主。萨图克死于344/955年。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位来自波斯比沙布尔的伊斯兰教首领阿布勒·哈桑·穆哈默德·本·苏夫扬·迦刺马提，对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起了重要的作用^①，阿布勒·哈桑在350/961年死于喀喇汗的宫廷。由于喀喇汗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在382/992年，博格拉汗诃伦作为一位伊斯兰统治者，利用萨曼帝国动乱的时机，越过萨曼王朝北部边界，占领了布哈拉。但是在到达萨曼王朝首都之后不久，诃伦就病倒了。紧接着，诃伦开始撤军，而且在此后很快就死于行军途中。

虽然诃伦撤回了他的军队，但萨曼王朝并没有因此而苟延多久。到389/999年，一支新的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又开始向布哈拉挺进，这次入侵是由伊利克·纳斯尔率领的。伊利克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布哈拉城，萨曼王朝艾弥尔阿布德·马里克·本·努赫以及他的兄弟们都身陷囹圄，被流放到了乌兹建。虽然萨曼王朝诸王子中有一位叫伊斯玛仪勒的王子成功地从监禁中逃脱，并且继续反抗了几个月，但这根本无济于事。与此同时，就在伊利克进入布哈拉的同一个月，萨布克的斤之子，哥疾宁的马哈穆德登上了哥疾宁朝的王位。马哈穆德派遣使节到伊利克·纳斯尔处，与伊利克签定了条约，规定以乌浒水作为两国的边界。但是，喀喇汗

^① 巴托尔德上引书，第255页。

王朝很快就违背条约，派遣远征军渡过了乌浒水。马哈穆德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这些入侵者，这样就将两国之间的边界稳定地保持在了条约规定的界限之内。但是到了后来，马哈穆德就将他的势力扩张到了包括花刺子模在内的地区。

在被混战所充斥的萨曼王朝末期，一个新的部落集团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就是塞尔柱突厥部落。塞尔柱突厥是乌古斯部落的一支，他们由锡尔河河口附近毡的(Jand)地区的草原向南迁徙。这些乌古斯人的首领塞尔柱接受了伊斯兰教。382/992年，在萨曼王朝反抗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诃伦的战斗中，塞尔柱之子伊斯莱尔曾经援助过萨曼王朝。后来，在乌浒水北部的一次战役中，哥疾宁朝的马哈穆德开始对伊斯莱尔的权力感到担心，他将伊斯莱尔抓了起来，在印度一直监禁到死。但是与此同时，马哈穆德允许塞尔柱部落渡过乌浒水，在奈萨和艾比瓦德他自己的领地上定居。移民的领袖是察克里伯克与图克里勒伯克，他们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到429/1037年，察克里伯克和图克里勒伯克已经分别在木鹿和你沙不尔作为艾弥儿登上了王位。432/1041—2年，马哈穆德的继承者，哥疾宁朝的马苏德在木鹿附近的丹丹坎发动了对塞尔柱突厥的战争，但马苏德被塞尔柱突厥彻底击败，逃回了哥疾宁。此后，马苏德就将呼罗珊让给了塞尔柱突厥。这次事件，标志着哥疾宁王朝衰落的开始。从此以后，哥疾宁朝的主要统治中心就转移到了拉合尔，而他们的注意力，也随之集中到了哥疾宁朝印度领土的事务上。

在下个世纪，中亚地区兴起了廓尔王朝。“廓尔”这一名称来源于廓尔山地，廓尔山地大致位于阿富汗中部赫拉特与喀布尔之

间,是一片几乎无法接近的地区。在穆斯林征服时期,这个交通困难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被遗漏了。虽然《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写于372/983年)的作者声称,在他那时,这里的大多数居民就已经成了穆斯林^①,但他的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哥疾宁朝的马哈穆德曾用武力征服了廓尔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自己对廓尔的宗主权,但是真正掌握了廓尔地区政权的统治者是廓尔王朝开国君主伊宰勒丁·胡赛因。伊宰勒丁与塞尔柱苏丹桑杰尔(511/1117—552/1157)同时,而且是桑杰尔的封臣。他还向桑杰尔进贡廓尔地区的特产,如武器、邮车和钢盔等,廓尔地区的铁匠就以制造以上器具而闻名。后来,当哥疾宁王朝苏丹巴赫兰王(512/1118—547/1152)处死了廓尔王朝家族成员屈特卜丁·穆哈默德时,屈特卜丁的兄弟赛夫丁·苏里兴师进犯哥疾宁,他赶走了巴赫兰,并且占领了哥疾宁城。但是,巴赫兰出其不意地杀了一个回马枪,突袭并俘虏了赛夫丁,而且在544/1149年将他处也处以死刑。此后,屈特卜丁的三弟阿拉丁·胡赛因继承了廓尔朝的统治权。为了报仇雪恨,阿拉丁出兵哥疾宁,攻克哥疾宁城,并且将其夷为平地。正是因为这次残忍的暴行,阿拉丁得到了“世界焚烧者”(Jahansuz)的别号。

早在屈特卜丁·穆哈默德统治时期,他就已经开始在赫里河的非里兹库赫着手建设廓尔帝国的新首都了。这一地区现存的主要遗迹是在大清真寺内的一座庄严宏伟的尖塔,它是由廓尔王朝后来的一位统治者,吉亚斯丁·穆哈默德大帝(558/1162—599/

^① Hudud al-'Alam, tr. Minorsky (米诺尔斯基译《世界境域志》), 110.

1202)建造的。1957年,安德烈·马里克发现了这个尖塔^①。到吉亚斯丁统治的末期,他在596/1200年发动了一场战争,将他的统治扩张到了整个呼罗珊。吉亚斯丁在已经拿下赫拉特之后,他的部队继续挺进,攻取了你沙不尔、撒刺哈夕和木鹿,向西一直推进到了远至比斯塔姆城的地区。吉亚斯丁的对手是塞尔柱苏丹设在花刺子模地区的总督,也就是花刺子模诸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花刺子模王,塞尔柱突厥在花刺子模的领土才得以暂时保持了下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叙述一下这些花刺子模王兴起的情况。

花刺子模王朝的建立者是一位叫做阿奴什的斤的突厥奴隶。到塞尔柱苏丹马里克王统治时期(465/1072—485/1092),阿奴什的斤就已经升任了司酒。随后在苏丹巴尔克耶勒统治时,阿奴什的斤的儿子被任命为花刺子模总督。到了塞尔柱苏丹桑杰尔统治时期,阿奴什的斤家族的第三代,花刺子模王阿齐兹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独立性。桑杰尔在进行了三次艰苦的战争之后,才迫使阿齐兹臣服。此后,随着塞尔柱苏丹国家的衰落,花刺子模王成了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他们的影响也扩展到了整个呼罗珊。花刺子模王朝的第六代王塔喀什是在异教徒喀喇契丹的支持下继位⁷⁷的。喀喇契丹是中国游牧王朝——辽的残余势力。他们被敌对部落赶出了中国,越过中亚,控制了衰落的喀喇汗朝帝国^②。塔喀什在向喀喇契丹进贡的同时,不仅蹂躏了呼罗珊,而且进入了伊拉

① A. Maricq and G. Wiet, *Le minaret de Djani* (马里克、威特《杰姆的清真寺》), Paris, 1959.

② 关于喀喇契丹,参见 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魏特夫、冯家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619—74.

克，由此引起了与阿拔斯哈里发政府的摩擦。塔喀什死于 596/1200 年，廓尔王朝的吉亚斯丁·穆哈默德抓住这一时机，一举占领了呼罗珊，但吉亚斯丁也在 599/1202 年死去了。

吉亚斯丁·穆哈默德的继承人是廓尔朝的什哈布丁·穆哈默德(他后来以穆易兹丁为人所知)。什哈布丁遭到了新的花刺子模王阿拉丁·穆哈默德·本·塔喀什的反对，穆易兹丁在冲突中被击败。602/1206年，穆易兹丁遇刺身亡，留下来的廓尔王朝诸王子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维持廓尔帝国统一的重任。在哥疾宁和德里，廓尔王朝奴隶将军野勒特斯与阿拔克宣布他们独立。而花刺子模王则重新攻克了赫拉特，迫使廓尔王朝臣服。607/1210年，花刺子模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于是花刺子模拒绝向其君主喀喇契丹进贡。不久，花刺子模王就率领一支军队向喀喇契丹开战，与此同时，喀喇契丹则因为其东部边界乃蛮部首领屈出律的造反而被削弱了。这样，在成吉思汗入侵前夕，喀喇契丹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分裂状态，全部伊斯兰中亚领土，都由花刺子模王独自进行统治。

第五章 西藏文明的建立

78 吐蕃人属于蒙古人种，藏语与缅甸语为同一语族。自从西藏这个遥远的地区有了历史记载以来，吐蕃人就居住在西藏高原，也有一小部分吐蕃人生活在西藏边界以外的地区^①。西藏地区的山脉，使西藏高原成为不易进入的地区，这些山脉将吐蕃社会与其邻人隔绝开了，甚至中亚草原地区强大的突厥和蒙古征服者，也都避免对这个没有吸引力的地区征战。西藏农村只能供给少量稀疏分散人口的生活需求，甚至现在，西藏人口可能还不到三百万。大多数吐蕃人口集中在西藏南部地区，从事定居农业，西藏南部是印度河、萨特莱杰河与藏布江(Brahmaputra)的发源地，而且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城市以及大量寺院也都座落在南部。然而在西藏东北部，在青海湖周围的柴达木和安都地区，则有着游牧经济所需要的充足的草原^②。

由于缺乏考古材料，我们对于早期的西藏历史还无法得知其详，但是，最早的吐蕃人可能是游牧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现在仍然居住在荒凉的张塘地区的游牧者相差无几。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那些西藏游牧艺术品的代表作，与在欧亚草原发现的艺术品

^① 关于吐蕃早期的记载，见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赫尔曼《古希腊罗马文化烛照的丝国和西藏》), Leipzig, 1938.

^② M. Herrmanns, *Die Nomaden nov Tibet*(赫尔曼斯《西藏的游牧民族》), Vienna, 1949.

极为相似。这些游牧艺术品表明,在西藏早期历史上,吐蕃人与北方可能有着更为频繁的联系^①。在吐蕃文学作品中,保留了对公元七世纪历史王国之前的传说中的吐蕃统治者的回忆。但是,吐蕃人没有产生过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在他们的记载中,更多的是有关宗教的开导,而不是对于政治事件的叙述。所以,除了西藏本地土生土长的苯教以外,我们对七世纪以前的西藏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苯教是一种萨满教的信仰,它与一度流行于内陆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宗教信仰相近,在吐蕃历史初期,苯教就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吐蕃人的头脑之中了^②。七世纪早期,随着一个以拉萨为基地的,强大的侵略性的君主政体的出现,西藏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一个由部落和贵族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正是君主制度所提供的动力,使西藏能够在连续两个世纪中,取得重大的成就。当吐蕃卷入同它的大部分邻人,特别是唐朝(618—907年)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的战争中的时候,君主制度为这一特别的扩张时期提供了必需的领导。君主制度还为印度佛教之传入西藏,起了促进和领导作用。佛教最初与苯教相对抗,后来则吸收了苯教,从而产生了以喇嘛教著称的混合宗教。通过以上方式,在吐蕃与相邻的印度以及中原文明之间,建立起了传统的联系。虽然吐蕃与印度的政治联系,几乎一直是微乎其微,但从印度传来的精神准则和文学作品,给吐蕃人的生活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

① J.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s of Northern Tibet* (罗里奇《西藏北部游牧者中的动物风格》). Prague, 1930.

② 有关苯教,见 H. Hoffman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Bon-Religion' (霍夫曼《西藏苯教史考》),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in Mainz*, 1950.

吐蕃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除了汉族的生活方式以及艺术品、手工艺品之外，吐蕃人从中原得到的物品有纸和墨、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奢侈品，还有茶、黄油和大麦酒，中原地区某些中庸的思想态度也传入了吐蕃。中原王朝经常正是以此来诱惑它的那些更为质朴率直的邻人。西藏君主政体初期(7—9世纪)，差不多就是西藏历史的形成时期。藏族人们自己也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总是带着特殊的怀旧心情，尊敬松赞干布、弃松德赞和弃足德赞的英雄时代，与此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英武的国王，也正是西藏佛教的创建者。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约620—约649年)取得辉煌业绩之前，⁸⁰ 在吐蕃历史上一定有许多年没有记载的兼并时期。松赞干布的父亲，就已经在西藏南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而且开始推行扩张政策，这一政策被松赞干布继承。在强大的君主政体统治下，贵族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吐蕃政权之实行扩张政策，可能部分地是为了要补偿贵族的这种损失，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掠夺机会。不管怎么说，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军队被派往唐朝西部和上缅甸，而且吐蕃政权这时可能已经君临尼泊尔。松赞干布享有崇高的威望，唐朝皇帝太宗将唐帝国的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为妻，同时，尼泊尔君主也向吐蕃送去了自己的女儿尺尊公主。两位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除了带来了一些各自国家的更为世俗的礼节之外，她们还随身将佛教僧侣和经典带入了西藏^①。部分地是

^① 后来，这两位公主被尊崇为度母神的化身，她们分别为白度母和绿度母。见 A. Getty, *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格蒂《北方佛教诸神》), 2nd edn., Oxford, 1928, 119—24; G. Tucci, 'The Wives of Sron btsan sgam po' (图齐《松赞干布诸未蒙》), *Oriens Extremus*, 1962, 121—6.

在两位公主的影响下,或许部分地是出于政治动机,松赞干布成了佛教僧人在西藏传教布道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松赞干布的指示下,西藏地区设立了僧职,建筑了寺院。松赞干布本人除了在现在布达拉宫的基址上建造了一座宫殿之外,还在拉萨兴建了小昭寺和大昭寺两所著名的寺庙。与此同时,松赞干布派遣大相 吞米·桑布扎到当时主要的佛教研究中心克什米尔,吞米·桑布扎在这里学习到了一种文字,这种文字被用来拼写当时还不能书写的藏语^①。

松赞干布之死,导致了吐蕃扩张的暂时停止和佛教在西藏本土传播的间歇。但是在赤松德赞(约754—约797年)统治下,这两股潮流重新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吐蕃政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得到了承认。在北方,吐蕃的前哨基地已同回鹘相接。在唐朝边境,吐蕃军队则占领了甘肃走廊。唐帝肃宗被迫赎回长安(今陕西西安),当肃宗的继承人代宗拒绝付出已经讲好的贡金时,作为报复,吐蕃在763年攻陷了长安^②。吐蕃历史上这一扩张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吐蕃王室明显地对肥沃的恒河平原的诱惑力漠然视之。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可能是印度恶劣的气候环境,也可能是由于对佛陀故乡的尊敬,或者还有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以藏布江河谷为中心的政权,同化东北部游牧部落的困难,使吐蕃无暇南侵。总81
之,客观事实是,这一时期吐蕃军队主要都被派去防御唐朝边境。

^① 甘哈尔曾对克什米尔与西藏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过讨论,见 J. N. and P. N. Ganhar, *Buddhism in Kashmir and Ladakh* (甘哈尔《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佛教》), Delhi, 1956。

^② 有关这一混乱时期的唐蕃关系,见 H. E. Richardson, *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黎吉生《拉萨的古代历史敕令》), London, 1952。

然而，赤松德赞最不朽的成就，并不在于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对于将来而言。更重要的是赤松德赞作为佛教的热心的保护人所起的作用。佛教在其传入西藏的一个世纪中，只不过是取得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佛教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公元七、八世纪传入西藏的大乘佛教，随着秘宗神秘主义的增长，已经超出了西藏社会的承受能力。佛教一旦在西藏驻足，它很快就吸收了苯教的因素，产生了一种混合物，高度的玄学思维和世俗迷信都在其中得以发展。从宁玛派或“红帽派”的主要崇拜对象，著名的传教僧人和术士莲花生(Padmasambhawa)的经历中，可以反映出佛教传入西藏过程中的特点。莲花生早年是在乌仗那地区(今斯瓦特)度过的。乌仗那地区在古代既是佛教的中心地区，也是各种宗教混合的主要地区。莲花生作为一名著名的巫师，被赤松德赞从那烂陀请到了西藏，来与那些被认为是反对佛教传入的恶魔战斗，所谓恶魔，很可能是指苯教信徒。莲花生以他不可思议的力量战胜了恶魔，大约在779年，建立了西藏喇嘛教系统最古老的寺院——桑耶寺。作为宁玛派的创立者，莲花生在西藏宗教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西藏佛教带来了它独特的密宗特点。

从莲花生时代起，佛教传教僧人在西藏的活动日趋活跃，佛教经典的流传又使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佛教的传播，引起了苯教的强烈反对。反对佛教的活动是由贵族领导的，他们可能认识到君主政权试图利用这种新的宗教，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加强王权^①。甚至在赤松德赞在世时，这种反对力量就已经有

^① 图齐强调了这一斗争的政治特点，见 G. Tucci, *Tombs of Tibetan Kings* (图齐《吐蕃诸赞普陵墓》)，Rome, 1950, 172.

所表现。国王的王后（她可能是领导反抗运动的一个贵族家族里的成员）被认为是反对佛教集团的领导，而且国王的大臣们（他们⁸²是从贵族阶层中吸收来的）也借口印度和尼泊尔的传教僧人是巫师，试图说服国王，阻止这些传教僧人大量进入西藏。所有这些都说明，意在牺牲贵族利益以建立其权力的吐蕃君主政权，将佛教看作一种实现其加强中央集权目的的合适的武器，这也就是吐蕃贵族为什么一直反对皈依佛教的原因所在。在九世纪上半叶，贵族领导的反对佛教的斗争达到了顶点，并且导致了吐蕃统治王朝的垮台。佛教暂时淹没无闻，贵族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是事实证明，贵族的胜利是虚幻的。在摧毁君主政权的同时，也粉碎了简单的西藏政治中的最为详尽精细的制度。尽管此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摆脱了束缚的，自由的间歇时期，但是贵族阶层本身屈从了甚至比君主制度更为详尽的教阶制度，这种教阶制度是从受到迫害的佛教教派中产生的。重新复活的苯教，最终也将同化在这一教阶制度之中。

但是，上述这种变化在八世纪末期赤松德赞去世的时候，还无端倪可寻。在九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君主政权及其拥护者佛教僧侣似乎较之以前更要强盛。这一变化是随着赤祖德赞或热巴津（815—38年）的继位而到来的。作为佛教最伟大的保护者之一，在全西藏，人们至今还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赤祖德赞。不管使他的祖先们保护这种新宗教的目的是什么，赤祖德赞本人则确实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改变信仰者。赤祖德赞对佛教僧侣的迷信崇拜，使他自己成了佛教徒手中的顺从工具。结果，赤祖德赞成了一个厌恶自己臣民的人，这些臣民的大多数可能

仍然在信奉西藏旧有的宗教。在赤祖德赞统治时期，佛教对吐蕃国家事务的影响，较之以前更加露骨，一个僧人甚至可以提升到宰相的地位。这种事本来应该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但由于不明理智地采取了加快速度的作法，结果导致了一场组织周密的暗杀国王⁸³的阴谋，吐蕃王位落入了一个叫朗达玛(834—42年)的苯教候选人手中。接着，朗达玛就发动了对佛教徒残忍的迫害，直到这位新国王自己也被一位佛教隐士暗杀。佛教与苯教集团开始了激烈的宗教混战时期。在后来的战乱中，君主政权受到了更大的损害。随着君主政权的消灭，吐蕃作为军事强国的荣誉，也最终毁灭了。甚至晚至赤祖德赞统治时期，吐蕃军队还袭击了甘肃，但是现在这种征服已经被放弃了。在吐蕃帝国末期签定的唐蕃条约中，将吐蕃的边界确定在了青海地区。

吐蕃历史上，大多数重要的家族都自称来自东北部边境地区。这说明，在遥远的古代，贵族游牧部落从安都地区迁移到了南方，并统治了南方的本地居民^①。但是，随着吐蕃帝国的垮台和南方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退，东北部的吐蕃部落开始独树一帜，在十一、二世纪建立了西夏党项帝国。党项人从吐蕃东北部向北、向东发展，由南山和额济纳河，通过宁夏的阿拉善，一直到额尔多斯和黄河河曲地区。直到1227年被成吉思汗消灭为止，西夏帝国一直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混合的基础上。但是西夏帝国的的重要性，依赖于它对通过甘肃走廊的商路的控制。

在党项人兴起的时，吐蕃南方开始衰落，专制政体的崩溃，

^①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图齐《西藏画卷》), 2 vols., Rome, 1949, I, 7; II, 737—8.

使佛教濒于全面毁灭的境地。寺院被摧毁，宗教仪式被遗弃或被歪曲而为巫术所利用，僧众被杀或被驱逐出境，几乎各地的苯教都又再次坚持了下来。在那些苯教没有完全摧毁佛教残余的地方，苯教在自己的传统方式中吸收了佛教的习俗。然而，就是在这极为不利的环境中，开始了十一、二世纪伟大的佛教复兴。在吐蕃帝国末期，佛教文明得以迅速推广。新的寺院建立了起来。佛教组织也扩大了。大量传教僧人进入了西藏，他们不仅来自印度和尼泊尔，而且来自中原地区。对于西藏文明的将来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大量佛典的翻译，早在赤祖德赞统治时期，就有一个学者委员会创立了一种书面语言，将佛教经典由梵文、巴利文、于阗文和汉文翻译为这种语言。所以，在西藏“黑暗年代”的前夕，有一个文学上的混合、翻译和注译的伟大时代。大量翻译佛典，保证了前代的佛教著作能够一直保留下来，直到用明显的西藏形式来表述佛教的新的思想和新制度出现，这种西藏形式综合了古代吐蕃帝国的传统和新的外来因素。⁸⁴

接踵而来的是九世纪后半期和十世纪的混乱时期，就象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之前肯定存在的那些小邦一样，在这一时期，西藏地区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然而，正是在这种逆境之中，开始了十一世纪早期的佛教复兴。佛教复兴运动是从距离拉萨很遥远的两个地区开始的。这两个地区分别位于西藏的两端。西藏东部的多康，是残留的佛教僧众的中心地区，这些僧众立志重新弘扬佛法，恢复佛教原来的显赫地位，他们终于开辟了通往桑耶寺的道路，并且将桑耶寺作为重新使西藏中部地区皈依佛教的基地。在同一时期，拉达克地区古格的一位统治者取名意希沃，成了佛教僧人。拉

达克地区一直是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文化走廊，意希沃精心挑选了一些年轻人，将他们派到佛教中心克什米尔学习，从而恢复了印度与西藏佛教之间的联系。派往克什米尔的年轻人中，有在西藏历史上以“大译师”著称的任钦桑布(958—1055年)。在苯教反动时期，佛教传入西藏的潮流曾经一度中断。任钦桑布重新大力推动了将佛教经典翻译为藏文的运动，在西藏西部地区建造了大量的庙宇和寺院，从而对恢复印度佛教的潮流稳固地进入西藏起了重要的作用^①。任钦桑布的事业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阿底峽的到

85 来，则使任钦桑布从事的事业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阿底峽是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学者和神秘主义者，1042年，他从摩揭陀之超戒寺来到了古格。阿底峽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当时已有85岁高龄的任钦桑布也成了这位孟加拉人的门徒。在古格地区，阿底峽继续了任钦桑布恢复和纯化佛教的使命，他巩固了上代人已取得的成就，他还帮助进行翻译工作。后来，阿底峽进入了西藏中部地区，以增强桑耶寺在传播佛教方面的使命。直到1045年圆寂为止，阿底峽一直住在桑耶寺。作为一名僧人，阿底峽的影响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由于阿底峽后来到了桑耶寺，使古格和康多两股互不相干的复兴运动得以合流，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西藏其他地区的皈依佛教。如果没有阿底峽这个光辉的榜样鼓励的话，要设想佛教在西藏的进程简直是不可能的。由于阿底峽的努力，赋予了西藏佛教以精神上的和文学上的特性，迄今为止，这种特性还是缺乏的。阿底峽从事的堪称楷模的事业，在整个十二、三世纪，鼓励了象

① G. Tucci, 'Rin c'en bzan po e la rinascita del Buddhismo nel Tibet intorno all mille' (图齐《任钦桑布与西藏佛教的复兴》), *Indo-Tibetica*, II, Rome, 1933.

玛尔巴(1012—79年)和高贵的隐者诗人米拉日巴(1040—1123年)那样的导师和圣哲^①。在十三世纪,日喀则附近奈塘寺院的佛教经典藏文译本总汇,证实了重建佛教的最终胜利。在这个百科全书写作的时代,西藏佛教史学家布顿(1290—1364年)最后制定了西藏佛教的两部经典,《甘珠尔》和《丹珠尔》。

然而,如果说在十二、三世纪佛教就已经在西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在这同时它也开始僵化了。这部分是由于在当时出现的教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部分则是由于西藏与印度的隔绝,佛教在印度西北地区的最终毁灭,切断了西藏文明的重要来源,从而结束了西藏与印度之间许多世纪的有益的联系。自此以后,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转向了中原地区和蒙古,这一转变渊源于成吉思汗氏族的宗教喜好。

① 有关玛尔巴和米拉日巴一生的重要意义,可以查阅下列著作: J. Bacot, 'La vie de Marpa le "traducteur"' (巴考《译师玛尔巴传》), Buddhica, Paris, 1937; B. Laufer, Milaraspa (劳费尔《米拉日巴》), Tibetische Texte in Auswahl, Hagen and Darmstadt, 1922; W. Y. Evans-Wentz, 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 (埃文斯·温茨《西藏大瑜伽师米拉日巴》), London, 1928; H. Hoffman, Mi-la Ras-pa (霍夫曼《米拉日巴》), Sieben Legenden, Munich, 1950.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一生

86 十二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亚并无显著的影响。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蒙古”这一名称只是用于称呼贝加尔湖东南的一个很小的部落的成员。十二世纪初，现在以蒙古知名的地区是由三个重要的部落统治着。在蒙古地区最东部的贝尔湖和呼伦湖地区周围，由鞑靼人统治。在鞑靼部西面，克烈部统治着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以及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地区。由克烈部再往西，位于色楞格河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由乃蛮部统治。而蒙古部落自己则在克烈部和鞑靼部草原之间的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两岸，牧放着自己的牛羊。在克烈部和乃蛮部的北面，是一些另外的部落，在这些部落中，最重要的是斡亦剌部和蔑儿乞部。现在，这些部落全部都被称作“蒙古族”了。上述部落相互之间不仅有种族和文化上的联系，而且他们与突厥和东胡民族也有着疏远的联系。除了以狩猎、驯鹿群以及毛皮贸易为生的北方森林部落以外，这些部落都属于中国边境地区流动的游牧部落，他们的存在，往往对中原王朝构成很大的威胁。例如在前机械化时代，游牧部落极大的军事灵活性，就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边疆防卫。中原王朝对这些游牧部落的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分地取决于在特定的时期，这些部落军事力量的强弱程度，部分地则

87 取决于不同的部落对汉地文明的接受程度。对于十二世纪后半期

(成吉思汗在世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来说,重要的是,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三个世纪中,中国北部是由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统治的。它们分别是契丹或辽朝(947—1125年)和女真或金朝(1122—1234年)。与蒙古人直接从汉族那里得到的汉地文明的知识相比较,他们可能从契丹和女真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汉地文明的知识。一般说来,最接近中原地区边境的部落,接受汉地文化的影响也就最强烈,甚至他们的首领也不无骄傲地接受象“王”、“太子”这样的汉族称号。

虽然只是在森林居民中,萨满教(böge)才在部落事务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蒙古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是萨满教教徒。在草原地区,领导人是在部落和氏族首领中任命的,部落首领的身份和职责,明显地赋予了游牧社会一种世俗的和贵族的特点。部落首领们称为“汗”,对部落联盟的统治者则冠以“可汗”的称号。除了森林地带以外,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经济,一个部落的繁荣及其生存能力,取决于该部落所能得到的牧场的质量和规模。在一些较为先进的部落中,贸易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种辅助性的,但是又很重要的作用。

在十二世纪初期,蒙古地区似乎形成了一种将大的氏族分割为更小的单位的趋势,由此扩大了统治集团——草原贵族的数量。这一变化为什么产生,在什么时间出现,现在还远远没有弄清,但是这种变化可能与饲养牛羊与牧马之间分工的加剧有关。人们认为牧马职业更带有贵族性,因为占有了马匹,就能够提供军事上的优势。然而,不管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蒙古草原地区,整个十二世纪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

式——某种游牧封建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为成吉思汗的征服提供了社会的和军事的基础，而成吉思汗的征服也反过来极大地加强了这种游牧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目前要对这种现象做出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大体说来，它的某些特点与当时欧洲封建主义的特点倒是不无相似之处。例如，当时在蒙古有一种“忽里勒台”，即王公与首领的集会。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忽里勒台”或许可以比作金雀花王朝与加佩王国国王的“大会议”。蒙古社会分成了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及其家族之下是军事贵族（这与儒教中原王朝的官僚等级制度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处于明确限定的社会金字塔底部的，则是农奴和奴隶。游牧贵族因为富有牲畜而高踞于其他的公社成员之上。密切的血缘关系、婚姻纽带、武士阶层所专有的思想观点以及勇武的道德准则，所有这些因素，使贵族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与当时的西欧社会相比较，蒙古贵族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升降变迁可能更大。蒙古农奴制度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但是在蒙古社会中一定存在过一个可以称之为“农奴”的阶层，他们一般是战俘或战俘的后代。农奴阶层享有某种程度的人身自由，拥有财产，除了在军队中服务之外，他们仅仅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按照一定的比率交给自己的主人。在军队中，农奴只不过是扮演了一种奴仆的角色，例如搭帐篷，做些牧人的活，以及为了统治者及其随从们的利益，在有组织的围猎活动中，充当驱赶野兽的助手。他们只是在勉强被允许的情况下，行使着他们拥有的那点权利。

我们继续将十二世纪的蒙古社会与当时的欧洲社会加以比较。蒙古汗将采邑授予他的支持者，并通过军事扈从来保持他们

的特权,这些军事扈从们由于共同的思想、忠诚、相互利益以及共同的亲属联系而对统治者履行义务。这种军事扈从或警卫很可能是蒙古人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在战争中,这些军事扈从起着“精锐部队”的作用,而且还为其他的部队提供指挥人员,但是在蒙古帝国时期,军事扈从是在成吉思汗建立的军事组织之外的。在和平时期,受到信任的军事扈从成员还可以出任地方统治者。成吉思汗在开始创业初期,曾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军事扈从可能就是来源于此,他们曾帮助成吉思汗维护了他在邻敌之上的霸权。军事扈从的成员几乎全部限于出身名门的人。而且重要的是,“军事扈从”,蒙文作“nököd”,它的复数形式是“nökör”(伴当),⁸⁹这个字带有明显的封建的和英雄的色彩。从理论上讲,作为某个统治者个人的追随者,军事扈从们是可以自愿选择他们的主人的,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实行过某种效忠誓言(因为这还值得怀疑),作为朋友和顾问,军事扈从与其主人的关系肯定是极为密切的。在这里,盎格鲁撒克逊的“House—carl”,金雀花王朝的“comitatus”,以及早期基辅的“druzhennik”都与蒙古的“nökör”有相似之处。

然而,蒙古社会与当时欧洲社会的这种相似之处,切不可过分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游牧社会对牧场的权力总是非常重视的,但他们对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问题却不甚关心,而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对农业社会来说却非常重要。在蒙古社会中,也没有什么政治单位能与中世纪欧洲的男爵领地和郡相比较。对王权、司法权、财产所有权的争端,在中世纪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历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对于游牧社会来说,几乎就没有这种麻烦。成吉思汗的法律“札撒”,并不是相互之间的义务和权力的

准绳，而是成吉思汗的臣民和继承人必须遵守的一些强制性的命令条款^①。从理论上说，蒙古统治者要实行绝对专制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害怕引起反抗，以及贯穿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各等级中的习惯和氏族感情的力量，这种专制制度还是受到了约束。

大约在 1125—6 年，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出生在蒙古某地。这时的蒙古社会中，渗透了封建的社会准则。终其一生，作为一名生来的贵族，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蒙古贵族利益的优惠，而他的作为是违背一般部落成员利益的。成吉思汗出生于著名的孛儿只斤氏族，他的父亲也速该·巴阿秃儿是一位叫合不勒汗的人的孙子。合不勒汗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曾经蹂躏过金朝的边界，他甚至接受了“可汗”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但是当金朝鼓动鞑靼人打败了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邻人之后，蒙古部落的这个短暂的扩张阶段就结束了。然而对合不勒汗及其子孙的回忆，很可能大大地刺激了铁木真年轻时的野心。也速该·巴阿秃儿是一位游牧封建主义的典型人物，作为领主，他拥有自己的畜群

^① “札撒”没有抄本留下来，现在只能根据当时的材料，部分地重建“札撒”。见 G. Vernadsky, 'The scope and contents of Chingis Khan's Yasa' (弗纳德斯基《成吉思汗“札撒”的范围与内容》), HJAS, 1938; idem, 'Juwaini's version of Chingis Khan's Yasa' (同著者《志费尼著作中有关成吉思汗“札撒”的译文》), Annales de l'Institut Kondakov, 1948; C. Alinge, Mongolische Gesetze(阿林《蒙古法律》), Leipzig, 1934; V. A. Riasonovsk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ngol Law (里亚索诺夫斯基《蒙古法律的基本原则》), Tientsin, 1937 (1956年海牙重版)。人们设想，“札撒”可能给实行它的人提供了特权，这也许就是“札撒”在远远超出蒙古帝国的范围内被采纳的原因，见 A. N. Poliak, 'The influence of Chingiz-Khan's Yasa upon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mluk State' (波里亚克《成吉思汗的“札撒”对马木路克国家一般组织的影响》), BSOAS, 1942。

和农奴，他还聚集了一批由亲属和侍从组成的强有力的追随者，在当时本地的部落战争中帮助他。尽管铁木真在年轻时代曾经经历过巨大的磨难，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出身微贱，具有天才的野蛮人，而是一位贵族传统和古代光荣梦想的继承者。

也速该·巴阿秃儿大约死于公元1165年，在也速该·巴阿秃儿死后的许多年里，随着他们父亲家族的分崩离析，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和他们很少的牲畜，他们被迫同贫困以及对立部落的敌视行为斗争。有时他们竟至于贫穷到了以渔猎为生的地步。但是只享有一些小封地刺激起来的物欲本能以及他的生存能力，使铁木真逐渐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同等地位和同样绝望的人，他尽可能地显示出了自己的天才，以他的领导能力、才智以及谨慎态度，将这些人吸引在身边。铁木真还得到了他父亲原来的联盟者，克烈部汗脱斡邻的保护。由于脱斡邻的支持，铁木真得到了一个小首领的地位。当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被蔑儿乞部落的人劫持时，铁木真求得了脱斡邻的援助（虽然他很小心地向脱斡邻保证，不以蔑儿乞部为牺牲，以增强他已经很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铁木真开始比平时更有效地组织自己的部属，成立了护卫军，为他的部属制定了补充新马的制度，并且使用信使来传达他的命令。

到十二世纪末，鞑靼部落逐渐强大，他们对金朝的威胁也日益增加。金朝曾经利用鞑靼人粉碎了初期蒙古部落的野心，现在金朝转而与克烈部结成联盟，反对鞑靼这一新的威胁。克烈部与鞑靼、蒙古部落一样，也是游牧者，但是由于与中原地区以及西夏蒙古特帝国接触的结果，克烈部比其他的蒙古部落文明程度更高。

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十一世纪初期就已经皈依了聂思托里派基督教。一般认为，脱斡邻本人就是地中海东部十字军参加者所传说的普雷斯特·约翰^①。脱斡邻在铁木真的帮助下，从西部袭击了鞑靼人，与此同时，金朝在南部发起了进攻，鞑靼人被彻底击败，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鞑靼部此后就不复存在了。金朝适当地赏赐了他们的蛮族同盟，脱斡邻和铁木真都接受了金朝的封号。然而，铁木真仍然还是脱斡邻的下属，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误解，而且相互谴责。传统看法认为，脱斡邻的变节行为，使他声名狼藉。脱斡邻肯定与铁木真的敌人有过密谋，但是铁木真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他原来的保护人，经过一段短暂的斗争之后，脱斡邻兵败被杀^②。

铁木真曾经帮助克烈部击溃了鞑靼人，作为克烈部的联盟者，铁木真已经变得声名卓著了。现在克烈部和鞑靼部的人民都成了

^① 关于普雷斯特·约翰，见 C. R. Beazley, *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比兹利《现代地理学的萌芽》，3 vols., Oxford, 1897—1906;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玉尔《契丹及其路程》，4 vols., London, 1913—16; J. K. Wright, *The geographical lore of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 (赖特《十字军时代的地理知识》，New York, 1925; A. P. Newton,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纽顿《中世纪的游记与旅游者》，London, 1926; R. Henning, *Terrae Incognitae* (亨宁《未知地》，4 vols., Leiden, 1936—9; G. H. T. Kimble, *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金布尔《中世纪地理学》，London, 1938; V. Slessarev, *Prester Jahn: the letter and the legend* (斯莱萨雷夫《普雷斯特·约翰——文学与传说》，Minneapolis, 1959)。

^② 脱斡邻家族的妇女，注定要在成吉思汗帝国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脱斡邻的侄女唆鲁禾帖尼与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结婚，后来成为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旭烈兀的妻子脱古思可敦，是脱斡邻的孙女，伊朗第二任伊利汗阿八哈(1265—81年)的母亲。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1284—91年)与脱古思可敦的侄女乌鲁黑可敦结婚，乌鲁黑可敦是完者都(1304—16年)的母亲。克烈部对伊利汗国宫廷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不赛因统治时期(1316—35年)。

他的臣民，铁木真利用这些相继增加的人力袭击了乃蛮部落。乃蛮部的领地曾经是古代回鹘人土地的一部分，他们是最先使用回鹘文的蒙古人，乃蛮部与西南地区的交往，使他们受到了蒙古以外的陌生地区的影响。在征服了乃蛮部之后，铁木真接着又征服了蔑儿乞部，将蒙古诸部落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而铁木真则成为部落联盟无可争议的领袖。

1206年，在鄂嫩河河源附近召开了“忽里勒台”，这次大会标志着蒙古部落联盟的建立。对于这次大会，虽然有些具体细节还不十分清楚，但是铁木真在这次大会上接受了“大汗”的称号和“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从这次大会以后，似乎那些被征服的和加入了联盟的部落，都接受了“蒙古”这一名称。这一事件的策划者之一，是一位叫做阔阔出(或Teb—Tengri)的萨满教徒。阔阔出极力宣扬，成吉思汗的征服是顺应天命的，这种思想后来一直被成吉思汗的子孙坚持了下来。

现在，一般都倾向于将1206年的“忽里勒台”看作成吉思汗一生的转折点，但是在那时，并没有迹象表明成吉思汗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年逾五十的成吉思汗，已经不是亚历山大那样的年轻人了，这时的成吉思汗仅仅是中国北部边境游牧部落联盟⁹²的一位统治者，在他之前，有许多游牧部落的首领都扮演过这种角色。但是，成吉思汗作为一位战略家和组织者的天赋，这时已经开始显露出来。机动性和灵活性是游牧部落在草原战争中固有的优势，在这之外，成吉思汗又增加了一套严格施行的残酷的纪律。他将军队分为十、百、千、万诸单位，从上到下都有一套等级严密的指挥系统。各个等级都必须绝对服从。尽管成吉思汗不乏贵族偏

见，但是不管在哪一方面，我们都将发现他的才能和精力取得的成功。

成吉思汗建立的部落联盟结构，很明显是一种封建的社会结构，它是由大汗的家族盘踞在最上层的权力之塔。成吉思汗不仅将他自己看作蒙古民族的领袖，而且将自己看成是贵族的首领。只要有可能，贵族总是比出身卑贱的人更优先地得到成吉思汗的任用。正是依靠这种办法，成吉思汗不仅得到了自己部落氏族首领的支持，而且得到了部落联盟和被征服的部落首领的忠诚拥戴。出于同一目的，成吉思汗还转让了大量封地，转让封地的作法，并没有削弱成吉思汗本人对他的属地的控制。很可能正在成长的蒙古帝国的法律渊源，可以追溯到1206年的“忽里勒台”。这些法律构成了“札撒”，“札撒”是一些被残暴地加以施行的不可变易的规则，它规定了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加强了贵族及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种社会观念。

1206—1209年间，蒙古西北部的斡亦剌部和乞儿吉思部先后臣服了蒙古，位于阿尔泰山西南部，原来作为喀喇契丹朝封臣的回鹘人，也很精明地向蒙古称臣归顺。此后，成吉思汗将征服的矛头转向了他的更为强大的定居邻人。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用十三世纪蒙古的人口骤增来解释他们后来的迁徙，也没有必要将这种迁徙归结为原来的蒙古牧地干旱的结果。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只有使游牧贵族相信，部落联盟对他们有好处，他才能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⁹³因为部落联盟为掠夺和增加财富，为榨取软弱的邻人，为征收商路沿途的税金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成吉思汗为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所有这一切，此外，他还实现了穷困的内陆亚洲游牧

民族最古老、最伟大的愿望——征服中原，因为中原地区有着无穷无尽的财富、难以数计的奢侈品以及大量可供役使的人力资源。

蒙古南部是四个王国。金朝统治着北部中国；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由南宋王朝统治；西夏唐古特国家的统治基地在甘肃，西夏南部则是西藏。对于蒙古这个有着巨大潜能的侵略者来说，入侵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成吉思汗首先进攻西夏，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由定居的农民和游牧者混合组成的。从直接与西夏人做买卖的克烈部、乃蛮部和回鹘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西夏的必要的情报之后，成吉思汗在1209年入侵了西夏，并且一直推进到了西夏首都，位于黄河之滨的中兴府。虽然成吉思汗并没有攻克西夏的首都，但是西夏统治者投降了成吉思汗，成了蒙古的臣民。成吉思汗的威望由于他的胜利而日益增长，此外，他还具备了攻打筑防城市和在定居居民中作战的新经验，这时成吉思汗又转而进攻占据北部中国的金朝。象以往一样，成吉思汗尽可能地搜集情报，这些情报是从居住在金朝边境附近的汪古部以及与金朝贸易的穆斯林商人那里得来的。汪古部如同克烈部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聂斯托里派教徒，而穆斯林商人则非常欢迎草原地区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因为这样就可以制止掠夺和部落战争，从而保证商路沿线的相对稳定。1211年，成吉思汗在他最优秀的将领和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的陪同下，率军穿越金朝边境，横扫了中国北部地区。金朝有着不容忽视的雄厚兵力，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战术技能要比他的强大的对手高明得多。这次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212年，这时满洲南部的契丹人起来造反，反对金朝，并且臣服于蒙古。到了1214年，成吉思汗已勒兵北京城下。但是，因为成吉思汗携

带着大批珍贵的战利品，他决心将这些战利品安全地运回蒙古，所⁹⁴以成吉思汗无意强攻由金朝最精锐的部队防守的壁垒森严的首都，由此在蒙古与金朝两国之间达成了和解。成吉思汗得到了一位金朝的公主，公主还带来了大批奴隶、马匹、珍宝作为嫁妆。但是时隔不久，战端再起，蒙古军队又一次侵入了金朝。这次战争是由者别和木华黎两位将领指挥的。1215年，北京沦陷，金朝的国库也随同首都一起落入了蒙古之手。但是，女真人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仍然在苟延残喘，在成吉思汗的余生中，蒙古与女真之间不时和谈以及小规模战斗一直没有间断过。成吉思汗与金朝的战争，也许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成吉思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与灵活细致的战术运动相结合，表现出了最伟大的技艺。他指挥着蒙古军队踏遍了陌生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蒙古军队彼此相隔经常有几十公里之遥。

在侵入西夏和金朝的同时，蒙古人对汉族及其文明有了直接的感受。攻陷北京城后带往成吉思汗那里的俘虏中，有一位辽朝后裔，他就是诗人学者耶律楚材，耶律楚材的家族曾经为金朝服务了三代之久。成吉思汗吸收耶律楚材为自己供职，耶律楚材作为一名星占学家的学识和行政才能，使成吉思汗留下了深刻印象。耶律楚材这位汉文化和中国官僚传统的代表，很快就对征服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耶律楚材本人也成了蒙古帝国的主要行政官员。蒙古人接着开始了对汉地的征服。

蒙古对女真人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在金朝境内战争中的实际经验使成吉思汗认识到，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要统治人口众多，聪明才智的金朝人民，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成吉

思汗可能预见到,进一步入侵金朝,对他新成立的蒙古军队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要在他的侧翼还存在着没有被征服的,与蒙古人相比有着同样的机动性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就有可能试图在成吉思汗与女真人决战时袭击他,所以成吉思汗抑制了自己征服金朝的愿望,没有贸然对金朝继续发动进攻。此后,成吉思汗从金朝撤军,以解决他的西部边疆问题。

在阿尔泰山的峡谷地区,乃蛮部与蔑儿乞部的反抗还没有绝⁹⁵迹,速不台很快就消灭了这些危险因素。与此同时,者别向新近篡夺了喀喇契丹直古鲁汗王位的乃蛮部首领屈出律发起了进攻。喀喇契丹是以前统治过中国北部的契丹人的一支,为了躲避金朝,他们在十二世纪早期向西方迁徙,来到了七河地区。1218年,者别占领了喀喇契丹王朝的领土,他得到了不满屈出律统治的穆斯林的支持,屈出律逃往喀什噶里亚,并且在喀什噶里亚被捕,遭到杀害。

由于征服了喀喇契丹王朝的领土,使蒙古的疆界与花刺子模王阿拉丁·穆哈默德(1200—1220)统治的十三世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接壤。花刺子模帝国的东北部疆界是锡尔河,除了花刺子模和河中地区之外,它还统治着现代伊朗和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并由此控制了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商路。成吉思汗决心保护商路,使来往于草原的商人畅通无阻。或许至少在最初,成吉思汗是无意入侵花刺子模,向阿拉丁·穆哈默德这样一位难以对付的邻人开战的。后来在1218年,一队大约450人的穆斯林商队(他们大多数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经由蒙古返回河中地区途中,在讹答剌被花刺子模王阿拉丁·穆哈默德屠杀,他们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成

吉思汗派来的一位使节要求对违背成吉思汗保护商人政策的这种野蛮行为进行惩罚，但是花刺子模王阿拉丁·穆哈默德反而处死了这位使节。阿拉丁·穆哈默德的所作所为，对于成吉思汗决心要建立起来的威望，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与成吉思汗发动的对女真人的战争相比，成吉思汗甚至更为详尽地筹划了他对花刺子模王国的进攻计划。他制定计划所依靠的情报是由穆斯林商人提供的，因为成吉思汗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在保护穆斯林商人利益。成吉思汗留下了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木华黎指挥北部中国的战争，他自己则率领大部分军队以及主要将领和儿子们向西方进军。1219年夏天，成吉思汗到达了额尔齐斯河，他的军队缓慢移动，组成了巨大的驱赶围猎圈，为了保证人力和马匹都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成吉思汗还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调动。成吉思汗的军队数目大概在150,000到200,000人之间^①。与成吉思汗相比，花刺子模王的部队要多得多，但花刺子模部队缺乏纪律、内聚力或领导。而且就双方战争的指挥者而言，成吉思汗的机动性和战略观念，使他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在最小的儿子拖雷的陪同下，成吉思汗首先袭击了讹答剌，然后向布哈拉挺进，并闪电般地包围了布哈拉（1220年5月），接着他又包围了撒马尔罕。与此同时，另外两支蒙古军队也越过了锡尔河。术赤的军队沿锡尔河而下，到达了锡尔河下游的毡的，然后又进抵玉龙杰赤。第三支蒙古军队则越过锡尔河上游，向费纳喀忒和俱战提挺进。花刺子模帝国对蒙古的抵抗很微弱，这部分地是由于阿拉丁·穆哈默德的指挥无方造成的结果，因为他很快就放弃了抵抗，

^① 巴托尔德上引书，第404页。

逃往里海的一个岛上，此后不久，阿拉丁·穆哈默德就在这个海岛死去了。

攻陷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成吉思汗逼近了阿姆河，并且在阿姆河地区度过了1220—1221年的冬季，就在这时，术赤和他的弟兄们正在攻打玉龙杰赤。此后，在1221年的春天，成吉思汗又攻克了巴尔赫，而拖雷则袭击了呼罗珊，洗劫了赫拉特、木鹿和你沙不尔。但是在哥疾宁，花刺子模王的儿子札阑丁重整他父亲的军队，在哥疾宁与巴米扬之间的八鲁湾川与蒙古军队进行了一次战斗，并且在这次艰苦的战斗中打败了一位蒙古将领。八鲁湾川战役，是蒙古在西方遭遇的一次最严重的失败。成吉思汗决定亲自前去雪耻，他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印度河与札阑丁相遇，并且彻底击败了札阑丁。成吉思汗在巴尔赫附近的兴都库什山地区度过了1221年的夏天，然后由阿姆河地区从容地返回蒙古，到1225年，成吉思汗回到了土拉河谷。

成吉思汗当时至少已经有70岁了，但是他对战争的热情却有增无已。在成吉思汗发动对花刺子模王国的战争时，已经臣服蒙古的西夏统治者拒绝派出军队支持其蒙古君主，此后在成吉思汗长期滞留在西方时(1219—1225年)，西夏又起而反叛蒙古，并且支持女真人恢复对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无论是考虑到维护成吉思汗本人的威望，还是考虑到关于中国边境的战略，现在都要求97消灭西夏。1226年，成吉思汗发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役。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西夏的唐古特帝国终于被打垮了，但是在最后消灭西夏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在1227年长眠地下了。

有关成吉思汗其人，我们已经写了很多。这些相互矛盾的材

料，表明了成吉思汗非常复杂的个性。成吉思汗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自制力，他能够一反温文尔雅和宽宏大量，变得背信弃义而且具有报复心理。他的残忍行为，较之于同时代的女真统治者、花刺子模诸王或者欧洲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首领来说，并无半点逊色。就这方面而言，成吉思汗正是属于他的时代的一个人物，但是成吉思汗的名誉并没有因为这些无意的残忍行为而沾上污点。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恐怖是一种战争的心理武器，一种意在保证使他的敌人迅速臣服和顺从的宣传形式。作为一位精明的知人善任者，成吉思汗非常赞赏在人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敢、坦率和忠诚，他自己的一生就显示出了武士的传统美德，也表现出了政治家的谨慎和狡诈。尤其是在早期，他巧妙地处理了互相倾轧的部队以及部落政治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出了最高超的技艺。成吉思汗象他的家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沉溺醉乡，耽于声色，在战争中欢宴作乐，喜好狩猎，而且精于骑术。权力欲肯定是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主要动机，除此之外，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对他的征服应该也是一种刺激。

与更高文明的接触，对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他的后代大相径庭。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很轻易地就同化于中国或伊朗文化，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伊朗文化与游牧生活是绝对不相容的，而且蒙古之所以具有凌驾于其邻人之上的军事优势，主要也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游牧生活方式。成吉思汗几乎没有改变游牧首领传统的傲慢，聚敛财富是他行动的主要刺激，他相信，命运之神将整个世界都给了他和他的家族，供他们恣意享用。成吉思汗可能是个文盲，除了本民族的语言

之外，他对别的语言一无所知，所以成吉思汗与汉族、突厥以及伊朗臣民打交道时，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缺乏教育，但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之一，是具有善于从经验中学习的才能，成吉思汗的才干是随着蒙古帝国疆域的扩大而增加的。在蒙古部落内部倾轧的早期，成吉思汗对蒙古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是随着他所处的环境的改变，只要能够从中得到益处，成吉思汗对于任何新的思想和影响都是乐于接受的。

成吉思汗作为一位帝国缔造者，一些有助于他取得非凡成就的因素，在此值得我们特别指出。首先，在成吉思汗时期，对于一位在草原地区出现的征服者来说，中亚及其边缘地区的情况是十分有利的。这时中国分裂为宋、金两个王朝，虽然金朝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宋、金王朝都已经度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西夏和喀喇契丹王朝这时也已经不再是难以克服的军事强国了。而且事实证明，正在扩张中的花刺子模帝国，在真正需要抵御入侵者时，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其次，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因素还有蒙古军队自身，成吉思汗个人以及他的将领们的功绩。蒙古军队的纪律（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以及他们以十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在上文中都已经提到了。几乎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蒙古人建立了给养供给系统，供应部队粮秣，补充新的马匹以及运输围攻器械。蒙古军队的围攻器械较之于其对手的任何器械都更高级。蒙古人还具有优于敌人的战术上的优势。毫无疑问，速度、机动和保密也是帮助成吉思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因素，成吉思汗才能对他的军队指挥裕如。不仅如此，成吉思汗取得关于对手的情报以及了解他要

入侵的地形的形势的方法，在十三世纪来说，也是很特出的。成吉思汗的情报是由商人提供的，而商人们则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看作他们的保护人^①。最初，蒙古人最明显的弱点是他们对于围城技术全然无知，但是由于吸收了熟练的汉族和穆斯林工匠，这一缺陷很快就被克服了。

第三，作为一位战争指挥者和善于在敌人中制造敌对和误解的政治家，成吉思汗也是一个杰出的典范。他的永远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比他一生中的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他的才智。成吉思汗的最终目标（直到他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才实现），毫无疑问是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但是当他在蒙古东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与预期的相反，成吉思汗没有去进攻女真人，因为即使开始他能够取胜，也会遭到在他后方的蒙古中西部的克烈部和乃蛮部的袭击。所以，成吉思汗克制了直接进攻北部中国的欲望，集中全力使自己成为全部蒙古部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甚至在统一了蒙古草原之后，他仍然没有准备去征服整个中原地区，成吉思汗对西夏和金朝的战斗（他非常乐意同他们谈判），也是在转过来袭击阿尔泰山以西的突厥部落和喀喇契丹朝之前采取的部分的防御手段。西方游牧部落的机动性和作战方法与蒙古人相似，一旦蒙古人深深的陷入与中原王朝的大规模的战斗之中，他们就很可能轻而易举地粉碎新建立的蒙古联盟。只是在西部的游牧者及其不安定的邻人花刺子模王国被平定以后，成吉思汗才着手去消灭西夏和金朝，然而就在这时，成吉思汗溘然长逝，他未竟的事业留给了他的

^① 拉铁摩尔曾经详细分析了这种战略，见 O. Lattimore, 'The Geography of Chingis Khan' (拉铁摩尔《成吉思汗之地理》),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63.

后代去完成^①。

最后,某些心理上的因素,也使得创建蒙古帝国的任务得以比较顺利的完成。战场上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十足的勇气和决心,增强了蒙古军队中掠夺的愿望。这种勇气和决心不仅来自蒙古军队对成吉思汗本人的信赖,而且也来自他们对自己的将领的信赖。成吉思汗对他的几个儿孙以及象木华黎、苏不台和者别那样宠爱的将领,都同样非常信任,而他的儿孙和将领们对于帝国团结统一的理想也一直忠诚不二。从成吉思汗本人来说,他具有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对于尚无力完成的事业,他是从不去奢望的。而蒙古人的对手这时正陷入内部分裂之中,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敌人阉然无知,而且自己本身也由于欺诈、贿赂、蓄意施行恐怖政策而士气低落,他们是没有能力与蒙古人长期抗衡的。

^① 见上文注引拉铁摩尔《成吉思汗之世界》。

第七章 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

100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了，他的去世对蒙古的扩张进程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成吉思汗最初的征服势头，后来被他的子孙们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成吉思汗一生的经历，已经指出了一条创建一个囊括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游牧帝国的道路。当成吉思汗的后裔们推翻了中原地区的金、宋王朝，消灭了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将部队开进东南亚、旁遮普、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以及欧洲斯拉夫人地区时，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蒙古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成吉思汗时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使以后的征服成为可能的军事机器。第二阶段从1229年延续到1259年（即相当于窝阔台、贵由汗和蒙哥汗统治时期），这一阶段以继续巩固已经赢得的领土和进一步的领土扩张为标志。第三阶段以1264年忽必烈夺得他的兄弟蒙哥汗的继承权为起点，一直持续到十四世纪初期蒙古帝国崩溃。

成吉思汗在死之前，将他征服的地区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长子术赤分得了额尔齐斯河西部的蒙古征服地作为他的兀鲁思（封地）。但是，由于术赤先于成吉思汗而死，这块广袤的土地就传给了术赤的儿子拔都。拔都大肆侵害他的西方邻人，以扩大他的封地，并且建立了以金帐汗国知名的帝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分得了河中地区、喀什噶里亚、七河地区以及准噶尔西部地区。

与此同时,第三子窝阔台得到了准噶尔东部、蒙古草原和已征服的101
中原地区诸省。根据蒙古人的习俗,由第四子拖雷管理他父亲的
家族、财富和祖先的牧地以及蒙古帝国的全部精锐部队。正是依
靠这支劲旅,拖雷的两个儿子,蒙哥和忽必烈才得以成为蒙古帝国
的统治者,并且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征服。拖雷的另一个儿子旭
烈兀,也是利用这支部队消灭了哈里发政权,建立了伊朗的伊利汗
国^①。这些安排并非意味着成吉思汗认为蒙古帝国会分裂,恰恰
相反,成吉思汗这种分封土地的安排,作为蒙古氏族的传统,意在
使蒙古帝国在氏族合作的基础上,永远保持统一。为了这一目的,
成吉思汗任命窝阔台作为他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已经
死了,察合台被认为过于残酷而且刚愎自用,无法保持部落首领对
他的忠诚。窝阔台则人情练达,也颇得下和,所以窝阔台之继承汗
位得到了一致认可,即便察合台本人也忠实地支持窝阔台。窝阔台
在父亲死后召集的“忽里勒台”上正式即位之后,从1229年一直统
治到了1241年。在这十二年中,蒙古帝国的民政管理逐渐转移到了
回鹘人、汉族人、伊朗人以及阿拉伯行政官员手中,蒙古帝国也
渐趋稳定。窝阔台本人虽然在需要严厉时也是严厉的,但是他仍
然不失为一名谦恭有礼、宽宏大量,相对来说较为人道的统治者。
窝阔台设在喀刺和林的朝廷(这里原来是克烈部的首府),很快就
被装饰的辉煌壮观,面目一新,这与窝阔台崇高的帝王权力观念的

^① 伊利汗这一称号,是用来指作为大汗的部属,统治特定的兀鲁思或封地的汗。
旭烈兀及其后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伊利汗称号的。一直到合赞汗统治时期(1295
—1304年),旭烈兀的后裔都在形式上承认蒙古或中国大汗的宗主地位。见Lane-Poole,
The coins of the Mongo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莱恩—普尔《大英博物馆收
藏的蒙古钱币》), Liv-Lv。在近代,伊利汗这一称号在伊朗被用来称呼合思孩以及拔
哥帖里等部落的首领,他们当然不是任何大汗的部属。

形成是一致的。大概是为了促进贸易的需要，窝阔台这位新的大汗甚至在七河地区建立了几座城市，可能同样是出于促进贸易的目的，窝阔台对穆斯林臣民也表现出了热情的支持。

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的早期阶段，我们看到蒙古帝国的疆域仍然得到了大肆的扩张。成吉思汗死之前，在伊朗处于有利地位的蒙古军队就已经被召集回来了，与此同时，自从1223年木华黎死后，在中原地区北部也接着发生了一系列起义活动。窝阔台继位之后，重新开始了蒙古的征服。1230年，窝阔台任命朮里蛮那颜¹⁰²为伊朗的指挥官，朮里蛮最终击败了花剌子模王的儿子札阑丁以及追随他的突厥人。在西方取得胜利的同时，1231年，窝阔台的军队入侵朝鲜，并且在1234年消灭了金朝，蒙古帝国成了长江以北中原地区的主人。1235年，又召开了一次“忽里勒台”，这时朝鲜仍然在负隅顽抗，蒙古军队遂再次入侵朝鲜^①。蒙古帝国与南宋之间也爆发了断断续续，非决定性的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了窝阔台统治结束。拔都入侵了鞑罗斯、波兰、匈牙利，而朮里蛮那颜则征服了伊朗北部、阿塞拜疆、阿尔美尼亚、谷儿只，一直推进到了远至塞尔柱帝国安那托利亚高原边境的地区。但是，这一时期蒙古帝国的扩张势头已经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本地的军事首领之中，蒙古的扩张已经成为了当地军事首领的扩张。1241年窝阔台之死，意味着对蒙古帝国统一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已经都去世了，根据成吉思汗的遗愿，大汗的继承权应该过渡给窝阔台的后裔，所以在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可敦摄

^① 亨索恩对蒙一朝关系作了权威性的研究，见 W. E. Henthorn, *Korea: The Mongol Invasions* (亨索恩《朝鲜：蒙古入侵史》)，Leiden, 1963.

政之后，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成了大汗。窝阔台在世时期，贵由汗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才干，在对鞑罗斯的战争中，贵由因为与拔都不和，很不光彩地回到了喀刺和林。现在拔都在成吉思汗的后裔中资历较老，窝阔台死后，拔都就与拖雷的长子蒙哥结成联盟，反对窝阔台家族。

脱列哥那可敦摄政时期（1241—1246年）和贵由汗统治时期（1246—1248年），标志着蒙古扩张进程的中止。与此同时，大汗的权力可能也因为皇族内部的派系纷争以及宠臣们权力的不断迅速提高而削弱了。但是在1242年，拜住（伊朗地区的指挥官朮里蛮那颜的继承人）在曲札达格击败了塞尔柱突厥，攻克了埃尔祖鲁姆、脱卡特和开塞利，并且迫使塞尔柱突厥向蒙古帝国称臣。蒙古人在安那托利亚高原的胜利以及拔都之进入匈牙利，极大地提高了欧洲人对蒙古这一新的东方强国的认识。欧洲人半信半疑地认为，蒙古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因为他们将蒙古与中亚的聂斯托里派联系起来考虑的结果），而且他们还开始将蒙古帝国与普雷斯特·约翰的不可磨灭的传说联系了起来。普雷斯特·约翰是一位基督教统治者，据传说，他的领土在伊斯兰地区之外的某个地方。从十三世纪中叶起，教皇、皇帝以及十字军骑士都派遣使团前往蒙古，*《蒙古历史》*一书的作者，修士士普兰诺·迦宾就是英诺森四世的使节，他是在1246年贵由汗继位时到达喀刺和林的。¹⁰³

在贵由汗统治的短暂时期内，贵由汗与其家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相互不和，怨隙日深。到了贵由汗去世的时候，他与拔都之间已经箭拔弩张，处在战争的边缘了。据称，贵由汗是被拔都或者是拖雷寡妻的奸细毒死的。贵由汗死后，他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成了

摄政者。斡兀立海迷失在 1250 年接见了法王路易九世派来的使节。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现在分成了两派，拔都和蒙哥（他们代表术赤和拖雷家族系统），联合起来成为一派，反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1250 年，在伊塞克湖附近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试图解决这些分歧，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一年之后，在克鲁伦河附近召开了第二次“忽里勒台”，这次会议是由拔都的兄弟别儿哥操纵的。别儿哥策划将蒙哥推举为大汗，而拔都实际上等于让出了大汗位。蒙哥登上汗位之后，最先采取的行动就是下令将他和拔都的反对者处死。由于首先镇压了反对派，所以蒙哥汗在他统治的其余时间里（1251—1259 年），就得以集中全力进一步扩张。1253 年，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在蒙古集结了起来。一支远征军由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指挥，进攻中国南部的南宋帝国。另外一支远征军则由蒙哥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指挥，目标是消灭伊朗北部的木刺夷国（他们在欧洲人中间以“暗杀者”著称）和阿拔斯哈里发政权。1257 年，旭烈兀攻克了阿刺模忒和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的其他大多数木刺夷要塞。1258 年 2 月，巴格达也陷入了蒙古军队的包围之中，最后一任阿拔斯哈里发谟斯塔辛在后来的大屠杀中被杀害。与此同时，忽必烈进攻南宋的战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忽必烈的成功使蒙哥汗疑嫉日增，于是他在 1257 年召回了忽必烈。后来蒙哥汗与忽必烈兄弟二人一起，再次向南宋发起进攻，在这次战争中，忽必烈在中国战场上处于从属的地位。两年之后，蒙哥汗在四川死于痢疾。

在忽必烈统治之下，蒙古帝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忽必烈之前，蒙哥汗统治时期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1253—

1254年，代表路易九世拜访过蒙哥汗朝廷的修道士卢卜鲁克，曾¹⁰⁴经描述过喀刺和林的景况，他的记载说明，这个帐篷城在当时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首都。但是，对于数量上相对更少的蒙古人和他们的联盟来说，要继续统治人口众多的广大臣民，世界主义与他们几乎是不能相容的。由于蒙古帝国的行政权已经落入了从他们的臣民和定居种族那里吸收来的官员手中，（事实证明，这些定居种族的更高级的文化对成吉思汗的后裔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魅力。）蒙古帝国已经不再是特别的蒙古人的帝国，而且它也不再仅仅是单纯代表游牧部落的利益了。这些游牧部落曾经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人如果接受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大量弱点，同化于突厥、伊朗或者汉族臣民，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的灭亡。蒙哥汗死后，那些敌对的汗位候选人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野心，充分说明了蒙古帝国当时面临的抉择。

忽必烈作为拖雷幸存的三个儿子中的长者，是蒙哥汗最明显的继承人选，但是在忽必烈从中国返回蒙古之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准备由他自己登上空缺的汗位。阿里不哥的这次行动可能得到了部分蒙古首领的支持，这些人对于忽必烈将蒙古帝国内中国诸省的利益置于蒙古之上的倾向深为不满。后来，忽必烈也召集了一次敌对的“忽里勒台”，在这次大会上，忽必烈接受了大汗的称号，并且出发到蒙古去征讨阿里不哥。忽必烈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迫使阿里不哥俯首投降。此后不久，阿里不哥就死了，他很可能是死于谋杀。虽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斗争，暴露了蒙古帝国的统一易于破碎的性质，但是到了1264

年，忽必烈已经控制了蒙哥汗原来的领土的一大半。当蒙哥汗去世之时，旭烈兀正忙于在叙利亚的战争，所以旭烈兀没有参与他的两个兄弟之间的争夺。虽然旭烈兀与忽必烈结成了联盟，但是他的当务之急是在巩固他在中东的征服，旭烈兀所征服的地区，就是后来伊朗的伊利汗国。

与其说忽必烈的统治保持了蒙古的传统，毋宁说他是根据汉族¹⁰⁵的传统进行统治的。1264年，汗八里（北京）取代了喀刺和林的地位，成了蒙古帝国的首都。1271年，蒙古帝国又接受了汉族的称号——元。1279年，当南宋最终被蒙古人消灭时，忽必烈发现自己是第一位拥有整个中国的“野蛮人”的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忽必烈是以中国作为蒙古帝国的中心的。他所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更多的具有中原封建王朝的特点，而与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扩张政策大相径庭。十三世纪八十年代，蒙古军队开进了安南、占城、柬埔寨和缅甸。虽然在1288年，大量印度支那的统治者就已经承认了忽必烈的宗主地位，但可能是由于气候环境的缘故，蒙古人很快就从这里撤军了。忽必烈在1274年和1281年从海上进攻日本，1293年又由海上远征爪哇，这几次出海远征，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些失败证明，一旦离开了草原，蒙古人的军事技术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只有在草原上，蒙古军队的军事优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这些失败也是对进一步背离蒙古民族传统的警告。就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威尼斯商人马菲奥和马柯罗·波罗于1262年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在1275—1292年之间，尼柯罗的侄子马可在忽必烈的政府中供职。马可·波罗在他的探险经历的著名记载中，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忽必烈

奢华辉煌的宫廷。仅仅需要将马可·波罗著作中的记载与普兰诺·迦宾以及卢卜鲁克对蒙古的描述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汉化的进程发展得多迅速，蒙古人在汉化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由于忽必烈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而且他也许还没有能力阅读回鹘文，所以虽然忽必烈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汉族传统，但是他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是很贫乏的。由于忽必烈对中国学术的保护以及他为蒙古皇室诸王子提供的汉族文学教育，保证了他的后代能够较之于蒙古文化更接近于汉族文化^①。

然而事实证明，中原王朝是蒙古帝国最难以战胜的对手，与西方的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相比，中原王朝有着远远更为强大的恢复能力。成吉思汗第一次在中原地区的土地上作战是在1211年，可是到了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孙子们仍然面临着南宋的顽强抵抗¹⁰⁶。正象汉族文明的吸引力逐渐削弱了蒙古人的魄力和首创精神一样，在中原地区的战役也逐渐削弱了蒙古军队的力量。蒙古统治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附带指出的是，在元朝统治下商业生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蒙古人的保护。新富起来的蒙古贵族将金、银、珠宝以很高的利率借给商人，作为流动资金。元朝统治者特别与掌握横穿大陆贸易利益的穆斯林商人(ortaq)交往密切，他们常常将帝国的税收承包给这些商人，而商人们也经常充当大汗的商业代理人。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信用设备的迅速增长，在这方面，纸币起

^① H. Franke, '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弗兰克《蒙古皇帝能够读写汉文吗?》), Asia Major, 1953.

了不可缺少的作用^①。但是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汉地征服者当中，蒙古人的同化程度是最浅的。蒙古的“封建主义”与中原封建王朝的官僚政治传统是根本不相容的，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在数量上和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又加重了这种不相容性。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后裔中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甚至在阿里不哥去世之后，忽必烈在蒙古地区的权力也还是不稳定的。在忽必烈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他在蒙古地区遇到了窝阔台的孙子海都这样一位很难对付的敌手。海都幸免于1215年对蒙哥汗的反对者的屠杀，到1269年，他成了窝阔台和察合台幸存的后裔中无可争议的领袖。海都以准噶尔和七河地区作为他的政权的统治基地，截止1273年，海都已经驱逐了喀什噶尔、叶尔羌以及和田等地的忽必烈的代理人。1276年，海都又威胁着吐鲁番——库车地区。忽必烈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很快就恢复了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权。但是在1277年，海都在那些仇恨忽必烈汉化政策的蒙古首领的支持下，攻克了喀刺和林。虽然忽必烈最优秀的将领伯颜(马可·波罗称他为“百目伯颜”)于1278年进军蒙古，而且收复了喀刺和林，然而海都仍然控制着准噶尔，继续肆意袭击蒙古地区，从而切断了蒙古帝国的交通线——正是因为海都阻断了陆路交通，才使得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八

107 十年代后期陪同一位蒙古皇室公主由中国去伊朗时，不得已取道

^① H. F.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舒尔曼《元朝的经济结构》), Cambridge, Mass., 1956, 4--6. 关于十四世纪发行纸币的尝试, 见 H. Franke, *Geld 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弗兰克《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钱币和经济》), Leipzig, 1949; K. Jahn, 'Das iranische Papiergeld' (扬《伊朗的纸币》), *Archiv Orientalni*, 1938; M. Husain, *Tughluq Dynasty* (胡赛因《秃忽鲁朝》), Calcutta, 1963, 185-92.

海路而行。由于忽必烈正在全力经营印度支那以及进行海上远征，所以他无法对海都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海都则因为控制了
中国边境地区，从而占有了战略上的优势。在边境地区，他可以从那些象蒙古民族一样尚武的部落中吸收兵员，这些部落曾经为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建功立业。一直到了忽必烈的继承人统治时期，海都才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海都的经历证明，忽必烈是缺乏战略远见的，他将蒙古朝廷和政府从蒙古地区撤出，由此割断了他的家族与蒙古以及突厥部落的个人联系，然而蒙古帝国的存在，正是依赖于这些部落的忠诚。海都之死(大约在1301—1303年间)解除了元朝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多年之后蒙元势力被明朝从中原地区驱逐出去为止。

忽必烈死于1294年，他的死并没有立即引起蒙古帝国权力的衰落。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1294—1307年)在经验丰富的伯颜支持下，坚定地确立了大汗的地位。他控制了海都的野心，并且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手段，重新宣告了他对西方诸汗国的君主主权。与此同时，铁穆耳还巩固了忽必烈在中国本土内部的行政措施。但是，铁穆耳的继承者们对中亚的历史进程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从1307年到元朝统治结束的1369年之间，九位元朝皇帝的汉化程度越来越深，元朝政权也日益削弱，最后使明朝轻而易举地扫除了蒙古帝国在中国本土的统治。

从忽必烈之死到伊利汗不赛因之死，也就是1294年到1335年之间的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要中国的元朝与分裂的诸汗国之间保持着某种形式上的外交、文化和商业的联系，世界性帝国的思想就有可能残存下来。只要

诸汗国还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和发展横贯大陆的商道贸易，那些分裂的汗国之间就会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商路贸易曾经是最初建立蒙古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到了十四世纪
108 中叶，再次恢复世界性帝国的思想和现实都已经消失了。十四世纪末期，巴鲁剌思突厥征服者，河中地区的帖木儿试图恢复中亚与其边缘地区之间类似于蒙古时期的那种关系，但是他失败了。随着海上贸易通道的发展，中亚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存在理由——控制商路贸易——也最终消失了。

从蒙古帝国建立之初，在其内部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的关系，而且它一直没有能够从这些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蒙古帝国的制度是一种力图使游牧军事政权与典型的，从定居社会中衍生出来的行政管理制度结合起来的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要素之上的，一种是离心、保守和封建的蒙古传统，一种是渊源于成吉思汗的“蒙古世界秩序”意识。由于使用非蒙古族官员——回鹘人、阿拉伯人、伊朗人以及汉族人等，成吉思汗的“蒙古世界秩序”意识由此得到了增强。在这些非蒙古族官员中，有许多人来自那些蒙古人闻所未闻的，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政体传统的社会。蒙古帝国的庞大的规模（尤其是在蒙哥汗和忽必烈统治时期），对维持帝国的统一尤其不利。因为对于管理这样广袤的领土来说，十三世纪的交通条件和管理技能都是非常缺乏的。总的来讲，将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分为封地的作法，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分裂。但是反过来讲，这种作法与蒙古的习俗又是一致的，而且要想对帝国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分封的作法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蒙古帝国的行政机构与同它相应的军

事机构相比,总是相形见绌。因为在帝国的中心与边远诸省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边远地区封地的发展与否,并不是由于帝国政策的需要而决定的,而是由于每个汗国当地的情况,包括其统治者的野心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割据称王的诸省之间的相互纠纷,就已经足以对帝国的统一构成威胁,而且成吉思汗后裔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极力要得到独立的统治权,这两种趋势交互作用,摧毁了蒙古帝国的统一。此外,相互冲突的利益、不明确的边界以及有争议的草原,也为成吉思汗后裔之间的摩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借口。由于诸汗和他们的追随者逐渐同化于各自当地更高的文化之中,他们坚持强调各自纯属本地的利益大大高于蒙古帝国的利益。正如同元朝感受到了汉地文明磁铁般的吸引力一样,伊朗的伊利汗国诸汗(直到十三世纪末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们大多数是佛教徒^①)也逐渐吸收了伊朗——伊斯兰文明。到十四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是同化蒙古征服者,或者是将他们驱逐出去。大约与此同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同化入侵者的能力的伊朗,也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选择。距离诸文明中心更为遥远的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诸汗,虽然更长久地保持了他们的游牧习俗和“札撒”习惯,但即便是他们,也没有幸免于类似的异化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个帝国的创立者,蒙古人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

^① 伊利汗国的佛教,不是后来在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中盛行的喇嘛教,而是一种大乘教的混合物。见 B. Spuler, *Die Mongolen in Iran* (斯普勒《伊朗的蒙古人》), 180; K. Jahn, 'Kamalashri-Rashid al-Din's "Life and Teaching of Buddha." A Source for the Buddhism of the Mongol Period' (扬《甘麻刺失里—拉施都丁之“生活与佛陀教义”》), CAJ, 1956.

的。在战争中，蒙古人使自己成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芸芸众生的主宰。这场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城市的毁灭以及对文明价值的极端蔑视，所有这些甚至以十三世纪的标准来看，无疑也是触目惊心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蒙古战争的恐怖而抹煞蒙古帝国对人类发展的积极贡献。在窝阔台、贵由和蒙哥统治时期（1227—1259年）的蒙古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及后来在忽必烈和铁穆耳统治时期（1264—1307年）作为某种帝国军事联盟，蒙古征服地区经历了四分之三世纪的相对稳定时期。一位当时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就其民众与军队而言，历史学家们没有记载过，也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有哪个王朝拥有与胜利的蒙古帝国同样多的征服地区。事实上，蒙古帝国所拥有的征服地区、军队以及臣民的数量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朝代都没有享有过的^①。

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能够使人们相对安全地从克里米亚到达朝鲜，商品以及思想和发明也能够从人们所知的世界的一头，畅通无阻地到达另一头。当时的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北京的威尼斯商人，波尔多和北安普敦的蒙古使节，大不里士的热那亚领事，喀刺和林的法兰西工匠，伊朗绘画中的回鹘和中国图案，中国的阿拉伯税收官员，埃及的蒙古法律，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十三世纪的世界各地正在接近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可·波罗著名的

^① J. Kritzeck, 'Ibn-al-Tiqtaqa and the fall of Baghdad' (克里特泽克《伊本·梯各台哥与巴格达的陷落》), *The World of Islam*, ed. J. Kritzeck and R. Rayly, London, 1931, 67—8.

游记要比一部洋洋大观的目录更为重要，因为它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十三世纪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后来中世纪的领土扩张以及早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十五、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活动，则是关于远东的知识扩大的直接结果，而这种知识则是从马可·波罗以及蒙古时期其他一些欧洲旅行者的记载中得来的。

在亚洲，由成吉思汗的经历中产生出了一种新的绝对统治的思想，尽管这种情感在最初是一种很可怕的情感，但是这种思想肯定引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到了后来，后代们对于成吉思汗帝国的回忆是非常广泛的，这种回忆足以与中世纪欧洲对查理帝国的回忆相比。蒙古时代之后的较大的穆斯林国家——中亚和印度的帖木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乌兹别克帝国以及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等，与蒙古时代之前的穆斯林政权相比，似乎都有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和更强的生存能力。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这些国家从蒙古帝国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呢？事实上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中亚的每个小诸侯都宣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统的。甚至印度的莫卧儿大帝也象强调自己是帖木儿的后裔一样，强调他们是察合台的后裔。在十八世纪中叶，德干的第一任尼萨(Nizam)阿萨夫·贾赫一世的遗嘱中就有这样的禁令，即规定统治者应该过一种帐篷生活，这一禁令肯定与那些最初执行“札撒”的人们有关。但是，尤其在穆斯林中间，对于蒙古统治的回忆会引起特别的反感，这部分地是由于蒙古人残暴和渎圣的原因引起的后果，部分地则是由于事实上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帝国之前，蒙古帝 111

国是穆斯林国家所遭受的一次仅有的重大傲戒，在蒙古统治时期，穆斯林文明被迫屈从于异教的统治。与穆斯林国家的反感比较而言，文明程度大大高于蒙古帝国的汉族人，对于他们的边界之外的部落社会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对于接受蒙古人的统治，似乎没有象穆斯林那样强烈地感到蒙受了耻辱。也许这是因为在蒙古统治中国之前，至少在中国北方地区，就是由另外的两个异族，契丹和女真人统治的。道教隐士长春真人的一位门徒，曾经描述了一次从山东到巴尔赫附近的成吉思汗营地的旅行，他的记载说明，对于这些古老而高级的文明的成员来说，蒙古人是他们真正感兴趣和尊敬的对象，而罗马帝国后期的罗马基督教徒也正是这样看待哥特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说蒙古人：

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①。

当蒙古最初的征服结束之后，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成吉思汗的世界，并不简单地是一次偶然的社会大变动，而是整个重建了中亚与其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蒙古人在结束征服之后，就开始从被征服的民族中招徕行政人员和具有高度能力的管理人员——先是来回鹑人、乃蛮人、契丹人以及河中地区的穆斯林中，后来则是从汉族人、伊朗人、犹太人和许多别的民族中吸收管理人员。在中国，忽必烈任用阿拉伯人充当财政官员，也正是忽必烈，吸收了马可·

^① A. Waley,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韦利《一位炼金术士的旅行记》), London, 1931, 67—8。

波罗在他的政府里供职。由于吸收了各民族的行政管理人员，蒙古帝国的统治逐渐成了世界主义的统治。特别是伊利汗国，非常广泛地任用了外族行政官员为其政权服务。君临伊朗的蒙古统治者既单纯质朴，但又危险而不可靠，在伊利汗国统治下，那些身居高官显职的伊朗人虽然鲜有善终，但是伊朗官僚阶层（由于坚韧顽强，保证了他们在几个世纪的动乱中存在着下来）却因此很快就发现了为蒙古君主效力的有效途径。

最初，伊朗伊利汗国的疆域从克什米尔一直延伸到了黎巴嫩¹¹²地区^①，在历时四分之三世纪中，伊利汗国一直是中东的一支难以战胜的力量。尽管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以及埃及马木路克王国，都发生过持久的战争，但是对于伊朗文明来说，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有秩序的管理机构恢复之后，学术和文学紧接着很快就得以复兴。与此同时，伊利汗国在艺术上，尤其是在建筑方面的赞助也是特别慷慨的^②。伊朗的建筑师和筑造工匠被任命建造一些辉煌的建筑，这些建筑较之阿拉伯征服以来在伊朗所见的任何建筑都要更宏大，也更壮观。

尽管由于继承权问题，在伊利汗国内部曾经出现过争端，而且伊利汗国与其邻国之间也经常发生频繁的战争，但是，伊利汗国时期伊朗文化的高度水平，还应该归功于1258年到1335年之间伊

① 早期伊利汗国诸汗对克什米尔行使了主权的问题，尚未得到普遍认可。见 K. Jahn, 'A Note on Kashmir and the Mongols' (扬《关于克什米尔与蒙古的札记》), CAJ, 1956。

② D. N. Wilbur, *The architecture of Islamic Iran: The Il Khanid period* (威尔伯《伊斯兰伊朗的建筑——伊利汗国时期》), Princeton, 1955。关于其他的艺术形式，见 A.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厄珀姆·波普《波斯艺术大全》), 6 vols., London, 1938—9。

利汗国政权内部的相对稳定。以下几个因素，对伊利汗国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一，伊利汗国诸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与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军队相比，伊利汗国的军队如果不是更精良的话，也足以与它们相匹敌；其二，伊利汗国成立了由熟练的伊朗官员管理的有效的税收组织系统；其三，伊利汗国还占据了位于中东商路的有利地位。部分地是由于新的蒙古统治阶级需要奢侈品的结果，当蒙古帝国一确立，商业和都市生活就开始复活了。就恢复经济活力而言，伊朗地区表现得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为显著。在伊朗，蒙古人将其统治基地设在了阿塞拜疆，这一方面是出于战略上的原因，更重要的则是因为，阿塞拜疆为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适宜的气候环境，而且这里也为他们的马匹提供了优良的牧地。蒙古人以阿塞拜疆作为基地的结果，使大不里士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最繁荣，最具有世界主义特点的，中世纪后期的世界性的贸易集散地。大不里士的繁荣得益于它位于伊利汗国诸汗营地附近的地理位置以及 1258 年巴格达的毁灭，而且蒙古——马木路克王朝在叙利亚的战争，转移了肥沃新月地带北部的商路，这对大不里士的发展也十分有利。

繁荣的贸易，意味着政府对商人的有效的保护。伊利汗国诸汗中最伟大的合赞汗(1295—1304年)，在这方面为蒙古君王作出了最好的榜样。在合赞汗统治时期，他将度量衡都予以标准化，在帝国的大道上设立了驿站，对盗匪实行了无情的镇压，而且规定各个村庄都要对其附近道路的安全负责。在合赞汗时，还新建了大不里士的郊区，设置了商队客店，工场和集市，以此来鼓励外国商人。他在税所竖立起了石柱，石柱上面刻有当时应该缴纳的税率，以防

止无知的旅行者被贪官污吏所盘剥。蒙古帝国的力量，部分地取决于象合赞汗那样的统治者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而这种有能力的统治者的消失，则不可避免地会使帝国衰落。如果说在合赞汗统治下的伊利汗国，堪称蒙古统治的最优秀的典范的话，那么三十年之后，到了伊利汗国的末期，伊利汗国就已经显示出了它在制度上面临的弱点。蒙古政权最严重的弱点，是它的薄弱的制度基础。蒙古帝国的民政和军事机构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其军政机构的运转依赖于上层统治者的有效领导和下层统治者的服从以及对下层统治者的限制。然而蒙古政权的下层统治者往往在当地拥有广泛的影响和雄厚的实力，一旦中央的领导能力腐化，当地军事首领就会与中央政权抗衡，接着开始自相倾轧，或者在中央控制能力削弱时，当地的领导者就会起而宣布独立。在伊利汗国所发生的情况就正是如此。伊利汗国最后一位实际的统治者是伊利汗不赛因（1316—1335年）。当不赛因继位时，他还没有成年。不赛因的统治标志着蒙古札剌亦儿氏族与绰班氏族之间争权夺利的开始。在这些强大的氏族的挟持下，不赛因的那些软弱的继承人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最后，札剌亦儿氏族战胜了对手，在阿塞拜疆和伊拉克地区建立了继承伊利汗国的主要国家^①。在东方，从赫拉特起的广大地区被凯尔特朝统治。呼罗珊的西部和戈尔甘落入了萨尔巴德朝手中。在南方，原来受到伊利汗保护的穆札法尔朝在设拉子、

^① 关于札剌亦儿朝见 J. B. van Loon, *Ta'rikh-i Shaikh Uwais'* (万隆《谢赫兀哇思史》), The Hague, 1954; C. Huart, 'Mémoire sur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Ilékaniens' (乌阿特《纪念伊利汗王朝的灭亡》), JA, 1876; H. L. Rabino, 'Coins of the Jalā'ir, Kara Koyūnlū, Musha'sha', and Āk Koyūnlū Dynasties' (拉比诺《札剌亦儿、喀喇谿云鲁、穆沙沙以及阿克谿云鲁诸王朝的钱币》), NC, 1950.

亚兹德、伊斯法罕和克尔曼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在不赛因死后的五十年内，这些继承了伊利汗国的国家，都被帖木儿的征服扫荡无遗。

第八章 金帐汗国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从他父亲的帝国内得到了自己的一份¹¹⁴封地，这块封地是额尔齐斯河西部地区（现代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和花刺子模。在术赤的封地之内除了有广阔肥沃的游牧地之外，还包括重要的商业集散地玉龙杰赤。1221年，玉龙杰赤曾遭到蒙古人的蹂躏，但是这座城市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繁荣。术赤兀鲁思的西部以及里海、黑海北部是尚未被蒙古人征服的钦察草原，库蛮人等突厥民族居住在钦察草原。突厥民族以北是伏尔加河上游的不里阿耳汗国和罗斯公国。虽然在1223年者别和速不台两位将领经由高加索进入了黑海北部草原，并且在迦勒迦河畔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击败了库曼人和鞑罗斯人的联合力量，但是术赤在世期间（术赤死于1227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前），蒙古人对于这些民族是没有多少兴趣的。对于蒙古人来说，迦勒迦河战役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战役，然而就鞑罗斯人而言，这次战争却是十五年后将要到来的总攻击的前兆。迦勒迦河战役（也是一次侦察）之后，在成吉思汗在世期间，蒙古人没有对西方发动进一步的试探性攻击。但是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帝国又开始向西方进一步扩张。1237—1242年之间，在老将速不台的帮助下，术赤的次子拔都消灭了不里阿耳汗国，征服了钦察草原诸部落和鞑罗斯人（基辅在1240年遭到洗劫），进入了波兰和匈牙利腹地。蒙古¹¹⁵

军队在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和匈牙利的莫希(1241年4月)取得的压倒优势的胜利,暴露出了十三世纪欧洲军队的虚弱无力,在碰到更机动,纪律性更强的对手时,欧洲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我们说,或许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才使西欧幸免于蒙古的入侵。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了,拔都作为成吉思汗帝国中一位资历较老的王子,如果要对即将召开的选择新汗的“忽里勒台”发生影响的话,他就必须亲自前往喀刺和林。拔都留下了留守部队之后,撤军向蒙古东进,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在钦察草原的战役中,拔都曾经与他的堂兄弟,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发生了争执,而且将贵由很不光彩地遣回了喀刺和林。当窝阔台死后,贵由的支持者很快就控制了蒙古帝国政府,很清楚,如果拔都将自己置于宿敌的手中,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拔都在伏尔加河畔停留了下来,在距离阿斯特拉罕城上游65英里的萨莱建帐立国,忙于在他辽阔的兀鲁思上建立自己的政权。拔都的兀鲁思内有无边无际的牧场,有众多的尚武部落,从这些部落中可以得到兵员的补充,而且在他的兀鲁思内还有几条重要的商道,可以保证稳定的税收。在1251年的“忽里勒台”上,蒙哥汗的继位遭到了察合台和窝阔台后裔的反对,正是由于拔都介入的结果,才终于使蒙哥作为贵由的继承人登上了大汗汗位。以上所介绍的拔都兀鲁思的情况,或许可以使我们弄清楚,为什么在整个蒙古帝国政治中,拔都仅仅满足于得到边缘权力,而无意争夺大汗的位置。虽然就个人关系标准而言,拔都与他的封主的关系是真诚的,但是拔都的封地后来还是迅速发展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蒙古帝国其余部分的独立的汗国。而蒙哥汗则认识到,他与他的堂兄弟享有某种共同统辖的权

力,蒙哥汗曾对卢卜鲁克说:“正如同阳光普照大地一样,我与拔都的权力也无所不在^①”。

无论是在萨莱,还是将营帐设在伏尔加河畔,在拔都的坚持下,他的宫廷结合了游牧民族不拘礼节的风尚与定居君王宫廷装饰豪华的气派。根据两位目击者,修士普兰诺·迦宾和卢卜鲁克¹¹⁶的叙述,拔都在一顶巨大而精美的亚麻布帐篷中处理他的日常事务,帐篷内绝对保持肃静,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许进入帐篷。被传唤谒见大汗的人,当他与拔都谈话时都要跪在地上,与此同时,有一个抄写员记录谈话内容。拔都本人与一位最亲爱的妻子坐在一个放置在帐篷中央高台上的黄金王位上。拔都另外的妻子们坐在左边的长凳上,而拔都的弟兄和儿子们以及主要仆从都坐在右边。在帐篷入口处附近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金银饮具和马乳酒碗。拔都汗对特殊的客人赐以马乳酒,用来表示他的好客,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的标志。当拔都汗与贵族们酣饮时,有六弦琴演奏和歌手歌唱助兴。而当拔都汗离开大帐出行时,在他的头顶上方罩着遮阳华盖(chatr),华盖在古代中东是一种皇权的标志。拔都在他的臣民中以“赛因汗”知名,这一称号可能意味着智慧与公正的意思,“赛因汗”的称号与其说与伟大的东方统治者的传说有关,倒不如说它与道德善行有关^②。虽然伊朗历史学家术兹扎尼提到过一个谣言,说拔都和他的叔叔窝阔台都是秘密的穆斯林教徒,但实际上拔都象他的父、祖一样,一生都遵奉萨满教,这

① C. 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道森《蒙古使团》), 155。

② P. Pelliot,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伯希和《金帐汗国史评注》), Paris, 1950, 106。

既不同于他那成为基督教徒的儿子撒里答，也不同于他成为穆斯林教徒的弟弟别儿哥。然而即使拔都一生都是一位异教徒，他还是因为他的王者气度，在伊朗穆斯林历史学家中赢得了声誉。而这些伊朗史学家作为伊利汗国的臣民，并没有必要非颂扬拔都不可。例如志费尼就是这样描述拔都的：

他的恩惠是无法计算的，他的慷慨也是不胜度量的。各地的国王、极边的君主以及其他的人，大家都来拜见他。朝贡者将累年积蓄的贡物献给拔都，他们的贡物还不曾运到仓库时，拔都就将这些贡品不计多少地赏赐给了蒙古人、穆斯林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商人们从各地给他带来了五花八色的货物，拔都不但全部接受这些货物，而且还付给商人高于货物本身价值几倍的酬金^①。

- 117 拔都的兀鲁思在历史上以金帐汗国而知名。“金帐”这一名称的起源我们还不清楚。但它可能与蒙古人认为黄金是帝王的颜色这种思想有关，或者如同十四世纪伊本·拔图塔曾经描述的那样，可能与金帐汗国诸汗有一顶镀金的银帐篷这一事实有关。按照蒙古习俗的特点，拔都将他的兀鲁思的各个地区分配给了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家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而拔都本人则保留了最需要的钦察草原心脏地区。在进行了最初的征服之后，拔都尽其余生，全力巩固伏尔加河西部的新领土。要巩固新征服的地区，就意味着首先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财政制度，而且要迫使在 1237—1241 年的战役中新征服的民族屈服。在鞑罗斯地区，由于联合了主要的

^① J. A.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s* (波义耳《世界征服者史》), 1, 267.

斯拉夫统治者，例如弗拉基米尔及其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及加利奇等，迅速实现了巩固鞑罗斯地区的目的。这些斯拉夫统治者认识到，试图抵抗蒙古人是徒劳无益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开创了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鞑罗斯人通过定期向蒙古人交纳规定的沉重的贡赋和在表面上保持对蒙古君主的忠诚，得以完全保持了他们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特点。

拔都死于1255年，除了在他的兄弟别儿哥统治时期之外，金帐汗国一直由拔都的嫡系后裔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359年，王位才转到了术赤其他的儿子的后裔手中。在这一时期，金帐汗国的情况明显地好于别的蒙古汗国。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阶级及其突厥军队逐渐同化于钦察草原原来的居民之中，形成了后世的鞑靼人，伊斯兰教成为他们主要的宗教，而且鞑靼语也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混合方言。拔都死后，他的儿子们紧接着很快就莫名其妙地都死了。到1258年，别儿哥成了金帐汗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精力充沛、才干超群的男子汉，别儿哥是十三世纪最杰出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而且他也是第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的蒙古统治者。根据术兹扎尼的描述（虽然他没有金帐汗国的第一手资料），别儿哥的周围是穆斯林神学家和30,000名穆斯林警卫，他们随身都携带着祈祷用的跪毯，而且滴酒不沾^①。别儿哥在伏尔加河上游距离萨莱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可以与萨莱城相媲美的居留地，这里叫做别儿哥——萨莱或新萨莱。到十四世纪前半期，在月即别统治时期，新萨莱城已经成为金帐汗国

^① H. G. Raverty, *The Tabakat-i-Nasiri* (拉维尔第译，术兹扎尼《卫教者表》)，II, 1285—6。

政府的所在地。在萨莱以及新萨莱城的发掘，揭示了这里明显的都市文明的证据。在此地的都市文明中，在文化影响方面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似乎是埃及和叙利亚文化，而不是伊朗文化^①。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局面是由于别儿哥以及他的直接继承人实行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在别儿哥统治时期(1258—1267年)，为了控制高加索地区，别儿哥与他的堂兄弟旭烈兀以及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之间频频发生冲突，到十三世纪后半叶，这种冲突演变成了金帐汗国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之间的激烈战争。别儿哥与旭烈兀长期不和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就使得别儿哥对于旭烈兀对待哈里发政权的政策持反对立场。但是使别儿哥反对旭烈兀的另一个原因，是蒙哥汗将高加索地区转让给了自己的弟弟旭烈兀(高加索地区原来属于金帐汗国)，别儿哥对此深为不满。别儿哥在1261年向伊利汗国发动战争，并且于1263年在捷列克河赢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但是直到他去世为止，别儿哥一直都在希尔万附近作战，再也没有能够向他的最终目标跨出一步。由于与伊利汗国长期不和的结果，别儿哥与他们的敌人，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开罗、大马士革和麦加清真寺的“虎土白”(khutba，即星期五布道)，都在颂读“别儿哥”的名字，由此可知，别儿哥对马木路克王朝行使了某种名义上的宗主权。根据马木路克王朝不断需要来自黑海北部草原的突厥兵力的补充这一事实，有一位史学家竟至于认为，金帐汗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殖民

^① F. A. Ballod (F. Bolodis), *Privolzhskie Pompei* (巴洛德[巴洛季斯]《伏尔加河沿岸盛况》), Moscow, 1923; idem, 'Alt-Sarai und Neu-Sarai, die Hauptstädte der Goldenen Horde' (同作者《金帐汗国的首都——旧萨莱与新萨莱》), *Latvijas Universitātes Raksti* (Riga), XIII, 1926, 3—82.

关系^①。与马木路克王朝的政治联盟，无疑丰富了金帐汗国的文化生活，从埃及给金帐汗国的中心地区，如萨莱和新萨莱等城市，带来了艺术家、工匠、学者和神学家。然而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的联盟，也标志着蒙古扩张阶段的结束，因为在蒙古扩张时期，是以成吉思汗帝国家族间的团结作为征服世界的基础的，而现在这种团结已经被破坏了。

别儿哥的继承人，拔都的孙子忙哥帖木儿(1267—1280年)继续保持了别儿哥与马木路克王朝的联盟，与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在忙哥帖木儿统治时期，由于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在对待中国¹¹⁹和伊朗的关系上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忙哥帖木儿与察合台汗国之间也继续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友好关系。以上这些因素，促使金帐汗国进一步脱离了其他的蒙古世界，而且它还使得金帐汗国在贸易和文化上更加接近了黑海沿岸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居民。别儿哥原来的宠臣那海，也在忙哥帖木儿统治时期变得声望日重。那海娶了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洛格的私生女儿为妻(帕列奥洛格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伊利汗阿八哈)，这次婚姻大大刺激了那海的野心。作为一位杰出的将领，那海的声望使他自然地成了王位争夺者。但是对一个篡位者来说，要取代成吉思汗的后裔显然还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忙哥帖木儿的兄弟脱脱蒙哥(1280—1287年)和他的侄子秃剌不花(1287—1290年)短暂的统治时期内，那海与他们之间保持着某种共同统治的关系。那海取得的胜利，既提高了金帐汗国的声望，同时也提高了他自己的威信。忙哥帖木儿

^① A. N. Poliak, 'Le caractère colonial de l'Etat Mamelouk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Horde d'Or' (波利亚科《马木路克王朝与金帐汗国关系的殖民特征》), *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1935, 231--48.

的儿子脱脱汗(1291—1313年)是一位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统治者。脱脱汗的继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那海与他的君主之间公开的战争。虽然那海在1299年被杀,但是里海北部的鞑靼部落对那海一直铭记不忘,这些部落后来就以那海部落而知名。当脱脱汗摆脱了那海危险的竞争之后,由于大不里士财富的引诱,再加上谷儿只统治者的鼓励,他又恢复了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政策。然而,尽管伊利汗国这时不得不被迫分兵守卫西南部的边疆,以免遭到马木路克王朝的进攻,而且与此同时,他们还要保卫阿姆河沿岸的疆界不受察合台汗国的入侵,但是,不管是脱脱汗还是他的侄子月即别(他的长期统治,标志着金帐汗国的顶峰),事实上都没有能够在高加索地区反对合赞汗或完者都(1304—1316年)的斗争中,得到任何持久的优势。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这一时期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国力的相对平衡状态。

在月即别(1314—1340年)和他的儿子札你别(1342—1357年)统治时期,金帐汗国完全成了一个成熟的伊斯兰国家(虽然在金帐汗国内有大量的非伊斯兰臣民),伊斯兰正宗教法也逐渐开始取代了蒙古人的“札撒”。金帐汗国之皈依伊斯兰教,在鞑靼人(他们后来被称为金帐汗国的穆斯林)和鞑罗斯人的历史上,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此以后,鞑靼人与鞑罗斯人就因为宗教信仰以及文化方面的区别而相互分开了,从而也就避免了将来同化的可能性。在1332年至1334年之间,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经两次拜访了月即别的宫廷。蒙古汗的财富和权力,他的家庭礼仪和奢华生活以及蒙古汗和鞑靼人对妇女的普遍尊敬,都给伊本·拔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本·拔图塔经

过钦察草原时，在这里见到了大群的马匹，这些马群使他惊叹不已，在这些马匹中有许多每年都要出口到遥远的印度^①。钦察草原是一个理想的游牧地区，部落里的人可以在肥沃的草地上收放牛、羊、驼等牲畜，在这里，是不会感到人口或者牲畜数量的压力的。

金帐汗国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如位于伏尔加河畔的萨莱、新萨莱和阿斯特拉罕，花刺子模地区的玉龙杰赤，库马河畔的马哈尔，顿河河口的阿扎科以及克里米亚的卡法、吉拉姆、苏勒达科等，都是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这些城市作为奢侈品以及税收的主要来源，受到了金帐汗国诸汗的保护。新萨莱和玉龙杰赤的巨大规模和繁荣状况，特别是新萨莱熙熙攘攘的集市与世界各地的居民，使伊本·拔图塔大为震惊。繁荣兴旺的卡法城，也使伊本·拔图塔难以忘怀。卡法是热那亚侨民的居住地，这里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基督教徒。卡法还拥有繁盛的集市和巨大的港口，根据伊本·拔图塔计算，卡法的港口停泊着二百艘船只^②。以上城市的富足，是因为它们的位置靠近横穿大陆的商道。这条商道始于阿扎科，往东越过伏尔加河，横绝草原，到达蒙古和中国；或者转向东南，抵达花刺子模、河中地区，甚至到达印度。黑海的港口与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初期蒙古统治下的东亚市场相连，草原地区或北部森林地区出产的粮食、牛、马、奴隶、皮毛、木材和鱼以及中国或

① H. A. 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54* (吉布《伊本·拔图塔游记》), II, 473—4; 478. 参见 G. le Strange,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ub* (斯特兰奇《心之欢愉: 的地理部分》), London, 1919, 251—2.

② 吉布上引书, 第II卷, 第515—16; 关于热那亚与金帐汗国的关系, 见 G. I. Brati-anu, *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e siècle* (布拉迪欧尼《十三世纪热那亚黑海贸易研究》), Paris, 1929.

中亚生产的奢侈品,都是由船只运送到拜占庭、埃及、叙利亚和意大利等地的。作为一种交换,草原地区、中亚与中国等地则可以得到纺织品(包括佛兰芒布)、珠宝、贵金属、香水、水果以及非洲出产的外来牲畜。

- 121 伊本·拔图塔是月即别统治时期金帐汗国盛况的目击者。金帐汗国的繁荣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札你别登上汗位。札你别注定要享有他的前辈们没有能够得到的成就。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金帐汗国诸汗与他们在伊朗的蒙古族亲属一直争斗不休,但是金帐汗国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伊朗的最后一位实际的蒙古统治者是不赛因汗,不赛因汗死于1335年。不赛因之死,似乎为月即别提供了一个插手高加索南部地区的特殊时机,但即便如此,月即别在高加索也没有任何显著的建树。到了1357年,伊利汗国已经完全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阿塞拜疆这时由合赞汗的将领艾弥儿绰班的儿子蔑力克·阿失刺夫掌握。札你别率领一支300,000人的军队越过高加索,攻克了大不里士,掠夺了城内的大量财富,而且处死了蔑力克·阿失勒夫。但是这次胜利也没有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也许是因为害怕瘟疫的缘故,札你别并没有长期停留在阿塞拜疆,而是很快就返回了钦察草原,将他的儿子别尔迪伯留下来担任大不里士总督。不久以后,札你别就去世了,别尔迪伯必须立即赶回北方,于是别尔迪伯也撤离了大不里士。大不里士几乎立刻就被札刺亦儿朝的兀洼思汗占领了^①。

^① 札你别可能打算得到谷儿只和阿塞拜疆。758/1357年,札你别和别儿迪伯在谷儿只东南的喀喇加什铸造了硬币。见 D. M. Lang, *Studies in the numismatic history of Georgia in Transcaucasia* (兰·《外高加索谷儿只之钱币学史研究》), New York, 1955, 75-6。

札你别之夺取大不里士,只是一次孤立的胜利,这次胜利预兆着金帐汗国逐步衰落时期的开始。1348—1349年,黑死病袭击了克里米亚,在黑死病随商队沿着商路传播开来以前,号称已经有85,000人死亡。黑死病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此后不久,金帐汗国享有的近一个世纪的文明,也随着拔都后裔的灭绝而结束了。在别尔迪伯(1357—1359年)和另外两个可能是札你别私生子的统治者的短暂统治之后,紧接着就是二十年的无政府时期。这时,术赤的后裔们为了争夺汗位而相互斗争不已。金帐汗国的内部斗争,影响了金帐汗国与其邻人,尤其是与鞑罗斯诸省之间的可汗与封臣的关系。术赤后裔之间的争吵与阴谋,对金帐汗国政权的稳定也造成了一系列威胁。1332年时,月即别就已经同意授予莫斯科公国伊凡一世以“大公”的称号,此后,伊凡一世就力图驾驭他的好争吵的邻人们。对于鞑靼人来说,不幸的是月即别册封伊凡一世为大公这一措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使莫斯科大公122们能够在金帐汗国的认可下巩固其政权,从而导致了莫斯科公国对于鞑罗斯人的敌人的持久的扩张。1380年,试图统治金帐汗国的鞑靼将军马买,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莫斯科底米特里大公展开了会战,但被底米特里彻底击败了。这次战役对于金帐汗国来说,是一次危险的警告,这种危险来自莫斯科公国的威胁。金帐汗国的这位邻人貌似谦恭,实际上却贪得无厌。库利科沃战役在当时并无多大意义,但是,鞑靼人被他们自己的臣属击败这一事实,则说明鞑靼人原来的军事力量已经衰退了。库利科沃之战粉碎了马买的野心,而且由此铺平了拔都的长兄斡儿答的后裔脱脱迷失崛起道路,到1381年,脱脱迷失已经成了金帐汗国无可争议的统

治者。自从库利科沃战役之后，莫斯科公国暂时中断了向金帐汗国的进贡，1382年，脱脱迷失亲征莫斯科，强迫莫斯科公国恢复了每年向金帐汗国的贡献。脱脱迷失的胜利，迅速恢复了金帐汗国正在下降的声望。莫斯科公国势力的增长，实际上对鞑靼人的统治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脱脱迷失对此可能有所觉察，他计划要一劳永逸地粉碎莫斯科公国这个潜在的对手。但是正如奥斯曼人攻取康斯坦丁堡延续了半个世纪一样，莫斯科公国也一直存在了下来，直到帖木儿作为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出现。

在脱脱迷失得以控制金帐汗国之前，为了争夺领导权，他曾经与白帐部落（斡儿答最初的兀鲁思）有过激烈的斗争。白帐部落位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是脱脱迷失的亲属。在与白帐部落的斗争中，脱脱迷失得到了帖木儿的帮助，帖木儿曾经是察合台汗在河中地区名义上的封臣，他牺牲了自己封主的利益，很快就在河中地区开拓创建了自己的王国。当脱脱迷失一旦成为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之后，他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事实上帖木儿的野心已经构成了对他自己的威胁。对于脱脱迷失与帖木儿这两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来说，甚至分享中亚这样广袤的土地，也还是不能使他们满足的。脱脱迷失以恢复他的祖先对高加索地区的扩张政策作为冲突的直接借口，重新建立了与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友好关系（正如别儿哥为了反对旭烈兀而得到帮助时所做的一样）。后来在1385—1386年，脱脱迷失越过了高加索山脉，洗劫了大不里士。作为一种报
123 复，帖木儿在1386—1387年蹂躏了高加索，但是在帖木儿进军高加索的同时，脱脱迷失则袭击了河中地区本土。脱脱迷失挥师深入，甚至布哈拉的城墙都已经遥遥在望。在这种情况下，帖木儿迅

速东返阿姆河，而且洗劫了作为金帐汗国诸汗主要税收来源的玉龙杰赤，由此恢复了自己的威望。1389年，脱脱迷失再次主动采取行动，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开赴锡尔河，但是在进行了一次无关大局的战斗之后，脱脱迷失再次撤回了钦察草原。1391年，帖木儿大举发动反攻，率军越过了哈萨克斯坦，一直远征到了伏尔加河中游，并且在孔杜勒哈河畔的一次血战中击败了脱脱迷失。但是，帖木儿由于没有将敌人赶过伏尔加河，所以没能巩固他已经取得的胜利。事实证明，脱脱迷失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而且难以战胜的对手。1394年，脱脱迷失又再次重返高加索，发动进攻，而且由北向南越过了高加索山脉。1395年，帖木儿率军亲征，由阿塞拜疆越过了高加索，在捷列克河畔彻底击败了脱脱迷失。脱脱迷失是金帐汗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脱脱迷失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是他轻视了他原来的庇护者，以至他再也没有能够从捷列克河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作为一名逃亡者，在脱脱迷失的余生中，他一直在寻求盟友，以恢复他失去的汗位。捷列克战役之后，帖木儿进入了金帐汗国领土的腹地。在返回撒马尔罕，计划入侵印度之前，帖木儿一直向北方深入，到达了鞑罗斯城市梁赞（但不是一般所认为的莫斯科），蹂躏了阿扎科、新萨莱以及阿斯特拉罕（这可能是作为削弱金帐汗国商业繁荣的一种手段）。

1395年之后，随着脱脱迷失的崩溃，为金帐汗国历史上最后一位重要人物也迪古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也迪古是满吉惕氏族的那海鞑鞑。1399年，立陶宛大公维托尔德（1377—1430年）违背金帐汗国的利益，试图扩张自己的疆土，也迪古击败了维托尔德。由于暂时粉碎了立陶宛人的入侵，也迪古得以在西部邻人中和鞑罗

斯王公中恢复了金帐汗国的威望。与此同时，也迪古在东方也颇有建树，1405—1406年，他重新从帖木儿帝国手中夺回了花刺子模，并且深入到了布哈拉附近地区。1408年，也迪古袭击了莫斯科，¹²⁴强征了一笔沉重的贡赋，以作为他从莫斯科撤退的代价。由于也迪古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他不能够正式取得汗位，但是也迪古甘愿扶植成吉思汗的后裔为傀儡汗，而由自己在傀儡的名义下行使权力。1419年，也迪古不幸去世了，此后，在那些企图取得也迪古位置的鞑靼首领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也迪古之死以及鞑靼首领间的斗争，为维托尔德提供了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也迪古在世期间，维托尔德的野心一直没有能够得逞）。从这时起，一直到1430年维托尔德去世，金帐汗国由于维托尔德不断干预其内部事务而日渐削弱了。

十五世纪期间，金帐汗国崩溃了。帖木儿对金帐汗国城市的摧毁以及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的兴起，加速了金帐汗国崩溃的进程。但是，对于促成金帐汗国的解体和鞑靼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来说，金帐汗国的氏族首领和军事贵族们在软弱无能的傀儡汗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负责任的混战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来自外部的压力起到的作用。十五世纪中叶左右，拔都最初的兀鲁思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在这片封地上兴起了许多独立的汗国，例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以及克里米亚等。除了哈萨克斯坦的白帐部落之外，在高加索北部有那海部落，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河流域中部有亦必儿汗国。亦必儿汗国的首都位于后来的托博尔斯克，由拔都的兄弟昔班汗（即 Sibagan，后来阿拉伯文称其为 Shayban，此名一直延用了下来）的后裔统治。正是由于这些继

起的诸汗国之间内部的相互残杀，才使逐渐强大的莫斯科人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前半叶，得以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它原来的封主。事实证明鞑靼人的外交手段是非常老练的，正当鞑靼人本身的军事力量相对衰弱时，鞑靼人在鞑靼诸王之间实行了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鞑靼军事力量的削弱，部分是由于欧洲人筑城技艺的提高和大炮的应用（尽管大炮的使用在当时并不广泛），部分则是由于背离游牧生活的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使一些重要的鞑靼部落在草原战争中的灵活性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战斗方式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在这种形势下，鞑靼人对伏尔加河流域诸汗国的征服，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1552年，伊凡雷帝占125领了喀山，不出十年，阿斯特拉罕也并入了鞑靼国家。而克里米亚汗国只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才又苟延残喘地存在了两个世纪。最伟大的克里米亚统治者是明里·吉列亦一世（1466—1515年），他的宫廷设在巴克契萨莱，明里·吉列亦使传统的鞑靼文化达到了顶峰，他很精明地臣服于迈赫迈特二世苏丹，而明里·吉列亦则因为在名义上隶属于严厉的奥斯曼人，而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奢侈品和大炮，这些大炮在1475年从卡法驱逐热那亚人时有效地得到了使用。虽然晚至1571年时，杰夫列特·吉列亦一世（1551—1577年）的军队还掠夺了莫斯科，迫使伊凡雷帝交纳了对古代鞑靼的贡赋，但是克里米亚汗国逐渐已经不能与鞑靼人正在增长的力量相匹敌，后来叶卡特琳娜二世采取了最后的步骤，占领并且消灭了克里米亚汗国。

伏尔加河流域诸汗国被消灭之后，鞑靼人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亦必儿汗国的灭亡是鞑靼人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鞑

罗斯人向东方的扩张活动，是随着十六世纪后半叶他们越过乌拉尔山而开始的。这次扩张活动是一次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复杂的运动。向东方扩张，既是鞑罗斯保证其边界稳定的需要，也是鞑罗斯统治者提出的系统的新帝国理论的需要，而且鞑罗斯人在火器和大炮方面具有胜过鞑靼人和其它西伯利亚居民的优势，这种优势造成了利用鞑靼人之间长期纠纷的成熟局面，此外还有作为最早的哥萨克匪徒先锋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彼尔姆半独立的豪商）的野心以及象后来黄金将人们引向加利福尼亚，或者象宝石将人们引向南非产金高地一样，将人们引向西西伯利亚的貂皮的吸引力^①，所有这些因素汇成了一股向东方扩张的潮流。伊凡雷帝命令斯特罗甘诺夫组建军队，进讨西西伯利亚的昔班朝统治者古出木，由此开始了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正是这支由哥萨克人叶尔马克率领的军队，在1583年攻克了亦必儿城。1585年，坚强不屈的古出木夜袭了叶尔马克的营地，叶尔马克本人在逃跑途中淹死。但是在这时，叶尔马克作为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已经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事实上，俄国在西伯利亚统治的真正创立者是波里斯·戈东诺夫。波里斯·戈东诺夫最初担任摄政王，后来继任沙皇（1598—1605年），他巩固了俄国在乌拉尔和额尔齐斯河地区的统治，在1586年建立了秋明城，1587年又建立了托博尔斯克。波里

126

^① 关于俄国的扩张活动，见 W. D. Wyman and C. B. Kroeber, *The Frontier in Perspective*（怀曼、克罗伯《疆界考》），Madison, Wis., 1957；R. J. Werner, *The Urge of the sea; 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沃纳《海洋之驱动——俄国史教程》），Berkeley, Calif., 1942；R. H.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费希尔《俄国皮毛贸易，1550—1700》），Berkeley, 1943；G. V. Lantzeff, *Siberia in the Seventeenth. A study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兰特泽夫《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殖民政权研究》），Berkeley, 1943。

斯·戈东诺夫不仅倾向于说服那些被驱逐的鞑靼王公，而且他更乐意抚慰鞑靼名门世族，使他们自愿降服。例如，直到在大约1601年被那海鞑靼刺死为止，古出木一直都在顽强地抵抗俄国人（虽然他的反抗是无效的），但即使这样，波里斯·戈东诺夫还是希望古出木自愿归顺俄国。1614年，沙皇米海尔·罗曼诺夫任命古出木的孙子阿尔斯兰为卡齐莫夫（位于奥卡河之戈罗杰茨）的可汗，直到1681年这个傀儡汗国被废除，阿尔斯兰的后裔们一直统治着这一地区。到十七世纪中叶，俄国人东进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古代西伯利亚汗国的残余，在卫拉特人的猛烈进攻之下，终于被彻底消灭了。

第九章 察合台汗国

127 在分封成吉思汗帝国时，河中地区、喀什噶里亚和七河地区以及准噶尔的大部分地区组成了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兀鲁思。直到十四世纪初期察合台的兀鲁思分裂为止，察合台的后裔在这里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河中地区，察合台诸汗是作为本地突厥军队的傀儡而进行统治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十四世纪后半叶，察合台的后裔被帖木儿消灭。察合台最初的兀鲁思中一直保留下来的部分，以莫谿勒斯坦知名，在这里，察合台诸汗一直保持着名义上的君主，直到十七世纪，莫谿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在卫拉特、哈萨克和乞尔吉思人的进攻下投降为止。

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再加上钱币学证据极为零乱，所以察合台诸汗的历史非常之晦暗不明，而且他们的系年大多数也是暂定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在察合台的兀鲁思内，成吉思汗的后裔与在中国、伊朗甚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相比，他们远远更为长期地保持了蒙古的游牧传统。天山北部的草原为察合台汗国提供了肥美的牧场、充足的马匹和战士，只要察合台诸汗控制了天山草原，他们就很少对河中地区和喀什噶里亚的绿洲产生兴趣，这些绿洲地区只是作为赋税来源，才得到察合台汗的重视。根据瓦撒夫记载，察合台汗国的八剌汗（1264—1270年）在渡过阿姆河前去袭击伊利汗国的呼罗珊地区之前，甚至掠夺了属于他自己的城市撒马

尔罕和布哈拉^①。在蒙古帝国创建时期,察合台兀鲁思的大多数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一百年之后,伊本·拔图塔拜访了河中地区,河中地区城市生活的衰败景象使他感到震惊。例如,忒耳迷¹²⁸是被成吉思汗掠夺之后,在一块新址上重建起来的,但是撒马尔罕仍然是一片巨大的废墟,呼罗珊、木鹿地区依旧满目断垣残壁,而巴尔赫则干脆就是渺无人迹^②。十三、四世纪河中地区的穆斯林城市居民所经历的那种恐怖景象,可能就是导致他们盲目崇信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原因。在这些城市居民中,托钵僧阶层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普遍崇拜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以及他的家族(即 Sayyids 与 khojas)。但是在游牧民族中间,伊斯兰教的传播却非常缓慢。在察合台汗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异教的蒙古传统与穆斯林生活方式之间,“札撒”与伊斯兰正宗教法之间以及游牧者与定居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察合台最初的兀鲁思,是由原来准噶尔盆地的回鹘和喀喇契丹的领土以及七河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组成的(塔里木盆地是中亚幸免于蒙古蹂躏的很少的大面积耕种地区之一),在以上地区之外,察合台的兀鲁思还包括花刺子模帝国后期实际占有的领土,即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但是察合台汗国的领地不包括已经属于术赤兀鲁思的花刺子模本土,而呼罗珊地区后来则被伊朗的伊利汗国占有。要给察合台汗国的确切疆界划定一条精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大体上说,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上

^① J. von Hammer-Purgstall, *Geschichte Wassaf's* (哈默·普尔格施塔勒《瓦撒夫史》), 141。

^② H. A. R. Gibb,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吉布·伊本·拔图塔亚非游记), London, 1929, 174—5。

游一直延伸到咸海和阿姆河，有一段时期，甚至扩展到了兴都库什山南部，到达了哥疾宁与印度河地区。察合台汗国的臣民包括萨满教徒、伊斯兰教徒、聂斯托利派教徒、基督教徒以及佛教徒等。他们的经济生活也各不相同，其中有游牧者、绿洲地区的农业劳动者，还有象撒马尔罕、布哈拉、喀什噶尔、叶尔羌以及阿克苏那样的重要的商业、手工业中心的城市居民。察合台本人对于都市生活并无直接兴趣，无论在严冬，抑或在盛夏，他的主要驻营地都在伊犁地区附近。虽然察合台政权最早的驻地是古代回鹘城市别失八里，但是别失八里的地位不久就被位于天山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阿力麻里城取代了。

对于察合台本人而言，有关他的材料是相互矛盾的。术兹札尼 129 宣称，在所有的成吉思汗后裔中，察合台是最敌视伊斯兰教的，而且正是因为成吉思汗深知察合台为人残暴刻毒、嗜血成性，才没有任命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①。但是在其他的记载中，察合台则被描写为一位聪明睿智、精力充沛的统治者，他高贵、好客，而且慷慨大方，不仅是一名能干的武士和热情的猎人，而且还是一位酒量极大的人。成吉思汗曾经任命察合台负责实施“札撒”的工作，可能正是因为察合台执掌“札撒”的缘故，才使他作为伊斯兰教的敌人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就察合台生活的时代的标准来看，他的政权似乎可以称为楷模。察合台政权是建立在与他的弟弟窝阔台大汗合作的基础上的，每当窝阔台遇到大事时，他都向察合台请教^②。

^① H. G. Raverty, *The Tabakat-i-Nasiri* (拉维尔迪《卫教者表》), II, 1144—6。

^② E. Haensch,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海涅什《蒙古秘史》), 136—7。

察合台的统治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统治是如此强大和严厉，以至当时道路上匪徒绝迹，对商队的保护也成了多余的事情。考虑到察合台被当作伊斯兰教的敌人这种名声，十分有趣的是，在察合台统治时期，河中地区是由穆斯林总督牙刺瓦赤主管的。牙刺瓦赤是一位来自花刺子模的富商，他的儿子麻速忽别乞后来继承父位，主管河中地区的全部兀鲁思。与此同时，另一位穆斯林商人哈巴什·阿迷的也完全得到了察合台的信赖。以上全部事实说明，察合台汗精明过人，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如何利用穆斯林商人阶层。

察合台大约死于1241年，汗位由他的孙子合刺旭烈继承。但是合刺旭烈的继位没有能够得到大汗贵由的认可，贵由汗使察合台的第五子也速蒙哥取代了合刺旭烈。1251年，当蒙哥成为大汗之后，蒙哥汗重新任命合刺旭烈为察合台汗，但合刺旭烈在得到汗位之前就去世了。在以后的十年中，察合台汗国的兀鲁思由合刺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统治。兀鲁忽乃是她的幼子木八刺沙的摄政者的身份进行统治的。这时，行政权继续保持在哈巴失·阿迷的和他的儿子纳速刺丁手中。一直到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阿鲁忽入侵察合台封地时，这种情况才告结束。阿鲁忽是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支持者，1260年，阿鲁忽成为察合台汗，并且通过与兀鲁忽乃结婚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后来阿鲁忽放弃了与阿里不哥的联盟，阿里不哥为了报复而蹂躏了准噶尔地区。阿里不哥的劫掠是如此残暴，以至于在1263—1264年之间，准噶尔地区因灾荒而死了十分之一的人。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阿鲁忽在他的余生中一直都在与忽必烈的手下，准噶尔东部的海都战斗。阿鲁忽大约死于1301264年，木八刺沙继阿鲁忽之后成为察合台汗。木八刺沙是第一

个成为穆斯林教徒的察合台统治者。但是对于忽必烈来说，木八剌沙的继承人资格是他难以接受的。忽必烈使他的侄儿，察合台另一位伟大的孙子八剌取代木八剌沙而成为察合台汗。

察合台的兀鲁思已经没有以前那样辽阔了。伊朗伊利汗国建立的结果，强占了阿姆河，进入了察合台汗国的西南边界，与此同时，海都在准噶尔地区反对忽必烈的成功，则意味着察合台汗国东部疆土的丧失。不久，八剌汗就同忽必烈发生了争执，后来八剌汗发现自己与忽必烈以及海都同时都处在战争状态之中。由于海都击败了八剌汗，而且迫使八剌汗让步媾和，所以到1269年春天，在塔拉斯河畔举行的一次“忽里勒台”上，八剌汗与海都恢复了原来察合台后裔与窝阔台后裔之间的联盟，反对在中国和伊朗的拖雷的后裔。至于八剌汗是否成了海都的封臣，或者在他们之间是否建立了某种共同统治的关系，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但是八剌汗与海都力图划清他们之间的边界，以结束近年来的劫掠，这一点是清楚的。这时牛羊群远离了农业地区，城市既避免了骚扰，而且也不再被迫交纳严苛的税收了。由于八剌汗抱怨缺乏充足的牧场，海都同意他入侵伊朗，对于海都而言，他也乐意听凭自己的新盟友专意于西南地区^①。八剌汗在前往阿姆河途中，劫掠了他自己的城市（这一暴行引起了年高德劭的河中地区总督麻速忽别乞的反抗），1269年，八剌汗渡过阿姆河，进入呼罗珊地区，一直推进到了你沙不尔。事实证明，八剌汗的对手伊利汗阿八哈，是一位比八剌汗更老练的指挥官，而且八剌汗很快就发现他的盟友抛弃了

^① K. Jahn, *Ta'rih-i-Mubārah-i-Gāzāni* (编《合赞汗史》), The Hague, 1957, 12-13.

他,于是他被迫慌乱地撤回了河中地区。在布哈拉,八刺汗后来成为一名穆斯林教徒,并且开始阴谋反对海都的封臣。八刺汗大约死于1270年,他可能是在海都的煽动下被毒杀的^①。

从八刺汗死后到笃哇继位之前,察合台汗国曾由两位无关紧要的统治者进行了一段短暂的统治。此后大概到1274年,八刺汗的儿子笃哇在海都的支持下,得到了他父亲的汗位。笃哇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对海都来说,他还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盟友,海都与笃哇一起,反对忽必烈的将领和北方的白帐部落。1273—1274年,伊利汗阿八哈为了报复八刺汗对伊朗的入侵,袭击了131河中地区,这次袭击行动以对布哈拉的劫掠而告终。但是笃哇组织了反攻,将伊利汗国的军队赶出了阿富汗,他甚至从哥疾宁派遣入侵者进入了旁遮普。可是就海都本人而言,他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对他的邻人进行不必要的掠夺活动,而是急于要使自己的领地恢复原来的繁荣。海都可能认识到,虽然自己的力量已经足以抵抗忽必烈的进攻,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主动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与八刺汗以及后来与笃哇的结盟,都说明海都是不愿意两面作战的。海都的疆域范围现在还无法精确地加以界定。他的政权中心位于准噶尔和七河地区,他在冬天和夏天两季的营帐,设在伊犁河与楚河之间的巴尔喀什湖南部地区。虽然海都在河中地区和喀什噶里亚大概享有某种宗主权,但是塔拉斯河很可能是他与察合台汗国边界的标志。在东北方,海都的管辖权越过了阿尔泰山,一直延伸到了额尔齐斯河与叶尼塞河上游:东至察罕淖尔,南抵罗布淖尔。

^① 瓦撒夫上引书,第153页。

海都死于1301—1303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海都的儿子察八尔是在1303年继承汗位的),在一段时间内,察八尔与笃哇保持了两个家族之间的传统联盟。但是一俟时机成熟,他们之间就逐渐陷入了战争状态。由于笃哇打败了察八尔,结果迫使察八尔放弃了他父亲对察合台汗国所享有的某种程度的宗主权。笃哇大概死于1306—1307年,一年之后,笃哇的儿子和继承人宽阔也在1308年去世了。此后,察合台汗国政权被另一位察合台后裔塔里忽所掌握。塔里忽由于公开宣布信仰伊斯兰教,从而失去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所必需的游牧部落的支持。

笃哇的另一个儿子怯别,领导了一场广泛的反对篡权者的密谋活动,大概在1308—1309年,怯别终于强行闯入了塔里忽的营帐,杀死了塔里忽。察合台后裔之间的这些纠纷,使察八尔跃跃欲试,重新发动了战争。但是察八尔的军队被强大的怯别彻底歼灭,¹³²他的人民也被并入了察合台部落或白帐部落之中。窝阔台的后裔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1309年,怯别之兄也先不花作为重新联合起来的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登上了汗位。也先不花其人不过是一名平庸的武士,1315年,他轻率地渡过阿姆河,袭击了呼罗珊地区。但是,元朝军队趁机入侵察合台汗国,并且深入到了远至伊塞克湖地区,为了保护东部边疆免遭元朝的人侵,也先不花被迫慌乱地从呼罗珊撤军。然而,这时伊利汗完者都也进一步入侵了河中地区,掠夺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忒耳迷地区。也先不花大约死于1318年,汗位由怯别继承,怯别一直统治到了1326年。或许是因为怯别担心河中地区被伊利汗国长期占领,所以他将首都建在了布哈拉西南部的那黑沙不(即合儿昔,Qarshi)。这样一来,察合台

汗国的政治中心就由七河地区和准噶尔转移到了河中地区。而在河中地区，异教的游牧传统已经被伊朗——伊斯兰文化传统取代了。尽管此后察合台汗的年代很混乱，但怯别大概是由笃哇的另外三个儿子继承的，他们是燕只吉台、笃来帖木儿以及答儿麻失里。很明显，他们三个人想与德里苏丹麻哈没的·本·秃忽鲁结成联盟，以反对伊利汗国^①。答儿麻失里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但是虽然伊斯兰教已经在部落中得到了传播，可是答儿麻失里的信仰对于许多异教的部落首领来说，仍然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在1334年，这些首领就起而叛乱，废黜了答儿麻失里。这次事件标志着河中地区长达三十多年的无政府状态时期的开始。此后河中地区出现了许多出身于成吉思汗家族的傀儡汗，本地的艾弥儿们则打着傀儡汗的旗号相互混战。直到十四世纪后半叶，巴鲁刺思突厥跛子帖木儿(Timur-i Lang)作为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出现，方才结束了这个混乱的时期。

在天山南北地区发生的事件，与河中地区大相径庭。十四世纪期间，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的结果，在七河地区与准噶尔地区恢复

^① 据推测，答儿麻失里入侵了印度，萨尔基斯扬兹称答儿麻失里在1327年到达了德里。见 E. Sarkisyanz, *Geschichte der orientalischen Völker Russlands bis 1917* (萨尔基斯扬兹《俄罗斯东方民族史》), 117。胡赛因对此持反对意见，见 M. Husain, *Tughluq Dynasty* (胡赛因《秃忽鲁朝》), 119—43。蒙古人在印度史上所起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可参见 D. Pal, 'Ala-ud-din Khilji's Mongol Policy' (帕尔《阿老丁·黑里吉的蒙古政策》), *Islamic Culture*, 1947; K. Jahn, 'Zum Problem der Mongolischen Eroberungen in Indien (13.—14. Jahrhundert)' (扬《十三、四世纪蒙古占领印度问题》), *Akten des vierundzwanzigsten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en-Kongresses, Munich, 1957*; K. Jahn, 'A Note on Kashmir and the Mongols' (扬《克什米尔与蒙古人札记》), *CAJ*, 1956; A. Ahmad, *Mongol Pressure in an alien land* (阿曼德《在异族土地上的蒙古压力》), *CAJ*, 1961。

了纯粹的游牧经济。而且随着性别将首都迁往河中地区，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也转移到了河中地区。而在河中地区的游牧部落中，伊斯兰教已逐渐传播开来，伊朗——伊斯兰文明对于象答儿麻失里那样的蒙古统治者产生了诱人的魅力。所有这些情况，都强化了锡尔河南北两岸地区的差异。鉴于以上情况，在答儿麻失里¹³³被废黜之后不久，准噶尔和七河地区的艾弥儿们答应，在那些根本不掺杂有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且能够保持成吉思汗帝国传统的地区恢复原来的察合台汗国。在伊朗和河中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中，这个重新成立的汗国以莫谿勒斯坦知名，而它的居民则被称为Jats(强盗)。虽然莫谿勒斯坦的首府最初设在阿力麻里，但是喀什噶里亚地区也包括在莫谿勒斯坦的范围之内。事实证明，天山南部的喀什噶里亚诸城市，如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总是对莫谿勒斯坦诸汗及其追随者具有日益增长的吸引力。

最初，莫谿勒斯坦也象河中地区一样，由于相互敌对的艾弥儿集团之间的争吵而陷于分裂状态。但是到1348年，笃哇的孙子秃忽鲁帖木儿成了莫谿勒斯坦的统治者，秃忽鲁帖木儿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君主，他一直统治到了1362或1363年去世为止。秃忽鲁帖木儿的军队甚至进入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然而，就总的方面而言，秃忽鲁帖木儿并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支持者们的希望。事实证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大概在1353年左右，秃忽鲁帖木儿本人也成了一名伊斯兰教徒，他对宗教界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斯兰教在莫谿勒汗国内传播的结果。秃忽鲁帖木儿也很喜爱都市生活，他先是将阿克苏，后来又喀什噶尔作为他的居住地。秃忽鲁帖木儿去世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进一步的事

变。在这次事变中，秃忽刺家族下毒手杀害了他们所能杀害的秃忽鲁帖木儿的全部后裔。从这时起，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秃忽刺家族在喀什噶尔历史上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帖木儿五次入侵了莫谿勒斯坦。1389年，帖木儿的部队蹂躏了莫谿勒斯坦，这次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能够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但是帖木儿没能将河中地区和莫谿勒斯坦重新联合起来，进而再建察合台最初的兀鲁思。1389年，帖木儿满意地承认了秃忽鲁帖木儿素负盛名的儿子黑的儿火者为莫谿勒斯坦的统治者。自从秃忽鲁帖木儿死后，黑的儿火者先是在喀什噶尔与巴达赫尚之间的大山中，后来是在荒凉的罗布淖尔附近躲藏着活了下来。作为一位正统的伊斯兰统治者，黑的儿火者与帖木儿的关系不是不友好的，而且在1397年，帖木儿还娶了黑的儿火者的女儿。可是1399年黑的儿火者之死，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而这种混乱状态又为河中地区帖木儿的继承者们提供了干涉莫谿勒斯坦西部地区的借口。但是，黑的儿火者的孙子或者曾孙^①歪思汗(1418—1428年)最后终于夺得了汗位。歪思汗在他统治的大部¹³⁴分时间里，都在同准噶尔的卫拉特人进行着失败的战争。当歪思汗死后，紧接着在他的艾弥儿中就发生了新的骚乱。这些艾弥儿们形成了拥护歪思汗的儿子也先不花和羽奴思的相互敌对的派别。在此后发生的这场实力角逐中，事实证明也先不花派比羽奴思派更为强大，羽奴思被他的支持者送到了帖木儿的孙子，撒马尔罕的

^① 巴布尔和米尔咱·穆罕默德·海答儿·秃忽刺二人对于察合台系诸汗的谱系肯定是知晓的，他们断言，歪思汗是黑的儿火者的曾孙。但是这种说法在年代学上很难成立。

统治者兀鲁伯处，兀鲁伯又将羽奴思派往伊朗，羽奴思在伊朗受教于历史学家萨拉夫丁。萨拉夫丁其人是在《武功记》一书的作者，《武功记》是一部描述帖木儿的征战的有名的著作。卫拉特人的不断入侵，与河中地区帖木儿帝国的战争以及莫谿勒汗国内部的反叛，打断了也先不花的长期统治(1434—1462年)。到也先不花去世时，莫谿勒斯坦的西部已经被受到帖木儿帝国保护的羽奴思的支持者们轻易地占领了。但是直到1472年，羽奴思才征服了阿克苏和吐鲁番。羽奴思是一位严格的穆斯林教徒，他在支持宗教界，尤其是在支持托钵僧阶层(Silsileh)成员方面是非常慷慨的。作为德里苏丹政权的征服者，大莫卧儿帝国的缔造者巴布尔的外祖父，羽奴思是当之无愧的。羽奴思其人也是十五世纪伊朗文明的完美的产物。他为人沉着、谦恭，而且智慧出众。他既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和著名的弓箭手，又是学者、旅行家，也是音乐、绘画、书法业余爱好者。然而，尽管羽奴思的多才多艺给人以深刻的映象，但是在使他的那些异教的部属们放弃游牧生活方式方面，他几乎一无进展，而且在与卫拉特人的战争中，他也没有能够取得比他的父亲或兄长更大的成功。在他的好争吵的河中地区的邻人——帖木儿帝国中，羽奴思的声誉竟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帖木儿帝国内部无穷无尽的争吵中，羽奴思经常是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的。

到1487年羽奴思去世的时候，莫谿勒汗国就已经分裂了。羽奴思的长子马哈木统治着塔什干，马哈木继承了父亲的文化教养，但是在魄力方面却比其父大为逊色。与此同时，羽奴思的小儿子阿黑麻统治了阿克苏，就传统的模式来看，阿黑麻是一位典型的察合台统治者。阿黑麻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武士，他曾经三次战胜了

哈萨克人的反叛军队，他还向卫拉特发动两次战争，而且两度击败了卫拉特人。但是在反对秃忽刺艾弥儿阿卜·乱乞尔方面，阿黑麻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他攻占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企图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阿黑麻的哥哥马哈木受到乌兹别克征服者麻哈默的·昔班尼的威胁时，阿黑麻迅速赶到了塔什干，支援马哈木。巴布尔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阿黑麻，并且对阿黑麻的到达留下了生动的记述：

他的部众的穿著打扮，都是蒙古流行式样。他们头戴蒙古帽子，身穿中国锦缎刺绣成的长袍。蒙古箭袋和马鞍是用未经处理的粗面皮革制作的。蒙古马的装饰也很特殊……他（阿黑麻）是一位性格怪僻的人，他既是战争的伟大的主宰，也是一名勇士……他与他那柄锋利的宝剑形影不离，他的剑或悬于腰间，或握在手中。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乡巴佬，谈吐粗俗，一直生长在偏远的地方①。

1503年，马哈木和阿黑麻兄弟二人被麻哈默的·昔班尼击败，成了昔班尼的阶下囚。虽然不久之后他们就得以获释，但是他们再也没能恢复他们原来的显赫地位。

然而，阿黑麻的儿子们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父亲好战的本能。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伙不易战胜的武士。在他们中间，为首的是赛德汗。当赛德汗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曾经被乌兹别克人俘虏，而且在麻哈默的·昔班尼的身边，躲过了战争的威胁。日后赛德汗联合巴布尔征服了喀布尔，并且在1514年率领他的兄弟们和追随

① A. S. Beveridge, *The Babur-Nāma in English* (贝维里吉《英译巴布尔回忆录》), 1, 160-1.

者,以大约 4700 人的力量进攻喀什噶尔,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座城市,从而结束了秃忽刺家族的长期统治。阿卜·乱乞尔逃进了拉达克,并在那里遭到了谋杀。

当赛德汗征服喀什噶尔之后,他的兄弟们接着就对东部诸城市——乌什、阿克苏、拜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发起了进攻,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他们的祖父羽奴思在世期间莫豁勒汗国原来所有的疆域。赛德汗与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以及乞尔吉思人战斗,而且他甚至发动了征服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战争。虽然在不久之前,疏勒的阿卜·乱乞尔曾经率先进入了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但是察合台诸汗以前还不曾进入过上述地区^①。1531—1532 年的某个时期,在巴布尔的侄儿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秃忽刺的指挥下,察合台军队离开疏勒地区,进入了克什米尔。米尔咱·海答尔是《拉失德史》一书的著名作者,《拉失德史》保存了察合台汗国历史的主要史料。米尔咱·海答尔进入克什米尔之后不久,赛德汗本人就接踵而来,在巴勒提斯坦地区度过了冬季。当 1533 年返回喀什噶尔途中,赛德汗在通过素盖提山口时去世了。米尔咱·海答尔坚持在克什米尔度过了春季,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战斗,甚至有人认为,当米尔咱·海答尔在恶劣的气候和地形环境逼迫下被迫撤军时,他已经进入了西藏,离开拉萨也只有短短八天的路程,而且他还进入了尼泊尔的边界。后来由于害怕赛德汗的儿子和继承人阿不都·拉失德对他的仇视,米尔咱·海答尔于 1536 年

^① 据称,阿卜·乱乞尔的将军密尔·哇利曾征服了吉尔吉特和巴勒提勒坦。但是不可能到达拉达克。见 L. Petch, A study of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皮特《拉达克编年史研究》), Calcutta, 1939, 120.

逃往巴达赫尚，以后他又到了印度帖木儿朝的宫廷，从1541年到1551年去世为止，米尔咱·海答尔一直统治着克什米尔。

根据《拉失德史》记载，虽然赛德汗晚年对伊斯兰教日益虔敬（事实证明，他对西藏的远征是一次反对偶像崇拜者的圣战），从而使许多他的不信教的追随者疏远了与他的关系，但是赛德汗仍然不失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一位能干、公正而且相对宽容的统治者。如同其他的察合台统治者以及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征服者一样，赛德汗对著名的圣者阿黑麻·牙撒吾教长的信从者采取了保护政策^①。赛德汗的儿子阿不都·拉失德汗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父亲的征服地区。但是在阿不都·拉失德汗死后（约1555—1556年），由于统治家族中各种不同成员之间的相互对立以及来自乌兹别克、哈萨克和乞尔吉思的外部压力的结果，察合台汗国分裂了。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尤其晦暗不明，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在1603—1605年间通过了叶尔羌地区，鄂本笃是自马可波罗以来，最早为人所知的一位进入喀什噶里亚的欧洲人^②。

十六世纪期间莫谿勒汗国的历史进程，象在十五世纪中叶的情形一样，由于卫拉特人占据了准噶尔，哈萨克人当时在七河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天山的乞尔吉思人也不再承认莫谿勒汗国的宗主地位，这时的莫谿勒汗国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仅仅是在喀

^① 阿黑麻·牙撒吾教长是著名的苦修教士阶层的创建者，他出生于牙锡，并在1166年左右死于该地。牙撒吾在中亚突厥人中受到了热烈的崇拜，他的陵墓（曾由帖木儿重建）也很快就成了人们朝拜的对象。

^② C. H. Payne, *Jahangir and the Jesuit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Travels of Benedict Goes, etc.* (佩恩《只罕杰尔与耶稣会士——鄂本笃游记》), The Hague, 1924.

什噶里亚,察合台后裔的统治才得以残留下来,但是即便在这里,他们的统治也越来越虚弱,直到被来自河中地区的,以野心勃勃的和卓王朝为首的半神权政权取代为止(至少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地区是如此)。和卓家族的开山祖以哈司刺·马黑杜米·艾札木知名,他是一位来自布哈拉的巡回牧师和奇迹创造者,他从察合台汗那里接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赠款,后来在1540年死于喀什噶尔。马黑杜米·艾札木是一位在民间受到普遍崇拜的对象。他的子孙们不久就分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派系,但他们最后在喀什噶里亚的城市居民中都享有宗教上以及政治上的统治权。虽然在城市之外,尤其是在那些由两个相互对立的,分别以白山派和黑山派知名的乞尔吉思部落联盟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和卓后裔的影响相对来说弱一些,但是敌对的和卓诸派终于与这些乞尔吉思部落结成了联盟。

十七世纪后半叶,最后一位对塔里木盆地诸城市具有主宰能力的察合台统治者是亦思马因汗。亦思马因汗与白山派和卓首领希达雅图刺和卓发生了争执,并且流放了希达雅图刺。对于亦思马因汗来说,不幸的是,在民间以哈司刺·阿法克知名的希达雅图刺和卓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对手。希达雅图刺是一位具有将帅之才的人物,而且还被他的信徒们尊崇为具有非凡权力的圣者和仅次于穆罕默德的先知。直到二十世纪早期,座落于喀什噶尔城外的希达雅图刺和卓的陵墓,仍然是民众们的朝圣地点。当希达雅图刺被从喀什噶尔驱逐之后,他向伟大的卫拉特首领噶尔丹寻求支持,噶尔丹在1678年入侵了塔里木盆地,将亦思马因汗驱逐出了喀什噶尔,任命希达雅图刺和卓为自己的代理人,取代了亦思马

因汗的地位。作为这次变革的后果,从这时起,在喀什噶尔的事务中,和卓除了对现代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有着广泛的宗教上的权威之外,还行使着稳固的政治权力。但是希达雅图刺和卓对他的从属地位似乎并不满足,因为为了保证驱逐卫拉特人,他很快又与亦思马因汗的弟弟,乌什的马黑麻·阿明秘密结成了联盟。在后来的斗争中,卫拉特人被击败了,不久之后,马黑麻·阿明也被他的一名支持者杀害。这样一来,硕果仅存的希达雅图刺和卓就成了喀什噶里亚无可争议的主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693—1694年间希达雅图刺去世为止。在此后的一段混乱时期之后,黑山派和卓在叶尔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此同时,白山派和卓则保持着喀什噶尔,从而在两派和卓之间导致了一种均势,这一均势一直延续到了1713年。这时卫拉特人摆脱了自从1697年以来噶尔丹死后发生的内部纠纷,重新加强了他们对喀什噶里亚的统治,并且将两派和卓的首领都迁移到了卫拉特人的首府伊犁河谷。黑山派的首领代尼耶勒和卓在伊犁赢得了噶尔丹的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1697—1727年)的信任,策妄阿拉布坦在1720年将代尼耶勒作为一位独立的统治者送回了喀什噶里亚,这一任命得到了另一位卫拉特统治者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的承认。但是在代尼耶勒和卓死后,卫拉特人认为,将喀什噶里亚诸城市在代尼耶勒的五个儿子中分开更为谨慎。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紧接着就出现了混乱局面,代尼耶勒诸子在混乱中摆脱了对卫拉特人的臣属关系。噶尔丹策零的孙子阿睦尔撒纳残暴地迫使黑山派和卓向他臣服,后来阿睦尔撒纳又转而成了白山派和卓的支持者。白山派和卓们再次成了喀什噶里亚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是阿睦尔

撒纳的臣民,而且是阿睦尔撒纳的封主——中国满清皇帝的臣民。然而对于和卓们来说,向一位远离喀什噶尔达许多月路程的异教皇帝尽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和卓们毫不迟疑地跟随阿睦尔撒纳,加入了反叛乾隆皇帝的行列。其实乾隆皇帝对塔里木盆地名义上的宗主权,对于本地居民来说,根本就没有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当阿睦尔撒纳最终被击败之后,尽管和卓们及其追随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是喀什噶里亚还是在1758—1759年间被清朝政府占领了。

在喀什噶里亚地区,和卓的统治是非常不稳定的,也许这就是喀什噶里亚的穆斯林居民开始时坦然地接受满清统治的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的新的异教主人在镇压反抗方面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在别的方面,满清政府却对其“野蛮人”臣民放任自流。喀什噶里亚的居民得以继续保持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他们丝毫没有受到遥远的满清当局的干预。但是在这之后的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里,被流放到帕米尔以外的浩罕的和卓们,却没有花多大气力就鼓动起了他们原来的臣民起而造反(尤其是利用宗教作为借口),反对满清的统治。

139 从察合台汗国衰落到满清政府征服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这段时期,由于缺乏有关的原始材料,要想精确地评价和卓统治时期对于喀什噶里亚的历史意义是不可能的。值得称赞的是,和卓们对这一地区(包括在他们的乞尔吉思邻人中)伊斯兰教的传播,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他们还在城市和大乡镇里创建了大量的 *madrasehs*(伊斯兰神学院)和 *maktabs*(伊斯兰学校)。如果说在很大程度上,和卓的统治是以智力蒙昧和完全无力提供一个稳定的

政治环境为其特点的话,事实上至少到十八世纪中叶,喀什噶里亚诸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还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一种脆弱的联系。虽然喀什噶里亚地区的语言基本上是由一种从喀喇汗朝时期的可汗语言衍生而来的突厥语(现代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方言即渊源于此),但是阿拉伯语自然是他们的宗教语言,与此同时,波斯文的知识肯定也如同在邻近的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人中间一样,在喀什噶里亚的上层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例如哈司刺·马黑杜米·艾札木以及他的后裔的圣徒传记,就是用波斯文写成的。甚至在1758—1759年满清征服之后,喀什噶里亚的突厥人还继续期待在西方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除了更迫切的动机之外,阿古柏在1867年控制喀什噶里亚地区的最初目的之一,就是谋求与奥斯曼帝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恢复喀什噶里亚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

第十章 哈萨克与乞尔吉思

140 在蒙古帝国创立时，术赤之子，拔都之弟昔班得到了从乌拉尔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广阔领土作为他的封地。在十四世纪，这片兀鲁思与位于萨雷苏河和阿拉套山脉之间的白帐部落草原相接壤。从脱脱迷失统治时期开始，白帐部落诸汗开始成为金帐汗国的统治者，而且在1380年，他们的兀鲁思也转移到了南俄草原。当1391年帖木儿越过阿拉套草原时，阿拉套草原被一些出自突厥和蒙古等不同来源的昔班朝部落占领了。这些部落都说突厥语，而且当时他们就已经具有了“乌兹别克”这一共同名称。十五世纪初期，这些游牧部落占领了现代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东部，有西蒙古的卫拉特帝国，而在七河地区南部，则有莫谿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的领土，位于乌兹别克人的南部，在他们的西南是那海部落，那海部落散布在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与四邻之间的斗争始终在哈萨克诸帐的历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1428年，昔班的后裔阿不勒海尔汗成功地联合起了位于乌拉尔河、锡尔河、莫谿勒斯坦以及托博尔河之间的全部游牧部落，成为昔班王朝兀鲁思（也以“乌兹别克汗国”知名）的最高首领。作为一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阿不勒海尔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试图袭
141 击他的南邻帖木儿帝国。1430年，帖木儿帝国的内部斗争摧毁了

伟大的帖木儿的后裔，阿不勒海尔借此机会向帖木儿帝国发起进攻，占领了花刺子模的部分地区，而且劫掠了玉龙杰赤古城。1447年，阿不勒海尔从帖木儿帝国手中夺取了锡尔河地区。锡尔河地区至关重要，它被恰当地看作征服河中地区的关键，而且这里繁荣的城市，也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与来自大河彼岸南方的定居居民之间的商品交换，提供了重要的市场。阿不勒海尔将锡尔河地区诸城之一的昔格纳黑城作为他的首都。在阿不勒海尔统治的高峰时期，他的帝国一直从锡尔河扩展到了西伯利亚森林。在西伯利亚森林地区，另一位昔班朝王子亦巴黑，建立了亦必儿汗国联盟。

阿不勒海尔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力图要建立一个某种类似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反过来说，这种制度实际上意味着打碎阿不勒海尔的封臣——即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首领们的半独立地位。对于一个定居的社会，或者正在走向定居道路的社会来说，这样一个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当企图要在一个完全游牧的社会中施行这种制度时，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两位出自术赤后裔的王子，克列与札你别率领着相当多的部族，从帝国中分裂了出来，向莫谿勒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寻求保护。这些持异议的部族接受了“哈萨克人”的称号。阿不勒海尔的力量被这种大量的反叛活动削弱了，但是在1456—1457年，他又不得不面临着卫拉特帝国的袭击。卫拉特帝国曾经抵抗过中亚的穆斯林势力，对于阿不勒海尔来说，它是一个最难战胜的对手。卫拉特帝国位于西蒙古地区，创建于十五世纪初期。在也先(1439—1456年)与他的儿子阿马桑赤(1456—1458年)统治时期，卫拉特经历了一段强大无比的时期，在1449年，卫拉特的部队曾经打败并俘虏了明朝皇帝英

宗,而且包围了北京。

卫拉特人的这些胜利,使人回想起成吉思汗那史诗般的生涯的初期,同时它也预示着哈萨克草原游牧部落的暗淡前景。1450年,信奉佛教的卫拉特人向穆斯林草原方向发起了第一次入侵。此后,这种入侵活动不断定期重演。卫拉特人以极端的残暴行为来进行他们的入侵活动,有时他们的入侵也带有真正的宗教战争¹⁴²的性质。1456—1457年,卫拉特人深入哈萨克草原,给了阿不勒海尔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对于乌兹别克帝国来说,这次打击是一次无可弥补的灾难。锡尔河地区遭到了卫拉特人的彻底蹂躏,在这次打击之后,阿不勒海尔的领土再也没有能够恢复。

不久之后,克列汗和札你别汗与他们的哈萨克部族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有利形势。卫拉特部落离开之后,哈萨克人大批地返回了哈萨克草原,1468年,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哈萨克人击败并且杀死了阿不勒海尔,一直打到了锡尔河北部。阿不勒海尔的儿子沙黑·海答尔也在同一年被莫谿勒斯坦的羽奴思汗所杀。昔班家族只有阿不勒海尔的年轻的孙子麻哈没的·昔班尼幸存了下来。麻哈没的·昔班尼许多年来一直过着盗匪生活,后来他领头纠合起了一帮人。1500年,麻哈没的·昔班尼率领他的人马入侵了河中地区,而且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麻哈没的·昔班尼在帖木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最后一个伟大的突厥斯坦帝国——乌兹别克汗国,他的家族对乌兹别克汗国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乌兹别克汗国将是一个最厉害的对手。

昔班部族迁移进了突厥斯坦的结果,在锡尔河北部草原留下

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一地带很快就被哈萨克部族充塞了。哈萨克部族最初跟随克列和札你别进入了莫谿勒斯坦，现在他们又返回了自己的家园。在克列的儿子布鲁杜克汗统治时期(1488—1509年)，特别是在札你别的儿子哈斯木统治时期(1509—1518年)，哈萨克部落迅速扩张，遍及了阿不勒海尔汗国的领土。从这时起，“哈萨克”与“乌兹别克”这两个词具有了新的涵义，所谓“哈萨克”是指那些仍然留在锡尔河北部的部落，而“乌兹别克”则是指那些追随麻哈没的·昔班尼，在锡尔河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部落。但是，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二者都是从古代同一部族中衍生出来的。

在哈斯木汗的统治下，哈萨克帝国保持了它的团结和强大，当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有二十多万骑兵用来参加战斗。哈萨克帝国的国力是如此强盛，以至于在十六世纪期间一直长期衰落不振的 143 卫拉特人，对它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危险了。与这种情况相同，甚至更为明显的是，被内部斗争削弱的那海部落以及在莫谿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国，此后也逐渐虚弱，不足以与哈萨克草原勇武善战的部落相匹敌了。鉴于这种形势，哈萨克人得以享有了一个世纪的繁荣和相对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趁机将自己的疆域向南方扩张。紧接着，为了争夺对锡尔河地区诸城市的所有权，哈萨克人与突厥斯坦的昔班王朝在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一般说来，虽然哈萨克人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接近他们征服突厥斯坦的目标。

事实上，由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总是带有易于瓦解的性质。在这个国家之上，有一个（在以后的年月里，则有几个）成吉思汗的后裔来作“汗”，汗位是一种世袭的位置，

除了通常的竞争之外，汗位是由选举而加以确认的。与此同时，国家日常的权力却集中在诸汗名义上的封臣——诸苏丹的手中，这些苏丹往往是一些重要部落的首领。实际上，山部落再加以划分的，以匈和巴秃尔为首的氏族保持着实际上的自主权。哈萨克人没有常备军，只有民间征募的军队。伊斯兰教对于这种游牧社会仅仅是产生了一些表面的影响。

当哈斯木汗去世之后，统一的哈萨克国家的分裂迹象就变得很明显了。中央集权的哈萨克汗国分裂成了三个独立的汗国或“帐”，这三个汗国都是由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汗”来统治的，它们分别是七河地区的“大玉兹”(Ulu Zhuz)，中部草原地区的“中玉兹”(Orta Zhuz)，以及位于三个汗国最西部，乌拉尔河以东地区的“小玉兹”(Kishi Zhuz)。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哈萨克草原经历了一个动乱而无益的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是由哈斯木汗的儿子们，谟麻什(1518—1523年)、塔赫尔(1523—1533年)以及不答什(1533—1538年)发动的，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突厥斯坦的昔班王朝以及莫谿勒斯坦诸汗。1538年，哈斯木汗的最后一个儿子哈克·纳咱尔(1538—1580年)重新统一了哈萨克三帐，他甚至将权力扩张到了那海国家的部分地区。哈克·纳咱尔还成功地领导了144次对布哈拉昔班王朝的远征，而且在1579年占领了塔什干。在特夫克勒汗统治时期(1586—1598年)，哈萨克人继续向南方深入，特夫克勒汗再次占领了塔什干，而且此后又攻占了牙昔和撒马尔罕，但是在1598年，特夫克勒汗被阻于布哈拉城外。特夫克勒汗的继承者们——艾斯木(1598—1628年)、江格尔，最后是头克汗(1680—1718年)，继承了特夫克勒汗占领河中地区的肥沃土地的愿望，继续

与阿斯特拉罕朝(即札尼朝)战斗,并且间或取得了一些胜利。阿斯特拉罕朝是在1599年继昔班王朝之后,成了布哈拉的新主人。头克汗是统一的哈萨克国家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作为一名武士、行政官员和法学家,他的法典(Jety Zhargy)推动了游牧民族的习惯法(adat)向成文法的转变。

但是到这时,哈萨克人受到了自从十七世纪初期以来就日益增长的一场巨大灾难的威胁。在阿勒坦汗(1543—1583年)的统治下重新统一而且逐渐强盛起来的东蒙古部落曾经挫败了卫拉特人,但是现在卫拉特人又开始向西方发展了。十七世纪初期,卫拉特诸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落进入了哈萨克人的领土。土尔扈特部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0,000帐。土尔扈特人在和鄂尔勒克汗的率领下,由东北而西南,穿过了威海、里海北部地区。留在这一举族迁徙的人们背后的,是一条横贯草原的血路。当土尔扈特人最终在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立脚之前,他们在迁徙途中曾经与恩巴河附近的哈萨克小玉兹以及阿斯特拉罕附近的那海部落发生过战斗。后来,土尔扈特人在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建立了一个以卡尔梅克部落知名的强大的游牧国家。1603年,这些卡尔梅克人劫掠了希瓦汗国,1639年,他们又征服了曼格什拉克的土库曼人。而卡尔梅克的阿玉奇汗(1670—1724年)则成了俄国名义上的封臣。俄国人鼓动这些信奉佛教的武士反对全部都是穆斯林信徒的克里米亚汗国、巴失吉儿人以及那海部落。

卡尔梅克部落在哈萨克草原地区的西南边境建立政权,对哈萨克诸帐的后方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大约与此同时,在哈萨克草原东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地区,另一个卫拉特政权也正在形成之

中。这个政权的建立者是绰罗斯部落的巴图尔洪台吉。在与成吉思汗的戎马生涯相距了四个世纪之后，巴图尔试图重振蒙古帝国的雄风。在巴图尔洪台吉统治时期，卫拉特人开始深入哈萨克草原，¹⁴⁵进行破坏性的袭击。虽然这些袭击最初仅仅是一些旨在窃取牲畜的掠夺性远征，但是它也是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的预兆，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哈萨克人民都死于这场灾难。1643年，巴图尔洪台吉领导了一次伟大的远征，进入并占领了七河地区，而且迫使大多数大玉兹部落的氏族向他臣服。1653年巴图尔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力强加在了全部卫拉特部落之上，而且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广袤的帝国。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卫拉特帝国的军事机器是使人惊叹不置的。噶尔丹当时拥有100,000纪律严格的部队。噶尔丹的目的是使自己成为整个中亚的统治者，而且他也几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取代了东突厥斯坦最后的察合台统治者，在1678年和1680年之间强占了喀什噶里亚，使喀什噶里亚成为自己的保护国，而且在1681年兼并了吐鲁番和哈密，最终吞并了全部残存的莫谿勒汗国的领土。与此同时，在1681年与1695年之间，卫拉特军队还大批入侵了锡尔河地区，攻占并抢劫了塔什干北部的赛夷城。但是，噶尔丹的野心主要是在东方，当1688年卫拉特人战胜了喀尔喀蒙古人，而且在东蒙古落脚之后，噶尔丹终于如愿以偿了。1690年，噶尔丹努力效仿成吉思汗的成就，进攻中国的满清帝国，但是耶稣会士为康熙皇帝制造的大炮，彻底地决定了卫拉特人的结局，这些被击败的游牧人仓惶而逃，进入了蒙古草原。

在被满清政府击败之后，卫拉特人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

的西邻。在噶尔丹的侄子和继承人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1697—1727年),哈萨克草原的历史揭开了真正黑暗的一章。卫拉特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就安然地袭击了整个哈萨克地区。在哈萨克草原,头克汗的权力已经扩展到了哈萨克全部三个玉兹,尽管头克汗努力进行了抵抗,但是在1698年,卫拉特人开始向巴尔喀什湖方向入侵,1710年,他们又再次侵入哈萨克草原。1716年,一支卫拉特部队离开了伊犁河谷,向七河地区北部进军,此后他们又将兵锋转向西南方向。在1718年春天,这支部队与在巴尔喀什湖东北部阿亚古兹河畔集结起来的哈萨克部落遭遇,在历时三天的战斗中,卫拉特部队打败了哈萨克人。这次战役使进入锡尔河的道路完全洞开。向南方插入的卫拉特人越过了中玉兹的领地,而且在塔什干北部的阿雷西河畔,赢得了对哈萨克人的另一次血腥的胜利。而1723—1725年,卫拉特人的另一次远征则到达了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诸城市如塔什干、牙昔、赛夷等城都落入了卫拉特人的手中,而且遭到了劫掠。在这同时,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为了与他们来自准噶尔的亲族会合,也开始侵入哈萨克草原。在哈萨克历史上,这是一个 *aktaban shubrundy* (巨大的灾难) 的时代,这次灾难本身,在哈萨克的叙事诗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玉兹和中玉兹的一些部落皈依了佛教。另外的哈萨克部落则试图逃跑,进入突厥斯坦的艾弥儿国家,但是他们也被打退,接着又转回西北方向,沿着恩巴河、乌拉尔河、伊列克河和鄂尔河,逃向那些已经处于俄国人控制之下的地区。

面对着威胁他们的致命危险,长期分裂的哈萨克诸部落决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的战线。1728年,在奇姆肯特附近的一次

部落联合大会上，哈萨克人选举了中玉兹汗阿不勒海尔作为哈萨克的最高首领。在同一年，联合起来的哈萨克军队挡住了卫拉特部落前往威海的道路，并且在楚巴尔腾格里湖附近使卫拉特人遭受了他们的第一次失败。次年，在巴尔喀什湖南部的另外一次大战中，哈萨克人又消灭了一支重要的卫拉特部队。但是，这两次胜利并没有能够阻止卫拉特人的远征。此后，卫拉特的远征又持续了二十年。在1740—1742年之间，卫拉特人再一次成功地由东而西，穿越了哈萨克草原，到达了奥尔斯克附近的俄国边界地区。锡尔河流域又经历了一次有计划的掠夺。直到卫拉特帝国在1757年被满清消灭为止，哈萨克才最终摆脱了卫拉特这个可怕的邻人对他们的长期威胁。

为了反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哈萨克人进行了持久而残酷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阻止哈萨克政府或国家出现的主要障碍。

147 更为严重的是，自从十八世纪初期起，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俄国对哈萨克的威胁，但是与卫拉特人的战争使哈萨克汗国支离破碎，疲惫不堪，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于来自西方和北方的俄国的新的危险进行有效的抵抗。

俄国人之进入哈萨克草原，与卫拉特人的袭击情形迥异。俄国人的进展缓慢而无情，而且以建筑堡垒线作为他们进展的标志。这些堡垒是1716年建立的鄂木斯克，1718年建立的塞米巴拉金斯克，1719年建立的乌斯季卡缅诺尔斯克，1732年与1757年之间建立的额尔齐斯河沿岸诸堡垒，1735年建立的奥尔斯克以及1752年与1755年之间在伊希姆河沿岸建立的堡垒。而这时的哈萨克诸汗根本不是力图去反对俄国人，而是一再寻求俄国人的帮助，以反

对卫拉特人。但是他们的这种企图总是落空的。实际上分别在1731年、1740年和1742年，小玉兹、中玉兹以及大玉兹的一部分，都各自接受了俄国的保护。但是就卫拉特人对于哈萨克的威胁而言，俄国人的这种保护却纯粹只是名义上的。

在同卫拉特人的斗争中，哈萨克中玉兹部遭受的损失最小。十八世纪后半叶，中玉兹诸汗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企图重新统一哈萨克草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哈萨克诸部原来的盛况。在这种形势下，中玉兹汗阿不勒海尔将他的权力扩张到了小玉兹和部分大玉兹地区。1737年，阿不勒海尔袭击了巴什基里亚（已经落入俄国人的手中），并且利用纳迪尔沙打败了希瓦汗国的机会，在1740年暂时占领了希瓦，宣布自己为希瓦汗国的统治者。1749年阿不勒海尔死后，他的儿子奴儿阿里袭击了俄国边防哨所。但是到了奴儿阿里的继承人阿布赉汗时，阿布赉试图进一步占有大玉兹部落，由此引起了他与满清政府的冲突。作为卫拉特帝国在准噶尔地区的继承者，满清政府将哈萨克诸汗看作是自己的封臣，1771年，阿布赉汗被迫向满清皇帝宣誓效忠。

到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地区从三面完全被俄国和中国包围了，而在哈萨克的南部边界地区，则受到了突厥斯坦诸艾弥儿国家的威胁。这时的哈萨克地区，已经变成了两块保护领地——哈萨克的西部地区成了俄国的保护领地，而东部则是满清的保护领地。这种状况标志着哈萨克独立地位的最终结束。如果说满清的保护国权力纯属虚构，几乎看不清楚的话，俄国的保护国权力则稳固地转变成了实际的占有。在整个哈萨克三个玉兹中，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的特点是社会动乱，这种动乱采取了诸部落起来造反，反抗

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以及诸汗、诸苏丹政权的形式。例如1792—1797年之间巴秃儿斯里木的大规模叛乱就是如此。事实证明，在这一动乱时期，哈萨克诸汗政权已经失去了生存的能力。当俄国人决定直接进行干涉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俄国人之废除哈萨克诸汗的统治权，是先从中玉兹开始的。中玉兹最后的统治者失儿加兹在1822年被召到了奥伦堡；1824年，小玉兹汗国遭到了镇压；1848年又轮到了大玉兹。对于他们的邻人来说，哈萨克曾是一个难以战胜的对手，但是此后哈萨克部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将是哈萨克部落为求生存而长期斗争的一个历史阶段。

乞尔吉思部落

乞尔吉思部落从前被称作喀喇——乞尔吉思，以区别于当时以乞尔吉思知名的哈萨克人。乞尔吉思部落的历史与他们的哈萨克邻人的历史大相径庭。

乞尔吉思人居住在天山山地中，他们是各种突厥部落，如突骑施和葛逻禄等部落（它们在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就已经蒙古化了）的后裔。这些突厥部落后来同化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尔吉思部落。从久远的中世纪起，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尔吉思人就已经成氏族地渗入了天山，而天山地区则在十三世纪并入了察合台兀鲁思。乞尔吉思人虽然被迫接受了蒙古人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但这几乎没有能够改变他们非常古老的部落社会结构。乞尔吉思人从来不知政治权力独自地集中于首领手中为何事，在乞尔吉思人中，氏族在

传统上是由匈或者长者(manaps)来管理的,而在十八世纪缓慢地进入乞尔吉思社会的伊斯兰教,对他们也只是产生了一些表面的影响。

十四世纪期间,天山地区成了莫谿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在帖木儿的反复入侵中,莫谿勒斯坦遭受了令人惊骇的破坏,但是帖木儿死后,在察合台统治者歪思汗(1428年),也先不花(1434—1462年)以及羽奴思(1462—1468年)统治时期,莫谿勒斯坦很快又重新得到了恢复。除了在哈克·纳咱尔统治的短时期外,甚至在哈萨克汗国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他们也从来没有能够将其统治权扩张到乞尔吉思部落之上。卫拉特帝国的噶尔丹最终消灭了察合台汗国,在1683年与1685年之间,噶尔丹掠夺并且后来又占领了天山地区。此后,有些乞尔吉思部落迁徙到了东突厥斯坦的叶尔羌、和阗和喀什噶尔周围的地区。1702年,卫拉特人又将叶尼塞河流域的乞尔吉思人大部分都迁入了天山地区,以取代原来在这里的乞尔吉思部落。1758年满清政府消灭了卫拉特帝国之后,乞尔吉思部落名义上成了中国的封臣,而且再次得到了他们完全的自主权。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乞尔吉思本土的南部地区——费尔干纳谷地被浩罕汗国征服了,紧接着开始了一段混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乞尔吉思诸部落力图要摆脱突厥斯坦的奴役。

俄国之介入乞尔吉思地区,开始于1855年。1862年,俄国人占有了皮什佩克要塞,并且占领了整个乞尔吉思北部地区。乞尔吉思南部地区也在1867年被吞并,随着浩罕汗国的灭亡,俄国人在1876年占领了阿莱谷地,从而完成了对乞尔吉思地区的征服。此后,乞尔吉思的一部分迁移到了帕米尔和阿富汗。

第十一章 帖木儿帝国与乌兹别克 对河中地区的征服

150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自从成吉思汗帝国分裂之后，直到俄国和中国进入时期的莫翰勒斯坦与哈萨克草原的历史。现在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十四世纪后半叶河中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对帖木儿一生的经历，进行一番追溯。帖木儿的名字已经在上文中不同的地方出现过，帖木儿曾经越过莫翰勒斯坦的边界地区进行掠夺，而且还曾经与金帐汗国脱脱迷失汗的霸权相抗衡。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也最有破坏性的征服者之一。1336年，帖木儿出生于渴石附近的地区，他的父亲塔刺海是巴鲁刺思氏族的一位突厥艾弥儿。塔刺海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且他还是学者们与托钵僧的支持者。与成吉思汗一样，帖木儿的早年生活是率领一帮冒险家和强盗（有时他们也许并不比土匪好多少）度过的，他还赢得了勇敢无畏、足智多谋、聪明睿智的领导者的声誉。在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帖木儿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艾弥儿们和突厥——蒙古察合台部族首领中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强有力的地位。自从蒙古征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艾弥儿与部族首领此前一直在河中地区占据着统治地位。随着察合台统治家族的衰落，河中地区的艾弥儿与察合台部族首领试图通过傀儡汗来统治河中地区，而这些傀儡汗仅仅是因为他们出自成吉思汗的后裔才声名卓著的。到

1369—1370年，虽然帖木儿的统治还没有正式得到承认——这时¹⁵¹的钱币继续以察合台汗的名义铸造，而且“虎土白”(khutba)念的也还是在位的察合台汗的名字——先是速亦儿哈的迷失(1370—1388年)，后来是他的儿子速檀马合谋(1388—1403年)^①——但是帖木儿这时已经成了河中地区实际的统治者。帖木儿将河中地区作为他的广袤的帝国的中心和对他的邻人进行战争的根据地，他残暴地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察合台贵族之上，扫除了一切潜在的对手。在河中地区诸城市中，帖木儿最喜欢撒马尔罕，他将撒马尔罕作为首都，而且将这里的花园和建筑物都装饰一新。亨利三世卡斯提尔的使臣克拉维约曾经描述过这些他在1403年亲眼见到的花园和建筑物。在这些建筑中，得以在后来的动乱中保存下来的古尔艾弥儿陵墓和毕比·亥努姆清真寺，为帖木儿帝国最早时期建筑物的规模和宏伟程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对于一个新的中亚帝国的出现来说，十四世纪后半叶是一个特别适合的时期。这时察合台的兀鲁思已经完全分裂，自从1334年答儿麻失里死后，河中地区就处于混乱状态之中。在秃忽鲁帖木儿(1348—1362/3年)统治下强大的莫翰勒汗国，现在也成了封建的艾弥儿们的牺牲品。在钦察草原，自从札你别死后到脱脱迷失出现这一时期，即1357年至大约1381年之间，金帐汗国也经历了一个同样的激烈纷争的时期。在伊朗地区，自从伊利汗不赛因在1335年死后，他的王朝紧接着就衰落了。呼罗珊地区落入了赫拉特的凯尔特朝统治者手中，与此同时，在西方，从大不里士和巴格

^① 见 V. V. Barthold, *Ulugh-Beg* (巴托尔德《兀鲁伯》), Leiden, 1963, 25.

达起的地区，由充满活力的蒙古札刺亦儿王朝统治，札刺亦儿朝注定将是帖木儿的死敌。而在印度，继承了卑路斯王(1351—1388年)的德里秃忽鲁朝诸苏丹，对于帖木儿来说，则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在十四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帖木儿发现在自己的周围是一些分裂的国家和衰落的王朝，这种情形与将近二百年前成吉思汗遇到的情况倒是不无相似之处。

在这里，要对帖木儿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详细叙述是不可能的，但是下列帖木儿的战役表，可以说明帖木儿在从事征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活力和组织能力。

152 大约 1370—80年：巩固河中地区时期。在莫谿勒斯坦和花刺子模发动战争。

1380—82年：入侵呼罗珊，攻克赫拉特。

1383年：在呼罗珊和锡斯坦发动战争。

1384—85年：在呼罗珊西部、马咱达兰和伊朗西部发动战争。攻克赖依和苏丹尼耶。

1386—88年：在罗利斯坦、阿塞拜疆、谷儿只、安那托利亚东部以及法尔斯发动战争。掠夺了伊斯法罕，进入设拉子(1387年)。

1388—91年：发动战争对抗金帐汗国。掠夺玉龙杰赤(1388年)。

1392—94年：在法尔斯、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和谷儿只发动战争。进入巴格达(1393年)。

1395年：再次发动战争，对抗金帐汗国。

1398—99年：入侵印度北部，掠夺德里(1398年)。

1399—1401年：发动战争，反对谷儿只、札刺亦儿朝和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攻占锡瓦斯和阿勒颇(1400年)。掠夺大马士革与巴格达(1401年)。

1402年：在安卡拉打败并且俘虏了奥斯曼苏丹巴牙即忒一世。掠夺了布尔萨与伊兹密尔。

1404—05年：计划入侵中国。帖木儿去世(1405年)。

通过这样一个直观的系年表，几乎无法反映出帖木儿在这些战役中表现出的杰出的军事天才思想或者他在这些战役中所干的空前的暴行^①。很明显，帖木儿的野心是要重建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的帝国，而在腹地亚洲的部落中，还仍然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帝国的生动的回忆。从帖木儿发动战争的手段，在战场上实行的战术以及他所指挥的部队的构成等方面来看，帖木儿都更象一个十三世纪的蒙古征服者，而不象一个当时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明显地竭力强调自己与成吉思汗后裔的关系。在与察合台汗合赞汗的一个女儿结婚之后，帖木儿得到了“駙马”的称号，这一称号出现在帖木儿的钱币上，而且将他与出自成吉思汗后裔的察合台政权联系了起来。而帖木儿与莫谿勒斯坦的统治者，黑的儿火者的女儿的另一次婚姻，则进一步加强了他与成吉思汗后裔的联系。然而 153 在帖木儿的一生中，存在着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帖木儿是作为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军队的领导者和操纵者，完成了他的征服——游牧和半游牧部落的军队对于中亚诸帝国来说，是一个永远的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帖木儿本人也成了伊朗——伊斯兰文明对突厥——蒙古民族影响的范例(随着帖木儿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如果说对于在设拉子、赫拉特或者巴格达等地的受到帖木儿迫害的人们来说，帖木儿是一个野蛮的“鞑靼”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又是一位严谨的逊尼派穆斯林，一位教长们和

^① J. Aubin, 'Comment Tamerlan prenait les villes' (贵宾《帖木儿是怎样夺取城市的》), *Studia Islamica*, XIX, 1963.

托钵僧的慷慨的赞助者，一位伊朗艺术和文学的保护人，而且这位保护人对伊朗城市生活也甘之如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的宫廷（象克拉维约所描述的那样），与准噶尔和七河地区那些地方豪强的营地是截然不同的，帖木儿的宫廷是伊朗得以迅速驯服它的这位最野蛮的征服者的一种手段。

与成吉思汗相比，帖木儿是一位更有教养，但是却极少决断的人物。如果说作为一位武士和武士的领袖，帖木儿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帝国的创建者，他缺乏伟大的蒙古征服者的明晰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正象在帖木儿的帝国内看不出一种世界秩序的眼光一样——这种世界秩序的眼光，是从“札撒”的颁布中设想出来的——在帖木儿发动的那些战役中不存在明显的战略格局，而且他对战役的安排也没有一种长远的考虑。帖木儿的征服，根本就没有能够象成吉思汗的征服活动的结果那样，扩大对于更广大的世界知识的了解，甚至经济动机在帖木儿的征服中也是无足轻重的。当1405年帖木儿在讹答刺死后，帖木儿帝国的分裂局面几乎立刻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帖木儿没有象成吉思汗那样，颁布指定继承人的命令，以保持他的征服地区的完整。自从帖木儿帝国迅速分化为许多独立的王国之后，那些日渐增多的小诸侯们（他们都是帖木儿的后裔），为了帖木儿遗留下来的一点遗产而相互征战不休。

在帖木儿的四个儿子中，只罕杰尔、兀麻尔·沙黑以及米兰沙都先于其父而死，所以尽管遭到了帖木儿的孙子们的反对，王位还是传给了帖木儿的第四子沙哈鲁。在经历了帖木儿几乎无休止的154 征战之后，沙哈鲁的长期统治（1405—1447年）标志着帖木儿帝国

历史上一个巩固和相对稳定的时期。作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和伊朗文化的热情崇拜者，沙哈鲁将帖木儿的中亚帝国变成了一个以呼罗珊地区为中心的，正统的伊斯兰苏丹政权。赫拉特取代了撒马尔罕的地位，成了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河中地区也成了沙哈鲁之子兀鲁伯管辖的地区。沙哈鲁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伊朗西部地区，这里是帖木儿帝国的安全受到最明显的威胁的地区。随着札刺亦儿王朝的灭亡，在伊朗西部地区，尤其是在阿塞拜疆，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真空地带。在十五世纪期间，这一地带相继被两支强大的奥斯曼军事联盟所填补，他们是札刺亦儿朝原来的封臣，来自凡湖东北的喀喇裕云鲁朝以及此后来自迪亚尔巴克儿地区的阿克裕云鲁朝。在与喀喇裕云鲁朝的斗争中，沙哈鲁并没有取得多少显著的胜利，而且到沙哈鲁去世的时候，伊朗西部地区已经不再被算作是帖木儿帝国的一个部分了^①。但是在帖木儿帝国其他的属地上，沙哈鲁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宠爱的妻子高赫尔沙的帮助下，沙哈鲁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和精力，用于保护艺术家和作家，支持宗教界，提供宗教捐助，建筑圣陵、清真寺以及伊斯兰教神学院（madrasesh）。在赫拉特、塔雅巴德、托尔巴特谢赫贾姆、哈儿只提和马什哈德等地遗留下来的帖木儿帝国早期建筑，就是沙哈鲁统治时期的精美的建筑风格的代表。在沙哈鲁的后

^① 关于十五世纪的伊朗，见 V. Minorsky, 'Le Perse au XVe siècle entre la Turquie et Venise'（米诺尔斯基《介于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十五世纪的波斯》），Société des études iraniennes et de l'art Persan, X\III, Paris, 1933; idem, 'La Perse au XVe siècle'（同著者《十五世纪的波斯》），Serie Orientale Roma, XVII, Roma, 1958; R.M. Savory,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in Persia after the death of Timur'（萨沃里《帖木儿死后在波斯争夺霸权的斗争》），Der Islam, 1964.

裔中，阿斯塔拉巴德的伯升裕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藏书家之一，伯升裕儿对书画很有鉴赏能力，他还是书法家和画家的赞助人。与此同时，河中地区总督兀鲁伯在其任期内，对于他的天文表的编辑和位于撒马尔罕的天文台的建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沙哈鲁之死，标志着争夺空缺王位的一系列激烈斗争的开始。在1447年到1449年之间，兀鲁伯是帖木儿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但是兀鲁伯受到了他的对手们或者潜在的对手们的威胁，在这些对手中，也包括兀鲁伯自己的儿子阿布德·刺迪甫在内。兀鲁伯与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布德·阿昔思之死，肯定都与阿布德·刺迪甫有关。此后不久，阿布德·刺迪甫就被他的侄儿，沙哈鲁的另一
155 个孙子阿不都刺谋杀了。但是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后来又推翻了阿不都刺的统治。虽然卜撒因统治时期(1451--1469年)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叛乱的时期，但是卜撒因在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统治，构成了帖木儿帝国在中亚统治史上的第二个相对稳定阶段。作为帖木儿家族中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卜撒因竭力仿效帖木儿和沙哈鲁，以慷慨大方的气度对待托钵僧阶层，尤其是对纳合昔班底教团进行了保护。到卜撒因统治的末期，他对于在西方的阿克裕云鲁朝的崛起日益不安，决定恢复帖木儿帝国对阿塞拜疆的统治权。卜撒因在阿塞拜疆被乌宗哈散(1466—1478年)俘虏，乌宗哈散将卜撒因移交给了高赫儿沙的一个儿子，后者因为卜撒因曾在1457年处死了他的母亲，为了复仇，杀死了卜撒因。

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仅有的一位才能超群的帖木儿帝国统治者是著名的胡赛因·拜卡刺苏丹(除了巴布尔之外)，胡赛因·拜卡刺是兀麻尔·沙黑的一位伟大的孙子。胡赛因·拜卡刺

曾经君临花刺子模和戈尔甘,而且最终征服了呼罗珊。在1470年到1506年之间,胡赛因·拜卡刺一直统治着赫拉特。德里未来的征服者巴布尔,曾经详细地叙述了胡赛因·拜卡刺其人以及他的宫廷,巴布尔将胡赛因·拜卡刺描绘为一个“斜眼、狮身,自腰以下很纤弱的人^①”。最初,胡赛因·拜卡刺对什叶教派似乎怀有好感,但是后来他成了一位正统的逊尼派教徒。然而胡赛因·拜卡刺却从不斋戒,而且根据巴布尔记载,每天中午祈祷之后他都要饮酒。作为一名杰出的战士,胡赛因·拜卡刺在他的王朝中享有最伟大的剑客的声音,而且他还爱好所有的运动——斗羊、斗鸡、飞鸽等等。与十五世纪后期的赫拉特市民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赫拉特市民追求享乐、放荡淫逸,其实有一位如此世俗的统治者以及他所提倡的那种社会生活风气,当时的人们有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伊朗和中亚的历史上,胡赛因·拜卡刺苏丹的重要性依赖于他的宫廷在文化方面的意义。在胡赛因·拜卡刺的宫廷里,聚集了音乐家、诗人、画家和学者,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极为优厚的礼遇。伊朗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札米,就生活在胡赛因·拜卡刺的保护之下。许多身份较低的诗人,历史学家们,如密儿哈完迪、宽答米儿以及伊朗最著名的《诗人传记》的作者倒刺沙,还有较¹⁵⁶之其他任何个人,都更为克尽职地将察合台突厥文改造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段的米尔·阿里·失儿·纳歪等人,也都受到了同样的保护。作为帖木儿帝国后期文学成就的补充,是它在观赏艺术方面的造诣,在赫拉特和巴尔赫,那些从十五世纪后半叶保留下来

^① 贝德里吉上引书,第1卷,第258页。

的,犹如凤毛麟角的建筑物,表现出了一种带有装饰效果的高雅情趣。我们可以在比札迪和全部赫拉特学派以袖珍画像为特色的那些精湛细微的手法中,在那些书法与书籍装帧的辅助技能当中,发现与建筑物极为相似的装饰效果。提到胡赛因·拜卡刺的统治时期,巴布尔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凡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还没有见过象胡赛因·米尔咱苏丹统治下的赫拉特那样的城市^①”。巴布尔恋情依依地回顾了这个时代,他写道:“胡赛因·米尔咱苏丹的时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这时在呼罗珊,首先是在赫拉特,博学多才,举世无匹的人物济济一堂。一个人不管所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他都希望并且力争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②”。

在胡赛因·拜卡刺的统治之下,赫拉特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是与此同时,河中地区却成了帖木儿遗留的后代之间频繁斗争的场所。这些帖木儿的后裔分为两个系统,其一为渊源于巴布尔的祖父卜撒因的帖木儿系,另一个系统则是由巴布尔的外祖父羽奴思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系。在这些相互斗争的帖木儿后裔中,也包括巴布尔本人在内。在巴布尔和他的侄儿们为了争夺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的王位而斗争的同时,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强国,这就是麻哈没的·昔班尼统治下的乌兹别克国家。昔班尼是不幸的阿不勒海尔的孙子,作为阿不

① 贝维里吉上引书,第1卷,第300页。

② 贝维里吉上引书,第1卷,第283页。有关一位特别的帖木儿统治者米尔咱·亦思干答儿·本·兀麻尔·沙黑对学者的保护,奥宾作了详尽的叙述,见 J. Aubin, 'Le mécénat timouride à Chiraz' (奥宾《帖木儿对设拉子文学艺术的资助》), *Studia Islamica*, VIII, 1957。关于撒马尔罕的兀鲁伯对天文学研究的贡献,赛义里曾经作过充分的讨论,见 A. Sayili, *The Observatory in Islam* (赛义里《伊斯兰天文台》), Ankara, 1960, 259—89。

勒海尔的子孙,他与巴布尔一样,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麻哈没的·昔班尼大约出生于1451年,在1468—1469年时,由于他的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昔班尼失去了保护,被孤苦零丁地留在了世上。他被迫从事盗匪生涯,最后又投身于统治莫谿勒斯坦的马哈木·本·羽奴思汗麾下效力。在阿不勒海尔去世的时候,乌兹别克部落就已经分裂了,但是昔班尼很快就威名大振,使自己成了战无不胜的乌兹别克部落的首领。他逐个地夺取了帖木儿最初征服留下来的全部小封邑。而末代帖木儿帝国的诸侯们则深深地陷入了相互之间的斗争之中,以至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来反对篡位者。胡赛因·拜卡刺是一位尚有力量粉碎麻哈没的·昔班尼的统治者,但是胡赛因·拜卡刺拒绝帮助他的受到威胁的亲属。所以到了1500年,麻哈没的·昔班尼已经成了河中地区无可争议的主人,在这一年里,他攻克了布哈拉、合儿昔和撒马尔罕。此后,巴布尔夺取了合儿昔和撒马尔罕,暂时遏止了麻哈没的·昔班尼的扩张势头,但是巴布尔没有能够将乌兹别克人从布哈拉赶出去,麻哈没的·昔班尼从布哈拉发起反攻,在撒里库尔的一次恶战中击溃了巴布尔。随着河中地区再次落入乌兹别克人的手中,麻哈没的·昔班尼扩大了他的征服范围,甚至进一步攻克了巴尔赫和昆杜兹,与此同时,昔班尼还击败了自己原来的保护人马哈木,而且将后者赶到了塔什干和费尔干纳河谷。在1505—1506年期间,昔班尼又占领了胡赛因·拜卡刺的属地花刺子模。

昔班尼对花刺子模的进攻,表明他随时都准备与最后残留的帖木儿帝国的傲慢的统治者一比高下。但是在1506年5月,胡赛因·拜卡刺苏丹去世了,他的两个孱弱无能的儿子很快在赫拉特

建立了一个共管政权。巴布尔这时正在阿富汗（巴达赫尚，1503年；喀布尔，1504年；坎大哈，1507年）忙于建立自己的新公国，为了帮助自己的亲属反对迫近的乌兹别克人的攻击，巴布尔迅速赶到了赫拉特。但是巴布尔发现，在这里他自己显然也无能为力，他认为要进行长期的抵抗是不可能的，于是巴布尔令人作呕地撤走了，他还引用了萨尔底的名言：十个苦修士可以睡在一块毛毡下，但是两个国王不能共有一个国家。麻哈没的·昔班尼实际上没有遇到反抗就开进了赫拉特。在赫拉特，昔班尼得到了前王朝积聚的大量财宝。但是一旦昔班尼占有了赫拉特城之后，他就表现得异常的宽宏大量了，这也许是因为昔班尼希望，作为一位有气量的征服者以及文化事业的资助人，他在这方面要胜过已故苏丹。如果巴布尔的记载可信的话，昔班尼甚至试图在绘画方面对比札迪进行指导。

喀布尔现在成了帖木儿后裔的最后藏身之地。当麻哈没的·昔班尼向南一直推进到了远至坎大哈时，统治坎大哈的阿尔浑王朝闻风而逃，看来昔班尼好象肯定要占领喀布尔，甚至进入印度。¹⁵⁸但是昔班尼的征服异常迅猛，这就要求他有一个喘息的间歇，以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而且这时在锡尔河彼岸，在布鲁杜克汗（1488—1509年）和哈斯木汗（1509—1518年）统治下日益强大的哈萨克人，对河中地区构成了经常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伊朗，萨法维王朝的缔造者沙·亦思马因（1502—1524年）的崛起，则更进一步使局势趋于复杂化。麻哈没的·昔班尼对赫拉特的征服，使呼罗珊暴露在了乌兹别克入侵者面前，他们不久就掳掠了马什哈德、托尔巴特、谢赫贾姆、你沙不尔、萨卜则瓦尔，甚至达姆甘和克尔曼。事实上自

从帖木儿帝国崩溃以来，伊朗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就象早期来自伊朗北方的人侵者那样，现在似乎很可能要由乌兹别克人来迅速地填充这一真空地带了。

很明显，沙·亦思马因既不能默许在没有经过斗争的情况下，就白白丧失呼罗珊地区及其富足的城市，也不会不顾自己的声望遭受到重大损失，允许一支敌军在他的领土内向西进入到远至达姆甘或者向南进入到远至克尔曼地区。昔班尼与亦思马因这两位伟大的战士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已经足够激烈了，但是教派分歧的对立，又在他们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种狂热野蛮的因素。沙·亦思马因表现出了爱尔代比勒的教长们的什叶派教徒的热情，而麻哈没的·昔班尼及其他的乌兹别克人则是坚定的逊尼派教徒。1510年，沙·亦思马因进入了呼罗珊，而且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马什哈德。在此前的几个月中，麻哈没的·昔班尼的活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他似乎很可能在这时对哈萨克人发动了一次迅疾而成功的战役。紧接着，由他的儿子指挥了另一次对哈萨克的战争，而这次战争则以灾难性的结果而告终^①。由于乌兹别克人受挫于哈萨克，所以麻哈没的·昔班尼很可能是率领着一支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部队来迎战沙·亦思马因。双方部队于同年11月在木鹿附近相遇，经过激烈的战斗，麻哈没的·昔班尼兵败被杀。沙·亦思马因下令将昔班尼的头颅嵌上金子，做成了酒杯，而他的头皮则

^① 关于麻哈没的·昔班尼最后战役的两种意见，见 N. Elias, 'An Apocryphal Inscription in Khorasan' (伊莱亚斯《呼罗珊的一件伪造的铭文》), JRAS, 1896; H. Beveridge, 'Note on the Panjmana Inscription' (贝维里吉《潘吉马纳铭文鉴别》), JRAS, 1896。有关伊朗方面，见 G. Sarwar, History of Shah Ismai'il Sa-fawi (萨瓦尔《沙·亦思马因·萨法维史》), Aligarh, 1939。

被实以稻草,送给了奥斯曼苏丹巴牙即忒二世(或者根据另一种说法,是送给了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巴牙即忒二世是乌兹别克人反对萨法维王朝的名义上的同盟者。位于木鹿的头颅金字塔,就是为了纪念沙·亦思马因的胜利而建造的。

159 这就是麻哈没的·昔班尼的结局。以中亚征服者们的伟大传统来看,他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昔班尼还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多才多艺的人,为了使他的儿子和军队从中受益,他用本民族的察合台突厥文写下了伊斯兰教的训词,而且他还可以用察合台突厥文创作优秀的诗歌。昔班尼也懂得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他甚至还用波斯文写了一些不怎么高明的诗。在远征途中,他经常随身带着一个“流动图书馆”。虽然帖木儿的后裔们认为昔班尼是个野蛮人,但是在昔班尼身边无疑有一批诗人、学者和神学家。就神学家而言,昔班尼的宫廷是那些来自伊朗的,为了逃避什叶派的迫害而寻求庇护的逊尼派宗教学者的自然避难所。

沙·亦思马因进入呼罗珊而且取得了在木鹿的胜利之后,他又占领了赫拉特和巴尔赫,再次使阿姆河成为伊朗的边界。与此同时,现在已经成为沙·亦思马因汗盟友的巴布尔也迅速从喀布尔北上,渡过了阿姆河,向合儿昔、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胜利进军,陷入混乱的乌兹别克人很快就从这些地区撤退了。1511年,巴布尔受到了撒马尔罕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对再次有一位伟大的帖木儿的后代来作他们的统治者而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巴布尔的保护人是萨法维王朝,所以萨法维朝的什叶派部队也随着巴布尔进入了河中地区,这样,巴布尔的威望很快就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当时由两位精力旺盛的指挥官,札你别与兀拜都刺

(麻哈没的·昔班尼的堂兄和侄儿)领导的乌兹别克人,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起了反攻。兀拜都刺率领大约 3000 人的部队向布哈拉进军,巴布尔立即统帅一支大军开出撒马尔罕,迎战兀拜都刺。在巴布尔的追击下,兀拜都刺撤退了。但是在忽里蔑力克地区,兀拜都刺扭转了绝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1512年)。巴布尔在撒马尔罕统治了仅仅八个月,现在他放弃了撒马尔罕,逃往希撒尔,向沙·亦思马因求援。由亦思马因的大将艾弥儿牙儿·阿合马·忽札尼指挥的一支 60000 人的伊朗军队加入了巴布尔的行列,巴布尔轻而易举地再次攻克了合儿昔,并且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在合儿昔进行了大屠杀(包括兀拜都刺的一个堂兄)。此后,联盟军的指挥者决定在进军撒马尔罕之前,先包围伽只迪万要塞,该要塞内只有一支很小的乌兹别克驻军。兀拜都刺与札儿别调集了大批军队前往伽只迪万解围,在要塞附近的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乌兹别克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艾弥儿牙儿·阿合马·忽札尼被俘,并且遵照兀拜都刺的命令被处以死刑,巴布尔则撤退到了喀布尔,再也没有能够重返河中地区。在帖木儿的后裔与萨法维王朝反对乌兹别克人的这些战争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敌对行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两派之间的敌意是如此之深,甚至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秃忽刺(他是一位逊尼派教徒,但也是巴布尔的堂兄,而且他对乌兹别克人并无好感)也将伽只迪万战役说成是“伊斯兰教的利爪,扭坏了异教徒与不信教的魔掌,胜利证实了真正的信仰。伊斯兰教胜利的狂飙,吹落了分裂者的旗帜^①”。

^① N. Elias and E. Denison Ross, A History of Monghuls of Central Asia (伊莱亚斯与德尼森·罗斯《中亚莫翰勒人史》), 261.

1526年,在巴尼伯德的第一次战役中,巴布尔开始成为印度北部的统治者,由此奠定了莫卧儿帝国的基础。巴布尔的后代对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了1739年,而作为德里的君主,则一直存在到了1857年。在巴布尔入侵印度之后至少两个世纪中,通过来自兴都库什山北部,希望在印度寻求财富和名望的武士、官吏、学者、艺术家、冒险家以及避难者等渠道,德里朝廷一直与中亚诸朝廷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1530年巴布尔死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希望恢复他们祖先的遗产,而且一直不经意地尝试着要重新获取大山以北他们失去的土地。为了保卫西北边界不遭受乌兹别克人和萨法维王朝这两个不安定的邻人的骚扰以及出于对有一天乌兹别克人会冒险入侵印度的担心,使得莫卧儿帝国有必要控制阿富汗中部山脉以及兴都库什山北部的商路通道,以保证兵员、马匹供应的畅通。对于一个位于印度,而且统治着占其人口多数的异教的印度臣民的外来穆斯林王朝而言,它生存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兵员和马匹的补充。

然而,这种梦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巴尼伯德战役以后,巴布尔将全部精力用于巩固他对北印度的征服。巴布尔非常明智,他没有冒险与兀拜都刺再次发生冲突。而他的儿子胡马雍也只是能够勉强维持父亲帝国的完整而已^①。至于阿克巴(1556—1605年),则

① 现有的权威著作作为 W. Erskine, *A History of India under the two first Sovereigns of the House of Taimur, Baber and Humayun* (厄斯金《两位帖木儿家族的最初君主——巴布尔、胡马雍统治下的印度史》), London, 1854. 拉什布鲁克·威廉斯和沃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研究。见 L. F. Rushbrook Williams, *An Empire Build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拉什布鲁克·威廉斯《十六世纪的帝国创建者》), London, 1918; R. C. Varma, "The Great Mughal and Transoxiana" (沃麦《大莫卧儿与河中地区》), *Islamic Quarterly*, 1955.

更是全力投入他在印度的战争和行政管理。在阿克巴统治时期，河中地区正是在昔班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阿不都刺二世（1583—1598年）的统治之下，阿不都刺从巴达赫尚和吐火罗斯坦驱逐了阿克巴的帖木儿家族的亲属。人们认为阿克巴预计到乌兹别克人会袭击喀布尔和旁遮普，所以他在1585年和1598年之间停留在了北印度^①。阿克巴的儿子是只罕杰尔，可能是由于太懒惰的缘故，只罕杰尔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在自己的西北疆界之外进行战争。但是，武力的荣耀对于沙·札罕（1627—1659年）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在沙·札罕统治期间，印度的帖木儿王朝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恢复他们原来在中亚的领地。但是1646—1647年之占领巴尔赫，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沙·札罕的继承者，奥兰则布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令人沮丧的冒险。很可能是在奥兰则布统治时期（1659—1707年），他将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对南方的扩张，以反对德干诸苏丹政权。奥兰则布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进一步在中亚发动战争，只会在人力和财力上导致更加惨重的毁灭性的损失^②。按照十七世纪的标准来看，沙·札罕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取巴尔赫，从萨法维王朝手中夺取坎大哈的企图，纯属异想天开、费用浩大之举，而且这对加剧十七世纪

^① J. Briggs, *History of the Rise of the Mahomedan Power in India till the year AD 1812* (布里格斯《印度穆斯林政权起源史——至1812年》), 4 vols., Calcutta, 1908—10, II, 276. 阿不都刺与阿克巴的关系，现在仍然不清楚，关于印度方面，见 Abu'l-Fazl, *Akbar-nameh*, tr. H. Beveridge, (贝维里吉译，阿不·法即勒《阿克巴史》), 3 vols., Calcutta, 1904; R. C. Varma, 'Akbar and Abdullah Khan' (沃麦《阿克巴与阿不都刺汗》), *Islamic Culture*, 1947.

^② 见 R. C. Varma, 'Mughal Imperialism in Transoxiana' (沃麦《河中地区的莫卧儿帝国主义》), *Islamic Culture*, 1948. B. P. Saksena, *History of Shah-jahan of Dihli* (萨克塞纳《德里之沙札罕史》), Allahabad, 1962, 182—209.

后半叶莫卧儿帝国的财政危机，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即便事实证明大莫卧儿王朝不会比英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中亚祖先以及他们作为伟大的帖木儿后裔的自豪感，却一直保持到了帝国毁灭。在莫卧儿印度和沙·札罕的朝廷，写出著名的《帖木儿纪年》（即便是有，这也是一部伪书），肯定不会是偶然的。

就政治方面而言，帖木儿帝国在中亚历史上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帖木儿王朝的建立者虽然不失为一位最有成就的军阀，但是他所造成的毁灭大大超过了他的创造，而且他的一生也缺乏象成吉思汗那样令人神往的魅力。帖木儿的后裔们虽然占据了河中地区和呼罗珊，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往往是一些平庸的，甚至是愚蠢的统治者，当面临外来的危险时，他们甚至无力控制自己的家族纠纷。只是在印度，而且是在很久之后，帖木儿家族的管理天才方才¹⁶²显示出来。但是在文化领域内，中亚帖木儿帝国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主宰了波斯文学的最后的伟大时代，而且促进了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察合台突厥文的发展。他们慷慨地提供基金，在赫拉特、马什哈德、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地修建了装饰奢华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神学院，他们还对画家和书法家进行了明智的保护，使最优秀的波斯画像和手稿得以问世。在中亚，没有哪个王朝能够留下这样一笔遗产。

第十二章 昔班王朝

帖木儿中亚帝国曾经两度摆脱了乌兹别克人的控制，第一次¹⁶³是在1468—1469年，即阿不勒海尔去世的时候，后来的一次是在麻哈没的·昔班尼死于木鹿战役的时候。但是伽只迪万战役的胜利，几乎恢复了乌兹别克人在1501年丧失的一切。后来，河中地区被分配给了最重要的昔班王朝首领，作为他们的属地。而在巴尔赫、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以及别的地方，都建立了当地的政权。麻哈没的·昔班尼的叔叔，在世的最年长的昔班朝汗忽什弘乞被承认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忽什弘乞的名字独自出现在钱币上，在“虎土白”中，也颂读他的名字。忽什弘乞从1510年统治到了1530年，紧接着，从1530年至1533年由他的儿子不赛因统治。接下来汗位由兀拜都刺继承。兀拜都刺死于1539年。自从麻哈没的·昔班尼去世之后，在乌兹别克诸首领中，兀拜都刺是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的统治才最终得以巩固。

兀拜都刺汗出生于1476年，他是乌兹别克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当麻哈没的·昔班尼在世期间，兀拜都刺曾经被委任管理布哈拉，所以在早年，他就得到了作为一名战士和行政官员的实际经验，在麻哈没的·昔班尼去世的时候，兀拜都刺只有三十四岁。在他的后半生中，除了作为一位典型的逊尼派统治者之外，兀拜都刺

还赢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而且他也是学者和诗人的保护者。而兀拜都刺本人——正如乌兹别克人的死对头，什叶派教徒哈散尼·
164 鲁木路勉强承认的那样——“在诗歌上是无与伦比的^①。”作为一位难得的不屈不挠的领导者，兀拜都刺汗享有最终将帖木儿后裔从其中亚故国驱逐了出去的荣誉。他还一再入侵伊朗，以求将呼罗珊并入昔班帝国。但是事实证明，兀拜都刺之征服沙·塔玛思普(1542—1576年)的失败，对于中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②。由于阻挡了乌兹别克人向阿姆河南部的扩张(或者说，被遏止在厄尔布尔士山和帕鲁帕米苏斯山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当时要想南下是不可能的)，萨法维王朝成功地将河中地区与其他的伊斯兰世界隔绝了起来，一直到十九世纪结束，这种隔绝状态摧残了河中地区的智力和文化生活。

人们往往认为，由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共同破坏的结果，毁灭了呼罗珊的繁荣。我们认为，十六、七世纪萨法维王朝——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较之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破坏可能要严重得多。试以下面我们对兀拜都刺汗在阿姆河以南的战争概述为例，就能显而易见地说明呼罗珊的城市和农村公社所遭受的悲惨境遇，而这种境遇则是乌兹别克人的掠夺造成的后果。乌兹别克人的掠夺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了十八世纪。

① C. N. Seddon, *A Chronicle of the Early Safawis, Being the Ahsan'u-t-Tawārikh of Ḥasan-i-Rūmlū* (塞登《早期萨法维朝编年史》), 2 vols., Baroda, 1934, II, 134.

② 迪克森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见 M. B. Dickson, 'Shah Tahmāsb and the Uzbeks (the duel for Khurāsān with Ubayd Khān: 930—46: 1524—40)' (迪克森《沙·塔玛思普与乌兹别克人》), Princeton, 1948.

1511年，兀拜都刺和札你别掠夺了呼罗珊。1521年与1524年，兀拜都刺试图攻取赫拉特。1526年，兀拜都刺占领了徒思和木鹿，与此同时，札你别的一个儿子攻克了巴尔赫。1527年，兀拜都刺进一步向远方掠夺，在向东返回赫拉特附近过冬之前，他向西方推进，一直深入到了远至阿斯塔拉巴德和比斯塔姆。紧接着在次年(1582)，兀拜都刺再次袭击了赫拉特。但是由于缺乏围城技术，而且又没有大炮，他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当兀拜都刺得知沙·塔玛思普正在计划要进入呼罗珊时，他撤退到了撒马尔罕，以补充兵力。此后，兀拜都刺又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返回了呼罗珊。由于塔玛思普年轻而且缺乏经验，乌兹别克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当两支部队在托尔巴特谢赫贾姆相遇时(1529年)，乌兹别克人却一败涂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514¹⁶⁵年在喀尔迪兰，萨法维王朝的军队曾经在奥斯曼的大炮优势面前撤退，然而萨法维王朝很好地吸取了喀尔迪兰的惨痛教训，十五年之后，拥有一些大炮和基本的轻武器，成了萨法维王朝取得托尔巴特谢赫贾姆之战的胜利的重要因素。很明显，正是由于没有能够认识到大炮的重要性，导致了乌兹别克人在亚洲较小的军事政权中的地位的逐步下降^①。

虽然托尔巴特谢赫贾姆战役大大地提高了年轻的塔玛思普的威望，但是这次战役似乎丝毫也没有减少兀拜都刺对呼罗珊的欲

^① 关于奥斯曼帝国、伊朗和印度在大炮方面的情况，《伊斯兰百科全书》之“喀尔迪兰”和“巴鲁德”条下，列有完备的书目。但是遗憾的是，这里遗漏了中亚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Y. Pullatov and A. Mirkalikov, 'K istorii ognestrel' nogo oruzhiya v Srednei Azii' (普拉托夫和米尔卡利科夫《中亚火器史》), *Materialy po istorii Uzbekistana*, Tashkent, 1963; W. E. D. Allen, *Problems of Turkish Pow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艾伦《十六世纪突厥政权考》), 1963, 18.

望。因为当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刚刚再次向西撤退时，兀拜都刺又转而反攻，再次渡过了阿姆河，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先占领了马什哈德，然后又占领了赫拉特，赫拉特遭受了残暴的掠夺，这些事件仍然发生在1529年。第二年年初，当兀拜都刺正在呼罗珊过冬时，得知沙·塔玛思普正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东反扑回来。这时兀拜都刺的宗主是不赛因汗，而不赛因汗很可能是因为害怕他的这位野心勃勃的亲戚的力量进一步增长，所以他拒绝援助兀拜都刺。兀拜都刺因此被迫放弃了他的征服，撤退到了阿姆河以外的地区。1532—1533年，兀拜都刺又返回了赫拉特附近地区（但他攻取赫拉特的企图被挫败了），从这里，他向西方发动了闪电般的袭击，横扫了马什哈德、萨卜则瓦尔、比斯塔姆以及阿斯塔拉巴德，当听到塔玛思普逼近的消息时，他又再次远走高飞了。最后，兀拜都刺在1535年第二次攻克了赫拉特。在他掠夺了这座城市之后，在逼近的萨法维王朝增援部队面前，兀拜都刺如同往常一样，又放弃了赫拉特。但是此后不久，兀拜都刺在他的一个亲戚，花刺子模的一位统治者手下遭受了一次屈辱的失败。兀拜都刺死于1539年，时年63岁。

作为处于敌对状态的乌兹别克诸部族的首领，兀拜都刺刚刚能够维持乌兹别克诸部表面上的统一。在兀拜都刺死后的至少二十年之内，相互与其邻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每个昔班汗，都力图使自己的属地变为一个独立的公国。随着札你别的孙子，阿不都刺汗无可争议的最高地位的确立，才使这一无政府阶段逐渐消除。阿不都刺汗在他的叔叔皮尔·马黑麻一世（1556—1561年）和他的父亲亦思干答儿（1561—1583年）统治时期，就消灭了所有潜在的对手，而

且掠夺了他们的封地，所以当阿不都刺汗最终继承了父亲的汗位¹⁶⁶时，他就得以控制了一片辽阔的地区，这一地区并不比麻哈没的·昔班尼在其极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小。在河中地区的历史上，作为混乱了几十年之后强制推行社会秩序的时代，阿不都刺汗二世（1583—1598年）的统治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正是由于阿不都刺汗的努力，这时河中地区的商业和农业开始复苏，人民的负担也开始有所减轻。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尤其是在布哈拉，阿不都刺汗的大名与和他基本上同时代的伊朗的沙·阿拔斯一世一样，带有很浓重的传奇色彩。所以甚至到了近世，人们通常还将另外一些不知名的客店、大桥、伊斯兰教神学院以及花园等建筑，或者将布哈拉和布哈拉附近的宜人环境，归功于阿不都刺汗这位被夸大的人物的慷慨赠与。

阿不都刺汗象他的前辈麻哈没的·昔班尼和兀拜都刺汗一样，决心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扩拓自己的疆域，他越过锡尔河，进入了无人居住的哈萨克草原，而且建立了一个西起阿斯塔拉巴德，东至喀什噶尔的政权（不管它有多么短暂），阿不都刺汗还从阿克巴的帖木儿帝国亲属手中夺取了巴达赫尚和吐火罗斯坦。但是阿不都刺汗最伟大的成就则是他赢得了反对萨法维王朝的胜利。1585年，阿不都刺汗袭击了赫拉特和木鹿，1588年，即在沙·阿拔斯（1587—1629年）继位一年之后，他又非常有效地介入了呼罗珊，使他的盟友奥斯曼帝国以非常有利的和约结束了反对伊朗的长期战争（1578—1590年）。到了适当的时候，沙·阿拔斯就成了阿不都刺汗最难战胜的对手，但是在这—时期到来之前，被阿不都刺汗的部队掠夺的呼罗珊城市的名单——赫拉特、富山集、托尔巴特谢赫

贾姆、木鹿、撒刺哈夕、马什哈德、你沙不尔、萨卜则瓦尔、伊斯法赖因、徒恩、徒巴斯和赫沃夫——雄辩地证明了乌兹别克人的统治手段给伊朗东北部地区所带来的毁灭，而乌兹别克人正是用这种手段占据了河中地区。

阿不都刺汗是一位严谨正统的统治者，他甚至正统到了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驱逐哲学学者的地步。他还派遣使者到阿克巴那里，¹⁶⁷查问皇帝异端的传闻^①。阿不都刺汗不仅是学者的保护人，事实证明，他还是建筑师和画家的慷慨的资助者。他的这些作法与十六世纪后半期布哈拉的学术气氛是相适应的。然而阿不都刺在世期间也亲眼目睹了昔班帝国开始衰败的状况，昔班帝国是他从瘟疫中拯救出来的（这次瘟疫在1590—1591年曾经席卷了河中地区）。这时卫拉特人开始入侵，而且阿不都刺汗的儿子阿布德·穆明也起而反叛。花刺子模与伊朗的联盟，使沙·阿拔斯在1695—1696年攻克了马什哈德、木鹿和赫拉特。伊朗军队在阿姆河北岸的出现，标志着昔班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的结束（虽然不是在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由一支旁系后裔统治的）。阿不都刺汗死于1598年，不管是阿布德·穆明，还是他的堂兄皮尔·马黑麻二世都没有能存在几个月。汗位后来传给了阿不都刺汗的妹夫，阿斯特拉罕从前诸汗的后裔札尼汗，札尼汗为了他的儿子把齐·麻哈没的（1599—1605年）而拒绝了汗位，随着把齐·麻哈没的登上汗位，开始了札尼朝或阿斯特拉罕朝的统治。

昔班王朝的成就在于，它使河中地区永远地成了乌兹别克人

^① Abdul-Qadir Badauni, Muntakhabut-al-Tawarikh, tr. G. S. A. Ranking, W. H. Lowe and Haig (兰金、洛和黑格译, 阿不都·海迪尔·拜道尼《历史文选》), 3 vol., Calcutta, 1884—1925, III, 199; 210—11.

的故乡。但是与昔班王朝同时兴起的伊朗萨法维王朝以及牢固地占据着兴都库什山南部地区的印度帖木儿王朝，使得即使最伟大的昔班朝统治者也无法恢复帖木儿征服的广大地区。与帖木儿帝国时期的形势相反，这时在三个王朝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量均势。乌兹别克人在这三个王朝中占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因为乌兹别克人没有能够象他们的对手一样，发展起一支炮兵，所以他们的机动优势就被抵消了。所有最能干的昔班朝统治者都极力要长期占有呼罗珊地区，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兵员的补充，这种野心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与萨法维王朝之间旷日持久、耗费殆尽的战争。战争双方都将这场战争说成是教派之争。这场战争削弱了乌兹别克人在锡尔河沿岸的力量，乌兹别克人作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和边界管理者，扮演着帖木儿帝国原来在锡尔河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他们在锡尔河地区则面临着他们的亲戚，机动的哈萨克人的威胁。无论是萨法维王朝（他们的后裔在1720年随着阿富汗吉尔扎伊人占领伊斯法罕而灭亡），还是相继不断的乌兹别克王朝，都没有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得到整个呼罗珊地区。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赫拉特和巴尔赫就已经并入了阿黑麻·沙·杜拉尼¹⁶⁸的阿富汗帝国，而且从此以后一直保持在阿富汗的管辖之下。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乌兹别克人对阿姆河南岸的野心复萌，又使得满吉惕王朝的建立者，沙·木刺德攻克并保持了木鹿地区。这样的结果，就使不久将在伊朗建立新王朝的合札儿不得不满足于仅仅占有呼罗珊南部和西部地区。呼罗珊地区曾经是中世纪哈里发政权及其东部继承国家的最辽阔、最富裕的省之一，但是现在它却分属于几个政权。十九世纪后期划定了各国间的疆界，

由此将呼罗珊地区的这种划分固定了下来。直到现在，呼罗珊还分别属于伊朗、阿富汗和苏联。

十六世纪期间，在昔班王朝的统治之下，河中地区终于开始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脱离出来了。昔班王朝与萨法维王朝之间残酷的逊尼派——什叶派的教派之争，使河中地区很难与伊朗以外的逊尼派国家保持交往，这种斗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河中地区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最终脱离。虽然在河中地区的东南方，确实建立了印度莫卧儿帝国，但是德里的帖木儿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提防与乌兹别克朝廷的交往。十六、七世纪期间，来自河中地区与呼罗珊的战士、学者、冒险家曾纷纷进入印度，但是这一潮流是一种单向的交流，一种仅仅对印度有利的，中世纪中亚和伊朗的“智囊流失”。而在河中地区的西北部，继承了金帐汗国的穆斯林诸汗国，在十六世纪都落入了信仰基督教的俄国人手中（仅仅除了克里米亚之外）。而这时河中地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则是依靠艰难而危险的里海——高加索通道。在阿不都刺汗在世期间，乌兹别克人的这种孤立状态，就已经成为布哈拉以及伊斯坦布尔所关切的问题了。

但是，仅仅用政治上的原因，还不能解释河中地区在文化方面不断增长的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相脱离的倾向，而在河中地区早期历史上，它曾经不断地产生过伊斯兰教文化与思想上的“带头人”。在这方面，有一个极为重要，但是相对来讲又不甚明确的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在十六、七世纪托钵僧诸阶层¹⁶⁹ (silsileh) 的蓬勃发展。虽然在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时期，托钵僧阶层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我们发现，乌兹别克政权

对于托钵僧阶层特别怀有好感，而他们对于更高的穆斯林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敌视的。托钵僧阶层的成员，几乎在整个社会各阶层中，都受到了热烈的尊敬。虽然在大城市的学者中间，托钵僧可能没有得到这种尊崇，但是不管是游牧者，还是绿洲居民，他们都很尊敬托钵僧，而且托钵僧中最有影响的几个阶层，例如纳合昔班底教团，与乌兹别克政权的统治首脑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十七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初期的耶稣会士同天主教统治王朝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倒是并非全无相似之处。而对于乌兹别克统治者来说，通过使他们以前的异族臣民与这种通俗的宗教思想(无论它怎样被贬低)保持一致，这样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这些异族臣民。在乌兹别克统治者中，实行这种政策的杰出榜样，是十六世纪的阿不都刺汗和两个世纪之后的沙·木刺德。

托钵僧诸阶层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代表最低水平的伊斯兰教派别。而在河中地区大城市里的那些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水平就要比托钵僧深奥玄妙得多。这些人置其他的教规于不顾，而是过分地专注于神学研究(我们所说的过分，是与萨曼王朝或者塞尔柱王朝时期的文化背景相比较而言)。伊斯兰教的教规在一些重要的人口中心——例如作为伊斯兰教的支柱(Qutb al-Islam)的布哈拉——的文化生活中，强加了一种绝对枯燥无味的教条。总之，在象布哈拉这样的人口中心，学者们由于广泛地占有了“瓦克夫”(永久管业权)，从而保障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对公众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也抑制了普通的文化生活。

在昔班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穆斯林教徒宗教情绪加剧的

根源,很可能与他们所处的暴露的地理位置有关,中亚穆斯林地区是伊斯兰世界最易受到攻击的边界地区之一。伊斯兰之中亚边界曾经遭受过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强烈打击;在不稳定的察合台汗国时期,这里又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混乱与动荡;此后,在帖木儿动乱不安的一生结束后不久,再次经受了来自北方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诸部落以及来自东方的异教的卫拉特人的屠杀。但是,与这种中亚地区特有的遭受入侵和政治上不稳定的背景极不适应的是,中亚地区游牧者之皈依伊斯兰教的伟大而艰巨的历程虽然进展缓慢,然而它却是不可抗拒的。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穆斯林国教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个人的托钵僧和比尔取得的成就大。在这方面,伊斯兰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遵循着一条与伊斯兰教在北印度的传播过程相近似的历程。在印度北部,皈依伊斯兰教的主要动力,也是来自托钵僧阶层,尤其是希什提教团。对于生活在伊斯兰世界边缘的游牧者来说,要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重要的是他们对伊斯兰教在感情上的投合(当然,这也是同化于更高文化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对其神学的投合。游牧群落在款待巡回托钵僧和接受他们那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张时,表现出来的敬畏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游牧者是将这些新到来的托钵僧与他们自己祖传的萨满教巫师等同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决定了伊斯兰教在中亚成为一种大众的信仰这种形式的是托钵僧,而不是以乡镇或者农村为其基地的毛拉。其中的理由,至少有一部分很容易就能推论出来。典型的毛拉,是由伊斯兰神学院培训出来的,而且他们本人很可能就是一位阿拉伯学者。在信仰方面,毛拉应该是严格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且要坚

定的服从伊斯兰正宗教法的要求，谨小慎微地实行沐浴仪式。然而四处游荡的托钵僧们，却与典型的毛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托钵僧沿着营帐乞讨，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在相对来说质朴无华，而且并未完全皈依伊斯兰教的游牧者中间，得到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只要这些托钵僧神圣的荣誉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与游牧者预想的神灵的顾问一致，那么至于他们是否目不识丁，是否缺少正统性或者是否漠视个人清洁等，游牧者是毫不介意的。这也就是说，一个托钵僧所具有的东西，正是一个萨满教巫师应该具有的东西。由此看来，托钵僧的“寺院”(khanqah)往往都座落在草原地区的边缘，即能够轻易地进入游牧人固定营地的地区，是大有道理的。而且沙黑·阿黑麻·牙撒吾在牙昔的圣陵之所以座落在紧靠哈萨克草原最南端延伸地带的附近，也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将圣陵设在牙昔，它就可以成为乌兹别克人以及哈萨克人的一 171 个主要的朝圣地。由于得到了河中地区和锡尔河以外地区居民中那些最易骚动而且也确实很残暴的游牧者的支持，托钵僧诸阶层在实现他们的主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来自城镇的，更具有良好教养和比较富裕的居民的障碍。甚至当强大的汗都断定，对于托钵僧的权宜之计是实行抚慰时，城镇中有教养的富裕居民对他们的贪婪和野心产生惧意，应该说是充分理由的。

一般来讲，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如果说穆斯林中亚对伊斯兰文明贡献甚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并没有将有关察合台文学在中亚地区的出现包括在内。在帖木儿帝国统治时期，察合台突厥文就已经迅速发展成了一种典雅的学术用语，并且在赫拉特的胡赛因·拜卡刺苏丹和最伟大的察合台诗人米儿·

阿里·失儿·纳歪的保护下兴盛起来。在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到昔班朝统治时代为止,察合台突厥文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熟练的文学表达工具。察合台突厥文与波斯文互为补充,但是它没有能够取代波斯文作为一种文化精华语言的地位。察合台诗歌也得到了热情的保护,而且确实有许多昔班王朝的统治者,包括麻哈没的·昔班尼以及兀拜都刺汗在内,都运用察合台突厥文写作,巴布尔则更甚,他宁愿选择察合台突厥文,而不是用波斯文撰写他的回忆录。伟大的土库曼艾弥儿拜刺木汗不仅可以用波斯文写作诗歌,而且可以同样熟练地用察合台突厥文作诗。在第二次巴尼伯德战役时(1556年),拜刺木汗曾经为莫卧儿人(帖木儿后裔)夺回了他们的印度帝国,而且在阿克巴未成年时,他还担任过摄政王。后来,到了十六世纪末以后,与昔班王朝衰落的同时,察合台突厥文诗歌的质量也明显地下降了。但是在札尼朝和满吉惕王朝的统治下,在中亚地区发展了一种历史散文写作的传统,这预示着乌兹别克现代文学的出现。

在观赏艺术方面,由帖木儿帝国时代确立的传统,虽然在生气活力上有所衰退,但是在十六世纪大部分时期内,这一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就袖珍画像而言,作为麻哈没的·昔班尼在1507年征服赫拉特的结果,著名的赫拉特画派没有在河中地区消失。但是,赫拉特画派后来分散开了,比札迪和他的一些弟子移居到了大不里士¹⁷²的沙·亦思马因汗的朝廷,另外一些赫拉特画派的画家则供职于昔班王朝,而且被转移到了河中地区新的省府,但主要是转送到了布哈拉。艺术史学家们倾向于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帖木儿帝国、萨法维王朝以及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袖珍画像,从而忽略了布哈

拉画派。虽然布哈拉画派无疑是渊源于赫拉特画派的一个分枝，但它还是具有自己明显的风格。布哈拉画派的特点是构图精巧，喜欢奢华的色彩。但是事实证明，布哈拉画派的辉煌时期是很短暂的，真正继承了来自赫拉特的流亡者的优点的画家，可能也就是一代^①。在建筑方面，上个世纪的传统则保持得长久得多，实际上，它很可能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然而就有关建筑的质量而言，却是急剧地衰退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昔班王朝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兴建了大量辉煌的寺院和伊斯兰教神学院，绘彩瓷砖装饰的外表(kashikari)与帖木儿帝国时期一样，作为主要的建筑装饰形式继续保留了下来^②。在较次要的艺术领域内，昔班王朝的工匠们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比起形制粗糙，铸作马虎的帖木儿帝国硬币，昔班王朝发行的钱币，显然设计得更为精巧。实际上，十六世纪的昔班王朝统治者肯定不是野蛮人——尽管巴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麻哈没的·昔班尼横加辱骂——作为昔班王朝统治阶级的国君表现出来的，对学术的真挚的热爱和对艺术家的保护，再加上他们对逊尼派学者的不懈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得从帖木儿帝国到昔班王朝的统治之间的过渡，对于较大的城镇和河中地区诸城市的文人学者来说，相对地更容易接受一

^① 关于布哈拉画派的代表作，见 N. V. D'yakonovoi, *Sredneaziatskie Miniatury XVI—XVIII vv* (德亚科诺沃伊《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亚小型彩画》), Moscow, 1964.

^② 见 L. I. Rempel', *Arkhitekturnyi ornament Uzbekistana* (列姆佩尔《乌兹别克斯坦的建筑装饰图案》), Tashkent, 1961. 关于乌兹别克时期一些最优秀的建筑的说明，见 *Istoricheskie Pamyantniki Islama v SSSR* (《苏联伊斯兰教历史文物》), Tashkent, (无出版日期) 和 M. Hrbas and E. Knobloch,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赫巴斯和诺布洛克《中亚艺术》), London, 1965.

些^①。

从十六世纪起,突厥人在河中地区居民的种族构成上,可能就已经形成了多数,而且在与定居农业人口或者城市居民的比例方面,游牧人口的比例很可能也有所增长。但是这时在河中地区的统治阶层中,伊朗文化和波斯语言还继续产生着普遍的影响。从十七世纪的很早的时期起,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作为游牧的畜牧者进入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部族,开始成为农耕者甚至城市居民,在绿洲地区定居下来了。而乌兹别克人自身,也很容易地就同当地定居居民,突厥人或者伊朗人(Tajik)融合为一体。在象布哈拉那样的城市中,一直降至十九世纪,伊朗人种还继续占据着优势地位。伊朗人种是绿洲地区古代居民的后裔,他们不断地由来自伊朗的俘虏的后代、战俘或者奴隶掠夺的牺牲品而得到了补充。在乌兹别克人大量成功地屈从于农业甚至商业生活的同时,土库曼人、喀喇喀尔帕克人以及哈萨克人,却将他们作为畜牧者的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了俄国征服时期,他们还继续着他们的祖先与绿洲居民的纠纷。这时的绿洲居民通常都是渊源于乌兹别克人和伊朗人。

乌兹别克统治河中地区之日,正好是次大陆商队贸易持续衰落之时,次大陆的商队贸易曾经一直是中亚绿洲城市繁荣的主要源泉,而中亚绿洲城市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首要的理由,也正是由

^① 见 A. A. Semenov, 'Kulturnii uroven pervuikh Sheibanidov' (谢梅诺夫《昔班王朝初期的文化水平》), Sovetskoe Vostokovedenie, 1956, III, 51—9; A. Schimmel, 'Some notes on the cultural activity of the first Uzbek rulers' (希梅尔《初期乌兹别克统治者之文化活动考》), Journal of the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July 1960, 149—66.

于有了商队贸易。在麻哈没的·昔班尼征服帖木儿帝国残余的同时,世界彼岸的一位葡萄牙水手,正不知不觉地确定了中亚经济衰退的命运,这种衰退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在1498年达·伽马非洲环球航行以及欧洲与远东之间的海路发现之前,中亚曾经是中国、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的商业与文明的交汇地区,由于这些发现的结果,导致了中亚商路的重要地位的下降,而中亚商路重要性的下降,反过来又预示着中亚自身经济的衰退。两个世纪之后,当俄国恢复了与中国的陆路贸易时,这时的商队取道极北部的古代道路,即通过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商道。商队交通的逐渐衰退,对于中亚统治者来说,意味着财富上的巨大损失,中亚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征收商品过境税。过境税收的减少,同样也意味着中亚国家国力的真正衰退,因为他们再也无力象他们的祖先那样,保持有一批追随者了,而且他们也无力购买火器了。过境税收的减少,现在第一次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由于商品数量的下降,保持古代商路的通畅与安全,对于中亚统治者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很大的刺激了。在十六世纪末期之前,中亚在各方面开始衰退的潮流可能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在阿不都刺汗统治下的布哈拉,就肯定没有它在一个世纪之前那样繁荣^①——但是,在对中世纪中亚经济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前,中亚地区在帖木儿帝国之后的经济衰退问题,肯定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① 英国商人和探险家安东尼·詹金斯曾在1588年到达布哈拉,作为一名目击者,他对这一时期的布哈拉及其商业情况,作过简短的描述。见 E. D. Morgan and C. H. Coote, *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in Russia and Persia* by Antony Jenkins and other Englishmen (摩根和库特《安东尼·詹金斯与其他英国人在俄国和波斯的早期航海与旅行》), 2 vols., London, 1886, I, 87--90.

第十三章 乌兹别克汗国的衰落

175 在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札尼王朝是通过布哈拉来统治河中地区的，与此同时，花刺子模(希瓦)则由昔班王朝后裔的一个分枝继续统治。在后朝札尼王朝统治者的统治下，河中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呈现出了显著的停滞状态。历史学家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大约在1644—1663年间为希瓦的统治者)在他所著的一本描述成吉思汗后裔的著作《突厥世系》(Shajareh Turk)中，指出了河中地区文化衰退的重要意义，他写道：

作为我们的祖先疏忽的结果，也由于花刺子模人的无知，自从我们的先祖与阿不都刺汗的祖先分开以来，在花刺子模，没有给现代留下一部单独的，我们家族的历史。最初，我还相信会有人担负起写作这部历史的责任，但是我发现没有人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因此，我不得不亲自动手写了这部著作①。

大约在1700年左右，在浩罕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浩罕汗国的建立，使费尔干纳谷地摆脱了布哈拉政府的控制。与此同时，由于伊胡人入侵者纳迪儿沙在1740年的入侵，也进一步地削弱了布

① Abu'l Ghazi Bahadur Khan, Shajareh-ye Turk, Tr. Le Baron Desmairson (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著，戴美桑译《突厥世系》，II, 2。

哈拉和希瓦。纳迪儿沙再次使阿姆河成了伊朗的边界。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在阿姆河与锡尔河的广大地区,又显示出了恢复的迹象。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的恢复,至少得部分地归功于几个相对来说强大有力的新王朝的出现。这些王朝是布哈拉的满吉惕王朝,希瓦的孔格勒王朝以及浩罕的明氏朝。这三个政权都努力在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实行较之以前的制度更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取得了成功。由于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结果,在每个汗国之内,除了政治上的凝聚力有了明显的增长之外,也使得进行一些有用的公共工程,特别是灌溉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①。

1599—1785年之间,河中地区先后有十二位札尼朝统治者统治。在此期间,布哈拉一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而作为边远公国的巴尔赫,至少一直到纳迪儿沙入侵时为止,则常常是确定的汗位继承人的驻地。巴尔赫与印度莫卧儿帝国之间继续保持着脆弱的商业联系,这样,外部影响的涓涓细流,就可以通过巴尔赫而进入布哈拉。虽然这时在布哈拉,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都已经陷入了放纵狂热之中,但是仍然有很少的布哈拉统治者,力图保持一个有教养的朝廷的外貌。然而在十七、八世纪,河中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的穆斯林世界是完全隔绝的。

札尼王朝从他们的昔班朝祖先那里继承的领土,大体上相当于十五世纪古代帖木儿帝国的心脏地带。除了花刺子模地区之外,这块土地包括河中地区本土、巴达赫尚以及费尔干纳谷地等。在札

^① 关于乌兹别克时期经营的水利工程,见 A. J. Ahmad, 'Irrigation in relation to State Power in Middle Asia' (阿曼德《关于中亚地方政权的水利灌溉》),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0.

尼王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他们实际上完整地保持了这块遗产。在札尼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伊玛目库里汗的统治下（1608—1640年），布哈拉经历了最后的，相对来说和平繁荣、政通人和的时代。在撒马尔罕的失儿答儿建造的伊斯兰教神学院（1619—1636年），就是这一时期和平繁荣的见证。为了在阿拉伯的圣城中过一种虔诚的生活，几位札尼王朝的统治者曾经放弃了王位，而伊玛目库里汗就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但是伊玛目库里汗的兄弟和继承人，追求享乐的纳迪儿·麻哈没的（1640—1647年）却竟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被迫将布哈拉政权传给了他的儿子阿布德·阿昔思（1647—1680年），而纳迪儿·麻哈没的本人则仅仅得到了巴尔赫作为自己的属地。这些家族纠纷，引起了印度的莫卧儿统治者沙·札罕（1627—1659年）的注意，沙·札罕这时正试图要重新征服兴都库什山北部地区，至少部分地恢复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帖木儿帝

177 国的遗产。1645年，一支莫卧儿军队入侵了巴达赫尚，并且在沙·札罕最小的儿子木刺德·巴黑失的指挥下，于1646年占领了巴达赫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入了巴尔赫。纳迪儿·麻哈没的最初逃往马什哈德，后来又逃到了位于伊斯法罕的萨法维王朝的宫廷。但是，木刺德·巴黑失和他的印度军队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阵地是难以防守的。然而当木刺德·巴黑失撤退到喀布尔之前，沙·札罕一听到木刺德·巴黑失撤退的消息，就撤除了他的领导职务，并且在1647年派遣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未来的皇帝奥兰则布（1659—1707年）前去接替木刺德·巴黑失的职位。在从喀布尔通往巴尔赫的路上，奥兰则布每前进一步，都得被迫进行战斗。只是因为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乌兹别克人对他的旧式步枪的崇拜，才使奥

兰则布的军队得以进抵巴尔赫的城壕之下。抵抗奥兰则布的是纳迪儿·麻哈没的的两个颇具才干的儿子，阿布德·阿昔思和速班·库里。此后不久，奥兰则布就被迫与他们进行了谈判。1647年10月1日，巴尔赫城堡正式移交给了纳迪儿·麻哈没的的两个孙子，而奥兰则布也开始了他的撤军。在兴都库什山地区，这一年的冬季来得很早，疲惫不堪的莫卧儿军队不适应这里的恶劣气候，他们身负行囊，而且缺乏给养。在开阔地带，莫卧儿军队遭受了乌兹别克人的骚扰，而在关口要隘，他们又遇到了哈札刺人的阻击。等他们边战边退，到达喀布尔时，仅仅是几个月前才从这里出发的远征军，这时却只剩了一批残兵败将。在这次远征中，人力、畜力的损失是惊人的，大量的人力物力，都被毫无意义地浪费了。莫卧儿帝国既没有得到新的领土，也没有得到他们向往的政治优势，而莫卧儿帝国在其不稳定的西北边界地区的威望，却很悲惨地被动摇了。在沙·札罕干预之后，巴尔赫一切仍旧，还是由原来的那个家族进行统治。这是莫卧儿帝国恢复他们原来在中亚的领土的最后一次尝试。从此之后，莫卧儿帝国就满足于将他们与北方的邻人之间的关系，限制在正常的外交联系之内了。

1647年奥兰则布的远征，充分说明了乌兹别克人与其邻人，莫卧儿帝国以及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两支特点各异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保持其游牧祖先之军事传统的战斗者，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利用比较笨重而且更少机动性的军队战斗的人们。这种关系甚至一直保持到了很晚的时候。奥兰则布的军队，在数量上并不比乌兹别克人更178少，而且其战斗力也不比乌兹别克人更弱（况且奥兰则布本人这时

也已经是—位富有经验的指挥者了),但是,只有当他们能够有效地运用大炮和步枪时,他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如果莫卧儿军队在火器方面的优势,没有能够辅之以纳迪儿沙的军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还具有的那种机动性的话,他们所遇到的结果,可能就大为不同。实际上,事实反复证明,在与笨重的莫卧儿军队作战时,就在开阔地带的战斗和在运动中攻击敌人而言,乌兹别克人是很难战胜的(就象他们以前与萨法维王朝作战时—样)。乌兹别克人这种游牧者或半游牧者的大为棘手,而且使人烦恼的机动性,只有象哈萨克人或者卫拉特人,即那些比乌兹别克人更具有机动性的民族,或者是象俄国人以及满清政府在平定诸部落时所部署的那样,有效地使用火器,才能够将他们击败。

阿布德·阿昔思的长期统治,标志着札尼王朝在河中地区统治的高峰时期。紧接着阿布德·阿昔思之后,是速班·库里统治时期(1680—1702年)。速班·库里是一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人物,他还写过—篇关于医学的论文。在速班·库里的家族中,他可能是作为主人招待那些来自德里以及伊斯坦布尔的使节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事实证明,在十七世纪后半期,札尼王朝对艺术家的保护,并不比伊斯法罕的后期萨法维王朝逊色。例如阿布德·阿昔思设在布哈拉的伊斯兰教神学院(1652年)以及在撒马尔罕之塔刺喀里的伊斯兰教神学院(1640—1660年),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但是,表面上的显赫是靠不住的,这个经常由于家族竞争而分裂的王朝,是不可能控制住那些更为狂暴的氏族的。虽然战争通常都是在伊朗的土地上进行的,但是与萨法维王朝之间不时的战争,却增长了札尼王朝边境地区半独立的首领和强盗的力量,从而也就失去了对

布哈拉的控制。后来札尼王朝与沙·札罕的斗争虽然为时很短，但是却很激烈，而且在此之后，札尼王朝紧接着又与希瓦的统治者，富有旅行经验的历史学家阿德勒·哈齐·把阿秃儿汗之间发生了持久的战争。不仅如此，锡尔河彼岸的哈萨克人对札尼王朝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潜在危险，在十七世纪之后，浩罕汗国又对札尼王朝构成了新增加的威胁。最终，伟大的伊朗征服者纳迪儿沙（1736—1747年）摧毁了札尼朝政权残存的势力。纳迪儿沙摧毁札尼王朝的手段，与他摧毁了印度莫卧儿帝国残余势力的手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札尼国王（就象德里的麻哈没的沙一样）仍然残留着进行视察的权力，但他所能行使的只是名义上的权力，行政控制权已经落到了麻哈没的·拉希木甸家族手中。麻哈没的·拉希木甸是满吉惕部落的一个首领，这个部落可以追溯到蒙古时代的一个显赫的门第。当时，他们在河中地区占据着合儿昔附近以及阿姆河下游地区。

在速班·库里呆板的儿子阿不勒费兹统治时期（1705—1747年），麻哈没的·拉希木甸得到了布哈拉政府的最高职务“哈基姆·艾泰利格”（Hakim Ataliq）。作为满吉惕首领之一，麻哈没的·拉希木甸在1737年率领一支札尼朝的部队，抵抗纳迪儿沙的儿子里札·库里·米尔咱。后者利用他的父亲没有参加阿富汗和印度战役的机会，为了给自己赢得荣誉，越过阿姆河，向合儿昔进军。里札·库里·米尔咱在合儿昔与麻哈没的·拉希木甸相遇，也正是在这里，他接到了父亲发出的一道愤怒的命令，要他撤回阿姆河南岸。这样，里札·库里汗因为擅自违抗了父亲的命令而被召回了。但是在里札·库里从印度返回伊朗之后，紧接着在1740

年，纳迪儿沙决定解决伊朗多次遭受入侵的根源，摧毁布哈拉和希瓦的乌兹别克汗国。纳迪儿沙从巴尔赫出发，沿着阿姆河南岸到达查尔朱，然后渡过阿姆河，进入了布哈拉汗国的领土。阿不勒费兹倾向于听从麻哈没的·拉希木甸的意见，愿意向纳迪儿沙屈服。但是他们的意见被朝廷中赞成战争的一派否决了。此后，乌兹别克人很快就集结起了一支部队，前去抵抗入侵者。但是惧怕伊朗大炮的乌兹别克部队却遭到了耻辱的失败，阿不勒费兹遂匆忙议和。议和条件出奇的宽大，双方议定在两位统治者之间联姻；将原来属于布哈拉汗国的阿姆河以南的领土，全部并入纳迪儿沙的帝国；30,000名乌兹别克人加入纳迪儿沙的部队服役。纳迪儿沙在进军希瓦汗国的伊利巴尔汗之前，作为一位征服者，正式进入了布哈拉。在“虎土白”中颂读着纳迪儿沙的名字，并且将他的名字印在了钱币上。但是不管怎么说，布哈拉城本身免受了最近对德里180的掠夺的那种恐怖。很明显，乌兹别克人的首都的衰落景象，没有能够引起纳迪儿沙对它的欲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个世纪以前，在印度平原的灰尘与炎热之中的流亡者们——巴布尔和他的追随者，渴望着返回北方那些辉煌的城市——巴尔赫与赫拉特，布哈拉与撒马尔罕。现在另一位伟大的战士——纳迪儿沙，对于从巴布尔的后裔的莫卧儿首府得来的战利品几乎是贪得无厌，但是他却不屑于去掠夺这个小小的外省城镇，而这个城镇一度却曾经是宏伟壮丽的布哈拉城(Bukhara-ye Sharif)①。

纳迪儿沙离开之后，虽然满吉惕氏族成了布哈拉汗国真正的

① 洛克哈特从伊朗的观点出发，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见 L. Lockhart, Nadir Shah (洛克哈特《纳迪儿沙》), London, 1938。

统治者,但札尼王朝还继续残存了四十五年。大概在1747年,麻哈没的·拉希木甸终于谋杀了阿不勒费兹,而且在1753—1758年之间,正式成为布哈拉的统治者。但是当麻哈没的·拉希木甸死后,一位叫做阿不勒·哈齐汗的札尼朝后裔又持续统治了近三十年(1758—1785年),阿不勒·哈齐汗是一个荒淫的国王,他实际上是由麻哈没的·拉希木甸的族人答尼牙尔甸掌握的。答尼牙尔甸死于1785年,在后来的混战中,他的一个儿子,艾弥儿·麻素木·沙·木刺德成了布哈拉无可置疑的统治者。沙·木刺德给了阿不勒·哈齐汗以及残留的札尼朝诸王养老金,要他们退位,而他自己则成了满吉惕王朝第一位正式的统治者。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布哈拉已经鲜为人知了,但是在沙·木刺德统治时期(1785—1800年),布哈拉又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和军事上的强盛时期。然而这位新统治者(通常以 Begi Jan 知名)的特点是,他完全将荒谬的托钵僧主义传统奉为楷模,而这种托钵僧主义曾经长期地摧残了河中地区的文化生活^①。沙·木刺德早年在附属布哈拉的古代哈兰马斯只德的一个学院里,接受了作为一名神学家的教育。在这里,沙·木刺德以他的圣洁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甚至在登上布哈拉的“迈斯奈德”(Masnad)之后,他还受到人们普遍而热烈的尊崇。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事实上沙·木刺德作为一位统治者,还保持着托钵僧的服饰和生活方式,甚至在率领他的

^① 关于沙·木刺德的轶事,见 J. Malcolm, *History of Persia* (马尔科姆《波斯史》), 2 vols., London, 1815, II, 241—61; A. Conolly, *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 overland from England* (康诺利《北印度旅行记》), 2 vol., London, 1834, I, 158—63; Vambéry, *History of Bokhara* (万贝里《布哈拉史》), London, 1873, 348—62.

部队作战时，他也骑着一匹装备简陋的小马。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哪个“艾弥儿”或者“汗”愿意骑这种马。但是，作为一名军事首领，沙·木刺德具有非凡的才能。一旦巩固了对自己的臣民的统治之后，他就以希瓦和浩罕作为代价，有力地将布哈拉政权的疆域向前

¹⁸¹ 推进。虽然沙·木刺德一直没有能够从阿富汗的笃来尼统治者那里夺取巴尔赫，但是在反对伊朗的斗争中，他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沙·木刺德年复一年地渡过阿姆河，侵扰呼罗珊地区的居民。在河中地区统治者绵绵不绝的后裔中，他是入侵伊朗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沙·木刺德的主要目标是木鹿。木鹿曾经是一个著名的伊朗文明中心，但是，它当时则是一座由合札儿首领巴赫兰·阿里汗守卫的衰落的边境城镇。巴赫兰·阿里汗与札尼王朝以及伊朗合札儿王朝的建立者阿哈·马黑麻，都有着疏远的关系。巴赫兰·阿里汗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最后终于被杀死，他的头颅被钉在了布哈拉的绞刑台上。但是，由于得到了阿富汗的帖木儿王笃来尼（1773—1793年）的支持，木鹿地区在巴赫兰·阿里汗的儿子，麻哈没的·胡赛因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到了1788年才最后被攻克。最初，麻哈没的·胡赛因被囚禁在了布哈拉，但他最终逃到了德黑兰。在德黑兰，麻哈没的·胡赛因成了他的亲戚法塔赫·阿里沙（1797—1834年）的大宠臣。沙·木刺德的军队掠夺了木鹿之后，接着又摧毁了木尔加布河复杂的灌溉系统。木尔加布河长期以来一直是木鹿绿洲的生命之源，由于沙·木刺德破坏的结果，使木鹿城自身及其周围的农村很快就回复到了原来那种荒芜凄凉景象。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家们，曾经对木鹿的这种破败情景有过生动的描述。当沙·木刺德占领了木鹿绿洲之后，他就开始有计划地

驱逐绿洲内的伊朗居民。在世人的记忆中，这些伊朗人充斥了布哈拉的奴隶市场，以至奴隶价格跌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到了十八世纪末叶，呼罗珊北部的伊朗居民就被土库曼人取代了，甚至木鹿绿洲的情况也是如此^①。阿哈·马黑麻汗威胁，要对沙·木刺德对待木鹿合札儿人的行为报复。但是由于俄国在1796年入侵了阿塞拜疆，使阿哈·马黑麻没有能够进攻布哈拉，而他的继承者又没有足够的兵力使木鹿重归伊朗王室。这样一来，由于沙·木刺德一生东征西讨的直接结果，现代伊朗东北部的边界不是阿姆河，而是厄尔布尔士山北麓的科彼特山脉。

布哈拉的居民不但崇敬沙·木刺德的军事成就，他们对沙·木刺德之严格实行正宗教法同样也非常崇敬。沙·木刺德的儿子和继承人艾弥儿海答儿(1800—1826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功地将国王的角色与托钵僧结合了起来。但是在艾弥儿海答儿死后，布哈拉政权就陷入了他的儿子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海答儿的第三子纳斯鲁刺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1842年，纳斯鲁刺在布哈拉残忍地监禁和处死了东印度公司的两位官员，查尔斯·斯

^① 见 'The peoples of southern Turkmenistan and northern Khorasa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十七、八世纪南土库曼与北呼罗珊诸民族>), CAR, 1960, 264—72。但是这篇未具名的文章没有讨论沙·木刺德时期的情况。米尔·阿不都·克里木·布哈里《布哈拉史》声称，有27,000户伊朗人被从木鹿流放到了布哈拉，见 Mir 'Abdul Karim Bukhari. *Tarikh-i Bukhara* (米尔·阿不都·克里木·布哈里《布哈拉史》)——谢弗 (C. Schefer) 译作《中亚史》(Histoire de l'Asie Centrale)。据估计，1813年木鹿人口为3,000户。见 J. M. Kinneir, *A Geographical memoir of Persian Empire* (金尼尔《波斯地理志》)。关于十九世纪木鹿的情况，见 C. Marvin, *Merv, Queen of the World, and the Scourge of the Man Stealing Turcomans* (马文《木鹿，世界之首》，London, 1883; E. O'Donovan, *The Merv Oasis* (多诺万《木鹿绿洲》，London, 1882。

托达特上校和阿瑟·康诺利上尉^①，因为这件事，纳斯鲁刺的名字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中声名狼藉。但是，虽然纳斯鲁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背信弃义和冷酷蛮横的名声，他的残忍行为也使他在自己的臣民和邻人中成了一位可怕的人物，然而与布哈拉早期统治者的水平相比较，他的长期统治(1827—1860年)不能说是完全不成功的。如果纳斯鲁刺不是时运不济，生活在一个面对欧洲人的入侵，到处的穆斯林统治者都昏庸愚昧、孤立无助的时代的话，他很可能会名垂青史，成为昔班王朝之后的布哈拉统治者中一位最能干，肯定也是最成功的统治者。在富有经验的满吉惕首领胡赛因伯克的指导下，纳斯鲁刺在其统治的前十三年中，小心谨慎地执掌着政权，他粉碎了部落首领的独立活动，而且还实行了支持教士阶层的政策，这一政策无疑使他在城市居民中得到了好感。同时在他的疆域之外，纳斯鲁刺的目标是牺牲希瓦和浩罕，以扩张他的领土，他的最终目的，可能是要征服整个河中地区，甚至有可能是要重建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帖木儿帝国。纳斯鲁刺的这种野心得到了阿塞拜疆的冒险家，阿布德·萨曼德的鼓动，后者力图要取代胡赛因伯克作为纳斯鲁刺首席顾问的位置，并且在1840年设法处死了胡赛因伯克。阿布德·萨曼德具备一些训练正规部队和铸造大炮的知识，他的这些才能在1839—1842年间对浩罕的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阿布德·萨曼德对俄国之进入伊朗西北部以及英

^① 有关详情，见 J. Grover, An appeal to the British Nation on behalf of Colonel Stoddart and Captain Conolly, now in captivity in Bokhara (格罗弗《代表关押在布哈拉的斯托达特上校和康诺利上尉致布列颠国民书》，London; J. Wolff, Narrative of a Mission to Bokhara (沃尔夫《记前往布哈拉的使命》，2 vols., London, 1845; J. Grover, The Bokhara Victims (格罗弗《布哈拉牺牲者》，2nd edn., London, 1845.

国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扩张也有亲身经验，所以他对纳斯鲁刺似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阿布德·萨曼德利用纳斯鲁刺的多疑性格，几乎毫不费力就激起了纳斯鲁刺对欧洲人迫近他的领土的恐惧。纳斯鲁刺对欧洲人进入亚洲是有所了解的，他确实有理由相信，¹⁸³不管到来的是商人、传教士还是公使，一般说，他们的到来都预示着某种形式的欧洲保护国的建立。然而在纳斯鲁刺统治期间，俄国人始终一心致力于希瓦和浩罕，纳斯鲁刺本人并没有受到俄国人的直接威胁。但是在1868年，纳斯鲁刺的继承人穆札法尔丁被迫与俄国建立了条约关系，虽然布哈拉的艾弥儿政权作为类似于英属印度的海德拉巴德或者克什米尔那样的保护国，一直在存在到了1920年，然而布哈拉国家的经济生活，则日益受到了沙俄帝国经济生活的制约。

希瓦汗国僻处于偏远的花刺子模绿洲，而且受到卡拉库姆、乌斯季乌尔特和克齐尔库姆沙漠的保护，与布哈拉相比，希瓦汗国在乌兹别克统治的三个半世纪中，在中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瓦汗国的军事力量比布哈拉弱，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布哈拉重要，而且希瓦汗国的文化生活甚至更为落后，至于阿布勒·把阿秃儿汗的历史著作，则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在希瓦地区，游牧者与农耕者之间以及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之间的传统的紧张关系，由于土库曼人的加入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土库曼语属于乌古斯语族或西突厥语，阿塞拜疆地区操突厥语的奥斯曼人和阿泽里人也包括在西突厥语之内。土库曼语与东突厥语实际上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将土库曼人

与中亚其它的突厥民族区别开来。在早期,土库曼王朝以及土库曼部落联盟在伊朗及其毗邻地区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乌兹别克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河中地区的占领时,虽然就伊朗、希瓦和布哈拉的边界关系而言,土库曼人是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里海以东的全部土库曼人也就只是具有一些局部的意义了。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上述三个国家,伊朗、希瓦和布哈拉都力图要统治土库曼,而且他们也

184 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土库曼人则根据他们的邻人的相对军事力量的强弱,不断地更换自己的主人。在沙·阿拔斯一世和纳迪儿沙那样的统治者统治时期,土库曼人被迫承认了伊朗的宗主国地位。同样地,当布哈拉扩张领土时期,例如在阿不都刺二世和沙·木刺德统治时期,他们则效忠于布哈拉政权。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当萨法维王朝与札尼王朝都开始衰落时,两位强大的希瓦统治者,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和他的儿子阿努沙(1663—1687年),又征服了土库曼人。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好战的土库曼部落都享有实际的独立性,这就使他们相对来说能够无所顾忌地袭击在他们附近地区的交通线和商路。作为顽固的奴隶掠夺者,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土库曼人仍然是合札儿伊朗东北诸省的祸患。降至俄国吞并时期,大多数土库曼部落还保持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但是在戈尔甘河的谷地,已经有了一些土库曼农耕者。虽然在完全面临外来文化影响时,土库曼人对于这些文化的吸引力根本不是采取抵制的态度,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却是很有限制的。土库曼地毯织工表现出来的技艺和色彩感,当然是无须强调的,与此同时,有些少数高度伊朗化的统治阶级中

的杰出人物，甚至在波斯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写作于1616年，记载沙·阿拔斯历史的著作，《阿拔斯世界史》(Tarikh-i' Alam are-ye 'Abbasi)的作者亦思干答儿·蒙失，就是一位土库曼人。早期莫卧儿帝国的建筑师拜刺木汗也是土库曼人。拜刺木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在阿克巴幼年时期，他曾是一名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除此之外，拜刺木汗还是一位对波斯文和察合台文都很有造诣的作家。正是这些土库曼人在外国宫廷里树立了自己的声望，而且他们还用外国语写作。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叶，一种土库曼文学语言开始形成了。诸如马黑秃木·库里和木刺·阿哲迪那样的诗人们巩固了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的出现，也许是第一次给予了土库曼人以文化统一意识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就。

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直到1920年布哈拉的艾弥儿国家与希瓦汗国灭亡为止，这两个政权都一直享有独立的历史。与此比较而言，浩罕汗国的历史仅仅是从十八世纪头十年才开始的。当时185成吉思汗的一个著名的后裔沙哈鲁伯克在浩罕建立了一个政权，该政权相继经历了大约二十位统治者，直到1876年被俄罗斯帝国吞并。十九世纪早期，在浩罕汗国的鼎盛时代，浩罕的领土包括费尔干纳河谷和浩罕本土，西到俱战提，以及位于锡尔河北岸的塔什干和奇姆肯特都属浩罕汗国的范围，它的全部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750,000人。浩罕汗国领土的增长，是由费尔干纳河谷的地理条件决定的。费尔干纳河谷向西直接延伸到了锡尔河，结果导致了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政权在俱战提、乌拉秋别以及喀喇的斤地区的冲突，而且也促成了浩罕汗国与哈萨克在塔什干以外地区的冲

突。与布哈拉和希瓦的情况一样，浩罕诸汗发现，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当地乌兹别克首领以及有着巨大影响的托钵僧阶层的限制。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头十年里，相当有决断的、残忍的浩罕统治者阿利姆汗，实行了一种强硬的集权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建立喀喇的斤山民雇佣军，以代替传统的部落征集兵。当阿利姆汗在浩罕汗国内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他就开始扩拓领土，占领了乌拉秋别、俱战提和塔什干。阿利姆汗的继承人麻哈没的·乌马儿·沙黑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还是艺术家的慷慨的保护者。麻哈没的·乌马儿·沙黑继续执行了阿利姆汗的扩张政策，向北进入了哈萨克的领土，而且建立了阿克麦肯特要塞，以抵御锡尔河下游北岸的部落。在麻哈没的·乌马儿·沙黑统治时期（约1822年）以及他的儿子麻哈没的·阿里统治的早期，浩罕汗国达到了它短暂而辉煌的顶峰时期。但是事实证明，麻哈没的·阿里并不是布哈拉汗国强有力的纳斯鲁刺的对手。纳斯鲁刺在浩罕汗国的领土之内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最终攻占了浩罕本土并且导致了1842年麻哈没的·阿里之死。浩罕与布哈拉战争的结果，使这两个国家在逼近的与俄国的斗争面前，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尽管事实上与布哈拉或者希瓦一样，浩罕汗国也遭受了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之间以及游牧者（包括乞尔吉思人）与定居居民之间的内部冲突的损害，但是浩罕汗国对俄国的反抗，则要比布哈拉或希瓦坚决得多。

在浩罕汗国统治的一个半世纪内，费尔干纳谷地及其西邻地区，在政治上是独立于周围地区之外的。这一个半世纪，是辉煌灿烂的一个半世纪。在这时开始兴修了灌溉工程，修建了大量的公

共建筑,这些建筑的风格,都是由伊朗风格派生出来的一种传统的风格。各地留传下来的一些优秀的技艺,也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虽然很少有非穆斯林前去浩罕汗国,但是凡是到过浩罕汗国的人们,都对浩罕稳定的繁荣状况以及商业活动的迹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时前往布哈拉或者希瓦的旅行者,则肯定不会得到这种印象。

第十四章 沙皇和苏联 统治下的突厥人

187

1. 俄国统治下的金帐汗国后裔

在俄国境内,有金帐汗国的三个继承国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它们分别在1552年、1554年和1783年被征服和并入了俄国。

从阿斯特拉罕汗国被俄国吞并时期起,原来阿斯特拉罕汗国诸汗的后裔,就到突厥斯坦寻求避护,他们甚至在突厥斯坦也建立了一个阿斯特拉罕汗国(札尼王朝),这个国家在十七世纪期间统治着布哈拉。但除了其建立者是阿斯特拉罕汗国诸汗的后裔这一事实之外,突厥斯坦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与以前的阿斯特拉罕汗国已没有任何关系可言。此外,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只是稀疏地散布着一些穆斯林,但是他们很快就衰退得微不足道,而且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历史。然而阿斯特拉罕城却保持了穆斯林的特点,在1905年之后,它甚至恢复了作为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喀山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俄国征服之后,经历了一场变革,这次变革影响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历史。

(a) 俄国统治下的喀山鞑靼

1552年10月2日,伊凡雷帝的军队突然袭击了喀山,喀山是喀山汗国的首都和原来的大保加利亚王国以及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俄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是蒙古人的附庸了,他们对原来他们的主人的后裔进行了极度的报复,俄国东部的伊斯兰教徒,将在这种“异教”的统治下生活四个多世纪。

在伴随着大屠杀的征服之后,俄国人就开始有步骤地占领喀山汗国的领土,喀山的领土是在“喀山王国”的名义下被俄国吞并的。在喀山地区,俄国人在两个世纪里推行了一种野蛮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将原来的喀山汗国彻底俄罗斯化,并且将穆斯林社团并入他们自己的社会。¹⁸⁸

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俄国人贯彻“非鞑鞑化”政策的第一步,是将鞑鞑人从全部重要的城市中,特别是从喀山市中驱逐出去。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喀山市中占大多数。俄国人还将大河沿岸肥沃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了俄国贵族和寺院,并且在战略要地建立了城堡,俄国农民的浪潮席卷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这里的本地穆斯林居民和泛灵论者,很快就下降到了少数民族的地位。伴随着这种征用土地措施的,就是强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的政策。伊斯兰教教士的权力被剥夺,“瓦克夫”(由教会占有永久管业权的财产)也被掠夺,清真寺和可兰经学校则被摧毁或者是关闭。本地居民之皈依基督教,是在1555年由喀山的第一任主教古里主教开创的。本地居民的皈依,为俄国东正教信徒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分枝,这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鞑人和信仰泛灵论的芬兰居民。最后,俄国人就开始着手摧毁在他们看来最危险的鞑鞑封建贵族阶层。对于鞑鞑封建贵族来说,要末就是皈依基督教,要末就是失去

他们的特权。

鞑靼人的反抗是激烈而持久的。这种反抗早在 1552 年 11 月的流血起义中就已经显示了出来。这场由封建贵族阶层领导的起义，一直持续到了 1610 年。这时的克里米亚汗国正处在鼎盛时期，鞑靼贵族希望能在克里米亚汗国的帮助下，重建原来的喀山汗国。在五十年时间里，我们可以列举出十次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最悲惨的几次是 1552 年的忽辛·赛特起义，1556—1557 年的迈米什·拜迪起义以及与克里米亚汗杰夫列特·吉列亦袭击莫斯科同时进行的，1572—1574 年的大起义，此外还有 1608 年和 1610 年的起义。所有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极其残暴的镇压，在这些起义中，鞑靼贵族阶层几乎全部都被消灭了。

189 十七世纪初期，标志着—个农民起义时代的开始。从 1608 年起，农民起义—直绵绵不绝，延续到了 1615 年，接连不断的起义引起了新的大屠杀。鞑靼人还积极参加了 1670—1671 年由哥萨克首领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反对莫斯科政权的内战。

罗曼诺夫王朝的上台，并没有改变伏尔加河流域穆斯林教徒的处境。1731 年，喀山主教卢卡·科纳舍维奇发起了一场新的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运动，这次运动较之以前的任何—次都更为坚决。鞑靼农民的悲惨处境，迫使他们举行了新的起义。在这次起义活动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是 1775 年巴秃尔沙以反对“异教”的“圣战”为旗号的起义，而最主要的则是 1773—1774 年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在普加乔夫的部队中，有相当—部分是外族人，其中有鞑靼人、巴什吉尔人、伏尔加河的芬兰人以及哈萨克人。

作为鞑靼人绝望反抗的补充，鞑靼民族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被赶出了城市的贵族和手工业者流入了农村，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阶层。这一阶层稳步地向东延伸，在各地建立了繁荣的商业团体。随着鞑靼人在自己故乡的重要地位的衰退，他们逐渐成了一个由新的商业中产阶级统治的，流落在外的种族。

喀德琳二世的继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对鞑靼的政策。一方面喀德琳急于要避免象普加乔夫起义那样的麻烦再次发生，而且她也完全认识到了鞑靼贸易团体在沙俄帝国边境的优势地位，所以，女皇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改善鞑靼人的社会地位。她结束了宗教迫害，在奥伦堡建立了“宗教协会”，供俄国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使用。喀德琳二世还赋予了残存的鞑靼贵族与俄国贵族同等的权力，同意鞑靼商人具有特权，允许他们承当正在发展之中的俄国工业与突厥斯坦市场的中介人（这时的突厥斯坦市场对非穆斯林仍然是封闭的）。在这种形势下，鞑靼中产阶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鞑靼商人成了沙俄帝国政策的“合作者”，但是他们还仍然深深地依恋着伊斯兰教，自觉地保持着对于自己民族的责任。事实证明，这些商人是摆脱了偏见的保护圣徒，如果没有他们，改革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鞑靼文艺复兴”就既不会发生，也不会得到发展。¹⁹⁰

随着1806年俄国军队对中亚的永久性的征服，俄国与鞑靼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时期也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俄国征服的结果，使中亚地区对俄国工业门户洞开，从而摆脱了鞑靼这个中介人。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政权恢复了反对穆斯林教徒

的高压政策。被喀德琳二世废弃的皈依基督教的旧政策，又以更巧妙、更有效的方式恢复了。据统计，在十九世纪期间，有将近200,000鞑靼人改信了基督教。这时在乌拉尔、哈萨克草原以及突厥斯坦与鞑靼人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在鞑靼人的控制之下，为了抵消鞑靼人的这种作用，俄国政权还进一步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立法手段。

威胁到关于鞑靼民族的完整及其物质利益的双重攻势，引起了鞑靼人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的直接结果，就是鞑靼人的改革运动。为了生存，穆斯林教徒不得不重新唤醒他们的落后的文化，以求将伊斯兰教与进步谐调起来。文化复兴工作是由一群杰出的宗教思想家进行的，他们是阿卜·纳斯尔·库尔塞维（1783—1814年）、什哈拜丁·迈尔杰尼（1818—1889年）、里宰丁·费赫拉丁（1859—1936年）以及木萨·杰鲁莱赫·比吉（1875—19?），这些人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最无畏的人物，而且也是最渊博的神学家。对于鞑靼人来说，改造落后的教育制度也是必要的，首先着手教育制度问题的是语言改革家阿不都·凯尤木·纳西里，在他之后，又有大批作家从事这一工作。他们使通常被人们称为十九世纪末的“鞑靼文艺复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同时，伊斯迈勒·拜·杰斯普里斯基（参见下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的一些门徒，也将他们的现代教育方法介绍进了鞑靼地区。在二十世纪初，喀山和其他的鞑靼城市——奥伦堡、特罗伊茨克和阿斯特拉罕等，¹⁹¹都以伊斯兰教神学院、印刷品和鞑靼语出版物，使这些城市又恢复了作为辉煌的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些城市的影响大大超出了鞑靼地区之外，甚至超出了俄罗斯帝国的界限。

但是鞑靼人还具有另外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俄国统治下保持了下來，这一优势就是鞑靼人与另外的俄国的突厥民族在语言上的近亲关系和宗教上的联系，这种联系使鞑靼人能够向四面八方扩大他们的影响，宣传泛突厥和泛伊斯兰教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前线，鞑靼人将他们自己置于与俄国人直接对抗的地位。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包括了俄国的全部穆斯林民族。

第一次俄国革命，为鞑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提供了一次机会，他们于1905年和1906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斯堡召开的三次伊斯兰教大会上，公开宣布了他们的要求。这些人的要求是很节制的，他们仅仅要求政治权力的平等以及宗教、文化的自由，他们甚至还没有提出独立的要求。

1917年2月，在鞑靼民族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原来对他们来说，政治自治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随着专制政体的崩溃，政治自治似乎已经临近了。鞑靼人中的两派为了争夺鞑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发生了争论。“政治统一者”要求，在统一的俄国内，实行全俄罗斯穆斯林治外法权的自治（这一纲领与节制的中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而更为激进的“联邦制拥护者”则主张，在封建的俄国内，实现伏尔加——乌拉尔国家的领土独立。1917年5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泛俄国穆斯林会议上，联邦制拥护者趋向于要夺得领导权，但是十月革命和1918年国内战争的爆发，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

与此同时，鞑靼人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并没有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终止。原来作为改革运动斗士的大批穆斯林知识分

子，在1918年加入了共产党，但他们仍然还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1920年5月27日，建立了鞑靼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这并没有使¹⁹²民族主义者满足，因为鞑靼人只是勉强占鞑靼共和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有一半鞑靼人发现，他们是在自己共和国的疆域之外。反对俄国中央集权制的斗争，后来又在共产党内部继续进行。这一斗争是由以米尔·赛德·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领导的，他们叫嚷着要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突厥斯坦的穆斯林领土的大突厥国家——都兰，以上地区的人口合计要达到二千万居民以上。此外，他们还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穆斯林共产党，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世界内承认穆斯林文化的独特地位。这些“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行为，采取了“异端”的形式，这种“异端”在“苏丹加列夫主义”的名义下受到了谴责，第一次在1923年，最后是在1928年。苏丹加列夫和他的同伴被肃清了，高压也降临到了鞑靼知识界的头上。

自从国内战争以来，尽管四十多年来从不间断地进行了反宗教宣传，而且在年轻一代中也出现了普遍的“非伊斯兰化”倾向，但是对于伏尔加河的鞑靼人来说，并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一般说来，原来作为俄国伊斯兰领导者的鞑靼人的地位是很不稳定的，他们被分散在苏联的广大地区，所以鞑靼人最容易受到俄国同化的影响。今天，鞑靼民族已经认识到，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中，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b) 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汗国是继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亦必儿汗国

之后,在俄国统治下灭亡的第四个穆斯林国家。在1736年和1737—1738年,克里米亚遭到了俄国军队的蹂躏,1771年克里米亚第一次被占领。库舒克—凯奈德吉条约(1774年)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克里米亚的保护国关系,使克里米亚汗国在理论上得到了独立。但是条约承认,具有哈里发地位的苏丹,是鞑靼人的精神领袖,从而调节了鞑靼人与土耳其政府的精神上的联系。几年之后,俄国军队利用沙辛·吉列亦汗与土耳其支持者之间的纠纷,终于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在1783年4月9日喀德琳二世的声明中,十分明确地宣布将克里米亚汗国并入沙俄帝国。但是直到1792年1月6日的雅西条约,土耳其才正式承认了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兼并。

鞑靼人曾经使他们的北邻闻风丧胆,随着俄国的占领,在鞑靼民族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黑暗的一章。虽然4月9日的声明同意,对当时为数近400,000人的穆斯林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予以保护,保障他们的宗教自由以及与俄罗斯人同等的权力,但是自从征服之后,克里米亚居民与这一地区的新的统治者的关系,却给鞑靼社会带来了衰败的命运。随着原来克里米亚汗国的封建制度的瓦解,克里米亚统治阶级的主要收入只能通过军事远征来供给,而不是靠开发土地来获取。由于失去了他们的经济收益,而且逐渐同化于俄国贵族,鞑靼贵族阶层面临着毁灭的命运,这一过程虽然很缓慢,但它却是无法改变的。大约仅仅有十个大家族享有属于他们这一阶层的实际的特权,但是即使是他们,也逐渐走向了俄罗斯化,残存的鞑靼贵族一落千丈,以“穿木鞋的贵族”(Chabataly mirza)而知名于世。

穆斯林教士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保护。1794年，在辛菲罗波尔设立了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这一职务，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是从穆斯林社团中挑选的（虽然是从一份由俄国政府同意的名单中挑选）。保证教士物质利益的瓦克夫（由教会永久管业权掌握的财产）也保留了下来。但是，俄国人逐渐侵夺了大量的瓦克夫，1917年仅有100,000公顷土地的瓦克夫，与此比较，1783年的瓦克夫为460,000公顷。

在俄国人的征服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占鞑靼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1784年起，陶利斯总督波捷姆金公爵为了俄国贵族阶层成员的利益，采取了没收最肥沃的土地的政策，这一政策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为了在克里米亚地区实现“非鞑靼化”的目的，俄国政府力求吸引外国殖民者（德国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波罗的海人），其次还有俄国人（退役战士和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前往克里米亚。在1800年，这些殖民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0人。也正是在这时，那些被剥夺的鞑靼农民又被赶回了中克里米亚的干旱地带。

日益增长的苦难折磨着鞑靼人，他们被俄国政权所征服，俄国政权的统治虽然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残暴的地步。但已显示出了它的暴虐。在鞑靼人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他们光辉的过去，所以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衰败状况，这样，鞑靼人就自然而然地更加转向了奥斯曼帝国。但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帮助，向土耳其迁移，对鞑靼人来说似乎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因此在1783—1893年之间，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仅仅只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迁移过程，鞑靼人的迁移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迁移过程

中，成千上万的迁徙者死于疾病和饥饿。

开始于 1784 年的大量移民出走，是一个个人出走的过程。仅仅在 1788 年，就有将近 8,000 人，特别是贵族阶层成员离开了克里米亚地区。1787 年俄土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鞑靼人被赶到了内地。从雅西条约签定时起（1792 年），移民表现出了群众运动的特点，100,000 多鞑靼人从南克里米亚离开了这一地区。在 1808—1811 年俄土战争期间，形势变得更坏了，在巴克契萨莱爆发了一次起义，大量游牧的那海人从彼列科普地区启程前往土耳其。十九世纪初期，克里米亚人口总数为 200,000，而穆斯林教徒大概不会超过 80,000 人。由鞑靼人留下的空白，被外国定居者填充了。

十九世纪前半叶，没有突出的事件改变穆斯林社团的地位。在 1829 年的战争中，克里米亚保持着平静的局面。新的移民继续大量进入克里米亚，但是，由于鞑靼人出生率的自然迅速增长，大约到了 1850 年，鞑靼人口已经达到 300,000 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其中有将近 50,000 人是那海人。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新的悲剧降临到了鞑靼人身上。在联合占领期间，鞑靼人虽然保持置身于争端之外，但是他们无法隐瞒他们对土耳其的同情。结果由于害怕报复，又导致了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出走。最初，俄国人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后来实 195 际上是鼓励移民出走。据估计，在 1859 年到 1863 年之间，占全部鞑靼人口三分之二的 135,000 鞑靼人以及 46,000 那海人去了土耳其，在他们身后，留下了 800 个荒芜的村庄。这时，俄国当局开始担心这种移民的规模，并且试图阻止移民出走，但是没有收到任

何效果。1875年，又开始一次新的迁徙浪潮，这次迁徙一直持续到1880年，其间涉及移民60,000多人。最终在1891到1893年之间，最后的一次移民浪潮又将大约20,000鞑靼人带进了土耳其。

到十九世纪末，鞑靼人在克里米亚只是一支少数民族。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克里米亚只有187,000鞑靼人（在523,000总人口中），这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可怜的贫困社团。在整个欧洲俄国的穆斯林社团中，他们是文化水平最低的社团之一。克里米亚汗国的光荣的记忆，似乎已被彻底忘却了。

但是，这个落后的民族注定要再次经历一次文化上的重新觉醒的时期。最后一抹灿烂的夕阳，照亮了鞑靼的历史。这一光荣归于一位卓越的人物。

这位担负起伟大的鞑靼文化复兴的任务的人物，是伊斯迈勒·拜·杰斯普里斯基（又作 Gaspraly）。杰斯普里斯基是小贵族阶层的一名成员，他完成了传统教育和俄国教育，并且长期居住在法国和土耳其。此后，杰斯普里斯基于1877年返回了自己的故乡，用自己的热情，广泛地展开了复兴自己的民族以及突厥民族的工作。作为一名渊博多产的作家，作为一名进步势力的坚决支持者，杰斯普里斯基力求将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协调起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天才的教师，他的教育“新方法”，首先在由他作为典型的巴克契萨莱伊斯兰教神学院应用，尔后又推广到了俄国大多数伊斯兰教学校。这种方法后来还传入了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甚至也包括遥远的印度。最为重要的是，杰斯普里斯基是泛突厥运动的发起人，泛突厥运动旨在通过一种共同思想和语言，团结“从巴尔干到中国”的突厥民族。杰斯普里斯基在他的著作《代言

人》(Terdjuman)中, 阐述和宣传了这种思想。在1882年至1914年之间的三十五年间, 这本书是最好, 也是读者最多一本伊斯兰著作。¹⁹⁶毫无疑问, 杰斯普里斯基是二十世纪初期对伊斯兰教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在俄国本土, 杰斯普里斯基使鞑靼人认识到了他们的团结的必要性, 并由此唤起了他的同胞的政治觉悟。在克里米亚, 他的工作吸引了俄国和土耳其伊斯兰知识界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年轻的作家和政治思想家犹如璀璨的明星, 都聚集在巴克契萨莱, 巴克契萨莱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

1905年革命之后, 杰斯普里斯基的信徒们比他们的老师要激进得多。在青年土耳其党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下, 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进行文化改革, 而是提出了政治、经济的要求。“青年鞑靼党”成员在1917年2月初建立了“民族党”(Milli Firka), 并且试图要夺取政权。1917年5月, 他们在辛菲罗波尔召集了一次大会(Kurultay), 在大会上制定了鞑靼政府的宪法和穆斯林军事组织的建制。但不幸的是, 鞑靼人在克里米亚半岛仍然只是少数, 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有力, 而且占人口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在1920年11月最后终于被红军占领之前, 克里米亚在1917年至1920年的四年间, 被敌对派别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搞得四分五裂, 这些派别是共产主义者、德国人、协约国以及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白卫军。

1921年10月18日, 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道法令, 宣布建立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克里米亚共和国相当于苏联共产党与鞑靼人(即原来的民族党激进分子)的联合政府。克里米亚的穆斯林社团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 在苏维埃政权初年, 鞑靼语被承认与俄

语同时作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开放了鞑靼学校；而且有许多鞑靼人被委任以官职。但是，真正的权力还是保持在俄国人手中。1921年，克里米亚的共产党员总数为5,875人，其中仅仅只有192人是鞑靼人。

1928年，当莫斯科政府开始肃清鞑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¹⁹⁷时，苏联共产党人与鞑靼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盟也就惨痛地结束了。克里米亚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利·伊布拉吉莫夫以及他的大批同僚，都是在这时被判刑或者被处死了。

在苏联统治下，仍然有大批俄罗斯移民经常流入克里米亚。根据1926年的人口统计，共和国的总人口已经上升到了875,100人，而其中鞑靼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被德国军队占领了。当1944年苏联部队重新攻占克里米亚半岛时，全体鞑靼居民都被指控在占领期间“通敌”、“叛国”，并且被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随着这次放逐，克里米亚鞑靼民族的历史就悲惨地结束了。被放逐的幸存者从来没有再次复兴，而且也没有被允许重返他们的故土。现在，他们散布于整个中亚诸共和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在中亚地区已经同化于突厥斯坦的诸突厥民族之中了。在塔什干，克里米亚鞑靼人还出版了一份鞑靼文的报纸，这就是他们那漫长而光荣的历史的最后一点可怜的残迹。

2. 俄国人统治下的哈萨克草原

俄国人之占有哈萨克草原和吉尔吉斯山区广袤的领土与另外

的伊斯兰地区不同,他们对哈萨克草原和吉尔吉斯山区的占领,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的。在十八世纪初期,哈萨克人为了反对卫拉特人的入侵,转而寻求俄国的帮助,也正是在这时,俄国就与哈萨克诸汗建立了一种非常松散的保护国关系。紧接着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人先是在哈萨克草原的边缘地区,后来又深入到了草原腹地,建筑了堡垒线和要塞,最后,俄国人才采取了直接统治哈萨克草原地区的手段。

俄国人征服的时间,可能要从哈萨克诸汗政权在三个玉兹被镇压时算起。中玉兹在1822年,小玉兹在1824年,布凯帐部落在1845年,大玉兹在1848年,都分别被俄国镇压。最后俄国人终于在1864年占领了锡尔河地区,锡尔河地区属于突厥斯坦的艾弥儿政权所有,但是这里是由哈萨克人居住的。¹⁹⁸

沙皇统治在哈萨克草原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审慎的过程。彼得堡政府并没有给予哈萨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们还仍然保持着“外侨”(inorodtsy, allogénes)的身份。哈萨克人被免除了兵役,而且保持了他们的一些习惯法。虽然哈萨克贵族阶层的封建权力已经被剥夺,但是他们还在当地水平上,以“长老议事会”的形式保持着他们的自治。在对哈萨克人的贸易方面,一直到1860年,俄国人都是利用喀山的鞑靼人的帮助与哈萨克进行贸易的,鞑靼人利用这种便利,加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哈萨克人的影响,并且在仍然保持着半泛灵论的游牧民族中巩固了伊斯兰教信仰,由此,他们得益不浅。

然而,俄国人与哈萨克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从十八世纪末叶起,哥萨克人开始在哈萨克草原的西北、东部边缘地区

定居,后来到了十九世纪,最早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农业殖民也开始出现了,这就使空旷的土地不断缩减,而空旷的土地对于游牧者畜群的移动却是非常必需的。甚至在俄国直接统治建立之前,很快就爆发了反对俄国人的起义。大多数起义都是由当时被剥夺的大大小的贵族领导的,这些起义还得到了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的支持。在 1783 年—1870 年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列举出八次规模巨大的起义。

最先举起起义大旗的是小玉兹部落的一位小贵族 (batyr) 斯里木达秃夫,他在 1783 年领导了一场游击战争,打击乌拉尔的堡垒线。斯里木达秃夫在 1797 年才被俄国人击败,他逃到了希瓦,并且于 1802 年在希瓦遇害。

在中玉兹,反对建立俄国统治的斗争开始于汗国被消灭之后的 1825 年。这次斗争是由被驱逐的统治者的后裔,阿布赉汗的孙子萨尔赞·喀齐莫夫和兀拜都刺·瓦利卡诺夫领导的。他们很快就被乌拉尔的哥萨克击败了,哥萨克将他们追进了草原,两个汗都逃到了浩罕。在 1831 年—1834 年之间,萨尔赞试图利用在浩罕征募的军队重返草原,但他又再次被击败。1837 年,阿布赉汗的另一个孙子怯乃萨莱又重新开始了反抗俄国的斗争。怯乃萨莱是一位精明的组织者和勇敢的武士,他在战斗频仍,极少和平的十年内,恢复了他对中玉兹,甚至一些大玉兹部落的统治。为了结束怯乃萨莱对俄国直接控制的地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克莫林斯克)的猛烈袭击,俄国人深入到草原腹地,建立了图尔盖和伊尔吉兹堡垒。1846 年,俄国人成功地将怯乃萨莱赶回了南部,1847 年又迫使他逃进了天山山区。吉尔吉斯人在天山山区击败并且杀

害了怯乃萨莱。怯乃萨莱的失败，结束了原来哈萨克统治者希望重新联合游牧部落，并领导游牧部落反抗俄国征服者的唯一认真的尝试。

就在同一时期，游牧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布凯帐部落哈萨克人中，也同时爆发了直接反对俄国人以及杨吉尔汗政权的运动。这次起义是由伊萨泰·泰曼诺夫伯克和民歌手马哈姆别特·乌捷米斯诺夫领导的，他们于1837年包围了杨吉尔的首都汉斯卡亚斯塔夫卡，但是他们被一支俄国军队击败，被迫逃往小玉兹的领地，伊萨泰与马哈姆别特分别在1838年和1846年被杀害。

1855年，另一位小贵族也赛·科季巴洛夫领导威海西部游牧的失克里氏族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三年后被击溃的。也是在1855年，小贵族占霍加·努儿马哈没得夫领导南部的哈萨克人，进行了反对锡尔河沿岸最早建立的俄国殖民地的斗争。

1867—1868年，在乌拉尔斯克和图尔盖地区爆发了最后的反对殖民化的斗争。这一地区诸部落的斗争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的斗争表现出了反对“异教”的“圣战”的特点。只是当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介入之后，这些部落的斗争才被粉碎。同一时期的另一次起义，爆发于里海东部的曼格什拉克地区。这里的起义者袭击了俄罗斯人的村庄，但他们后来也被由海上从巴库运来的军队击溃了。

到了1875年之后，流尽了鲜血的哈萨克旧封建贵族，已经再也无力使用武力来反抗俄国政权了。哈萨克地区似乎已经被“平定”。但是在鞑靼人传播的泛突厥与泛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下，哈萨克人明显地具有了这样一种感情，即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

者是部落，而是一个“民族”。俄国人对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感情很恼火，但是他们想利用这种感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人建立了一种新的，旨在抵销鞑靼人影响的政策。他们采取措施，消灭在哈萨克教育体制中的鞑靼教育，建立了俄罗斯—哈萨克学校。这样就促成了一个新的“西方化”的知识界的产生。这一阶层将与俄国的合作看成是引导哈萨克人走向进步的唯一有效的途径。这一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三个大文人，即俄国军官、东方学者乔坎·瓦里哈诺夫(1835—1865年)，人类史学者、教育学家伊不拉欣·艾勒廷萨林(1841—1889年)以及杰出的哲学家艾拜·昆嫩巴耶夫(1845—1904年)。艾拜·昆嫩巴耶夫是被争取到自由思想界的。另外的那些贵族后裔和在俄国学校中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诸如阿里·布凯哈诺夫、阿合买·拜图尔孙、米尔耶库卜·杜莱特等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起就一直紧步这三位哈萨克文化界精英的后尘。在他们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运动完全成了哈萨克式的，而不仅仅是泛突厥的民族主义运动，哈萨克民族主义运动有时甚至与其他的穆斯林的要求，特别是与鞑靼人的要求背道而驰。

但是，与俄国人进行有效合作的梦想只是一种乌托邦。1891—1892年，在未开垦的草原土地的吸引下，哈萨克地区爆发了一次巨大的移民浪潮。来自俄国的一百多万农民在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以及吉尔吉斯定居下来。大量移民的定居，引起了哈萨克地区家畜的减少，而且本来就已经非常低下的游牧人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急剧下降。此后，定居的俄国移民与哈萨克人之间的日常斗争，就构成了草原生活的一个背景。一

场危机已经不可避免,1916年,它终于以异常剧烈的形式爆发了。

如果说,经济上的困难是哈萨克部落大起义的远因的话,那么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就是1916年6月25日颁布的一项动员“外侨”的法令。这项法令不是要征募他们服兵役,而是要他们进行集体劳动。起义首先开始于乌兹别克地区的俱战提和吉萨科,而且很快就波及到了整个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呈现出了民族起义的特点。在这次起义中,数千俄罗斯移民和数万哈萨克人以及吉尔吉斯人都横遭残杀,而且其中还不包括大量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人。超过300,000人的游牧者逃脱了镇压,在中国得到了保护。除了在图尔盖的荒地地区之外,各地的起义都被残酷地镇压了。图尔盖地区由艾曼盖勒丁·伊曼诺夫和阿利比·杨吉勒丁领导的起义者,一直坚持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时期。

沙皇政府垮台以后,哈萨克首领建立了一个具有自由纲领的民族党(Alash Orda)。十月革命之后,民族党最初与奥伦堡、乌拉尔以及七河地区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军队联合,建立了一个民族政府。但是这个政权只是徒具虚名,它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也就无法阻止正在向草原蔓延的国内战争。1919年5月,因为反动分子对民族党的要求故意采取敌视的态度,民族党的领导者决定加入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他们以希望维护哈萨克民族的利益为条件,与苏维埃政府签定了-一个条约。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政府同意了哈萨克与吉尔吉斯的地方自治。最初在天山吉尔吉斯的领地上建立了一个自治区,后来又成立了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1936年11月5日)。吉尔吉斯的人口在1959年大约是837,000,只占共和国总人口的40.5%。

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共和国——最初是自治区，后来是苏维埃（1936年11月5日）。起初，原来民族党的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作用要比共产党重要。一直到大约1928年，民族党领导人还保持着权力，在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民族党人力求保持哈萨克文化的完整性和哈萨克社会的独特性。但是自从1924年起，他们在众多存在争议的问题上——首先是有关游牧人定居的问题以及他们力图保护的有产阶级的消灭问题——是反对俄国共产党的。1928年4月，民族党人被指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几乎全部被肃清。

1921年，毁灭草原的可怕饥荒，对哈萨克民族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1928年以后实行的使游牧者定居的野蛮政策，则为害更甚。在1926年与1939年之间，哈萨克人口损失了将近一百万人。与1926年的4,600,000人相比，现在哈萨克的人口数仅仅稍多于3,500,00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农民、工人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涌进了哈萨克草原，今天哈萨克人在其共和国内所占比例不会超过29.6%。

3. 俄国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尽管俄国与中亚诸汗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突厥斯坦才迟迟被俄国军队征服。实际上在1714年，就有一支俄国远征军根据彼得大帝的命令首次进入了外里海高原。三年之后，另一支由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率领的远征队，甚至试图从阿斯特拉罕到达希瓦，

但是他的部队在沙漠中遭遇了埋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本人也被杀了。在1715年,由布霍尔兹指挥的另一支部队从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出发,试图从北方到达突厥斯坦。但是这支部队接触了卫拉特人,而此时卫拉特政权正处在其顶峰时期,所以俄国军队又被迫返回了西伯利亚。1840年,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将军再次率领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进攻希瓦,但是这次远征也彻底失败了。

在1837年至1847年之间,哈萨克汗怯乃萨莱封锁了俄国军队²⁰³通往锡尔河的道路。只是到了1847年之后,也就是说,在怯乃萨莱的起义被镇压之后,俄国对突厥斯坦的征服才真正开始。1847年,俄国人在锡尔河河口附近建立了赖姆堡,这是他们在希瓦边境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1855年,俄国人从浩罕汗国手中夺取了位于锡尔河中游的阿克麦肯特堡垒,紧接着就开始沿着锡尔河修筑堡垒线。与此同时,发端于塞米巴拉金斯科的另一攻势,也从东北部威胁着突厥斯坦。这样就导致了1854年韦尔内(现在的阿拉木图)的修建。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御俄国人进入突厥斯坦了。突厥斯坦地区分为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而且这三个汗国都被内部斗争以及游牧人的起义削弱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突厥斯坦经济落后,而且缺乏现代军队,这就使他们无法对俄国人组织的力量进行认真的抵抗。但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哈萨克部落的反抗以及高加索战争,俄国人的征服也因此而被拖延了。只是在彻底击败了伊玛目沙弥儿,使达吉斯坦的部队腾出手来之后,俄国人对突厥斯坦的吞并才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1864年,一支由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率领的部队从韦尔内出发，攻克了突厥斯坦的城镇(牙昔)，然后又攻取了奇姆肯特，在1865年5月占领了属于浩罕汗国的塔什干。两年之后，俄国人袭击了布哈拉。1868年5月攻克了撒马尔罕，同年6月，在吉拉布拉克战役中击败了布哈拉的军队。1868年6月18日，布哈拉的艾弥儿签署了一个条约，将他的国家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1873年，征服的矛头又指向了希瓦，希瓦汗国的首都被攻克。8月12日的一项条约，结束了希瓦汗国的独立地位。

1875年，俄国人终于入侵了浩罕汗国，浩罕的首都于8月29日被放弃。1876年2月19日俄国人消灭了他们在中亚的最危险的对手——浩罕汗国，将浩罕的领土并入了突厥斯坦总督的辖区。

204 1873—1874年之间，俄国人占领了土库曼地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征服。随着斯科别列夫将军占领格奥克帖佩绿洲(1879年)和1884年之征服土库曼地区，俄国人最终结束了他们在土库曼的征服活动。

除了布哈拉和希瓦这两个被保护国的领土之外，俄国人将突厥斯坦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突厥斯坦变成了总督的辖地，而总督是向陆军部负责的。对穆斯林居民，俄国人则保持了一种“殖民”的态度。与他们对待从突厥人征服的其他的一些穆斯林地区所采取的手段相比，俄国人既不希望将突厥斯坦本地居民俄罗斯化，甚至也不希望本地居民接受欧洲文明。突厥斯坦的人民并没有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公民，他们也不适合服兵役。突厥斯坦人民保留着他们自己根据伊斯兰教教规制定的法律制度，而且也保留了他们自己当地的管理机构。俄国当局希望在突厥斯坦保持一个最具有

传统的社会形式。这一社会是由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而且也是排斥外部世界影响的社会。他们尤其反对那些居住在伏尔加河，与突厥斯坦人民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又有更高文化的人与突厥斯坦人之间的交往，他们也反对鞑靼人将奥伦堡伊斯兰教协会的权限扩大到突厥斯坦的要求。由于以上全部原因，在突厥斯坦人民中间，民族意识的觉醒就要比俄国其他的突厥人慢得多。

突厥斯坦属于绿洲地区，较之于哈萨克草原和吉尔吉斯山区，突厥斯坦是不适合进行移民的。例如，即就最一般的标准来说，这里可用于农耕的土地也是缺乏的。甚至这种少量定居者的进入，也已经足以引起俄罗斯人与突厥斯坦农村土著居民之间的冲突了。与此同时，俄国工人来到突厥斯坦，帮助建设铁路和创办纺织工业。后来，突厥斯坦诸城市很快就具有了殖民城市的特点，紧靠着旧的“本地人”城镇，组成了现代的“欧洲人”居民区。

反对俄国殖民的斗争，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一运动表现出了宗教的特点。这种反对“异教”的“圣战”，有时旨在恢复原 205 来的浩罕汗国。圣战的领导人几乎总是来源于宗教背景，而且经常出于泛神论神秘主义者阶层。而他们的追随者则来自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由于他们的斗争的自发性和无政府性，而且又没有外界的支持，所以这些斗争总是轻易地就被镇压了。

最初的起义是 1885 年费尔干纳盆地的托钵僧汉图里的起义，紧接着在 1891 年有纳曼干地区的起义和 1892 年塔什干以及浩罕附近地区的起义。1898 年，日益增长的不满，导致了纳合昔班底教团的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兄弟会组织的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伊尚·迈代利的起义。伊尚·迈代利聚集了2,000多名战士，宣布了一场圣战。起义者袭击了在安集延(Andijan)的俄国驻军。但是在取得了最初的一些胜利之后，他们就被打败，而且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二十世纪初，由于俄国当局的防范，阻止了进一步起义的倾向。从此以后，反对俄国压迫的斗争只有在改革的招牌下进行了。

尽管有检查制度，改革思想和泛突厥思想还是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了突厥斯坦。首先，这些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伊斯迈勒·拜·杰斯普里斯基和他的克里米亚的门徒的努力。自从1905年以后，伏尔加河的鞑靼人使改革运动活跃了起来，而最后到了1908年之后，改革运动则处在了青年突厥党的影响之下。日本对俄国战争的胜利，在俄国人与突厥斯坦人之间的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俄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了，而突厥斯坦人的斗争，则逐渐地转向了政治要求。在突厥斯坦，形成了一些秘密的和半公开的社会组织，他们出版和传播了民族主义者的著作。而另外的一些政治组织，如青年布哈拉党和青年希瓦党，则公开地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

1917年的二月革命，给了突厥斯坦人民一个公开表述他们的要求的机会。1917年5月，他们在突厥斯坦召开了伊斯兰教代表大会，委任了第一届民族政府——民族委员会。当十月革命爆发时，民族委员会试图掌握政权，在浩罕成立了一个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政府。但是他们的这种企图是短命的，浩罕政府既没有一个行政官员骨干阶层可供自己使用，而且首要的是，也没有一支听命于

浩罕政府，而且能够维持其存在的军队。1918年1月，塔什干的俄罗斯苏维埃派遣了一支由俄罗斯工人组成的部队前去进攻浩罕。2月19日，浩罕城被攻克并且遭到了劫掠。

在突厥斯坦，塔什干的苏联共产党人高踞于本地的穆斯林之上，对他们具有完全的支配作用，这形成了苏维埃政权最初两年的一个特点。这时“白卫军”将突厥斯坦与苏联其它地区隔绝了，对于反革命的敌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暴力的手段，但是苏维埃政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与反革命的敌人的斗争问题，他们还要与穆斯林革命者划清界限。根据塔什干苏维埃的一位领导人的说法，“因为革命是俄罗斯人发起的，所以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正是，也只能是他们。”在1919年底，从伏尔加河开来的一支红军到达了中亚，红军领导人立即开始着手消灭希瓦(1919年11月)和布哈拉汗国(1920年2月)。这两个汗国变成了花刺子模和布哈拉共和国。

尽管苏维埃政权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威胁，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的处境还很困难。一方面它不得不与巴斯马切斯的游击队进行战斗——穆斯林游击队战士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他们固守在布哈拉东部的山区中(现在的塔吉克斯坦)。这是由农民发动的，也是更为普遍的，既反对俄罗斯人也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到了1925年，在装备精良的苏联军队的干预面前，这一运动开始衰落了。一批起义者躲入了阿富汗，但是那些被孤立的游击队，则一直在山区坚持到了1936年。

另外一方面的危险，来自原来的那些改革者。在1920年之

后，原来的改革者全部都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虽然成了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民族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在207 一些年里，他们在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反对俄罗斯人，而且想要建立“穆斯林”民族的共产主义以及包括突厥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巴什基里亚、鞑靼斯坦等地在内的庞大的突厥国家，这样，他们就接近了建立一个都兰语国家的目标，这一目标是由同一时期的喀山的苏丹加列夫精心制定的。

1921年以后，俄国人开始审慎地从重要岗位上驱除本地的共产党人。尽管遭到了本地共产党人的反对，突厥斯坦还是在1924年被分割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几个民族共和国。这几个民族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建立一个联合的突厥国家的梦想。在1930年，终于开始了大规模清洗。这次清洗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了1938年。在清洗过程中，本地知识界的大部分人都被消灭了。这些人在1919年之后曾经嘲讽过共产主义政权。

然而，尽管主张独立者已被粉碎，突厥斯坦人民的自治愿望也已经破灭，但是今天的中亚，还是苏联最后的突厥堡垒。因为中亚地区地理结构的关系（沙漠和绿洲），俄国人在中亚的殖民还是很薄弱的。据估计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非穆斯林在1959年实际上低于15%，土库曼斯坦的非穆斯林则少于20%。一度曾经是广袤的蒙古帝国一部分的突厥斯坦，似乎将来仍然会属于突厥诸民族。

第十五章 俄国的征服及其 对突厥斯坦的管理

(至 1917 年)

在中亚西部(突厥斯坦)诸国渐次衰落和分裂的同时,兴起了 208 俄罗斯大国。俄国政权的兴起,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预示了中亚西部地区的命运。但是,在以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亦必儿汗国为牺牲,掀起了最初的向前推进的浪潮之后,俄国人又集中全力于另外的地区,这样就迫使他们对其东南边界地区采取了守势战略。俄国人以奥伦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以及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为基地,建立了一条从里海到阿尔泰山的漫长的哥萨克殖民线,以阻止哈萨克入侵伏尔加河地区和西西伯利亚。

但是这种防御政策从来没有使俄国人满意过。虽然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哈萨克人就已经在名义上臣属于俄国,然而他们还经常突破防御线,袭击定居居民。而希瓦汗国这时也鼓励哈萨克的起义,为起义首领提供避护,而且为俄国俘虏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由于哈萨克人袭击商队,俄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更加稳定的边界。

由于消灭了中玉兹(1822年)和小玉兹(1824年)汗国,并且在俄国的监督下建立了由诸苏丹统治的更小的帐落统一体,从而逐渐破坏了哈萨克的独立。俄国在草原上建立了一些前哨基地:在奥伦堡南部,有科克切塔夫和卡尔卡拉林斯克(1824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南部,有科克佩克特(1820年)和拜安奥尔(1826年)以及在亚历山大·冯·亨博德特考察之后建立的谢尔吉奥波尔(1831²⁰⁹年)。穆拉维耶夫使团和列格雷使团分别对希瓦(1820年)和布哈拉(1820年)的出访以及别尔格上校和埃奇瓦尔德的远征(1825—1826年),使俄国人得到了这一地区以外的有价值的情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人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立了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要塞。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保护贸易的要求和反对英国在阿富汗影响的需要,导致了一次由彼罗夫斯基将军领导的,对希瓦的更大规模的远征。这次冬季远征是在1839年发动的,战争的结果以将近一千人丧命和远征队大部分运输工具的损失而告终。彼罗夫斯基的失败突出地表明,俄国人需要更为深入草原的基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期间,俄国在奥伦堡南部建立了几个较小的要塞,它们是图尔盖和伊尔吉兹(1845年)、阿特巴萨尔和乌卢塔夫斯克(1846年)。而设置在锡尔河河口的赖姆要塞(阿拉尔斯克,1847年)则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意图。在东方,阿拉套山脚下的科帕尔要塞的建立(1847年),则使俄国人得到了伊犁河北部地区。

俄国人于是开始侵占那些据称属于浩罕汗国,但实际上却没有设防的土地。1853年,彼罗夫斯基领导俄国军队由阿拉尔斯克溯锡尔河而上,建立了一号要塞(卡扎林斯克),此后,他又继续

攻克了浩罕的阿克麦肯特要塞(重新起名为彼罗夫斯克),这样,彼罗夫斯基终于得以洗雪前耻。而在东方,俄国军队则占领了伊犁河南部的地区,建立了现在叫做阿拉木图的韦尔内城(1845年)。

俄国政府的计划,是要将其在南部扩张的两块地区连接起来,但是这一计划因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而被拖延了。紧接着就开始了已占领地区的巩固时期。哈萨克草原西部,在1859年组成了以奥伦堡为首都的奥伦堡吉尔吉斯州(Oblast)。而在草原的东部,则成了以鄂木斯克为首府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州,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组建于1854年,以塞米巴拉金斯克城为首府。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年),棉花供给突然紧张了。为了棉花供应的需要,俄国人重新开始了原来的军事行动。1864年5月,切尔尼亚耶夫上校率领一支2,600人的部队从韦尔内出发,210 维列夫金上校也带领1,600人从彼罗夫斯克出发了。6月4日,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猛攻奥利阿塔城(现在的江布尔),他们仅仅以3人负伤的代价就攻克了这座城市,而装备简陋、指挥无能而且无纪律性的大约1,500名当地驻军,却蒙受了死亡307人,受伤390人的损失。维列夫金也几乎同样轻易地攻克了突厥斯坦的城市(牙昔)。此后,两支部队汇合,由切尔尼亚耶夫指挥。在围攻了四天以后,奇姆肯特堡垒也在9月22日被攻克。这里的本地驻军有10,000人,但其中大部分人都闻风而逃,俄国人仅仅损失了2人。由于这次军事行动,俄国人占领了全部楚河河谷,而且用一条俄国堡垒线封锁了哈萨克草原。

上述这些军事行动的新闻,在欧洲诸列强的首都,特别是在大不列颠引起了关注。大不列颠为他的印度领地担心。1864年11

月 21 日，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致诸列强的一封措词圆滑的信件，减轻了他们的这种忧虑。戈尔恰科夫宣称，俄国首脑的动机很简单，他们只是要保证有一条有效的边界，也就是要有一条在俄国人反抗边境掠夺的斗争中，能够得到保护的边界。所以俄罗斯帝国只有推进到定居国家的边界才能够停止。俄国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之后，将修筑一条堡垒线来保护它的边界，使惯于掳掠的游牧人知道，贸易比掠夺好，而且将赐予他们“西方文明”的恩典。

1865 年初，俄国人以这些新得到的地区组成了突厥斯坦州。突厥斯坦州是由军事总督查辖的，军事总督兼理军事、行政事务，向奥伦堡总督负责。切尔尼亚耶夫被任命为突厥斯坦军事总督。俄国政府命令切尔尼亚耶夫不得再向前推进，但是他又主动攻下了塔什干的浩罕城。1865 年 4 月末，切尔尼亚耶夫攻克了位于奇尔奇克河畔的尼亚兹别克要塞。奇尔奇克河是塔什干地区水利灌溉的主要来源。两三天之后，切尔尼亚耶夫就以很小的损失，占领了塔什干城。

为了抚慰英国，俄国政府召回了切尔尼亚耶夫，但是却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切尔尼亚耶夫的继任者是罗曼诺夫斯基将军，他继续推行了切尔尼亚耶夫的计划。在第二年春天，罗曼诺夫斯基与
211 一支 3,600 人的小部队入侵了布哈拉的领土。在通往撒马尔罕途中的伊尔扎尔，他们将差不多 40,000 的布哈拉人与哈萨克人的军队从其固守的阵地上粉碎。此后，罗曼诺夫斯基溯锡尔河而上，进入了浩罕的领土，力求在布哈拉与浩罕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浩罕的璠城堡。5 月 24 日，经过炮击之后又攻克了俱战提城。俄国人只损失了 5 人，而防御者则损失了

2,500人。这样,最终迫使浩罕汗一呼达雅尔汗向俄国屈服了。呼达雅尔汗承认自己为沙皇的附庸,同意了俄国人的征服,答应俄国贸易通过浩罕境内,并且支付赔款,以赔偿俄国由于攻打浩罕而花费的费用。

有迹象表明,布哈拉的艾弥儿也倾向于谋求媾和。但是俄国政府已经决定,要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这一地位将使俄国将来的行为没有受到怀疑的余地。现在被沙俄当局视为俄国南部当然边界的,已经不是楚河或者锡尔河,而是阿姆河。1866年8月,由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担任指挥,准备进行一次新的战役。克雷扎诺夫斯基率领他的部队首先将兵锋指向乌拉秋别堡垒,并且在10月2日攻克了这个堡垒。俄国人损失了17人,当地人则至少有2,000人伤亡。几天之后,克雷扎诺夫斯基在10月18日占领了吉扎克,在这里,俄国人损失了6人,当地人则损失了6,000人。

1867年7月11日的一项帝国法令,宣布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突厥斯坦总督区以塔什干为中心,包括俄国自从1847年以来在突厥斯坦地区得到的全部土地,他们将这一地区分成了锡尔河州和七河州。先前在俄国占领的波兰土地上,即俄国西北地区担任总督的冯·考夫曼将军被委以突厥斯坦总督的新职。考夫曼享有广泛的权力,他有权进行军事行动和外交谈判。1867年11月初,考夫曼到达了塔什干,着手进行他的复杂的工作。考夫曼在突厥斯坦实行的组织模式,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近年来,“老突厥斯坦人”将考夫曼任期内的十三年过分地夸大为黄金时代,甚至英²¹²国的寇松勋爵也不无勉强地称赞他“虽然伟大得有限,但是毫无疑

问,也堪称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在考夫曼的统治下,突厥斯坦是仿照欧洲俄国的行政管理模式组织的。除了最高职务以外,突厥斯坦地区几乎全部都是由文职官员进行管理的。在经过一次人口调查之后,两个州被分成了县(uezd),县又分为乡(volosts),每个乡由几个游牧的“阿寅勒”(auls,父权家族团体,每个“阿寅勒”由200帐或者户组成)或者几个定居居民的村落(kishlaks)组成。每个村庄和“阿寅勒”选出它的长者和一个选民小组,再由选民小组帮助选出一位乡的首领,乡首领是向俄国县长负责的。在司法方面,还继续保持着习惯法(Adat)与穆斯林教规(Shari'at)的权力。只有当涉及到俄罗斯人的诉讼案件以及比较重大的犯罪案件时,才在俄罗斯人的法庭上审理。除了废除肉刑以外,俄国人的重大改革是选举原来由国家首脑任命的法官。当地的税收制度也被加以改造,使它与俄国人的习惯相适应,而且俄国人还实行了很有限的土地改革。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俄国人作出了努力,研究难以负担的瓦克夫制度(赠送给寺院和慈善机构托管的财产)以及复杂的水利法制度,虽然就这方面来说,改革的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

考夫曼有意不去改变当地的习俗。虽然他对于当地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很痛心,但是他宁肯实行一种清静无为的政策,而不去触动这些问题,以免引起当地人的愤怒。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样作并不是不关心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理论根据是,通过好的榜样的影响而发生的渐进的变化,要比实行高压政策好得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考夫曼反对乌法的伊斯兰教机构要扩大其权力,以控制突厥斯坦伊斯兰教

机构的努力。由于害怕会引起穆斯林教徒的反抗，他甚至禁止俄国东正教派遣传教士前往突厥斯坦地区，而且他也反对在塔什干设立一个东正教主教区。

1868年春天，考夫曼听说布哈拉艾弥儿带着明显的敌意，正在撒马尔罕集结他的部队，于是考夫曼入侵了布哈拉的领土。5月2日，他攻克了撒马尔罕，此后，又攻下了乌尔古特和卡塔库尔干城。一个月之后，考夫曼的部队于6月2日在卡塔库尔干城附近的吉拉布拉克高地咬住了布哈拉的主力部队。虽然布哈拉人拥有6,000多名步兵，15,000名骑兵和十四门轻型火炮，形势对他们十分有利，但是他们还是遭受了重创，落荒而逃。这次战役迫使布哈拉艾弥儿向俄国人投降了。在1868年6月18日的条约中，规定布哈拉割让撒马尔罕、卡塔库尔干、俱战提、乌拉秋别以及吉扎克，布哈拉还同意付出500,000卢布的赔款。象在浩罕一样，布哈拉欢迎俄国臣民自由地来布哈拉，并且在布哈拉的边境地区内贸易，而对俄国货物则只征收微不足道的一点税收。那些被割让的土地作为泽拉夫善区(即后来的撒马尔罕州)被并入了突厥斯坦总督辖区。布哈拉的艾弥儿要求允许他退位，但是考夫曼认为，使布哈拉有一个承认俄国霸权的统治者，对他们是有用的。所以俄国人不仅巩固了艾弥儿作为布哈拉统治者的地位，甚至还帮助艾弥儿镇压反对艾弥儿政权的起义。

接下来俄国人又得到了伊犁河上游的中国领土。1862年，在准噶尔爆发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蔓延到了伊犁地区。1864年，伊犁本地的东干人(汉回)和塔兰奇人(中国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人)联合起来，摆脱了清朝的统治。位于固尔扎的俄国领事馆以及

在楚呼楚的一个俄国工厂都被摧毁，商业也被迫停止了，逃难者充斥边界，进入了七河地区。

与此同时，在 1853 年曾经领导保卫阿克麦肯特要塞，抵抗彼罗夫斯基的浩罕将军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发起了一场叛乱。他驱逐了中国人，由自己建立了一个汗国。这一新的地方政权的建立，预示着中亚的力量均衡的破坏。阿克柏伯克对英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引起了俄国人很大的惊恐。如果阿古柏伯克将其统治扩展到了准噶尔，就可能会威胁与准噶尔接壤的七河州。这样将会导致英国影响大范围的扩大，而英国影响的扩大，则会对俄国的地位形成侧翼包围的形势，甚至最终将会威胁到欧洲俄国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关系。²¹⁴ 1871 年 6 月，为了阻止这种形势的发展，结束蔓延的混乱状态，考夫曼命令俄国军队占领了伊犁河上游地区。对于占领伊犁省（中国人是这样称呼这一地区的）或固尔扎地区（俄国人如是称）的行动，俄国人纯粹是作为一种对国际舆论所关注的临时事态来处理的。他们向中国人保证，只要中国人能够重新控制喀什噶尔的叛乱诸省以及准噶尔的其他地区，他们就从被占领的地区撤走。俄国人可能是认为中国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但是，阿古柏伯克在 1877 年与中国人的一个战斗中被击败，阿古柏王国被粉碎了，中国人恢复了对喀什噶尔的统治。经过几个月的外交谈判之后，俄国人虽然得到了赔款，割让了伊犁地区的一部分，但是在 1883 年，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对伊犁地区的控制。用在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的话来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吐出了她已经吞下去的领土。”

但是在此期间，俄国人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更大的目标，这些目

标中的第一个就是希瓦汗国。十七世纪由乌拉尔哥萨克人发动的三次远征、1717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的远征以及彼罗夫斯基在1839年的远征,全部都遭到了希瓦汗国这一宿敌的致命打击。1837年初,当考夫曼提议使用军事行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希瓦的问题时,这一建议很快就通过了。俄国人向英国政府保证,他们打算仅仅采取一些惩罚性的措施。

从军队规模和技术装备来看,希瓦都毫无胜利的希望。象以往一样,希瓦首要的凭借就是它优越的地理形势。为了保证远征的成功,也为了使将领们得到更多的荣誉,俄国人制定了由几个方向推进的计划。主要的一支部队从塔什干出发,另外一支部队由奥伦堡出发,还有一支从克拉斯诺沃茨克出发,第四支部队则由曼格什拉克半岛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要塞出发。全部远征军拥有13,000名士兵和62门大炮。远征军由考夫曼指挥,考夫曼本人跟随塔什干的这支部队同行。如同后来所证明的那样,有一支小部队就已经足够了。由于为其规模所累,塔什干的部队在到达阿姆河(5月12日)之前,好不容易才躲开了沙漠中的灾难。而克拉²¹⁵斯诺沃茨克的部队则因备受炎热与缺水的折磨,不得不返回了它的基地。在这支部队中,有60人死于中暑,部队的辎重,包括大炮也被丢弃了。与此相反,奥伦堡与曼格什拉克的两支部队却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他们的炮火,很快就使对方士气沮丧。当考夫曼的部队到达时(5月29日),这两支部队已经在准备进攻了。他们仅仅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攻下了希瓦。希瓦汗枪惶出逃,但他很快又被考夫曼叫了回来,在俄国人的指导下统治希瓦。希瓦居民也受到了优待,俄国军队保持了严格的纪律。在考夫曼的命令下,

希瓦汗宣布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取消奴隶制。在8月12日签定的一项条约中，希瓦割让了阿姆河右岸的领土，同意付出赔款，放弃与外国发展独立关系的权力，同意俄国人的居住权和免税贸易权。英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最后也以俄国人承认阿富汗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为条件，承认了俄国人的征服。

这样，三个主要的中亚国家都降为俄国的附庸，俄国的权力只有在浩罕还不稳定。浩罕统治者呼达雅尔汗因为他的残暴、苛捐杂税以及他与俄国人的关系，使他很不得人心。1875年7月，爆发了一次反对呼达雅尔汗的起义，呼达雅尔汗不得不逃入俄国军队寻求保护。起义者拥立呼达雅尔汗的长子纳速刺丁为新汗。8月，起义蔓延到了已经被俄国占领的原来浩罕的领土上。起义者将这次起义宣布为一场圣战，他们进入了俱战提，包围了城堡中的俄国要塞。考夫曼火速赶到俱战提增援，此后，他又侵入了浩罕的领土。8月22日，考夫曼向大约有30,000到50,000人的一支主要起义武装力量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马赫拉姆要塞，而且击溃了这支起义武装。当地人在要塞中留下了90具尸体，由斯科别列夫上校率领的哥萨克人顺着锡尔河沿岸将这些逃亡者追击了几公里，杀死了1,000多人。俄国人只损失了6人。后来，考夫曼很轻易地就再次攻克了浩罕城以及其他的城镇。9月23日，考夫曼在马尔吉兰(Marginan)与纳速刺丁汗签定了一项和平条约。纳速刺丁答应付给俄国3,000,000卢布的赔款，割让浩罕在锡尔河右岸的全部土地，放弃履行外交关系或者在未经总督许可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但是，浩罕汗国的整个东部地区尚未征服。安集延又爆发了起义。当特罗斯基少将企图猛攻安集延时，他的部

队遭到了打击，至少损失了 50 人。这时斯科别列夫已经成了少将，斯科别列夫后来被任命为指挥官，经过一系列激烈战争之后，起义首领在 1876 年 1 月被迫投降。俄国政府不愿恢复本地人的统治，在 2 月 19 日将浩罕并为一个州，这个州就以古老的费尔干纳命名。

俄国人已经在阿姆河以南，外里海地区取得了一个立足点。1869 年底，斯托列托夫上校率领一支从高加索地区开来的部队，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建立了一座要塞。克拉斯诺沃茨克附近地区作为隶属于高加索总督的达吉斯坦州的一部分，被并入了俄国。1873 年，克拉斯诺沃茨克成了对希瓦战争的基地之一，这时有更多的土地被俄国人兼并。这些荒凉的地区对于俄国人来说，并不能取代占有沿海据点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因为占有了沿海据点，将大大有益于俄国与伊朗以及大不列颠的交往。不久，土库曼人的袭击，使俄国人认识到必须采取对策，建立起内陆前哨。1879 年，高加索第一流部队的指挥官拉扎列夫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特克土库曼人的不驯服的阿哈尔部落。拉扎列夫死于行军途中，但是他的副手洛马金则逼近了这块绿洲。1879 年 9 月 9 日，洛马金发现几乎全部绿洲居民（大约有 20,000 人）都躲进了登吉尔捷佩（有时以 Geok-Tepe 知名）山上堡垒的土墙后面。本来，使用大炮和火箭投火器是可以攻下这座堡垒的。但是急功求利的洛马金却过早地命令停止炮击，以便使骑兵能够通过猛攻来占领堡垒。这样就给了土库曼人一个机会，当俄国人冲锋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被迫溃败下来。俄国人遭受了在中亚所经历的最惨重的损失，参战的俄国军队共有 3,024 人，其中有近 200 人丧生，250 多人受

伤。

俄国政府深怕这次失败会动摇俄国人的威望，很快就命令刚刚从俄土战争中载誉归来的斯科别列夫将军率军再次进行远征。到了1880年11月初，斯科别列夫已经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和另外的沿海据点集结了一支11,000人的部队。虽然这支部队已经开始从克拉斯诺沃茨克修筑一条铁路，但是由于铁路没有能够及时建成加以利用，就用了大约20,000头骆驼来运输。到1880年11月下旬，斯科别列夫的军队到达了阿哈尔特克绿洲，并且包围了这里的要塞。在这支部队的后面，大约有7,100人组成了供应线。防御者如同以往一样，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斯科别列夫坚持不断地炮击，而且使工兵在要塞的墙下布设了地雷。1881年1月12日，俄国人终于爆炸了他们的地雷，攻占了要塞。惊慌失措的守卫者向另一面的大门外蜂拥而逃。胜利的俄国人穷追不舍，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将溃逃者全部砍死，追杀了几千人。在要塞中间，发现了6,500具尸体。俄国人杀死了没有能够逃脱的全部男子，留下了大约5,000名妇女和儿童，释放了600名伊朗奴隶。

登吉尔帖佩的刽子手粉碎了土库曼的反抗活动。特克人对俄国人的势力信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成了沙皇的忠实臣民。几天之后，库罗帕特金上校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喀哈以及其他的据点。1881年5月6日，外里海地区被宣布为隶属于高加索总督之下的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州。斯科别列夫被任命为新州的统治者。但是，俄国人很快就调离了斯科别列夫，而由科马罗夫代替了斯科别列夫。很明显，他们这样作是为了缓和英国人的意见。

1884年2月18日，科马罗夫占领了重要的捷真绿洲的中

心——木鹿,5月,他又攻克了撒刺哈夕要塞。1885年初,科马罗夫的士兵攻占了通往赫拉特的道路上的祖菲凯尔关口,3月,他们与阿富汗人交战,并且拿下了库什卡。俄国人对印度的明显的威胁,将大不列颠与俄国带向了危险的战争边缘。可是后来还是由两个帝国的外交官员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1887年的俄国—阿富汗边界条约,确认了俄国的征服。²¹⁸

1891年,俄国人又企图占领帕米尔高原,由此引起了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另一场危机。这次危机在1895年3月的英—俄条约中得到了和平解决。根据这个条约,派遣了一个委员会测量帕米尔地区,而且划出了边界线。俄国人分开帕米尔地区的主张得到了赞同,帕米尔高原的其他部分则交给了布哈拉的艾弥儿政权。

帕米尔问题的解决,清楚地划出了整个边界地区的轮廓,从而结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扩张运动。通过这次扩张活动,俄国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一块相当于西欧面积的地区。他们在人员方面付出的代价相对来说是很低的——俄国人在战斗中仅仅死亡了800人;大多数的战役都只不过是一些战术演习而已。而俄国人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得到的潜在的利益则是非常巨大的。

在俄国人的征服浪潮中,他们将欧洲的行政管理、经济技术以及文化都带到了亚洲的心脏地区。出于健康和防卫的原因,俄国人的居民点都建筑在本地城市的近旁,而不是建在这些城市之中,这些居民点的样式都是精心设计的。根据考夫曼的命令,在塔什干的俄国人居住区内,设计了笔直的林荫大道和堂皇的公共建筑。考夫曼还设立了天文台、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报纸,而且他也鼓

励对本地区的博物学以及自然资源进行考察和研究。另外的一些城镇也都仿效了这种模式。

俄国人要巩固他们夺取的地区，就必须进行移民。移民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俄国官方的注意。在突厥斯坦地区没有空裕的土地，所以考夫曼和他的继任者们只允许来到突厥斯坦的俄国人在城市里定居。在草原地区，谷业与畜牧业为移民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在这里，移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俄国政府最先依靠哥萨克人，到1867年，他们在七河州的丘陵地区安置了将近12,000人。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太缓慢了。最初，为了防止1861年²¹⁹农奴解放以后的人口“有害移动”，俄国政府禁止农民向这一地区迁移，后来，农民的迁移得到了默认。最后，当南俄土地紧缺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力日渐尖锐时，官方政策变成了公开鼓励移民。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政府修筑了西伯利亚铁路，计划部分地帮助农民到达新的地区。1896年，又建立了移民局(Pereselencheskoe upravlenie)，由移民局寻找和准备合适的土地，以便帮助农民定居下来。在这种鼓励之下，成千上万想成为移民的人，每年都越过乌拉尔山滚滚而来。1908年，移民达到了高峰，其数量已经达到665,000人，大部分移民都居住在哈萨克草原。

事实证明，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俄国人在征服中所实行的移民政策，比他们所干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为害更甚。由于渴望土地的农民被允许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从而剥夺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牧民，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人停止了移民运动，但是流入的移民已经改变了许多地区的种族结构和生活方式。在草原诸州和七河地区，种族均衡开始倾斜，新来

的移民在人种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1911年，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以及塞米巴拉金斯克四个草原州的全部人口中（大约为3,834,000人），有百分之四十（1,544,000人）是来自欧洲俄国的移民。在七河地区，移民占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有204,000人是俄罗斯人。

但是在突厥斯坦总督所辖的灌溉土地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1911年的全部人口为5,090,000，其中俄罗斯人只占微不足道的百分之四，即仅有202,000人。甚至就是在这个数字中，还有177,374人属于城市居民，在全部突厥斯坦地区，剩下的仅有25,000人是俄罗斯农业居民。对于这种人口失去平衡的现象，俄国当局不无忧虑地认为，俄罗斯人的成份在这里消失在了“本地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虽然相对来说，突厥斯坦的俄罗斯人移民较少，但是，俄国人的统治还是改变了当地的经济。自古以来，突厥斯坦地区就已经种植了棉花，但是棉花质量低劣，生产及其运输方法也都处于原始状态。1883年，在考夫曼事先进行了试验之后，俄国政府引进了美国的高地品种（*Gossypium hirsutum* L.）和加工棉花的美国机²²⁰械。此后，棉花生产迅速上升，到1914年，俄国已经能够供应其工业所需棉花的一半。1888年，中亚连结外界的第一条铁路——外里海铁路通到了撒马尔罕，使大规模的装运成为可能。低廉的运费以及与之结合的保护关税，使得突厥斯坦的棉花生产可以与外国棉花相互竞争。在1899年—1905年，俄国政府又修建了奥伦堡—塔什干铁路，这样一来，突厥斯坦就可以从乌克兰和西西伯利亚进口低价小麦，从而也就鼓励了当地人将更多的土地用于

种植棉花。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是在 1914 年之前开始动工修建的，一直到 1930 年才竣工。这条铁路将进一步推进突厥斯坦地区的经济改革。但是这种单一作物经济的弊病，使当地的农民日益陷入了负债和租赁的境地。

另外的农业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规模上却受到了更大的限制。俄国人作了将干果和新鲜水果由铁路集运到欧洲俄国的试验。由于采用了现代的检验手段和实验方法，而且建立了实验站，古老的丝绸工业也得到了改善。葡萄种植和酿酒在撒马尔罕取得了成功。在塔什干附近种植了蔗糖。在草原地区引进了割草机和另外的现代农业机械，并且进行了利用冷冻车运输肉食的实验。

俄国人的统治，也使得基本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能够在中亚进行几个世纪之久。当考夫曼和他的继任者切尔尼亚耶夫灌溉塔什干西南被称之为“饥饿草原”的地区的企图失败之后，在塔什干地区过着流放生活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在—项较小规模的工程上获得了成功。这一工程在 1900 年被并入了野心勃勃的罗曼诺夫运河工程。罗曼诺夫运河工程的目的，是要灌溉 50,000 公顷的土地。在外里海州，木尔加布河上的一系列水坝，为木鹿附近的 27,250 公顷土地提供了灌溉条件。其他更大规模的工程都没有成为现实。一个最典型的失败的例子，就是一直最为人们向往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土库曼斯坦主体运河工程。这个工程计划要使阿姆河改归古代河床，再次流入里海。为了利用阿姆河水灌溉卡拉库姆沙漠东部的大片地区，有几项工程为—条运河服务，这条运河就是现代卡拉库姆运河的先驱。但是，

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由移民局首脑，斯托雷平首相的得力助手克里沃舍在1912年提出的一项整个突厥斯坦地区发展的建议。克里沃舍将经济与政治目的结合起来，极力主张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开发出一块相当于波兰面积的地区，这样就可以使俄国棉花达到自给，同时也可以在这一地区移居1,500,000农民，这样就有助于俄罗斯人种在中亚达到优势地位。

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中亚的矿产资源就引起了俄国人的兴趣。彼得大帝曾经派遣了大批远征军，前往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希瓦去寻找谣传的金矿。在阿尔泰地区，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附近的铅矿和银矿的开采，开始于1784年。后来，阿克莫林斯克州境内的铅矿和银矿的开采工程，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卡拉干达煤矿的开采，开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斯帕斯基和更南部的尤斯彭斯基的铜矿，也在数年之后开始开发。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杰兹卡兹甘的铜矿，在1771年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行开采。在突厥斯坦地区，早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很久，这里就以煤、铅、金、硫磺以及盐矿闻名。但是由于资本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以及缺少或者根本没有运输工具，所有这些矿山的遭遇几乎都是相同的，没有一座矿能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大多数甚至连动都没动。

就象同一时期其他的殖民政权一样，俄国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为他们占据中亚的行为辩护。他们认为，他们的扩张是一种文明的使命。但是在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他们很少承认的谋求经济与战略优势的考虑。然而，不管他们统治的目的是什么，俄国人与其他的殖民政权一样，都是力求以某种方式将土著民族纳于外

222 国的统治之下。俄国人已经多次面临这一问题，由于数量上的优势、相对的文化优势以及普遍缺乏法定权力或者甚至是心理的歧视，所有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俄国人对其统治下的许多民族从种族上以及文化上进行同化。但是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争夺，结束了早期那种比较轻松的同化方式。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俄国人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便使异族臣民与俄国政权形成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向异族臣民灌输与俄国保持一致和忠诚的思想，教给他们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如果可能的话，就使他们改信东正教。

由于哈萨克人原始的生活方式和地理位置，还有他们的不完善的伊斯兰教习俗，所以他们似乎特别适合于俄国文化的渗透。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东方学家、民族主义者伊尔明斯基就拟定了在哈萨克的“阿寅勒”创办学校的计划，伊尔明斯基的计划后来得到了他的学生伊不拉欣（Ibray）·艾勒廷萨林的帮助。他们用哈萨克语讲授俄语课程。学生可以从“阿寅勒”学校升入乡学校或者“俄罗斯—吉尔吉斯”学校，每个学程为两年。此后，学生就可以进入俄国城市学校，到奥伦堡吉尔吉斯师范学院或者另外的高等学校学习。

由于哈萨克学校的发展依赖于当地行政官员的兴趣以及学校所能得到的基金，所以学校的发展速度缓慢，而且也不平衡。在图尔盖州，为发展教育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艾勒廷萨林从1879年到1889年他去世时为止，在与他具有相同思想的俄国官员的领导下，一直担任图尔盖州的学校监察员；在另外的一些州里，却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每年最多有2,000名哈萨克人在这些学校中接受教

育,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超出小学水平。

在突厥斯坦的定居土著居民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困难得多。这些民族已经有了一个教育体系。十九世纪末,在突厥斯坦有5,000所伊斯兰小学和400所伊斯兰教神学院,总共大约有75,000名学生。考夫曼认为这些学校是反对俄国利益的,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去取消这些学校,而是有意采取了他对突厥斯坦其他的伊斯兰教机构实行的政策相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认为如果取消了国家的支持,并且进而结束高级穆斯林学校原来充斥公共机关的支配地位,就将会削弱这些学校,使它们陷于废置不用的境地或者促使它们经历激烈的变化。为了填补他所期待的,因当地学校的衰落而留下的空白,考夫曼鼓励发展一种为俄罗斯儿童和本地儿童开设的两种语言的学校。第一所学校于1884年创办,到1915年,在全部突厥斯坦地区已经有90多所这种学校,其中在锡尔河州有65所学校,3,410名学生。甚至锡尔河州的数字,也仅仅只能代表本地儿童的百分之二。与此相比较,这时在锡尔河州的10,000名俄罗斯学龄儿童中,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五多的儿童接受了小学教育。而本地儿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就更少了。在1879—1904年的二十五年间,在塔什干师范学院完成学业的415名学生中,只有65人是本地人,而在他们中间只有11人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鞑靼人,另外54人是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虽然从资料来看,这些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这一小部分利用俄国人为本地人提供的便利条件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形成了本地知识界的开端。

我们可以将突厥斯坦知识界的形成,看成是长期寻求的“接

近”的结果，而俄国人的目的也正是在于这种“接近”，但是知识界的形成，同时也预示着当地人民对俄国统治的更为有利的反抗。因为与俄国人不时所宣称的相反，当地人并不是轻松地就接受了俄国人的统治。正如俄国征服史以及那些微弱的反抗火花的扑灭——例如 1898 年安集延(Andijan)的三天起义——所证明的那样，积极的反抗是毫无希望的。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免除了当地居民的兵役。他们认为，唤起当地居民的尚武情绪，教给他们欧洲的军事组织以及对现代武器的使用，这些都是不安全的。俄国人不想要难以控制的本地人的正规军。

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一般都存在着被征服与现代化之间的自
224 相矛盾的选择。现代化使他们能够对入侵者，但是因此得改变他们自己，放弃他们正在保卫的那种生活方式。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正在传播的手段，可能最终将会导致他们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结束。

到十九世纪末期，在另外那些生活在异教统治下的伊斯兰民族中间，日益动荡的新潮流方兴未艾，接受了新潮流影响的中亚人越来越认识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发展的同时，他们却落在了后面。于是一些中亚穆斯林就成了“新主义”(Jadidism)的追随者。这种新的教育方法，是由杰出的克里米亚鞑靼伊斯迈勒·拜·杰斯普里斯基开创的。他的纲领在中亚得到了少数思想家的欢迎，这些思想家开始对改良主义者的主张抱有希望。1901年，在塔什干开办了第一所“新”(Jadid)学校，尽管有政府的监督和保守的穆斯林的反对，其它学校还是纷纷起而仿效。日俄战争和 1905 年革命，给了中亚本地的改革运动以更大的推动。在第一、二届国家杜

马中,中亚代表也坐在了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代表中间,虽然事实证明,实际的政治代表制是短命的,但是,改革在穆斯林文化生活的范围之内发展了起来。到1914年,中亚地区有一百多所“新”学校。本地的报纸也出现了。在奥伦堡,几位哈萨克知识分子致力于创办哈萨克报纸,1912年诞生了哈萨克报。哈萨克报批评俄国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抨击俄国殖民主义者对哈萨克人的迁移。报纸还攻击了主张泛伊斯兰主义的保守团体,极力主张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服兵役,要求创办更多的学校,主张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最初,哈萨克报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后来也逐渐转向了政治问题方面——虽然他们跟随的是俄国自由党人采取的路线。

当地民族自觉的趋势将向何处发展,俄国人对突厥斯坦地区的占领,是否会加紧这一地区的附加经济的发展,加剧文化渗透和殖民化的进程,这些都是尚属猜测中的问题。经济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以及1905年的革命动乱,都预示着变革的到来,随着第一²²⁵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旧制度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了。俄国中亚也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前十年的许多理想和价值都被置于一旁或者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多思潮都被窒息或歪曲。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税收加重了,通货膨胀也发生了。当地人的帐篷、车辆和家畜都被征用,俄国移民的来福枪也被征集起来,以供应前方的部队。移民的浪潮停止了,但是代替移民的是大量来自战场的疏散者的到来。疏散者中有许多人都死于流行病。随着1914年9月俄国在加利西亚的胜利,大约有225,000名奥匈帝国的战俘被送往草原和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在国际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设法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迁移到西伯利亚集中营之前，大约有 40,000 名战俘死于疾病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

到 1916 年，军事形势的恶化和人力缺乏的状况日益严重，使俄国政府对长期以来本地居民不服兵役的规定进行了认真考虑。6 月颁布的一项帝国法令，命令中亚、西伯利亚以及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男性公民，在战斗部队的后方建筑防御工事和交通线。由于这是一个绝望的设想，而且没有经过适当地解释就草率地予以实施，结果动员法令引起了一场造反和叛乱的浪潮。在七河地区，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部落成员杀了 3,000 多俄罗斯农民。遍地蜂起的起义形势使俄国人近乎惊慌失措，他们回过头来大肆杀戮，估计有多达 200,000 的本地居民死于这场报复中。其他许多人——估计约有 200,000 人——则逃离边界，进入了中国中亚。

为了处理这种形势，作为一名老军人和突厥斯坦的行政官员，库罗帕特金将军被派往突厥斯坦担任总督职务。他为了保护移民和本地居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从而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此后，在 1917 年 2 月，沙皇退位。苏维埃几乎立即就在突厥斯坦的全部城镇中建立了起来，并且开始扰乱俄国政府的代理人。一个吵吵嚷嚷的左派，要求进行更为彻底的革命。他们要求的革命，带来的将不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府，而是由“劳工”统治的政府。作为合法的政府首脑，库罗帕特金力图保持他的控制。但是在四个星期之后，他就被苏维埃逮捕，送回了彼得格勒。后来，如同俄国其他地区一样，临时政府的机构逐渐失去了权利。布尔什维克最终控制了苏维埃，10 月 31 日，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克了塔什干。到 1917 年底，新政权控制了全部突厥斯坦地区。

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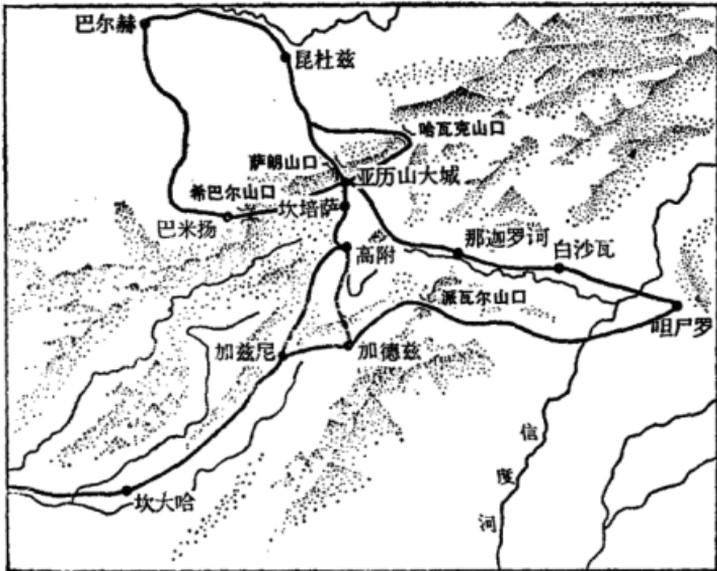
第1图 中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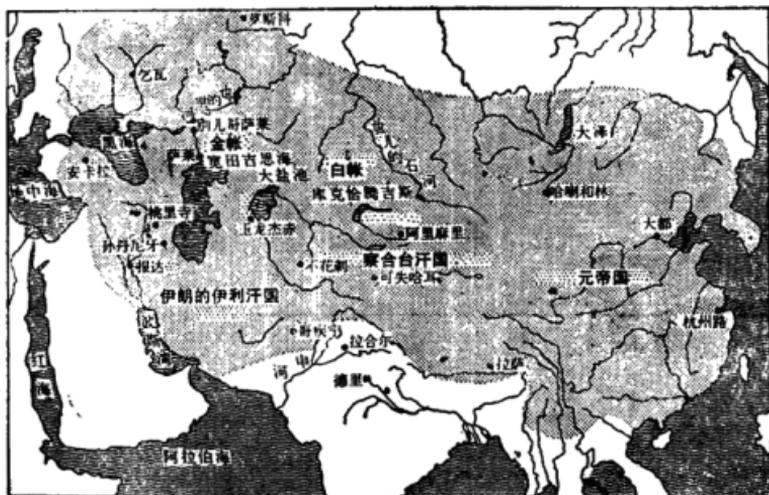
第2图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扩张



第3图 阿契美尼朝与帕提亚(安息)时期的伊朗与西南亚地区



第4图 印度—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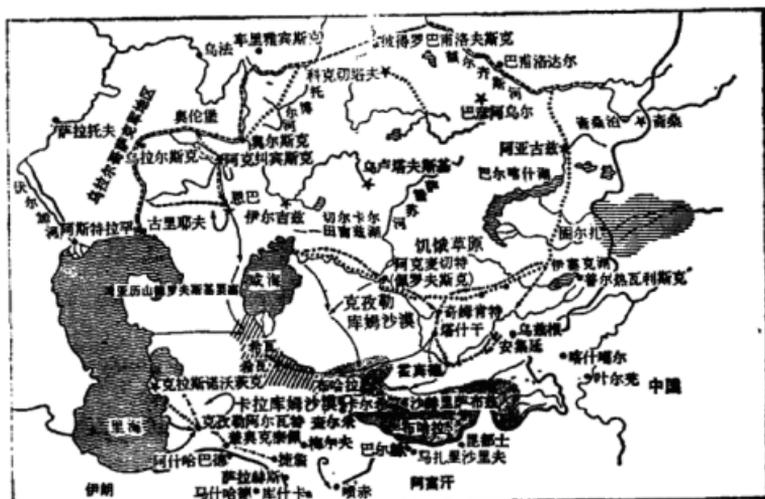
第 7 图 十三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蒙古帝国



第 8 图 哈萨克诸帐



第9图 帖木儿朝与昔班朝时期的河中、呼罗珊以及伊朗西部地区



第 10 图 俄国对中亚的征服



图例

注解与参考书目使用的缩写

- BABesch Bulletin van de Vereeniging tot Bevordering der Kennis van de antieke Beschaving te 'S-Gravenhage (《古代沟篱状况知识传播协会会刊》)。
-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
- CA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中亚杂志》)。
- CAR Central Asia Review (《中亚评论》)。
- CRAI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论丛(书评)》]。
- E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伊斯兰百科全书》), new edn., Leiden, 1960—。
-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 JA Journal Asiatique (《亚洲学报》)。
- JNSI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印度钱币学学会杂志》)。
-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 MDAFA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法国赴阿富汗考古团论集》)。
- NC Numismatic Chronicle (《钱币学》)。
- PA 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事务》)。
- PBA Proceeding of the British Academy (《英国科学院学报》)。
- RCAJ 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皇家亚洲杂志》)。
- RMM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伊斯兰世界》)。
- SA Studia Altaica (《阿尔泰研究》)。Festschrift für Nikolaus Poppe, Wiesbaden, 1957。
- SJ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西南人类学杂志》)。
- TG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2nd edn., Cambridge, 1951。
- TP T'oung Pao (《通报》)。
-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德国东方协会杂志》)。

参考文献要目

下列目录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书目，我们建议对中亚地区有兴趣的学者查阅克纳《东北亚参考文献要目》(R. J. Kener, *Northeastern Asia: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2 vols., Berkeley, Calif., 1939。), 和西诺尔《内陆欧亚研究导论》(D. Sinor,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Wiesbaden, 1963。)。以下所列书目包括一般著作以及撰稿人认为特别重要的专著和论文。一般来说，在注解中已经出现的书名，在目录中不再重复。虽然本书目是按章排列的，但有些著作涉及的内容并不止一章。

导 论

- Barthold, V. V. (巴托尔德), *Die geographische und historische Erforschung des Orient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ussischen Arbeiten* (《东方史地研究——以俄国著作为主》), Leipzig, 1913.
——*Zwöl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urken Mittelasiens* (《中亚突厥语各民族历史十二讲》), Berlin, 1935.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中亚突厥史》), Paris, 1945.
——*Sochineniya* (《巴托尔德文集》), 3 vols., Moscow, 1963—5.
——*La découverte de l'Asie* (《亚洲的发现》), Paris, 1947.
Codrington, K. de B. (科德林顿),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中亚史地理入门》),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44.
Franke, O. (弗兰克),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中国史》), 5 vols., Berlin-Leipzig, 1930—52.
Gronbech, K. (格朗贝奇), 'The Steppe Region in World History' (《世界史上的草原地区》), *Acta Orientalia*, 3 parts, 1958, 1959, 1960.
Jochelson, W. (乔基尔森), *Peoples of Asiatic Russia* (《亚俄诸民族》), New York, 1928.
Krader, L. (克拉德),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中亚诸民族》), The Hague, 1963.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蒙古

- 突厥游牧人的社会组织», The Hague, 1964.
- Proceedings of the VIIIth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第八次会议文献汇编》), 'The Horse in Ancient Altaic Civilization' (《马与古代阿尔泰文明》), CAJ, 1965.
- Sarkisyanz, E. (萨尔基斯扬兹), Geschichte der orientalischen Völker Russlands bis 1917 (《俄国东方民族史》), Munich, 1961.
- Stein, M. A. (斯坦因),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腹地亚洲》),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25.
- Toynbee, A. (汤因比), A study of history (《历史研究》), 12 vols., London, 1934—61.

第 1—5 章

原始资料 I 文献

关于前伊斯兰中亚历史的资料非常分散和零碎。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561。)一书中列举了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主要的记载。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1—37。)一书中,讨论了早期的穆斯林史料。另外请参见下列著作。

- Bacot, J., Thomas, F. W., and Toussaint, C., (巴考、托马斯和杜散),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敦煌文书中的吐蕃史料》), Paris, 1946.
- Beal, S. (比尔),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僧徒西域记》), London, 1884.
- Chavannes, E. (沙腕),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西突厥史料》), Paris, 1900.
-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后汉书注》), TP, ser. ii, VIII, 1907.
- Dubs, H. H. (达布斯),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班固〈汉书〉》), 3 vols., Baltimore, 1938—55.
- Frye, R. N. (弗赖伊), The History of Bukhara (《布哈拉史》), Cum-

- bridge, Mass., 1954.
- Giles, H. A. (翟理思). The travels of Fa-Hsien (《法显游记》), Cambridge, 1923.
- Hirth, F. (赫斯), 'The story of Chang-Kien, China's Pioneer in Western Asia' (《张寿事迹》)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17, 89—152.
- Hitti, F. K. and Murgotten, F. C. (希提和默戈廷),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家的起源》). New York, 1916—24.
- Liu Mau-Tsai (刘茂才),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T'u Kue) (《东突厥史料》), 2 vols., Wiesbaden, 1958.
- Miller, R. A. (米勒), Accounts of the Western 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 (《北周史上之西方诸民族考释》), Berkeley, Calif., 1959.
- Minorsky, V. (米诺尔斯基), Hudud al-'Alam (《世界境域志》), London, 1937.
- Thomas, F. W. (托马斯),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istan' (《关于新疆的吐蕃文书》), JRAS, 1930.
- Watson, B. (沃森),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中国史学名著》), 2 vols., New York, 1961.
- Watters, T. (沃特斯),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 D. 629—645 (《玄奘传》), 2 vols., New York, 1961.
- Wylie, A. (怀利),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西域考释》),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881 and 1882.

原始资料 II 考古材料

- Ahrens, D. (阿伦斯), Die römische grundlagen der Gandharakunst (《健陀罗艺术的罗马基础》), Munster, 1961.
- Andrews, F. H. (安德鲁斯), Wall 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中亚古代寺庙壁画》), London, 1948.
- Bussagli, M. (巴萨格利), Central Asia Painting (《中亚绘画》), Geneva, 1961.
- Curiel, R. and Fussman, G. (柯利尔和福斯曼), 'Le Trésor monétaire de Qunduz' (《昆杜兹的钱币宝藏》), MDAFA, XX, Paris, 1965.

- Dalton, O. M. (多尔顿),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阿姆河宝藏》), 3rd edn., London, 1964.
- Deydier, H. (代迪埃),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rt de Gandhara* (《健陀罗艺术研究》), Paris, 1956.
- Foucher, A. (福舍), *L'art gréco-bouddhique de Gandhara* (《健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 2 vols., Paris, 1905—22.
- La vieille route de l'Inde de Bactres à Taxila* (《犍喝到咀叉始罗的印度古道》), MDAFA, I, 2 vols., Paris, 1942—7.
- Gray, B. (格雷), *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Tun Huang* (《敦煌千佛洞壁画》), London, 1959.
- Hackin, J. (哈金), *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egram (1939—1940)* (《贝格拉姆考古新研究》), MDAFA, XI, 2 vols., Paris, 1954.
- Ingholt, H. and Lyons I. (英戈尔特和莱昂斯),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巴基斯坦的健陀罗艺术》), New York, 1957.
- Le Coq, A. von (勒柯克), *Chotscho* (《高昌》), Berlin, 1913.
-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晚期中亚佛教》), 6 vols., Berlin, 1922—4.
-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东突厥斯坦的希腊遗迹》), Berlin, 1926. (英译本为《新疆埋藏的宝藏》,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 Maricq, A. and Wiet, G. (马里克和威特), *Le Minaret de Djam* (《杰姆的清真寺》), MDAFA, XVI, Paris, 1959.
- Marshall, J. (马歇尔), *Taxila* (《咀叉始罗》), 3 vols., Cambridge, 1951.
- Mongait, A. (蒙盖特), *Archaeology in the USSR* (《苏联考古学》), London, 1959.
- Pelliot, P. (伯希和),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敦煌石窟》), Paris, 1922—4.
- Stein, N. A. (斯坦因), *Ancient Khotan* (《古代和田》), Oxford, 1907.
- Ruins of Desert of Cathay* (《中国荒漠遗址》), 2 vols., London, 1912.
- Serindia* (《西域》), Oxford, 1921.
- Innermost Asia* (《腹地亚洲》), Oxford, 1928.
- 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ks* (《古代中亚遗迹》), London, 1933.

Folstov, S. P. (托尔斯托夫), *Auf den Spuren der altchoresmische Kultur* (《古代花刺子模的遗迹》), Berlin, 1953.

原始资料 III 钱币

Curiel, R. and Schlumberger, D. (柯利尔和斯伦贝格),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阿富汗的钱币宝藏》), MDAFA, XIV, Paris, 1953.

Gardner, P. (加德纳), *Catalogue of Indian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大英博物馆藏印度钱币目录: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斯基泰诸王》), London, 1885.

Ghirshman, R. (科什曼),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匈尼特—哒哒》), MDAFA, XIII, Cairo, 1948.

Herzfeld, E. E. (赫兹斐尔德), *Kushano-Sasanian coin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XXXVIII) (《贵霜—萨珊钱币》), Calcutta, 1930.

Sourdel, D. (索代尔), *Inventaire des monnaies musulmanes anciennes du Musée de Caboul* (《喀布尔博物馆藏古代穆斯林钱币目录》), Damascus, 1953.

Whitehead, R. B. (怀特黑德), *Catalogue of the coins in the Punjab Museum, Lahore, vol. 1, Indo-Greek coins* (《旁遮普博物馆藏钱币目录》第一卷《印度—希腊钱币》), Oxford, 1914.

研究论著

Altheim, F. (阿尔泰姆), *Weltgeschichte Asiens in griechischen Zeitalter* (《希腊化时期亚洲在世界史上的意义》), 2 vols., Tübingen, 1947—8.

Bacot, J. (巴考),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Tibet* (《西藏历史导论》), Paris, 1962.

Barthold, W. (巴托尔德),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蒙古人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 2nd edn., London, 1958.

Bataille, G. (巴泰莱), 'Notes sur le numismatique des Koushans et des Koushan-Shahs sassanides' (《贵霜与萨珊—贵霜王钱币考》), Aréthuse, 1928.

- Bivar, A. D. H. (比瓦尔), 'The Bactrian Treasure of Qunduz' (《昆杜兹的巴克特里亚宝藏》), JNSI, XVII, 1955.
- 'The Kaniska dating from Surkh Kotal' (《苏科克塔耳铭文反映的伽腻色伽年代》), BSOAS, XXVI, 1963.
- 'Indo-Bactrian Problems' (《印度—巴克特里亚人的若干问题》), NC, 1965.
- Bosworth, C. E. (博斯沃思), The Ghaznavids (《哥疾宁朝》), Edinburgh, 1963.
- 'Notes on the pre-Ghaznavid history of Eastern Afghanistan' (《东阿富汗的前哥疾宁朝史稿》), The Islamic Quarterly, 1965.
- Bosworth, C. E. and Clauson, C. (博斯沃思和克劳森), 'Al-Xwarazmi on the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花刺子模在中亚诸民族史上的地位》), JRAS, 1965.
- Buchthal, H. (布克萨耳), 'The Western aspects of Gandhara sculpture' (《健陀罗雕像的西方流派》), PBA, XXXI, 1945.
- Clauson, C. (克劳森), 'The Name Uygur' (《回鹘族名考》), JRAS, 1963.
- Debevoise, N. C. (德贝沃伊塞),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帕提亚政治史》), Chicago, 1938.
- Frye, R. N. (弗赖伊), Bukhara. The Medieval Achievement (《布哈拉》), Norma, Oklahoma, 1965.
- 'The significance of Greek and Kushan archaeology i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希腊和贵霜考古在中亚历史上的意义》), Journal of Asia History, 1967.
- Frye, R.N. and Sayili, A. M. (弗赖伊和赛义利), 'Turks in the Middle East before the Seljuks' (《塞尔柱王朝之前中东的突厥人》),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III, 1943.
- Gabain, A. Von (冯加班), 'Steppe und Stadt in Leben der ältesten Turken' (《最古突厥人生活中的草原和城市》), Der Islam, 1949.
- 'Die Frühgeschichte der Uiguren, 607—745' (《回鹘早期史》), Nachricht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Hamburg, 1952.
- 'Das Uigurische Königreich von Chotscho' (《高昌回鹘史》), Berlin, 1961.
- Gibb, H.A.R. (吉布), 'Chinese records of the Arabs in Central Asia'

- (《汉文所载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活动》), BSOAS, II, 1921—3。
- ‘The Arab invasion of Kashgar in 715’ (《715年阿拉伯人对喀什噶尔的人侵》), BSOAS, II, 1921—3。
- The Arab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阿拉伯征服中亚史》), London, 1923。
- Giraud, R. (吉罗), L'empire des Turcs célestes: les règnes d'Elterich Qapghan et Bilgä, 680—734 (《蓝突厥汗国史》), Paris, 1960。
- Göbl, R. (戈布尔), ‘Die Munzprägung der Kušān von Vima Kadphases bis Bahram IV’ (《从阔耆珍到巴赫兰四世的贵霜钱币》), in F. Altheim and R. Stiehl, Finanzgeschichte der Spätantike, Frankfurt am Main, 1957。
- Grousset, R. (格鲁赛), L'empire des steppes (《草原帝国》), Paris, 1939。
- Haloun, G. (哈隆), ‘Zur Üe-tsi Frage’ (《大月氏考》), ZDMG, XCI, 1937。
- Hamilton, J. R. (汉密尔顿), Les Ouigh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907—960) (《五代回鹘史料》), Paris, 1955。
- Henning, W. B. (亨宁),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粟特文古代书信的年代》), BSOAS, XII, 1943。
- Hoffman, H. (霍夫曼), The Religion of Tibet (《吐蕃宗教》), London, 1961。
- Jettmar, K. (杰特玛尔),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突厥之前的阿尔泰地区》),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XIII, 1951。
- Lamotte, E. (拉蒙特),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印度佛教史》), Louvain, 1958。
- Laufer, B. (劳费尔), Sino-Iranica (《中国—伊朗编》), Chicago, 1919。
- Mackerras, C. P. (梅克拉斯),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Uighur Empire (744—840)’ (《回鹘帝国史的若干问题》), unpublished M. Litt. thesis, Cambridge, 1964。
- McGovern, W. M. (麦高文),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中亚古国史》), Chapel Hill, 1939。
- Maenchen-Helfen, O. (麦因钦—赫尔芬),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ined’ (《月氏问题再探》),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XV, 1945。

- Mélikoff, I. (梅利科夫), *Abū Muslim, le 'porte-hache' du Khorassan dans la tradition épique turco-iranienne* (《突厥—伊朗史诗传说中的“持斧者”——阿卜·穆斯林》), Paris 1962.
- Minns, E. H. (明斯), 'The art of the northern nomads' (《北方游牧人的艺术》), PBA, XXVIII, 1942.
- Minorsky, V. (米诺尔斯基), 'Tami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泰米姆·伊本·拜赫尔前往回鹘之游记》), BSOAS, XII, 1948.
——'A Greek crossing on the Oxus' (《一位渡过阿姆河的希腊人》), BSOAS, 1967.
- Muir, W. (缪尔), *The Caliphate: its rise, decline and fall* (《哈里发政权及其兴起、衰落和灭亡》), 4th edn., Cambridge, 1914.
- Narrain, A. K. (纳利因), *The Indo-Greeks* (《印度—希腊人》), Oxford, 1957.
- Nazim, M. (纳齐姆),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 (《哥疾宁苏丹马哈穆德的一生及其时代》), Cambridge, 1931.
- Philips, E. D. (菲利普斯), *The Royal Hordes* (《汗帐部落》), London, 1965.
- Pritsak, O. I. (普里查克), 'Von dem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 (《从葛逻禄到喀喇汗朝》), ZDMG, CI, 1951.
——'Stammesnamen und Titulaen der altaischen Völker' (《古代亚洲人的部落名称和职官称号》),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Weisbaden, 1952.
——'Die Karachaniden' (《喀喇汗王朝》), *Der Islam*, XXXI, 1953.
- Puech, H. (皮埃什), *Le Manichéisme: son fondateur, sa doctrine* (《摩尼教及其创始人与教义》), Paris, 1949.
- Pugliese Carratelli, G. and Garbini, G. (帕格利斯·卡拉特里和加比尼), *A bilingual Graeco-Aramaic edict by Aśoka* (《阿育王的希腊—阿拉米文两种文字敕令》), Rome, 1964.
- Rice, T. T. (赖斯), *The Scythians* (《斯基泰人》), London, 1957.
- Samolin, W. (萨莫林),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突厥前塔里木盆地的历史人种论》), *Palaeologia Isaka*, 1955.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考古反映出的历史人种问题》), CAJ, 1959.
——*East Turke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 (《到十二世纪的东突厥斯

- 坦》), The Hague, 1964。
- Schlumberger, D. (斯伦贝格), 'The excavations at Surkh Kotal and the problem of Hellenism in Bactria and India' (《苏科克塔尔的出土文物与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古希腊文化》), PBA, XLVII, 1961。
- Smith, V. A. (史密斯),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印度上古史》), 4th edn., Oxford, 1924。
- Snellgrove, D. L. (斯内尔格罗夫), Buddhist Himālaya (《佛教之喜马拉雅》), Oxford, 1957。
- Soper, A. C. (索珀), 'The Roman style in Gandhara' (《健陀罗的罗马风格》),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LV, 1951。
- Spuler, B. (施普勒), Iran in frühislamischer Zeit (《早期伊斯兰时代的伊朗》), Wiesbaden, 1952。
- Tarn, W. W. (塔恩),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2nd edn., Cambridge, 1951。
- Weddell, L. A. (沃德尔),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西藏的佛教或喇嘛教》), London, 1934。
- Weil, G. (韦尔), Geschichte der Chalifen (《哈里发史》), Heidelberg /Stuttgart, 1846—62。
- Wheeler, R. E. M. (惠勒), 'Romano-Buddhist art: an old problem restated' (《再论罗马——佛教艺术》), Antiquity, LXXXIX, March, 1949。
- Whitehead, R. B. (怀特黑德), 'Notes on Indo-Greek numismatics, (《印度—希腊钱币学简论》), NC, 1923。
- 'Notes on the Indo-Greeks' (《印度—希腊人札记》), NC, 3 parts, 1940, 1947, 1950。
- Widengren, G. (威登格伦), Mani und der Manichäismus (《摩尼与摩尼教》), Stuttgart, 1961。
- Yetts, W. P. (耶茨), 'The Horse, a factor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马在早期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 Helsinki, 1934。

第6—8章

原始资料

- Blake, R. P. and Frye, R. N. (布莱克和弗赖伊),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Archers (the Mongols) by Grigor of Akanč' (《引弓民族史》), HJAS, 1949.
- Boyle, J. A. (波义耳),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世界征服者史》), 2 vols., Manchester, 1958.
-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海屯行纪》), CAJ, IX, 1964.
- Bretschneider, E. (布莱特施乃德),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中世纪研究》), 2 vols., London, 1888.
- Dawson, H. C. (道森), The Mongol Mission (《蒙古使团》), London, 1955.
- Gibb, H. A. R. (吉布),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54 (《伊本·拔图塔游记》), 2 vols., Cambridge, 1958—62.
- Haensch, E. (海涅什),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蒙古密史》), Leipzig, 1948.
- Hambis, L. (韩百诗), Le Chapitre CVII de Youan chen (《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注), Leiden, 1945.
- Le Chapitre CVIII de Youan Che (《元史》卷一〇八《宗室世系表》注), Leiden, 1954.
- Hammer-Purgstall, J. von (哈默·普尔格斯塔勒), Geschichte Wassaf's (《瓦撒夫史》), Wien, 1956.
- Mostaert, A. and Cleaves, F. W. (田清波和克利夫斯),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 vaticanes' (《梵蒂冈秘密档案中的三种蒙古文献》), HJAS, 1952.
- Les Letters de 1289 et 1305 des ilkhan Arrun et Öljeitu a Philippe le Bel (《1289—1305年伊利汗阿鲁浑与完者都致美男子菲利浦的书信》), Cambridge, Mass., 1962.
- Pelliot, P. (伯希和),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蒙古秘史译注》), Paris, 1949.
- Pelliot, P. and Hambis, L. (伯希和与韩百诗), Histoire des campagn-

- es de Gengis Khan (《圣武亲征录注》), Leiden, 1951。
- Quatremère, E. M. (夸特雷默勒),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 (《波斯蒙古史》), Paris, 1836。
- Raverty, H. G. (拉维尔第), The Tabakat-i-Nasiri (《卫教者表》), 3 vols., London, 1881—9。
- Waley, A. (韦利),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一位炼金术士的游记》), London, 1931。
- Yule, H. (玉尔),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 2 vols., 3rd edn., London, 1921。

研究论著

- Altunian, G. (阿尔图尼安), 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 in kaukasischen und kleinasiatischen landern im 13 Jahrhundert (《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及其在高加索和小亚地区的征服》), Berlin, 1911。
- Blochot, E. (布洛舍特), Introduction à l'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dl Allah Raschid ed-Din (《拉失德〈蒙古史〉导论》), London, 1910。
- Ch'en Yuan (陈垣),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 Los Angeles, 1966。
- D'Ohsson, A. C. M. (多桑),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 à Timour Bey ou Tamerlane, (《蒙古史》), 4 vols., 2nd edn., Amsterdam, 1852。
- Dunlop, D. M. (邓洛普), 'The Karajts of Eastern Asia' (《东亚的克烈部人》), BSOAS, 1944。
- Egami, N. (江上波夫), 'Olon-Sume et la decouverte de l'eglise catholique romaine de Jean de Montecorvino' (《鄂伦素木和约翰·孟德高维诺的罗马天主教堂的发现》), JA, 1952。
- Gray, B. (格雷), 'Art under the Mongol Dynasties of China and Persia' (《中国与波斯蒙古王朝统治下的艺术》), Oriental Art, 1955。
- Grekov, B. and Iakoubovski, A. (格列科夫和雅科博夫斯基), La Horde d'Or (《金帐汗国》), Paris, 1939。
- Grousset, R. (格鲁塞), L'empire Mongol (《蒙古帝国史》), Paris, 1941。
- Le Conquérant du Monde (《世界征服者》), Paris, 1944。

- Haenisch, E. (海涅什), *Die Kulturpolitik des mongolischen Weltreichs* (《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 Berlin, 1943.
- Heyd, W. (海德),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âge* (《利凡得(东方)中世纪贸易史》), 2 vols., 2nd edn., Leipzig, 1936.
- Howorth, H. H. (霍渥斯),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 (《九至十九世纪的蒙古史》), 5 vols., London, 1876—1927.
- Kiselov, V. S. (基谢洛夫), 'Drevnie goroda mongolii' (《古代蒙古城市》), *Sovetskaya Archeologiya*, 1957.
- Krader, L. (克拉德),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Mongols' (《蒙古人的文化与历史地位》), *Asia Major*, 1952.
- 'Qan-Qaya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ngol Kingship' (《汗、可汗及蒙古君主的起源》), *CAJ*, 1955.
- 'Feudalism and the Tatar Policy of the Middle Ages' (《封建主义与中世纪的鞑靼政策》),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58.
- Lane-Poole, S. (莱恩—普尔), *The coins of the Mongo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蒙古钱币》), London, 1881.
- Lattimore, O. (拉铁摩尔), '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 (《蒙古腹地废弃的景教城》),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4.
- 'The Geography of Chingis Khan' (《成吉思汗之地理》),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63.
- Martin, H. D. (马丁),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Baltimore, 1950.
- Mostaert, A. (田清波), 'A propos de quelques portraits d'empereurs mongols' (《论蒙古皇帝的几幅肖像》), *Asia Major*, 1927.
- Olbright, P. (奥尔布里希特), *Das Postwesen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im 13 und 14 Jahrhundert* (《十三、四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邮政》), Wiesbaden, 1954.
- Olschki, L. (奥尔斯基), *Marco Polo's Asia* (《马可·波罗笔下的亚洲》), Berkeley, Calif., 1950.
- Pelliot, P. (伯希和),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eme-Orient' (《中亚与远东的基督徒》), TP, 1914.
- 'Notes on Marco Polo' (《“马可·波罗”注》), 2 vols., Paris, 1959—

- 63。
- Schurmann, H. F. (舒尔曼), '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irteenth Century' (《十三世纪的蒙古进贡习惯》), HJAS, 1956。
- Spuler, B. (施普勒),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ssland 1223—1502* (《金帐汗国史》), Wiesbaden, 1965。
- Die Mongolenzeit* (《蒙古时代》), Berlin, 1948。
- Die Mongolen in Iran* (《蒙古人在伊朗》), Berlin, 1955。
- Les Mongols dans l'histoire* (《历史上的蒙古人》), Paris, 1961。
- Vernadsky, G. V. (维尔纳德斯基), *The Mongols and Russia* (《蒙古与俄国》), New Haven, 1953。
- Vladimirtsov, B. Y. (符拉基米尔佐夫), *Gengis-Khan* (《成吉思汗传》), Paris, 1948。
-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le féodalisme nomade* (《蒙古社会制度史》), Paris, 1948。

第9—13章

原始资料

- Beveridge, A. S. (贝维里吉), *The Bābur-Nāma in English* (《英译巴布尔回忆录》), 2 vols., London, 1834。
- Burnes, A. (伯恩斯), *Travels into Bokhara* (《布哈拉游记》), 3 vols., London, 1834。
- Chekhovich, O. D. (切霍维奇), *Bukharskie Dokumenty XIV Veka* (《十四世纪的布哈拉文献》), Tashkent, 1965。
- Desmajsos, Le Baron (戴美桑), *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tars*, (《蒙古人和鞑靼史》), St Petersburg, 1871—4。
- Epifanovoi, L. M. (叶皮凡诺夫), *Mirza 'Abdul 'Azim Sami: Tarikh-i Salatīn-i Mangitiyeh* (《米尔札·阿卜都·阿齐姆·沙米: 满吉惕算端史》), Moscow, 1962。
- Eljas, N. and Denison Ross, E. (伊莱亚斯和丹尼森·罗斯),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中亚莫翰勒人史》), London, 1895。
- Khanykov, N. V. (哈内科夫), *Bokhara: its Amir and its peoples* (《布哈拉及其艾弥儿与人民》), London, 1845。

- Le Strange, G. (斯特兰奇),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amerlane at Samarcand, AD 1403—1406 (《克拉维约东使记》), London, 1928.
- Levchine, A. de (列夫希内), Description des hordes et des steppes des Kirghiz-Kazaks (《乞尔吉思—哈萨克游牧部族和草原志》), Paris, 1840.
- Michell, J. and R. (米歇尔),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俄国人在中亚》), London, 1885.
- Neumann, K. F. (纽曼), Reisen des Johannes Schiltbergér aus München in Europa, Asia und Afrika von 1394 bis 1427 (《席特勒伯格 1394 年—1427 年从慕尼黑出发在欧、亚、非的旅行》), Munich, 1859.
- Sanders, J. H. (桑德斯), Tamerlane or Timur the Great Amir (《大艾弥儿帖木儿或跛子帖木儿》), London, 1936.
- Schefer, C. (谢弗), Histoire de l'Asie Centrale (《中亚史》), Paris, 1876.
- Relation de l'Ambassade au Kharezm (《出使花刺子模记》), Paris, 1879.
- Scherzer, F. (舍尔泽), Recueil d'itinéraires et de voyages dans l'Asie Centrale et l'extrême Orient (《中亚与远东地志和游记集》), Paris, 1878.
- Senkowski, J. (申科夫斯基), Supplement à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ks et des Mongols (《匈奴、突厥与蒙古通史》补编), St Petersburg, 1824.
- Vambery, A. (万贝里), Die Scheibanjade (《昔班王朝》), Wien, 1885.

研究论著

- Ahmad, A. J. (阿曼德), 'Irrigation in relation to State Power in Middle Asia' (《关于中亚地方政权的水利灌溉》),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0.
- Aubin, J. (奥宾), 'Comment Tamerlan Prenait les villes' (《帖木儿是怎样夺取城市的》), Studia Islamica, XIX, 1963.
- Bartold, V. V. (巴托尔德), Istoriya Kul'turnoy Zhizni Turkestana (《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 Leningrad, 1927.

- Istoriya Turkestana* (《突厥斯坦史》), Tashkent, 1922。
-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 into English by V. and M. Minorsky (米诺尔斯基英译《中亚史研究四种》), 3 vols., Leiden, 1962—3。
- Bellew, H. W. (贝柳), *The History of Kashgharia* (《喀什噶里亚史》), Calcutta, 1875。
- Dickson, M. B. (迪克森), 'Shah Tahmāsh and the Uzbeks (the duel for Khurāsān with 'Ubayd Khān: 930—46/1524—40)' (《沙·塔玛思普与乌兹别克人》),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Princeton, 1958。
- Hartmann, M. (哈特曼), *Der islamische Orient* (《东方伊斯兰教》), 3 vols., Berlin, 1899—1910。
- Hill, D. and Grabar, O. (希尔和格拉巴尔), *Islamic architecture and its decoration, AD800—1500* (《伊斯兰建筑及其装潢》), London, 1964。
- Hinz, W. (欣茨), 'Quellen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Timuriden' (《帖木儿朝史料研究》), ZDMG, 1936。
- Holdsworth, M. (霍尔兹沃思), *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十九世纪的突厥斯坦》), London, 1959。
- Ivanov, P. P. (伊万诺夫), *Ocherki po istorii Srednei Azii* (《中亚史文集》), Moscow, 1958。
- Köprülü, M. F. (科普罗洛), *L'influence du Chamanisme turco-mongole sur les ordres mystiques Musulmans* (《突厥、蒙古萨满教对穆斯林秘密会社的影响》), Istanbul, 1929。
- Lane-Poole, S. (莱恩—普尔), *The Coinage of Bukhara* (《布哈拉的钱币》), London, 1882。
- Majerczak, R. (马耶科扎克), 'Renseigne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Kazaks ou Kirghizes-Kazaks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Horde Kazake jusqu' à la fin du XIX siècle' (《从哈萨克汗国创建到十九世纪之间的哈萨克或乞尔吉思—哈萨克历史资料集》), RMIM, 1921。
- Nalivkine, V. P. (纳列夫金), *Histoire du Khanat de Khokand* (《浩罕汗国史》), Paris, 1883。
- Oliver, E. E. (奥利弗), 'The Chaghatai Mughals' (《察合台蒙古人》), JRAS, 1888。
- 'The coins of the Chaghatai Mughals' (《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1。

- Roemer, H. R. (罗默), 'Neuere Veröffentlichungen zur Geschichte Timurs und seiner Nachfolger' (《有关帖木儿及其继任者历史的新著》), CAJ, 1956.
- Savory, R. M. (萨沃里),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in Iran after the death of Timur' (《帖木儿死后在伊朗争夺霸权的斗争》), *Der Islam*, 1964.
- Shaw, R. B. (肖),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estan' (《东突厥斯坦和卓史》),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7.
- Vambery, A. (万贝里), *Geschichte Bochara's* (《布哈拉史》), Stuttgart, 1872.
- Varma, R. C. (沃麦), 'Akbar and Abdullah Khān' (《阿克巴与阿不都拉汗》), *Islamic Culture*, 1947.
- Vyatkin, M. (维亚特金), *Ocherki po istorii Kazakhskoy SSR* (《哈萨克史文集》), Leningrad, 1941.
- Wjinner, T. G. (文纳), *The Oral Art and Literature of the Kazakhs of Russian Central Asia* (《俄国中亚哈萨克的口头文学与文学作品》), Durham, North Carolina, 1958.
- Zimine, L. (济米内), 'Les exploits d'emirzâde 'Omar Cheikh, fils du Timour, à Kashghar, en Ferghana et en Mongolie' (《帖木儿之子兀麻尔·沙黑在喀什噶尔、费尔干纳和蒙古的武功》), *RMM*, 1914.

第 14 章

- Allworth, E. (奥尔沃思),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中亚——俄国统治的世纪》), New York, 1967.
- Uzbek Literary Politics* (《乌兹别克文人政治》), The Hague, 1964.
- Central Asia Publishing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中亚出版业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New York, 1965.
- Bacon, E. E. (培根), *Central Asians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下的中亚人》), Ithaca, N. Y., 1966.
- Bennigsen, A. and Lemerrier-Quelquejay, C. (本宁森和勒梅希尔—奎尔昆杰), *The evolution of the Muslim nationalities of the USSR and their linguistic problems* (《苏联穆斯林诸民族的发展及其语言问题》), London, 1961.

- Les Mouvements Nationaux chez les Musulmans de Russie («俄国穆斯林的民族运动»)。I. Le Sultangalievisme au Tartarstan (第一卷«鞑靼斯坦的苏丹加列夫主义»), Paris, 1960; II. La Presse et les Mouvements Nationaux chez les Musulmans de Russie avant 1920 (第二卷«1920年之前俄国穆斯林的民族运动»), Paris, 1964。
-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苏联的伊斯兰教»), London, 1967。
- Caroe, O. K. (卡罗), Soviet Empire: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 («苏维埃国家: 中亚的突厥人与斯大林主义»), London, 1967。
- Carrere d'Encausse, H. (卡雷里·德·英科斯), Réforme et Révolution chez les Musulmans de l'Empire Russe (Bukhara, 1867—1924) («俄罗斯帝国中穆斯林的改革与革命»), Paris, 1966。
- Castagné, J. (卡斯塔格内), 'Le Bolchevisme et l' Islam' («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穆斯林»), RMM, 1922。
- Hostler, C. W. (霍斯勒) Turkism and the Soviets («突厥主义与苏维埃»), London, 1957。
- Kirimal, E. (基里玛尔),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Krimtürken («克里米亚突厥的民族斗争»), Emsdetten, 1952。
- Mende, G. Von (冯门德),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s Türken («俄国突厥人的民族斗争»), Berlin, 1936。
- Nove, A. and Newth, J. A. (诺夫和纽思), The Soviet Middle East («中东苏维埃»), London, 1967。
- Park, A. G. (帕克),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917—1927 («突厥斯坦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New York, 1957。
- Pipes, R. (派普斯),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构成»), Cambridge, 1954。
- Muslims of Central Asia («中亚的穆斯林»), Middle East Journal, 1955。
- Sokol, E. D. (索科尔), The Revolt of 1916 in Russian Central Asia («俄国中亚的1916年起义»), Baltimore, 1953。
- Spuler, B. (施普勒), 'Die Wolga-Tataren und Bashkiren unter russischer Herrschaft' («俄国统治下的伏尔加鞑靼人和巴失吉尔人»), Der Islam, 1949。
- 'Mittelasien unter sowjetischer Herrschaft' («苏维埃统治下的中亚»), Der Islam, 1964。

- Wheeler, G. (惠勒), *Racial Problems in Soviet Muslim Asia* (《苏联穆斯林亚洲的种族问题》), London, 1960.
- *A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苏联中亚现代史》), London, 1964.
-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苏联诸民族》), London, 1966.
- Zenkowsky, S. A. (齐科夫斯基), 'Kulturkampf in Pre-revolutionary Central Asia' (《革命前中亚的文化斗争》),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55.
- 'A Century of Tatar Revival' (《鞑靼文艺复兴的世纪》), *idem*, 1958.
- *Pan-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俄国的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教》), Cambridge, Mass., 1960.

第 15 章

- Becker, S. (贝克尔), *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俄国在中亚的保护国——布哈拉和希瓦》), Cambridge, Mass., 1968.
- Capus, G. (卡普斯), *A Travers le Royaume de Tamarlan* (《穿过鞑子帖木儿王国》), Paris, 1892.
- Curzon, G. N. (柯曾),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1889年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与英—俄争端》), London, 1889.
- Junge, R. (琼杰), *Das Problem der Europäisierung orientalischer Wirtschaft dargestellt an den Verhältnissen der Sozialwirtschaft von Russisch-Turkestan* (《俄属突厥斯坦社会经济状况反映的东方经济欧化问题》), Weimar, 1915.
- Khalfin, N. A. (卡尔芬), *Russia'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1857—68* (《俄国中亚政策》), London, 1964.
- Krafft, H. (克拉夫特), *A Travers le Turkestan Russe* (《穿越俄国突厥斯坦》), Paris, 1902.
- Krahmer, G. (克拉赫默), *Russland in Mittelasien* (《俄国在中亚》), Leipzig, 1893.
- Lansdell, H. (兰斯代尔), *Russian Central Asia* (《俄国中亚》), 2 vols.,

- London, 1885.
- Macgahan, J. A. (麦加恩), Campaigning on the Oxus, and the Fall of Khiva (《阿姆河的战斗与希瓦的陷落》), New York, 1874.
- Maksheev, A. I. (马克舍夫), Istoricheskii Obzor Turkestana i Nastupatel'nogo Dvizhenija v Nego Russkikh (《突厥斯坦历史概述及俄国对涅戈的攻势》), St Petersburg, 1890.
- Marvin, C. T. (马文), The Eye-Witnesses' Account of the Disastrous Russian Campaign against the Akhal Tekke Turcomans (《目击者对俄国人攻打阿哈尔特克土库曼人的悲惨战役的叙述》), London, 1880.
- Middeldorf, A. T. (米德尔多夫), Einblick in das Farghana-Thal (《费尔干纳谷地概况》), St Petersburg, 1881.
- Moser, H. (莫泽), A Travers l'Asie Centrale (《穿越中亚》), Paris, 1885.
- Olufsen, O. (奥鲁夫森), The Emir of Bokhara and his country (《布哈拉的艾弥儿及其国家》), Copenhagen, 1911.
- Olzscha, R. and Clejnow, G. (奥尔查和克莱诺), Turkestan. Die politischhistor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Probleme Zentralasiens (《中亚的政治史和经济问题》), Leipzig, 1942.
- Pahlen, K. K. (帕赫莱), Mission to Turkestan ... 1908—09 (《前往突厥斯坦的使命》), Oxford, 1964.
- Pierce, R. A. (皮尔斯),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俄国中亚(1867—1917)——精选书目》), Berkeley, Calif., 1953.
-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俄国中亚(1867—1917)——殖民统治研究》), Berkeley, Calif., 1960.
- Schwarz, F. von (施瓦茨), Turkestan, die Wiege der indogermanischen Völker. Nach funfzehnjährigen Aufenthalt in Turkestan (《突厥斯坦——印度日耳曼人的摇篮》), Freiburg in Breslau, 1900.
- Terent'ev, M. A. (捷连季耶夫), Istorija Zavoevanija Srednei Azii (《征服中亚史》), 4 vols., St Petersburg, 1906.
- Uljalvy-Bourdon, M. de (乌尔法尔维—鲍登), De Paris à Samarkand (《从巴黎到撒马尔罕》), Paris, 1880.

索引

(数字为原书页码)

- Abaqa (Chingizkhanid)** (阿八哈〔成吉思汗帝国〕), 118, 119, 130, 131
- 'Abbasid Dynasty** (阿拔斯王朝), 66, 68, 69, 70, 72, 77, 100, 103
- 'Abd al-Aziz (Timurid)** (阿布德·阿昔思〔帖木儿朝〕), 154, (Janid) (札尼朝), 176, 177, 178
- 'Abd al-Karim Satuq (Qarakhanid)** (阿布德·凯里姆·萨图克〔喀喇汗朝〕), 74
- 'Abd al-Latif (Timurid)** (阿布德·刺迪甫〔帖木儿朝〕), 154
- 'Abd al-Malik** (阿布德·马里克), 65
- 'Abd al-Malik b. Nuh (Samanid)** (阿布德·玛里克·本·努赫〔萨曼朝〕), 72, 74
- 'Abd al-Mumin (Shaybanid)** (阿布德·穆明〔昔班朝〕), 167
- 'Abd al-Rahman b. Muhammad b. al-Ash'ath** (阿布德·拉赫曼·本·穆哈默德·本·阿夏特), 65
- 'Abd al-Rahman b. Muslim** (阿布德·拉赫曼·本·穆斯林), 65
- 'Abd al-Rahman b. Muslim** (see **Abu Muslim**) (阿布德·拉赫曼·本·穆斯林〔见阿卜·穆斯林〕), 67
- 'Abd al-Samad** (阿布德·萨曼德), 182
- Abdagases** (阿布达伽塞斯), 43
- Abdul Kayyum Nasyri** (阿不都·凯尤木·纳西里), 190
- 'Abdullah (Timurid)** (阿不都刺〔帖木儿朝〕), 154
- 'Abdullah b. 'Amir** (阿不都刺·本·阿弥儿), 63, 64
- 'Abdullah Khan (Shaybanid)** (阿不都刺汗〔昔班朝〕), 161, 165—7, 168, 169, 174, 184
- 'Abdullah b. Khazim** (阿不都拉·本·卡齐穆), 63, 65
- 'Abdullah b. Tahir** (阿不都拉·本·塔希尔), 69
- 'Abdullah b. al-Zubayr** (阿不都拉·本·佐拜尔), 64, 65
- 'Abdur Rashid (Chaghatai)** (阿不都·拉失德〔察合台汗国〕), 136
- Ablay Khan** (阿布赉汗), 147, 198
- Abu 'Ali Simjuri** (阿卜·阿里·锡姆朱里), 73
- Abu Bakr** (阿卜·巴克尔), 134, 135
- Abu Bakr Lawik** (阿卜·巴克尔·拉维克), 72
- Abu'l-Fayz (Janid)** (阿不勒费兹〔札尼朝〕), 179—80
- Abu'l Ghazi Bahadur Khan** (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 178, 180, 183, 184; *Shajarah-ye Turk* («突厥世系»), 175
- Abu'l-Hasan Muhammad b. Sufyan al-Kalamati** (阿布勒·哈桑·穆哈默德·本·苏夫扬·迦拉马提), 74
- Abu'l Khayr Khan (Shaybanid)** (阿不勒海儿汗〔昔班朝〕), 140—1, 142, 156, 163
- Abu'l Khayr Khan** (阿不勒海儿汗), 146, 147
- Abu Muslim** (阿卜·穆斯林), 67, 68

- Abu Nasr Kursavi (阿卜·纳斯尔·库尔塞维), 190
- Abu Sa'id (Chingizkhanid) (不赛因〔成吉思汗帝国〕), 107, 113, 121
- Abu Sa'id (Timurid) (卜撒因〔帖木儿朝〕), 151, 154—5, 156
- Abu Sa'id Khan (Shaybanid) (不赛因汗〔昔班朝〕), 163, 165
- Afghanistan (阿富汗), 4, 22, 31, 34, 36, 45, 47, 57—8, 131, 149, 157, 168, 181, 182, 206, 209
- Afghans (阿富汗人), 167—8, 217—8
- Agathocles (阿加索克利斯), 34, 37
- Agnaean dialect (焉普语), 44
- Ahmad (Chaghatai) (阿黑麻〔察合台汗国〕), 134—5
- Ahmad Shah Durranī (阿黑麻·沙·杜兰尼), 167
- Ahmed Baytursun (阿合买·拜图尔孙), 200
- Akbar (Mughul) (阿克巴〔莫卧儿帝国〕), 160—1, 166, 171, 184
- Akhal-Tekke oasis (阿哈尔特克绿洲), 216, 217
- Akhšunwar (阿克苏瓦尔), 55
- Ak Mechet (Perovsk) (阿克麦切特佩罗夫斯克), 图 10
- al-Ahnaf b. Qais (阿赫奈弗·本·盖斯), 64
- 'Ala al-din Husain (Ghurid) (阿拉丁·胡赛因〔廓尔朝〕), 76
- 'Ala al-din Muhammad b. Takash (Khwarazmshah) (阿拉丁·穆哈默德·本·塔喀什〔花刺子模王〕), 77, 95, 96
- al-Amin (艾敏), 69
- Alamut (阿拉模忒), 103
- Alash—Orda (民族党), 201, 202
- Aleksandrovski, Fort (亚历山大德罗夫斯基要塞), 214, 图 10
- Alexander Balas (亚历山大·巴拉斯), 40
- Alexander Nevsky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117
-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24, 26—9, 31, 34, 91
- Alexander II of Russia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 190
- Alexander IV Aegus (亚历山大四世艾格斯), 30
- Alexandria Eschata (艾斯查塔的亚历山大城), 29
- Alexandria in Arachosia (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 29
- Alexandria in Ariana (Herat) (阿利亚的亚历山大城·赫拉特), 28—29
- Alexandria-of-the Caucasus (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 27, 29, 36, 37
- Alexandria Prophthasia (普罗塔西亚之亚历山大城), 29
- Alghu (Chaghatai) (阿鲁忽〔察合台汗国〕), 129—30
- 'Ali (阿里), 64, 67, 68
- Ali Bukeykhanov (阿里·布凯哈诺夫), 200
- 'Alim Khan (阿利姆汗), 185
- Almalīq (阿里麻里), 8, 128, 图 6, 7
- al-Mansur (曼苏尔), 68
- Alptigin (阿勒波斤), 72
- Altai, the (阿尔泰山·即金山), 3, 20, 25, 128, 131, 208, 221, 图 5, 6
- Altan Khan (Anda) (阿勒坦汗〔俺答〕), 144
- Altynsarin, Ibrahim (伊不拉欣·艾勒廷萨林), 200
- Amas-nji (阿马桑赤), 141
- Amdo (安都), 78
- Amida (Diyarbakr) (阿美达〔迪亚尔巴克勒〕), 52, 54
- Amir Chupan (艾弥儿绰班), 121
- Amir Haydar (Mangit) (艾弥儿海答儿〔满吉惕朝〕), 181—2

- Amir Ma'sum Shad Murad (Mangit) (艾弥儿麻素木·沙·木刺德〔满古惕朝〕), 168, 169, 180
- Amir Yar Ahmad Khuzani (艾弥儿牙儿·阿合马·忽札尼), 159, 160
- 'Ammar (阿玛尔), 70
-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 38, 52, 54
- Amphiopolis (安菲波里斯), 30
- 'Amr b. al-Layth (阿穆尔·本·莱斯), 70, 71
- Amu-Darya river (阿姆河, 即阿木河, 阿母河), 3, 4, 5, 127, 128, 130, 132, 156, 159, 164—8 (passim), 175, 179, 181, 211, 215, 220—1
- Amur-Sana (阿敏拉撒纳), 138
- Amyntas (阿敏塔斯), 34, 36, 37
- 'Amyrgians' (阿米尔基安人), 25
- Anbir (安贝尔), 67
- Andizhan (Andijan) (安集延〔安集洞]), 205
- Andragoras (安德拉戈拉斯), 33
- Angara (安加拉河, 即昂可刺河), 图5
- Antialcidas (安提耳希达斯), 36, 37
- Antigonus the One-Eyed (独目安提柯努斯), 30
- Antimachus Theus (安提马科斯·特乌斯), 34
- Antiochia (安条基亚, 即木鹿), 图3
- Antiochus (安条克), 31
- Antiochus II (安条克二世), 31, 32
- Antiochus III the Great (安条克三世大帝), 33
- Antipater (安提帕特), 29, 30, 34
- Anusha (阿努沙), 184
- Anushtigin (Khwarazmshah) (阿奴什的斤〔花刺子模王]), 76
- Apama (爱帕玛), 28, 31
- Aparytae (阿帕里塔伊), 22
- Apollodotus I (阿波罗多都斯一世), 35, 37
- Apollodotus II (阿波罗多都斯二世), 41
- Apollonius of Tyana (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44
- Apollophanes (阿波罗法内斯), 38
- Aq Mechet (阿克麦肯特), 185, 203, 209, 213
- Aqa Muhammad Khan (Qajar) (阿哈·马黑麻汗〔合札儿]), 181
- Aqsu (阿克苏, 即跋禄迦, 阿速), 6, 128, 133, 134, 135
- Aqtaghliq (白山派), 137, 138
- Arachosia (阿拉霍西亚), 21, 22, 27, 29, 30, 40, 41, 42, 43
- Aral Sea (咸海, 即大盐池), 图6
- Aramaic (阿拉米), 32
- Araxes, River (阿拉斯河, 即阿拉克塞斯河), 20, 图3
- Archebius (阿切比厄斯), 36, 37, 41
- Ardabil Shaykhs (爱尔代比勒诸教长), 158
- Ardashir I Kushanshah (阿尔达西尔一世贵霜王), 50, 51
- Ardashir II Kushanshah (阿尔达西尔二世贵霜王), 51, 54
- Ardavan V (阿尔达汪五世), 50
- Arghunid Dynasty (阿尔浑王朝), 157
- Argippaei, the (阿吉派伊人), 20
- Argun, R. (额尔古纳河, 即也里古纳河), 图5
- Aria (阿里亚), 22, 27, 30, 图3
- Arians (阿里亚人), 24
- Arigh Böke (Chingizkhanid) (阿里不哥·成吉思汗帝国), 104, 106, 129
- Arimaspians (阿里玛斯皮艾人), 20
- Ariomardus (阿利奥马杜思), 24
- Arius, River (Hari Rud) (阿里厄斯河〔哈里河]), 33
- Armenia (阿尔美尼亚), 22
- Arrian (阿里安), 27

- Arsaces (阿尔萨西斯), 31, 32
 Arsaces Theos (阿尔萨西斯·泰奥斯), 43
 Arsacid Dynasty (阿尔萨西斯王朝), 31—2
 Arslan (阿尔斯兰), 126
 Artabanus (阿尔达班努斯), 24
 Artacoana (阿塔柯纳), 27
 Artaeus (阿塔尤斯), 24
 Artayntes (阿泰特斯), 25
 Artyphius (阿蒂菲厄斯), 24
 Asad b. 'Abdullah al-Qasri (阿萨德·本·阿不都拉·盖斯里), 67
 Asaf Jah (Nizam of Hyderabad) (阿萨夫·贾赫〔海得拉巴德的尼萨〕), 110
 Ashkhabad (阿什哈巴德), 32, 217
 Asii (Asiani) (阿希〔阿色尼〕), 39—40, 41
 Asoka (阿育王), 31, 33
 Assassins (‘暗杀者’), 103
 Astarabad (阿斯塔拉巴德), 154, 164, 165, 166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8, 115, 120, 123, 124, 125, 144, 157, 187, 190—1, 192, 202, 208
 Astrakhanids (阿斯特拉罕朝), 144, 167, 187
 Athos (阿索斯), 23
 Atisha (阿底峽), 85
 Atossa, Queen (爱托莎王后), 24
 Atsiz (Khwarazmshah) (阿特锡兹〔花刺子模王〕), 76
 Aulia-Ata (Dzhambul) (奥利阿塔〔江布尔〕), 210
 Aurangzeb (Mughul) (奥兰则布〔莫卧儿帝国〕), 161, 177—8
 Avars (阿哇尔人)
 Avidius Cassius (阿维狄俄斯·卡西厄斯), 47
 Aya Guz river (阿亚古兹河, 即爱古斯河), 145—6
 Aybak (阿拔克), 77
 Ayuka Khan (阿玉奇汗), 144
 Azarbayjan (阿塞拜疆), 112, 113, 121, 123, 152, 154, 155, 181, 182, 183
 Azeri language (阿泽里语), 183
 Azes I (阿泽斯一世), 41, 46
 Azes II (阿泽斯二世), 43
 Azilises (阿泽里塞斯), 41
 Babur (Mughul) (巴布尔〔莫卧儿帝国〕), 134, 135, 155, 156, 157, 159—60, 171, 172, 180
 Bactra (巴克特拉, 即缚喝, 今巴尔赫), 33, 图3
 Bactria (巴克特里亚, 即大夏), 21, 22, 24, 27—37 passim, 39, 46, 49, 51, 54, 55, 56, 57
 Badakhshan (巴达赫尚, 即巴达哈伤, 八答黑商), 3, 6, 133, 136, 157, 161, 166, 176—7, 图9
 Baghchesaray (巴克契萨莱), 125, 194, 195
 Baghdad (巴格达, 即报达), 7, 15, 69, 71, 103, 112, 151, 152
 Baghlan (巴格兰), 42
 Bahram II (巴赫兰二世), 51, 52
 Bahram IV (巴赫兰四世), 55
 Bahram 'Ali Khan (巴赫兰·阿里汗), 181
 Bahram Shah (Ghaznavid) (巴赫兰王〔哥疾宁朝〕), 181
 Bai (拜城), 135
 Baikal, L. (贝加尔湖, 即大泽), 图5, 7
 Baichu (拜住), 102
 Bajaur (巴焦尔), 29
 Baku (巴库), 200
 al-Baladhuri (白拉左里), 63
 Bal'ami (巴拉米), 72
 Balasaghun (巴拉沙衮), 73
 Balkh (巴尔赫, 即缚喝, 巴里黑, 把力

- 黑), 5, 6, 47, 50, 52, 63, 64, 67, 71, 73, 96, 111, 128, 156, 157, 159, 161, 163, 164, 167, 176—7, 179—80, 图4
- Balkhash (巴尔喀什湖, 即克播海, 库克恰腾吉斯), 图2, 3, 6, 7, 8, 9
- Baltistan (巴勒提斯坦), 136
- Bamiyan (巴米扬, 即帆延), 48, 50, 73, 96, 图4
- Banakat (费纳喀忒), 96
- Baqi Muhammad (Janid) (把齐·麻哈没的〔礼你朝〕), 167
- Bardesanes (巴尔德撒纳斯), 44
- Barkyaruq (Seljuqid) (巴尔克耶勒〔塞尔柱王朝〕), 76
- Barlas (巴鲁刺思), 108, 132, 150
- Barsaentes (巴塞提斯), 27
- Bashghird (巴失吉尔惕), 73
- Bashkiria (巴失基里亚), 147, 207
- Bashkirs (巴失吉儿人), 144, 189
- Basmachis (巴斯马切斯), 206
- Basmil (拔悉密), 73
- Batu (Chingizkhanid) (拔都〔成吉思汗帝国〕), 100, 102, 103, 114—18, 121, 122, 124, 140
- Batur (Khuntayji) (巴图尔〔洪台吉〕), 144, 145
- Batyrsha (巴秃儿沙), 189
- Batyr Srym Khan (巴秃儿斯里木汗), 148
- Bayan (伯颜), 106, 107
- Bayazid I (Ottoman) (巴牙即忒一世〔奥斯曼帝国〕), 152
- Bayazid II (Ottoman) (巴牙即忒二世〔奥斯曼帝国〕), 158
- Bayram Khan (拜刺木汗), 171, 184
- Baysunqar (Timurid) (伯升豁儿 帖木儿帝国), 154
- Begram (贝格拉姆), 47
- Behistun (贝希斯坦), 21
- Bekovich-Cherkasskii, Prince (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 202, 214
- Berke (Chingizkhanid), (别儿哥〔成吉思汗帝国〕), 103, 116—119, 122
- Besnager pillar (贝斯那格石柱), 36
- Bessus (贝苏斯), 27
- Bihzad (比札迪), 156, 157, 171
- Bilge (毗伽可汗), 59
- Bilgetigin (毗伽的斤), 72
- Bimaran casket (比玛兰金棺), 49, 50
- Birdi Bek (Chingizkhanid), (别尔迪伯〔成吉思汗帝国〕), 121
- al—Biruni (比鲁尼), 44, 61
- Bishapur (比沙布尔), 74
- Bishbaliq (别失八里), 128
- Bishkent valley (佩斯肯特河谷), 54
- Bismil (拔悉密), 60
- Bistam (比斯塔姆), 76, 164, 165
- Bon religion (苯教), 79, 81—4
- Boris Godunov (波里斯·戈东诺夫), 125, 126
- Borjigin (孛儿只斤), 89
- Borte (孛儿帖), 90
- Bribsun (尺尊公主), 80
- Buddhism (佛教), 4, 9, 13, 31, 35, 39, 47, 48, 49, 60, 62, 79—85, 109, 128, 141, 144, 146; Milindapāṇha (《弥兰陀问经》), 35
- Bughra Khan Harun (Qarakhanid) (博格拉汗河伦〔喀喇汗朝〕), 74, 75
- Buir-Nor (贝尔湖, 即捕鱼儿海子), 图5
- Bukey (布凯帐), 198, 199
- Bukhara (布哈拉, 即安国, 不花剌, 卜花儿), 5, 6, 10, 64, 65, 71, 74, 96, 123, 127—33 passim, 137, 142, 143, 144, 157, 159, 162, 163, 166, 168—9, 172—87 passim, 203, 205, 206, 209, 210—11, 213, 218; People's Republic (布哈拉人民共和国), 206
- Bukholz (布霍尔兹), 202
- Bulgar Khanate (不里阿耳汗国), 114

- Buraq Khan (Chaghatai)** [八剌汗(察合台汗国)], 127, 130
- Burunduk Khan (布鲁杜克汗)**, 142, 158
- Bust (布斯特, 即不思忒)**, 70, 72
- Bu-ston (布顿)**, 85
- Buydash Khan (布答什汗)**, 143
- Caldiran (喀尔迪兰)**, 164—5
- Calliope (卡利俄珀)**, 37
- Callisthenes (卡利斯提尼斯)**, 27
- Cambyses (冈比西斯)**, 21
- Capisa (卡皮萨)**, 20, 52
- Carmania (卡曼尼亚)**, 33
- Caruq (喀禄克)**, 74
- Carus, Emperor (卡鲁斯皇帝)**, 52
- Caspian Gates (里海关)**, 26
- Caspians (里海人)**, 22, 24
- Caspian Sea (里海, 即克田吉思海)**, 图 6, 7
- Cassander (卡山德)**, 30
- Castana (总督)**, 45
- Caucasus (高加索)**, 2, 19, 168, 203, 216, 225
- Chagha-Nor (察罕诺尔)**, 131
- Chaghatai (Chingizkhanid)** [察合台(成吉思汗帝国)], 93, 100, 101, 103, 106, 110, 115, 127, 128—9
- Chaghatai Khanate (察合台汗国)**, 109, 112, 118, 119, 122, 127—39, 140, 141, 143, 145, 148, 149—52, 169
- Chaghatai Turkish (察合台突厥文)**, 156, 162, 171, 184
- Chaghri Beg (Seljuqid)** [察克里伯克(塞尔柱王朝)], 75
- Chaman Huzuri (查门赫兹里)**, 22—3
- Chandragupta (旃陀罗笈多)**, 30, 31
- Ch'ang-an (长安)**, 80
- Ch'ang-Chun (长春真人)**, 111
- Chapar (Chingizkhanid)** [察八尔(成吉思汗帝国)], 131
- Charju (查尔朱)**, 6—7, 179
- Cherniaev, General M. G.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 203, 209—10, 220
- Chi'en-Han Shu (《前汉书》)**, 39
- Ch'ien-lung, Emperor (乾隆皇帝)**, 17, 138
- Chimkant (奇姆肯特)**, 71, 146, 185, 203, 210
- China (中国)**, 1, 2, 3, 6, 8, 9, 10, 12, 13, 16—18, 24, 25, 38—9, 44, 47—52 passim, 58, 59, 60, 86, 87, 91, 93, 94, 105, 106, 107, 127, 147—8, 173, 201, 213—14
- Chin Dynasty (秦朝)**, 38
- Chigiz Khan (成吉思汗)**, 9, 12, 17, 77, 83, 85—9, 91—102, 104, 105, 107, 108, 110, 111, 114, 119, 124, 127, 128, 129, 141, 143, 150, 151, 152, 156, 162, 164; Tarikhi-i Jahān Gushā (《世界征服者史》), 62
- Chigizkhanids (成吉思汗帝国)**, 15, 102, 103, 104, 106, 115, 118, 124, 127—39, 152, 175
- Chionites (匈尼特)**, 38, 53—4, 55, 56
- Chirchik (奇尔奇克)**, 210
- Chikar Tengiz, L. (切尔卡尔—田吉兹湖)**, 图 8, 10
- Chorasmia (花刺子模, 即驢潜)**, 22, 23, 27, 65 (see Khwarazm) (见“花刺子模”)
- Chorasmians (花刺子模人)**, 24
- Chormaghun Noyan (孛里蛮那颜)**, 101, 102
- Choros (绰罗斯)**, 144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43, 44, 46, 60, 62, 128, 168, 188, 190, 222
- Chu, R. (楚河, 即辟叶川, 吹河)**, 图 2, 9
- Chuguchak (楚呼楚)**, 213
- Chung-hsiang (中兴府)**, 93

- Chupanids (绰班朝), 113
 Čigil (处月), 74
 Cimmerians (辛梅里安人), 19
 Clavigo (克拉维约), 151, 153
 Coenus (科努斯), 28
 Columella (克卢弥拉), 24
 Communists and Communism (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 192, 196—7, 202, 206—7
 Cosmas Indicopleustes (科马斯·英狄科普流斯特), 32
 Cossacks (哥萨克人), 189, 194, 198, 201, 208, 214, 215, 218
 Craterus (克兰特鲁斯), 28
 Crimea (克里米亚), 120, 121, 124, 125, 168, 192—202, 205; Khanate (克里米亚汗国), 144, 187, 188, 192, 195; Soviet Republic (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 196—7
 Ctesiphon (泰西封), 47, 52
 Cumas (库曼人), 114
 Čumul (处密人), 74
 Cyaxares (基亚克萨里斯), 19
 Cyrenaica (昔兰尼伽), 23
 Cyropolis (居鲁士城), 20
 Cyrus the Great (居鲁士大帝), 20
 Cyrus the Younger (青年居鲁士), 24
 Dadarshi (达达尔什), 21
 Dadicae (达迪卡伊), 22
 Daghestan (达吉斯坦), 203, 216
 Damghan (达姆甘), 158
 Dandaqan, Battle of (丹丹坎之战), 75
 Daniel of Galich (加利奇), 117
 Daniyal Bey (Mangit) (答尼牙尔贝 [满吉惕朝]), 180
 Dar al-Islam (伊斯兰世界), 139, 170
 Darius the Great (大流士大帝), 21, 22, 23, 24, 25
 Darius III (大流士三世), 26, 27, 29
 Dasht-i Qipchag (钦察草原), 114, 115, 117, 120, 123, 127, 151
 Datov, Srym (斯里木达秃夫), 198
 Dawlatshah (倒刺沙), 155
 Dayr al-'Aqul, Battle of (代尔阿古勒之战), 70
 Delhi (德里), 15, 77, 132, 152, 155, 160, 168, 178, 179; Sultanate (德里苏丹政权), 134, 151, 图7
 Demetrius I and II (德米特里一世与二世), 33—4, 35
 Dengil-Tepe (登吉尔捷佩), 216—17
 Devlet Giray (杰夫列特·吉列亦), 125, 188
 Dikaios (狄喀奥斯), 37
 Diodotus (狄奥多德), 32—3
 Divastich (歹伐思帝), 66
 Diwān lughāt al-Turk («突厥语大词典»), 73
 Dmitri Donskoi (底米特里·顿斯科伊), 122
 Drangiana (德兰吉亚那), 22, 23, 24, 27, 29, 30, 40, 41
 Dughlat family (秃忽刺家族), 133, 135
 Dungans (东干人), 4, 9, 213
 Dura-Timur (Chaghatai) (笃来帖木儿 [察合台汗国]), 132
 Durrani (笃来尼人), 181
 Ecbatana (艾克巴特那), 27, 33
 Eljigitei (Chaghatai) (燕只吉台 [察合台汗国]), 132
 Elterish (额跌利施), 59
 Epithalites (欧脱), 54
 Esen-Buqa (Chaghatai) (也先不花 [察合台汗国]), 132, 134, 141, 149
 Esen, Esentaiji (也先, 也先台吉), 141
 Eset Kotibarov (也赛·科季巴洛夫),

- 199
 Eucratides I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34, 35, 37
 Eucratides II Soter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索特), 34
 Eudamus (欧德摩斯), 29
 Eumenes of Cardia (欧迈尼斯), 30
 Euthydemus I and II (欧西德莫斯一世与二世), 33, 34, 35, 38
- Fa'iq (法伊格), 73
 Fardaghan (法尔达甘), 71
 Farghana (费尔干纳, 即拔汗那), 3, 6, 39, 66, 149, 156, 157, 175, 176, 185, 186, 205
 Fath 'Ali Shah (法塔赫·阿里沙), 181
 Firdausi (费尔道西), 55
 Firuzkuh (菲鲁兹库赫), 76
 Firuz I Kushanshah (卑路斯一世贵霜王), 51
 Firuz II Kushanshah (卑路斯二世贵霜王), 51, 52, 55—6
 Firuz Shah (卑路斯王)
 Frada (弗兰达), 21
 Fravartish (弗拉瓦尔蒂什), 21
 Fushanj (富山集), 166
- Galdan (Khungtayji) (噶尔丹〔洪台吉〕), 137, 138, 145, 149
 Galdan-Tseren (噶尔丹策零), 138
 Gandara (健达罗), 22, 24
 Gandhara (健陀罗), 33, 41, 47, 49—50, 51; Dharmapada (<法句经>), 44
 Gardiz (加德兹), 36, 37, 57, 69, 72
 Gauhar Shah (高赫尔沙), 154, 155
 Gaumata (高马塔), 21
 Gedrosia (Baluchistan) (吉德罗西亚〔俾路支]), 20, 30
 Geok-Tepe (盖奥克泰佩), 204, 216
- Georgia (格鲁吉亚, 即谷儿只), 102, 119, 152
 Ghajdivan, Battle of (迦只迪万战役), 159—60, 163
 Gharchistan (加希斯坦), 73
 Ghaza (Chingizkhanid) (合赞汗〔成吉思汗帝国]), 109, 112, 113, 119, 121
 Ghaznavid Dynasty (哥疾宁王朝), 73—6
 Ghazni (加兹尼, 即纳忒那, 哥疾宁), 71, 72, 74—7, 96, 128, 131, 图4
 Ghifzais (吉尔扎伊人), 57—8, 167
 Ghiyas al-Din Muhammad (Ghurid) (吉亚斯丁·穆哈默德〔廓尔朝]), 76, 77
 Ghur (廓尔), 73, 75—6
 Ghurid Dynasty (廓尔王朝), 75—7
 Ghuzs (乌古斯), 74
 Gobi desert (戈壁沙漠), 3, 4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 8, 100, 109, 112, 116—24, 140, 150, 151, 152, 168, 187
 Gondophares (戈多法里斯), 43
 Gorchakov, Prince (戈尔恰科夫公爵), 210
 Grumbates (伽楼巴提), 54
 Guge (古格), 84, 85
 Gupta Empire (笈多帝国), 56
 Gurgan (戈尔甘), 16, 113, 155; Plain (戈尔甘平原), 56; river (戈尔甘河), 184
 Gurii Mgr. (古里主教), 188
 Güyük (Chigizkhanid) (贵由〔成吉思汗帝国]), 100, 102, 103, 109, 115, 129
 Gyantse (江孜), 78
- Habash 'Amid (哈巴失·阿迷的), 129
 al-Hajjaj (哈贾吉), 65, 66
 Hamadan (哈马丹), 7, 63
 Hami (哈密), 6, 145

- Hamza b. Abdullah (哈姆宰·本·阿不都拉), 68,69
- Hamza b. Atrak (哈姆宰·本·艾特拉克), 68,69
- Hangchow (杭州,即杭州路),图7
- Haqq Nazar Khan (哈克·纳帕尔汗), 143,149
- Hariti, Goddess (诃利帝母,女神), 47
- Harun al-Rashid (诃伦·拉希德), 69
- al-Hasan b. Zayd (哈桑·本·宰德), 70
- Hasan-i Rumlu (哈散尼·鲁木路), 163—4
- Hashim b. Hakim (哈希姆·本·哈基姆), 68
- Hazaras (哈札刺人), 58,177
- Hazrat-i Afaq (哈司刺·阿法克), 137
- Hazrat-i Makhtum-i Azam (哈司刺·马黑杜米·艾扎木), 137,139
- Heliocles (海里奥克拉斯), 34,36,42
- Heliocles II (海里奥克拉斯二世), 36,37
- Heliodoros (海里奥多鲁斯), 36
- Hephthalites (Ephthalites) (唃哒), 54,55—56,57,58,59
- Herat (赫拉特,即也里,哈烈), 4, 5, 7,40,42,52,63,64,70,75,76,77, 96, 113,151—9 passim, 162—7 passim, 171,172,180
- Heraus (黑刺思), 42
- Hermaeus (赫尔麦乌斯), 37
- Herodotus (希罗多德), 19—20, 22, 23,25,26
- Hindu Kush range (兴都库什山脉,即大雪山), 2,3,7,27,30,33, 35, 42, 43,44,49,128,160,166,176
- Hindushahiya Dynasty (印度教沙希亚王朝), 71,73
- Hissar (希撒尔), 159
- Historia Augusta («奥古斯塔史»), 52
- Historia Mongolorum («蒙古历史»), 103
- Hordu (Chingizkhanid) (斡儿答[成吉思汗帝国]), 122
- Hormizd I Kushanshah (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 51; II (忽鲁密斯二世), 52; III (忽鲁密斯三世), 55
- Hou-Han shu («后汉书»), 43
- Hsien-Pi (鲜卑), 39,53,58
- Hsi-Hsia (西夏), 83,90,93,96,98
- Hsiung-Nu (Huns) (匈奴[匈人]), 26, 38—9,43,53
- Hülegü (旭烈兀), 101,103,104,118, 122
- Humayun (胡马雍), 160
- Hunas (匈奴人), 56—7
- Huns (匈人), 54—5,56 (See Hsiung-Nu) (见“匈奴”); language (匈奴语), 57
- Husayn Bayqara, Sultan (Timurid) (胡赛因·拜卡刺苏丹·帖木儿帝国), 155—6,157,171
- Husayn Beg (胡赛因伯克), 182
- Husein Seit (忽辛·赛特), 188
- Huvishka (护毗色迦), 46,47,48
- Hydarnes (希达尼斯), 24
- Hyrkania (希尔卡尼亚), 21,23,31,33, 图3
- Hystaspes (维什塔斯帕), 21,24
- Jaroslav of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 117
- Ibak (Sibir Khan) (亦巴黑[亦必儿汗]), 141
- Ibn Battuta (伊本·拔图塔), 8,117, 120,121,127—8
- Ibragimov, Veli (韦利·伊布拉吉莫夫), 197
- Ibrahim al-Qawsi (依布拉辛·高锡),

- 70
- Idiku (也迪古), 123, 124
- Idiqu (亦都护), 62
- Ighraq (亦哥罗克), 74
- Ilbars Khan (伊利巴尔汗), 179
- Ilek Nasr (Qarakhanid) (伊利克·纳斯尔〔喀喇汗朝〕), 74
- Ili, the (伊犁), 3, 8, 39, 128, 131, 209, 213; Province (伊犁省), 214; Valley (伊犁河谷), 138, 145, 214
- Ili, R. (伊犁河, 即伊丽河, 衣烈河), 图 2, 8
- Il-Khanids (伊利汗国), 101, 104, 108, 111—13, 118, 121, 127, 128, 130—1, 132, 151
- Iminskii, N. A. (伊尔明斯基), 222
- Imam Quli Khan (伊玛目库电汗), 176
- Imanov, Amangeldy (艾曼盖勒丁·伊曼诺夫), 201
- India (印度), 22, 24, 28, 29, 32—48, 49, 56, 136, 151, 152, 157, 160—2, 167—73 passim, 176, 179, 182, 195, 218
- Indus (印度河, 即信度河, 申河), 图 2, 3, 6, 7
- Iran (伊朗), 10, 16, 17—18, 19, 20, 21, 22, 44, 50—6 passim, 59, 61, 101, 103, 106, 111, 112, 121, 127—34 passim, 151—9 passim, 164, 166—8, 217; language (伊朗语), 42, 57
- Irkutsk (伊尔库茨克), 4
- Irtys, R. (额尔齐斯河, 即也儿的石河), 图 5, 6, 7, 8
- Isatay Taymenov Bey (伊萨泰·泰曼诺夫伯克), 199
- Isfahan (伊斯法罕), 7, 10, 30, 113, 152, 167, 178
- Isfarayin (伊斯法赖因), 166
- Isfijab (白水胡城), 65, 71
- Ishan Madali (伊尚·迈代利), 205
- Ishaq b. Alptigin (伊沙格·本·阿勒波的斤), 72
- Ishim Khan (艾斯木汗), 144
- Iskandar (Shaybanid) (亦思干答儿〔昔班朝〕), 167
- Iskandar Munshi (亦思干答儿·蒙失), Tarikh-i 'Alam are-yc 'Abbasī (《阿拔斯世界史》), 184
- Islam (伊斯兰教), 3, 4, 9, 10, 13—14, 17, 63—67, 130—3, 136, 139, 141, 143, 144, 148, 154, 167—70, 182, 184, 187—199 passim, 204—7, 212, 222—4; See also Sunni (又见“逊尼派”)
- Ismail Bey Gasprinski (Gaspraly) (伊斯迈勒·拜·杰斯普里斯基〔杰斯普拉雷〕), 195—6, 205, 224
- Isma'il b. Ahmad (Samanid) (伊斯玛仪·本·艾赫麦德〔萨曼朝〕), 71
- Isma'il Khan (Chaghatay) (亦思马因汗·察合台汗国), 137
- Isma'ilis (伊斯玛仪派), 71
- Isra'il b. Seljuq (伊斯莱尔·本·塞尔柱), 75
- Issedones, the (伊塞顿人), 19, 20, 26
- Issyk Kul (伊塞克湖, 即热海, 阔池), 图 2, 3, 8, 9
- Istämi (室点密), 59
- Ithamitres (伊塔弥特瑞斯), 25
- Ivan I (伊凡一世), 121
- Ivan the Terrible (伊凡雷帝), 125, 187
- Izz al-Din Husain (Ghurid) (伊宰勒丁·胡赛因〔廓尔朝〕), 75
- Jadidism (新主义), 224
- Jahangir (Mughul) (只罕杰尔〔莫卧儿朝〕), 153, 161
- Jalal al-Din b. Muhammad (Khwarazmshah) (札阑丁〔花剌子模王〕), 96, 102
- Jalandhara (闍烂达罗), 48

- Jalayrid Dynasty (札剌亦儿朝), 113, 121, 151, 152, 154
- Jami (札米), 155
- Jandi (毡的), 75, 96
- Jangir Khan (杨吉尔汗), 199
- Janibek (Chingizkhanid) (札你别克吉思汗帝国), 119, 121, 151
- Janibek (Kazakh) (札你别克哈萨克), 141, 142
- Janibek (Shaybanid) (札你别克昔班朝), 159, 160, 164, 165
- Jangir Khan (江格儿汗), 144
- Janid Dynasty (札尼朝), 144, 167, 171, 175—6, 178—80, 181, 184
- Jassy, treaty of (雅西条约), 193, 194
- Jats (强盗), 133
- Jaxartes river (药杀水, 即锡尔河), 5, 20, 21, 27, 29, 33, 38, 65, 66, 68
- Japal (占波勒), 73
- Jayun (阿姆河), 5
- Jebe (者别), 94, 95, 99, 114
- Jebel Suraj (杰贝勒·苏拉吉), 29
- Jöchi (Chingizkhanid) (术赤[成吉思汗帝国]), 93, 96, 100, 101, 103, 114, 117, 121, 128, 140, 141
- John of Plano Carpini (普兰诺·迦宾), 103, 105, 115
- Jo-Khang (大昭寺), 80
- Juan-juan (柔然), 58—9
- Jungaria (准噶尔), 3, 4, 6, 7, 8, 101, 106, 128—32 passim, 136, 145, 147, 153, 213, 214
- Jürchids (See Kin Dynasty) (女真人[见“金朝"]), 87, 89, 90, 91, 93—7, 99, 111
- Jurjan (See Gurgan) (朱里章[见“戈儿甘"]), 63, 70, 71
- Juwani (Juvayni) (志费尼[术外尼]), 116, *Tarikh-i Jahān Gushā* («世界征服者史»), 62
- Juzjan (护国使), 图 2
- Juzjani (术兹札尼), 116, 117, 128—9
- Kaakha (喀哈), 216
- Kabul (喀布尔, 即高附, 迦布罗, 可不里), 7, 20, 23, 43, 52, 53, 57, 71, 75, 135, 157, 159, 160, 177; valley (喀布尔河谷), 41, 43, 51, 52
- Kaffa (卡法), 120, 125
- Kalka, Battle of the (迦勒迦河战役), 114
- Kalmyk Horde (卡尔梅克部落), 144, 146
- Kamalu (迦球罗), 71
- Kandahar (坎大哈), 21, 23, 157, 161, 图 3, 4, 9
- K'ang-hsi, Emperor (康熙皇帝), 145
- Kanishka, Emperor (伽腻色伽皇帝), 44, 46—7, 48, 49, 50
- Kanishka II (伽腻色伽二世), 47; III (伽腻色伽三世), 51
- Kanishkapura (伽腻色伽布罗城), 48
- Kanjur (甘珠尔), 85
- Kansu (甘肃), 6, 39; Corridor (甘肃走廊), 8, 16
- Kan-Tcheou (甘州), 62
- Kapishakani, Battle of (卡佩萨坎尼之战), 21
- Karaites (克烈部), 86, 90, 91, 93, 99, 101
- Kara-Kalpaks (喀喇喀尔柏克人), 9, 173
- Kara-Kirghiz, see Kirghiz (喀喇吉尔吉斯, 见吉尔吉斯)
- Karay Khan (克烈汗), 141, 142
- Karkaralinsk (卡尔卡拉林斯克), 208
- Kart Dynasty (凯尔特朝), 113, 151
- Kashgar (喀什噶尔, 即可失哈耳, 哈密哈儿), 74, 106, 128, 133, 135—9, 149, 166, 213—14
- Kashgaria (喀什噶里亚), 3, 6, 7, 10, 95, 100, 127, 131, 136—9, 145

- Kashmir (克什米尔, 即怯失米儿), 图6
 Kasym Khan (哈萨木汗), 142—3, 153
 Katta-Qurghan (卡塔库尔干), 213
 Kaufman, General K. P. von (考夫曼将军), 211—15, 218, 219, 220, 222—3
 Kayseri (开塞利), 102
 Kazakh (哈萨克), 9, 13, 14, 127, 134, 135, 136, 141—8, 158, 166, 170, 173, 178, 185, 189, 190, 197—202, 203, 204, 208, 209, 219, 222, 225; Khanate (哈萨克汗国), 143, 147, 148, 149, 197, 203; Soviet Republic (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 201, 235
 Kazakh Hordes (哈萨克诸帐), 140, 143—8 passim, 169—70, 197—201, 208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4, 12, 140, 146, 192, 201, 207
 Kazan (喀山), 124, 125, 187—92, 198, 207, 208
 Kazimov (卡齐莫夫), 126
 Kebek (Chaghatai) (怯别察合台汗国), 131—2
 Kenesary Khan (怯乃萨莱汗), 199
 Kerulen (克鲁伦河, 即怯绿连河), 图5
 Khalaj (哈拉吉), 57—8
 Khalj (哈尔吉), 57—8
 Khalkas (Mongols) (喀尔喀〔蒙古人〕), 7, 145
 Khan-baliq (see Peking) (汗八里〔见北京〕)
 Khanskaya Stavka (汗斯卡亚斯塔夫卡), 199
 Khan Tengri (汗腾格里), 3
 Khan Töre (汉图里), 74, 139
 Khaqani Turkish (可汗的突厥语), 74, 139
 Kharijites (喀里吉特派), 68, 69, 70, 72
 Kharjird (哈儿只提), 154
 Kharoshthi inscription (佉卢文铭文), 40, 45, 46, 48
 Khingila (身矩罗), 57
 Khitans (see Liao Dynasty) (契丹人〔见辽朝〕), 39, 87, 93, 95, 111
 Khiva (希瓦), 95, 96, 97, 147, 175, 178, 182—5, 183, 202, 203, 209, 214—16, 221, 222, 223, 224, 225; Khanate (希瓦汗国), 144, 147, 179, 183, 184, 198, 206
 Khizr-Khoja (Chagharai) (黑的儿火者察合台汗国), 133, 134, 152
 Khoja Dynasty (和卓王朝), 136—9
 Khoja Hidayatullah (希达雅图刺和卓), 137
 Khojand (霍真德, 即火占、俱战提), 96, 185, 201, 211, 213, 215, 图10
 Khorezm People's Republic (Khiva) (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希瓦〕), 206
 Khosrau I Anoshirvan (库萨和一世), 56, 59
 Khotan (和田), 6, 41, 45—6, 84, 106, 149
 Khotan, R (白玉河, 于阗河), 图3, 9
 Khudayar Khan (呼达雅尔汗), 211, 215
 Khungtayji (洪台吉), 12
 Khurasan (呼罗珊), 5, 6, 54, 60, 63—73, 75—7, 128, 130, 132, 151—6 passim, 158, 161, 164—8 passim, 181
 Khusnavaz (库什那瓦兹), 55
 Khu Urluk Khan (和鄂尔勒克汗), 144
 Khwaf (赫沃夫), 166
 Khwandamir (宽答米儿), 155
 Khwarazm (花刺子模, 即火寻), 5, 6, 50, 65, 75, 76, 95, 114, 120, 123, 128, 129, 141, 152, 155, 157, 167, 175, 176, 183
 Khwarazmshahs (花刺子模王朝), 76, 77, 95—6, 102

- Kidara (寄多罗), 54—5
 Kidararites (寄多罗人), 54—5, 57
 Kiev (基辅, 即乞瓦), 图 7
 Kin Dynasty (see Jürchids) (金朝〔见女真人〕), 87, 94, 98, 100, 102
 Kirghiz (黠戛斯, 吉利吉思, 乞尔吉思, 吉尔吉斯), 9, 11, 14, 59, 62, 73, 92, 127, 135, 136, 137, 139, 148, 186, 197, 199, 201, 204, 219, 223, 225; Soviet Republic (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 201
 Kirghizia (吉尔吉斯地区), 149, 192, 200, 201, 207
 Kirman (克尔曼), 63, 68, 70, 113, 158
 Kishsh (史国), 65, 68
 Kokand (浩罕), 138, 181—6 passim, 199, 203—6, 209, 211, 215—16; Khanate (浩罕汗国), 149, 175, 178, 198, 203, 205, 209
 Kokchetav (科克切塔夫), 208
 Kökchü (阔阔出), 91
 Koko-Nor (青海湖), 8
 Kokpekty (科克佩克特), 208
 Komarov, General A. V. (科马罗夫将军), 217—18
 Konashevich, Luka (卢卡·克纳舍维奇), 189
 Kondurcha, Battle of the (孔杜勒哈战役), 123
 Kopal (科帕尔), 209
 Krasnovodsk (克拉斯诺沃茨克), 214—15, 216, 217, 图 10
 Krivoshein, A. V. (克里沃舍), 221
 Krizhanovskii, General N. A. (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 211
 Kucha (库车, 即龟兹, 苦叉), 6, 44, 50, 59
 Kuchean dialect (库车语), 44
 Kückünchi Khan (Shaybanid) (忽什弘乞汗〔昔班朝]), 163
 Küchlug (屈出律), 77, 95
 Kuchuk-Kainardji, treaty of (库舒克—凯奈德吉条约), 192
 Kuchum (古出木), 125, 126
 Kujula Kadphise (丘就却), 43, 44, 46
 Kuldja (固尔扎), 213, 214
 Kulikovo Polye, Battle of (库利科沃之战), 122
 Kul-i Malik, Battle of (忽里蔑力克之战), 159
 Kulun-Nor (呼伦湖, 即阔连海子), 图 5
 Künjek (Chaghatai) (宽阔〔察合台汗国]), 131
 Kununbaev, Abay (艾拜·昆嫩巴耶夫), 200
 Kuropatkin, General A. N. (库罗帕特金将军), 217
 Kushans (贵霜人), 42, 44—8, 50—2, 55
 Kushka (库什卡), 218
 Kuzadag, Battle of (曲札达格之战), 102
 Kyros, R. (基罗斯河), 图 3
 Ladakh (拉达克), 84, 135
 Laghman (拉格曼), 31
 Lakhana (逻迦拿), 57
 Lamaism (喇嘛教), 15, 79, 80
 Lang Darma (朗达玛), 83
 Lazarev, General I. D. (拉扎列夫将军), 216
 Lhasa (拉萨), 78, 136
 Liao Dynasty (see Khitans) (辽朝〔见契丹人])
 Liegnitz, Battle of (里格尼茨之战), 115
 Lomakin, General (洛马金将军), 216—17
 Lop-Nor desert (罗布淖尔沙漠), 4, 6, 131, 133
 Lo-yang (洛阳), 53, 60
 Lysias (吕西阿斯), 37

- Machar** (马哈尔), 120
Madyes, Prince (马底耶斯王), 19
Magadha (摩揭陀), 85
Magnesia (马格尼西亚), 24, 33
Mahabet Utemisnov (马哈姆别特·乌捷米斯诺夫), 199
Mahavibhasa (《大毗婆娑论》), 48
Mahmud of Ghazni (哥疾宁的马哈穆德), 73—5
Mahmud al-Kashghari (马赫默德·喀什噶里), 73, 74
Mahmud Khan, Sultan (Chaghatai) (速檀马合谋汗[察合台汗国]), 151
Mahmud Yalavach (马合谋·牙刺瓦赤), 129
Mahmud b. Yunus (Chaghatai) (马哈木·本·羽奴思 [察合台汗国]), 134, 135, 156, 157
Makhrum (马赫拉姆), 215
Makhtum Quli (马黑秃木·库里), 184
Malik Ashraf (Chupanid) (蔑力克·阿失刺夫[绰班朝]), 121
Malikshah (Seljuqid) (马里克王[塞尔柱朝]), 76
Mamash Khan (谟麻什汗), 143
Mamay (马买), 122
Mamluks (马木路克), 110, 112, 118, 119, 122, 152, 158
al-Ma'mun (麦蒙), 69
Mamysh Berdy (迈米什·拜迪), 188
Manchus (满清), 138—9, 145—9 passim, 178
Mangits (满吉惕朝), 123, 168, 171, 175—6, 179, 180, 182
Mangyshlak (曼格什拉克), 144, 200, 209, 214—215
Manichaeism (摩尼教), 60—1, 62
Mansur I b. Nuh (满苏尔一世), 72
Mao-tun (冒顿单于), 39
Maracanda (马拉坎达), 27
Mar A'mmo (马尔·阿摩), 60
Margelan (Marghinan) (马儿吉兰[马尔基南]), 216
Margiana (马儿吉亚那), 21
Mar-pa (玛尔巴), 85
Marv (梅尔夫, 即木鹿), 5, 7, 10, 31, 50, 52, 60, 63, 64, 75, 76, 128, 158, 159, 164, 167, 168, 181, 204, 217, 220; **Battle of** (木鹿之战), 158, 159, 163, 图 10
Mashhad (马什哈德), 5, 10, 154, 158, 162, 165, 166, 167, 177
Massagetae (马萨格泰), 19, 20, 25, 28, 图 3
Mas'ud Bek (麻速忽别乞), 129, 130
Mas'ud of Ghazni (哥疾宁的马速德), 75
Mathura (秣菟罗), 44, 49; **Battle of** (秣菟罗之战), 41
Mathura Lion Capital (秣菟罗狮柱), 40, 41
Maves (Maues) (莫俄斯), 37, 41
Maurya, the (孔雀王朝), 30, 33
Mawarannah (河中地区), 5, 6, 10, 13, 15, 16, 17—18, 59, 66, 68, 71, 95, 108, 111, 120, 122, 123, 127—44 passim, 150—1, 154—73 passim, 175—9, 180—1, 183
Mazandaran (马赞达兰), 图 9
Medes (米底人), 19, 20
Media (米底), 29, 30, 32, 图 3
Megabazus (墨伽巴祖斯), 24
Megasthenes (墨伽斯忒涅斯), 30
Mehmet II, Fatih (Ottoma) (迈赫迈特二世[奥斯曼帝国]), 125
Menander I Soter (弥兰陀一世索特), 35—6, 37
Menander II (弥兰陀二世), 37
Mengli Giray I (明里·吉列伊一世), 125
Merkits (蔑儿惕部), 86, 90, 91, 95, 图

- 5
-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洛格), 119
- Mihirakula (摩醯逻矩罗), 56—7
- Milarepa (米拉日巴), 85
- Ming Dynasty (明朝), 107
- Mins (明氏朝), 175—6
- Minusinsk (米努辛斯克), 58
- Mir 'Ali Shir Nava'i (米尔·阿里·失儿·纳歪), 155—5, 171
- Miranshah (米兰沙), 153, 155
- Mirkhwand (米儿哈完迪), 155
- Mir Said Sultan Galiev (米儿·赛德·苏丹加列夫), 192
- Mir-Yakub Dulat (米尔耶库卜·杜莱特), 200
- Mirza Muhamand Haydar Dughlat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秃忽刺), 135—6, 160
- Möngke (Chingizkhanid) (蒙哥〔成吉思汗帝国〕), 100, 101, 103, 104, 106, 108, 109, 115, 118
- Möngke-Temur (Chingizkhanid) (忙哥帖木儿〔成吉思汗帝国〕), 118, 119
- Mongolia (蒙古), 26, 38—9, 53, 58, 60, 62, 140, 145, 173
- Mongols (蒙古人), 6, 9, 12, 13, 15, 57, 86, 88—92, 94, 98, 100—13 passim, 127, 128, 144, 148, 151, 169, 187: Empire (蒙古帝国), 141, 142, 207
- Mu'awiya (穆阿维亚), 64
- Mubara Shah (Chaghatai) (木八剌沙〔察合台汗国〕), 129, 130
- al-Mufaddal b. al-Muhallab (穆法德勒·本·穆哈拉布), 65
- Mughul Empire (莫卧儿帝国), 160—1, 168, 179
- Mughuls (莫卧儿人), 110, 134, 135, 171, 176—8
- Mughulistan (莫谿勒斯坦), 142, 150, 152; Khanate (莫谿勒汗国), 127, 133, 134, 135, 136, 140, 143, 145, 148—9, 151
- al-Muhallab b. Abi Sufra (穆哈拉布·本·阿比·苏弗拉), 65
- Muhammad 'Ali (麻哈没的·阿里), 185
- Muhammad Amin (Chaghatai) (马黑麻·阿明〔察合台汗国〕), 137
- Muhammad b. Tughluq (麻哈没的·本·秃忽鲁), 132
- Muhammad Husayn Khan (Qajar) (麻哈没的·胡赛因汗〔合儿儿〕), 181
- Muhammad Rahim Bey (Mangit) (麻哈没的·拉希木贝〔满吉惕朝〕), 179, 180
- Muhammad Shah (Mughul) (麻哈没的沙〔莫卧儿帝国〕), 179
- Muhammad Shaybani (麻哈没的·普班尼), 135, 142, 156—9, 163, 166, 171, 172, 173
- Muhammad 'Umar Shaykh (麻哈没的·乌马尔·沙黑) 185
- Mu'izz al-Din Muhammad (Ghurid) (穆易兹丁·穆哈默德·廓尔朝), 77
- Mulla Azadi (木刺·阿哲迪), 184
- Muqali (木华黎), 94, 95, 99, 101
- al-Muqanna' (木坎纳), 68
- Murad Bakhsh (Mughul) (木刺德·巴黑失〔莫卧儿帝国〕), 177
- Muraviev, N. N. (穆拉维耶夫), 209
- Musa b. 'Abdullah b. Khazim (木萨·本·阿不都拉·本·卡齐穆), 65
- Musa Jarullah Bigi (木萨·杰鲁莱赫·比吉), 190
- Muslims, see Islam (穆斯林, 见伊斯兰教)
- Musta'sim (谟斯塔辛), 103
- al-Mu'tamid (穆耳泰米德), 70
- Muzaffar al-din (Mangit) (穆札法尔丁〔满吉惕朝〕), 183
- Muzaffarid Dynasty (穆札法儿朝),

- 113
 Myci (密喀), 22
- Nadir Muhammad (Janid) (纳迪儿·麻哈没的〔札尼朝〕), 176—7
- Nadir Shah (纳迪儿沙), 147, 175, 176, 178—80, 184
- Naimans (乃蛮部), 86, 93, 99, 111
- Nakhshab (Qarshi) (那黑沙布〔合儿普〕), 132
- Nalanda (那烂陀), 81
- Namangan (纳曼干), 205
- Naqshbadiyeh (纳合普班底教团), 155, 169, 205
- Naqsh-i Rustam (纳克什鲁斯坦姆), 51
- Nartang (奈塘), 85
- Nasaf (see Nakhshab) (那色波〔见那黑沙布〕), 65
- Nasir al-din Khan (纳速刺丁汗), 129
- Nasir al-din (Kokandi Khan) (纳速刺丁〔浩罕汗〕), 215—216
- Nasr b. Ahmad (Samanid) (纳斯尔·本·艾赫麦德〔萨曼朝〕), 75
- Nasrullah (Mangit) (纳斯鲁刺〔满吉惕朝〕), 182—3, 185
- Nau, Fort (瑙城堡), 211
- Nestorians (聂斯托利派教徒), 90, 91, 93, 128
- New Saray (see Saray-Berke) (新萨莱〔见别儿哥萨莱〕), 118
- Niaz-bek, Fort (尼亚兹别克要塞), 210
- Nicanor (尼喀诺), 30
- Nikolai Konstantinovich, Grand Duke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220
- Nishapur (内沙布尔, 即你沙不尔), 5, 7, 50, 53, 63, 67, 66—9 passim, 96, 130, 158, 166
- Nisibis (尼西比斯), 53
- Niya (尼雅), 48
- Nizhni-Novgorod (下诺夫哥罗德), 191
- Noghay (那海), 119, 143, 144
- Noghay Tatars (那海鞑靼), 8, 119, 123, 124, 126, 144, 194, 195; Horde (那海鞑靼部), 140, 143
- Noin-Ula tumuli (诺颜乌拉古墓), 26
- Novo-Aleksandrovscoe, Fort (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要塞), 209
- Nuh II b. Mansur (Samanid) (努赫二世〔萨曼朝〕), 73
- Nur 'Ali Khan (奴儿·阿里汗), 147
- Nying-ma-pa (宁玛派), 81
- Ob, R. (鄂毕河, 即阿浦河), 图 5
- Ögetei (Chingizkhanid) (窝阔台〔成吉思汗帝国〕), 93, 100—3, 106, 109, 114—16
- Oghul-Ghaimish (斡兀立海迷失), 103
- Oghuz (乌古斯), 59, 75; language (乌古斯语), 183
- Ohind (奥欣德), 71, 73
- Oirots (斡亦剌·卫拉特), 86, 92, 126, 127, 134, 136—49 passim, 167, 170, 178, 197, 202
- Omsk (鄂木斯克), 147, 208, 209
- Öngüts (汪古部), 93
- Onon, R. (鄂嫩河, 即翰难河), 图 5
- Ordu-Baligh (斡耳朵八里), 60
- Orenburg (奥伦堡), 148, 192, 201, 208, 209, 211, 214—15, 224; Spiritual Assembly (奥伦堡宗教协会), 189, 204; Tashkent Railway (奥伦堡—塔什干铁路), 220
- Orenburg Kirghiz (奥伦堡吉尔吉斯州), 209
- Orkhon, R. (鄂尔浑河, 即斡儿寒河), 图 5
- Orqina (兀鲁忽乃), 129
- Orthagnes (俄塔格涅斯), 43
- Otrar (讹答刺), 6, 8, 95, 96, 153

- Ottoman Turks (奥斯曼突厥人), 110, 122, 125, 152, 164—5, 166, 168, 183, 192, 194
- Oxus river (乌浒水, 即妫水), 5, 27, 28, 30, 42, 56, 59, 60, 64, 65, 67, 73, 74, 图 3
- Oxyartes the Bactrian (巴克特里亚人 奥克夏特), 28, 29—30
- Pacores (帕科瑞斯), 43
- Pactyes (帕克底斯人), 25
- Pactyca (帕克蒂喀), 22
- Padmasambhava (莲花生), 81
- Pahlavi language (中世波斯语), 51, 70
- Pamir (帕米尔, 即播蜜川, 葱岭), 图 2, 3, 6, 9
- Panipat, 1st Battle of (第一次巴尼伯德战役), 160; 2nd (第二次巴尼伯德战役), 171
- Pantaleon (班达里奥), 34
- Paropamisadae (帕鲁帕米塞德), 29—30, 33
- Paropamisus range (帕鲁帕米苏斯山脉), 2, 33, 164, 图 3
- Parśva (婆栗湿婆), 48
- Parthia (帕提亚, 即安息), 21, 22, 24, 29, 31—3, 40, 43, 47, 50; language (帕提亚语), 31—2, 51
- Parvan (帕尔万), 29
- Parwan, Battle of (八鲁湾之战), 96
- Pasargadae (帕萨加第), 21
- Pashtu language (普什图语), 45, 57, 58
- Pazyryk tumuli (巴泽雷克古墓), 20, 25—26
- Pečeneg (北姆), 73
- Pei Shan (白山), 4
- Peithon (珀同), 29, 30
- Peiking (北京, 即大都, 中都), 8, 13, 93, 94, 141
- Perdiccas (珀耳狄卡斯), 29
- Perekop (彼列科普), 194
- Perovsk (彼罗夫斯克), 209, 210
- Perovskii, General V. A. (彼罗夫斯基将军), 70, 72, 139, 171, 172, 184
- Petropavlovsk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199, 208
- Pharasmanes (法拉斯曼尼斯), 27
- Pharnaces (法尔纳西斯), 24
- Pherendates (费伦达特斯), 24
- Philotas (菲罗塔斯), 27
- Philoxenus (菲洛克森努斯), 37
- Phrataphernes (佛刺塔斐耳尼斯), 29
- Piri (鼻利), 73
- Pir Muhammad I (Shaybanid) (皮尔·马黑麻一世 [昔班朝]), 165, 167
- Pishpek (皮什佩克), 149
-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8, 105, 106, 110, 111, 136
- Polybius (波里比厄斯), 33
- Polyxenus (波吕克塞努斯), 37
- Pompeius Trogus (庞培·特罗古斯), 39—40
- Prestre John (普雷斯特·约翰), 91, 102
- Priscus (普利斯库斯), 54, 55
- Procopius (普罗科匹厄斯), 56
- Prophthasia (普罗塔西亚), 27, 29
- Protothyes (普罗托蒂耶斯), 19
- Przhevalsk (普尔热瓦利斯克), 图 9
- Ptolemy III Euergetes (托勒密三世), 32
- Pushkalavati (Charsada) (布色羯罗伐底 [查萨达]), 36, 37
- Pyanjikent (喷赤干), 66
- Qabul Khan (舍不勒汗), 89
- Qai (柴), 73
- Qajars (舍札儿), 168, 181, 184
- Qapghan (喀嘎可汗), 59
- Qara Balgasun (喀喇八喇合迭), 60; inscription (“三体合璧碑”), 60, 62

- Qara Hillegü (Chingizkhanid) (合剌旭烈兀成吉思汗帝国), 129
- Qara-Khitans (喀喇契丹), 76, 77, 92, 95, 98, 99, 128
- Qaraqorum (哈喇和林), 103—3, 105, 106, 110, 115, 图 7
- Qara-qoyunlu (喀喇裕云鲁), 154
- Qarashahr (焉耆, 即苦力叉), 44, 54, 135
- Qarataghliq (黑山派), 137—8
- Qarategin (喀喇的斤, 即喀尔提锦), 72, 185, 图 9
- Qarluq (葛逻禄), 60, 73, 148
- Qarshi (合儿昔), 157, 159, 179, 图 9, 10
- Qaydu (Chingizkhanid) (海都成吉思汗帝国), 106, 107, 130—1
- Qazan Khan (合赞汗), 152
- Qiram (吉拉姆), 120
- Qirqiz (see Kirghiz) (黠戛斯〔见吉尔吉斯〕), 73
- Qizil (克孜尔), 50
- Qocho (高昌), 62
- Qubad (居和多), 55, 56
- Qubilai (Chingizkhanid) (忽必烈〔成吉思汗帝国〕), 99, 100, 101, 103—9, 111
- Quinsai (“行在”), 8
- Quintus Curtius (昆图斯·库尔提乌斯), 28
- Qunduz (昆都兹), 42, 157; Treasure (昆杜兹宝藏), 34, 40, 图 9, 10
- Qungrats (孔格勒朝), 175
- Quriltai (忽里勒台), 88, 91, 92, 102—4, 115
- Qutayba, General (屈底波将军), 59, 65, 66
- Qutb al-din Muhammad (Ghurid) (屈特卜丁·穆哈默德〔廓尔朝〕), 76
- Qutb al-Islam (伊斯兰教的支柱), 169
- al-Rabi 'b. Ziyad (拉比·本·齐亚德), 64
- Rafi' b. Layth (拉菲·本·莱斯), 69
- Raga (Ray) (拉伽·赖依), 21
- Raim (Aralskoe) (赖姆·阿拉尔斯克), 203, 209
- Rai-pa-chen (热巴津), 82
- Ra-mo-che (小昭寺), 80
- Ray (赖依), 7, 21, 63, 152
- 'Red Hats' (“红帽派”), 81
- Rin-chen Zang-po (任钦桑布), 84, 85
- Rizaeddin Fihreddin (里宰丁·费赫拉丁), 190
- Riza Quli Mirza (里札·库里·米尔咱), 179
- Romanovskii, General D. I. (罗曼诺夫斯基将军), 210—211
- Roxana (露娜娜), 28, 29, 30
- Russia and Russians (俄国〔幹罗斯、苏联〕与俄国人〔幹罗斯人〕), 7, 16, 18, 53, 120—2, 124, 140, 144, 146—9 passim, 168, 173, 178, 181—6, 187—207, 208—26
- Sa'adi's (萨尔底的〔名言〕)
- Sabzavar (萨卜泽瓦尔), 158, 165, 166, 图 9, 10
- Saca (Sai-Wang) (塞种国王〔塞王〕), 39 ff.
- Sacae (塞种), 21, 22, 24, 25, 27—8, 31, 33, 38
- Sacaraucae (萨迦诺卡伊), 25, 40, 45
- Safavid Dynasty (萨法维王朝), 110, 158, 159, 160, 161, 164—5, 166—8, 172, 177, 178, 183
- Saffarid Dynasty (萨法尔王朝), 70, 71
- Sagala (Sialkot) (奢羯罗〔锡牙科特〕), 35
- Sagatians (萨加提), 22
- Sa'id b. al-'As (塞依德·本·阿斯), 63

- Sa'id Khan (Chaghatai) (赛德汗〔察合台汗国〕), 135-6
- Sairam (赛兰城), 145, 146, 图 8
- Saka Haumavarga (塞种豪玛瓦尔格), 图 3
- Sakastan (塞伽斯坦), 40
- Saka Tigrakhandā (塞种提格拉豪达), 图 3
- Sakavand (塞伽瓦德), 71
- Salih b. Nasr (萨利赫·本·纳斯尔), 64, 70
- Salm b. Ziyad (萨利姆·本·齐亚德), 64
- Samanid Dynasty (萨曼王朝), 71-5, 169
- Samarqand (撒马尔罕, 即康国, 撒麻耳干), 5, 6, 64, 65, 68, 69, 96, 123, 127, 128, 132, 133, 134, 142, 144, 151, 153, 154, 156, 157, 159, 162, 163, 164, 166, 172, 176, 178, 180, 203, 211, 213, 220
- Sanabares (萨纳巴瑞斯), 43
- Sanjar (Seljuqid) (桑杰尔〔塞尔柱朝〕), 75
- Sarakhs (撒刺哈夕), 63, 76, 166, 217,
- Saray (萨莱), 8, 115, 118, 120
- Saray-Berke (New Saray) (别儿哥萨莱〔新萨莱〕), 118, 120, 123
- Saraychik (小萨莱), 8
- Sarbardarid Dynasty (萨尔巴德朝), 113
- Sar-i Pul (Afghanistan) (萨里库尔〔阿富汗〕), 67
- Sar-i Pul (Mawarannah), Battle of (撒里库尔〔河中地区〕, 撒里库尔之战), 157
- Sasanian Dynasty (萨珊王朝), 50-3, 54, 56, 59, 60, 63
- Sasas (撒萨斯), 43, 48
- Satibarzanes (萨提巴赞尼斯), 27
- Sattagydjian (萨塔吉底亚), 22
- Saurashtra (沙拉斯特拉), 40
- Sayf al-Din Suri (Ghurid) (赛夫丁·苏里〔廓尔朝〕), 76
- Sayhun (锡尔河), 5
- Scythians (斯基泰人), 19, 42
- Sebüktigin (萨布克的斤), 73, 74
- Seistan (锡斯坦), 40, 图 2
- Selenga (色楞格河, 即薛良格河), 图 5
- Seleucid Era (塞琉西纪年), 21, 31-3, 40
- Seleucus, General (塞琉克斯将军), 28, 30, 31, 53
- Seljuqid Dynasty (塞尔柱王朝), 67, 75, 76, 102, 169
- Semipalatinsk (塞米巴拉金斯克), 147, 200, 208, 209, 219
- Semirechie (七河地区), 6, 7, 8, 127, 128, 131, 132, 133, 136, 140, 143, 145, 153, 201, 213, 218, 219
- Sera Metropolis (丝都), 53
- Serapis (塞拉庇斯), 48
- Sergiopol (谢尔吉奥波尔), 208-9
- Shah 'Abbas I (沙·阿拔斯一世), 166, 167, 184
- Shahin Giray (沙辛·吉列亦), 192-3
- Shah 'Isma'il (Safavid) (沙·亦思马因〔萨法维朝〕), 158, 159, 171
- Shah Jahan (Mughul) (沙·札罕〔莫卧儿帝国〕), 161, 176-7, 178
- Shah Murad (Mangit) (沙·木刺德〔满吉惕朝〕), 181, 184
- Shahrisabz (沙赫里萨布兹, 即渴石), 150, 图 10
- Shah Rukh (Timurid) (沙哈鲁〔帖木儿朝〕), 153-4
- Shah Rukh Beg (沙哈鲁伯克), 184
- Shah Tahmasb (Safavid) (沙·塔玛思普〔萨法维朝〕), 164, 165
- Shamanism (萨满教), 13, 61, 79, 87, 91, 116, 128
- Shamil (imam) (沙弥儿〔伊玛目〕), 203

- Shapur I (沙布尔一世), 51, 61; II (沙布尔二世), 52, 53, 54; III (沙布尔三世), 54
- Sharaf al-din 'Ali Yazdi (萨拉夫丁), 134
- Shari 'at (正宗教法), 119
- Shash (赭时), 5, 6, 65, 68, 71
- Shayban (Chingizkhanid) (昔班[成吉思汗帝国]), 124, 149, 142
- Shaybanid Dynasty (昔班王朝), 125, 140, 143, 161, 163—8, 171—4, 175, 176
- Shaykh Ahmad Yasavi (沙黑·阿黑麻·牙撒吾), 136, 170
- Shaykh Haydar (Shaybanid) (沙黑·海答儿[昔班朝]), 142
- Shaykh Uwais (Jalayrid) (沙黑·兀洼思[札刺亦儿朝]), 121
- Shigatse (日喀则), 78, 85
- Shihab al-din Muhammad (Ghurid) (什哈布丁·穆哈默德[廓尔朝]), 77
- Shihabeddin Marjani (什哈拜丁·迈尔杰尼), 190
- Shi'ites (什叶派), 155, 158, 159, 160, 163, 168, 235
- Shiraz (设拉子即失罗子, 失刺思), 113, 152
- Shir-Ghazi Khan (失尔加兹汗), 148
- Shirvan (希尔万), 118
- Sibagan (Chingizkhanid) (昔班汗[成吉思汗帝国]), 124
- Siberia (西伯利亚), 25—6, 173, 189, 202, 208, 209, 214, 220, 225
- Sibir Khanate (亦必儿汗国), 124, 125, 141, 192, 208
- Sibyrus (西彼耳提乌斯), 30
- Sighnaq (昔格纳黑), 141
- Simferopol muftiat (幸菲罗波尔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193; Assembly (幸菲罗波尔大会), 196
- Sinjibu (Silzibul) (室点密), 56, 59
- Sinkiang (Chinese Turkestan) (新疆[中国突厥斯坦]), 2, 4, 8, 62, 137
- Siryx (希里克斯), 33
- Sisamnes (希萨姆涅斯), 24
- Sistan (锡斯坦), 22, 50, 63, 65, 68—71, 152
- Sivas (锡瓦斯), 152
- Skandagupta (塞建陀笈多), 55
- Skobelev, general M. O. (斯科别列夫将军), 204, 215, 216, 217
- Sogdian, Sogdiana (索格底亚那), 22, 24, 27, 28, 29, 39, 40, 51, 53, 59, 60, 64, 65, 66 Language (粟特语), 66
- Song-tsen Gampo (松赞干布), 79, 80, 84
- Sophagascenus (索发盖塞奴斯), 33
- Soter Megas ("伟大的教皇"), 46
- Soviet Union (苏联), 168, 191—2, 196, 201, 226
- Spalagdames (悉婆罗格达米思), 41
- Spalirises (悉婆里瑞塞思), 41
- Spargapises (斯帕尔伽皮塞斯), 20
- Spasskii (斯帕斯基), 221
- Spitamenes (斯皮达玛), 27—8, 31
- Stasanor (斯塔萨诺耳), 30
- Stoddart, Colonel Charles (查尔斯·斯托达特上校), 182
- Stoletov, Colonel N. G. (斯托列托夫上校), 216
- Strabo (斯特拉波), 39
- Strato I (斯特拉托一世), 36, 37
- Stroganovs (斯特罗甘诺夫), 125
- Sübetei (速不台), 95, 96, 114
- Subhan Quli (Janid) (速班·库里[札尼朝]), 177, 178, 179
- Suleyman (苏莱曼), 66
- Sultangalievism (苏丹加列夫主义), 192, 207
- Sultaniyeh (苏丹尼耶), 152, 图 7, 9
- Su-lu (苏禄), 59, 66
- Sung Dynasty (宋朝), 93, 98, 100, 102, 103, 105

- Sunni Islam (逊尼派伊斯兰教), 128, 153, 155, 158, 159, 160, 163, 168, 172
- Surdaq (苏勒达科), 120
- Surkh Kotal inscription (苏科克塔尔德文), 45—6, 57; Buddha (苏科克塔尔德佛), 48
- Susa (苏撒), 22, 31
- Susiana (苏西亚那), 24, 32
- Su-tsung (唐肃宗), 80
- Suyurghatmish Khan (速赤儿哈的迷失汗), 15
- Syr Darya (锡尔河, 即忽章河, 火站河, 药杀水), 2—6 passim, 132, 140—6 passim, 156, 158, 166, 171, 175, 185, 198, 199, 203, 209, 210, 215—16, 223, 图9
- al-Tabari (泰伯里), 50, 55, 72
- Tabaristan (陀拔斯单), 70, 71
- Tabas (塔八斯), 63, 166, 图9
- Tabriz (大不里士, 即桃里寺、帖必力思), 7, 110, 113, 119, 121, 123, 151, 171, 图9
- Tagir Khan (塔赫尔汗), 143
- Tahir (塔希尔), 69
- Tahirid Dynasty (塔希尔朝), 69, 70
- Tai-tsung (唐代宗), 80
- Tajikistan (Tajiks) (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 9, 13, 48, 54, 173, 183, 186, 206, 207
- Takash (Khwarazmshah) (塔喀什[花刺子模王]), 76, 77
- Takht-i Bahi (塔克提巴希), 43, 44
- Tajha b. Tahir (塔勒哈·本·塔希尔), 69
- Taliqu (Chaghatai) (塔里忽[察合台汗国]), 131
- Tambrax (坦博拉茨), 33
- T'ang Dynasty (唐朝), 59, 79, 89
- Tanguts (党项, 西夏), 74, 83, 90, 93, 97, 99
- Tanjur (丹珠尔), 85
- Tantric Buddhism (佛教密宗), 81
- Taraghai (塔刺海), 150
- Taranchis (塔兰奇人), 213
- Taraz (怛逻斯), 73
- Tarikh-i Rashidi («拉失德史»), 135—6
- Tarikh-i Sistan («锡斯坦史»), 69
- Ta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 3, 45, 50, 62, 128, 137, 138—9
- Tarmashirin (Chaghatai) (答儿麻失里[察合台汗国]), 132, 151
- Tashkent (see Shash) (塔什干, 即察赤, 达失干 [见赭时]), 5, 65, 71, 134, 135, 143—6, 157, 163, 185, 197, 203, 205, 206, 210—14, 218, 223, 224, 226
- Tatars (Mongolia) (鞑靼[蒙古]), 73, 86, 89, 90, 91
- Tatars (Russia) (鞑靼[俄国]), 117, 119, 120—2, 124, 126, 187—92, 192—7, 200, 204, 205, 223
- Tatar language (鞑靼语), 117, 191, 196
- Tatarstan (鞑靼斯坦), 207
- Tauke Khan (头克汗), 144, 145
- Taxila (塔克西拉, 咀叉始罗), 36, 37, 40, 41, 43, 44, 49, 图3, 4
- Tayabad (塔亚巴德), 154, 图9
- Teb-Tengri (阔阔出), 91
- Tehran (德黑兰), 181
- Tejen oasis (捷真绿洲), 217
- Tekke (特克人), 216
- Temüjin (see Chingis Khan) (铁木真 [见成吉思汗]), 89, 90, 91
- Temür (铁穆尔), 107, 109
- Tepe Maranjan (特佩马兰贾), 54
- Terek (捷列克), 118, 123
- Termez, see Tirmiz (铁尔梅兹, 即怛没, 又见忒耳速)
- Tevkkel Khan (特夫克勒汗), 144
- Thamanaei (塔蛮尼), 22, 23
- Theophilus (狄奥斐卢斯), 37
- Theophrastus (泰奥弗拉斯托斯), 24

- Thomas, Apostle (传道者托马斯), 43
 Thon-mi Sambhota (吞米·桑布扎), 80
 Tibet (吐蕃、西藏), 9, 15, 18, 44, 78
 Tibetans (吐蕃人), 9, 15, 18, 44, 78
 Tigrakhauda (提格拉豪达), 25
 Timur (帖木儿), 108, 110, 113, 122—4, 132, 134, 140, 141, 149, 150—3, 161, 164; *Mulfuzat-i Timuri* («帖木儿纪年»), 161
 Timur Dynasty (帖木儿王朝), 15, 17, 110, 123, 136, 140, 141, 149—62, 164, 166—9 *passim*, 171, 172, 173
 Timur Shah Durrani (帖木儿笃来尼), 181
 Tirmiz (忒耳迷), 128, 132
 Tobolsk (托博尔斯克), 202
 Tochari (吐火罗), 39, 40, 41, 42—3, 44—5
 Toghril (脱斡邻), 90, 91
 Tokat (脱卡特), 102
 Tokharian dialects (吐火罗方言), 62
 Tolui (Chingizkhanid) (拖雷[成吉思汗帝国]), 93, 96, 101, 103, 104, 130
 Tomyris, Queen (托米丽丝王后), 20
 Toramana (头罗曼), 56, 57
 Töregene Khatun (脱列哥那可敦), 102
 Torguts (土尔扈特部), 144
 Tou-man (头曼单于), 39
 Transcaspia (外里海), 216, 217, 220; Railway (外里海铁路), 220
 Transoxania (河中地区), 5
 Trans-Siberian Railway (西伯利亚铁路), 219
 Tri-song De-tsen (赤松德赞), 79, 80, 81, 82
 Tri-tsung De-tsen (赤祖德赞), 79, 82, 83, 84
 Trogus (特罗古斯), 35, 42
 Trotskii, Major-General (特罗斯基少将), 216
 Tsang-Po (藏布江), 78
 Tsevan-Rabtan (策妄阿拉布坦), 138, 145
 Tughluqid Sultans (秃忽鲁朝诸苏丹), 151
 Tughluq-Timur (Chaghatai) (秃忽鲁帖木儿[察合台汗国]), 127, 133, 134, 151
 Tukharistan (吐火罗斯坦), 42, 73, 161, 166
 Tukhsi (突骑施), 74
 Tukhtu (Chingizkhanid) (脱脱[成吉思汗帝国]), 119
 Tulabugha (Chingizkhanid) (秃刺不花[成吉思汗帝国]), 119
 Tu-men (土门可汗), 59
 Tungus (东胡), 39
 Tunguses (东胡族), 86
 Tun-huang oasis (敦煌绿洲), 6, 39, 62
 Tuqtamish (Chingizkhanid) (脱脱迷失[成吉思汗帝国]), 122, 123, 14), 150, 151
 Turbat-i Shaykh Jam (托尔巴特谢赫贾姆), 154, 158, 166; Battle of (托尔巴特谢赫贾姆之战), 164—5, 图9
 Turfan (吐鲁番, 即哈刺火州), 2, 6, 62, 134, 135, 145
 Turgai (图尔盖), 199, 200, 201, 209, 219, 222
 Türgesh (突骑施), 59, 66, 67, 148
 Turkestan (突厥斯坦), 142, 143, 145, 146, 147, 149, 187, 189, 190, 192, 197, 198, 202—7, 208—26; Soviet Republic (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 206—7
 Turkestan-Siberian Railway (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 220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207
 Turkomans (土库曼人), 9, 13, 32, 102,

- 144, 154, 171, 173, 181, 183—4, 216, 222—3; language (土库曼语), 183, 184
- Turks (突厥人), 59, 64—6, 71—4, 86, 114, 118, 127, 139, 141, 148, 172—3, 183
- Tus (图斯, 即徒思), 5, 63, 69, 164, 图 9
- Tuva (Chaghatai) (笃哇〔察合台汗国〕), 130—1, 132, 133
- ‘Ubaydullah Khan (Shaybanid) (兀拜都刺汗·昔班朝), 159—60, 163—5, 166, 171
- Ubaydullah Valikhanov (兀拜都刺·瓦利卡诺夫), 198—9
- Ubaydullah b. Ziyad (欧贝杜拉·本·齐亚德), 64
- Uch-Turfan (乌什), 135, 137
- Udyana (乌仗那), 81
- U8-Tsi speech (月氏语), 45
- Ufa (乌法), 212
- Uighurs (回鹘人、畏吾儿), 4, 9, 60—2, 74, 80, 91—3, 100, 105, 108, 110, 111, 128
- Uljaytu (Chingizkhanid) (完者都〔成吉思汗帝国〕), 119, 132
- Ulugh Beg (Timurid) (兀鲁伯·帖木儿帝国), 134, 135
- Ulutavsk (乌卢塔夫斯克), 209
- Umayyad Dynasty (倭马亚朝), 65, 66, 67, 68
- ‘Umar Shaykh (Timurid) (兀麻尔·沙黑〔帖木儿帝国〕), 153, 155
- Ural river (乌拉尔河), 8, 140, 143, 144, 146
- Ura-Tyube (乌拉秋别), 185, 211, 213
- Urganj (乌尔根奇, 即玉龙杰赤), 5, 6, 8, 96, 114, 123, 141, 152
- Urmia, L. (乌尔米耶湖), 图 3
- Urumchi (Ti-hua) (乌鲁木齐〔迪化〕), 8
- Ust-Kamenogorsk (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 147, 208, 222, 图 8
- U-sun dialects (乌孙方言), 45
- Utti (乌提), 22
- Uzbeks (乌兹别克人), 9, 13, 17, 110, 135, 139, 140, 142, 150, 157—73 passim, 177—86, 201, 213; Khanate (乌兹别克汗国), 118—21, 140, 142, 175—9
- Uzgand (乌兹根), 图 10
- Uzkand (乌兹建), 74
- Uzun Hasan (乌宗哈散), 155
- Vahyzdata (瓦黑阿兹达特), 21
- Valikhanov, Chokan (赤坎·瓦里哈诺夫), 200
- Vardanes (哇尔达尼斯), 44
- Vasishka (伐尸乞迦), 46
- Vasudeva I (波调一世), 46, 50
- Vasumitra (伐苏蜜罗), 48
- Vays Khan (Chaghatai) (瓦思汗〔察合台汗国〕), 133—4, 149
- Verevkin, Conolel N. A. (维列夫金上校), 210
- Vernyi (Alma-Ata) (韦尔内〔阿拉木图〕), 203, 209, 210
- Vikramashila (超戒寺), 85
- Vima Kadphises (阎膏珍), 46
- Vistaspa (Gushtasp) (维什塔斯帕), 21
- Vitold (维托尔德), 123, 124
- Volga, R. (伏尔加河, 即也的里河), 图 7
- Vonones (乌奴你思), 41
- Wassaf (瓦撒夫), 127
- Wèn-Ch’eng (文成公主), 80
- White Horde. The (白帐), 122, 124, 131—2, 140
- William of Rubruk (卢卜鲁克), 17,

- 103, 105, 115, 116
 Wu-Sun, the (乌孙), 20, 39, 42
- Xenophon (色诺芬), 23
 Xerxes I (薛西斯一世), 23, 24
- Yabaqu (药拔古), 73
 Yaghma (样磨), 74
 Yahya b. Zayd (雅赫雅·本·宰德), 67
 Ya'qub b. al-Layth al-Saffar (牙古布·本·莱斯·萨法尔), 70
 Yarkand (叶尔羌, 即鸦儿看, 牙儿干), 6, 10, 106, 128, 133, 136, 139, 149
 Yasa (札撒), 89, 92, 109, 110, 119
 Yasi (牙普), 144, 146, 170, 203, 210
 Yazc (亚兹德), 113
 Yazdagird III (伊嗣俟三世), 60, 63
 Yazid b. al-Muhallab (叶基德·本·穆哈拉布), 65
 Yeh-lu Ch'u-ts'ai (耶律楚材), 94
 Yenisei (叶尼塞河, 即谦河), 图 5
 Yemek (咽面), 73
 Yermak (叶尔马克), 125
 Ye Shes-od (意希沃), 84
 Yesugei-Baghatur (也速该·巴阿秃儿), 89, 90
- Yesü-Möngke (也速·蒙哥), 129
 Yildiz (野勒特斯), 77
 Ying-tsung, Emperor (明英宗), 141
 Yuan Dynasty (元朝), 105, 106, 107, 109, 132
 Yüeh-chih (月氏), 39, 43, 44
 Yünus (Chaghatai Khan) (羽奴思[赛合台汗]), 134, 135, 142, 149, 156
- Zabulites (疾布里提), 56
 Zaporozhia (扎波罗热), 194
 Zarafshan (扎拉夫尚), 图 9
 Zaranj (疾陵城), 69, 70
 Zariaspa (Bactra) (扎里亚斯普[巴克特拉]), 27, 28
 Zerabulak, Battle of (吉拉布拉克之战), 203, 213
 Ziyad b. Abi Sufiyan (齐亚德·本·阿比·苏菲亚), 64
 Ziyad b. Salih (齐亚德·本·萨里赫), 68
 Zoilus I (佐鲁斯一世), 37
 Zoilus II Soter (佐鲁斯二世索特), 38
 Zoroastrianism (琐罗亚士德教), 21, 48, 54, 60
 Zunbil (熟毗利), 70